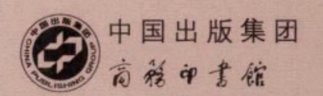


伊拉克史

〔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 著　张旭鹏 译



A Short History of Iraq



A Short History of Ira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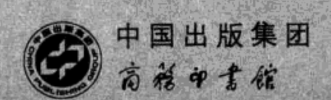




伊拉克史

〔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 著　张旭鹏 译

A Short History of Iraq



A Short History of Iraq (ISBN:9781405859370) by Thabit A. J. Abdullah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This translation of A SHORT HISTORY OF IRAQ, Secon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克史/(美)阿卜杜拉著;张旭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9768-0
Ⅰ.①伊… Ⅱ.①阿… ②张… Ⅲ.①伊拉克—历史 Ⅳ.①K3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7858 号

责任编辑　张艳丽
装帧设计　熊熊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次　201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

"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献给我的父亲：科学家、诗人和伊拉克爱国者，

阿卜杜勒-贾巴尔·阿卜杜拉博士

以及那个使他成为他自己的女人，

我的母亲：吉丝米特·法雅德



致　谢

viii

在 2003 年出版的本书第一版中，我写下了如下文字：

>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美英军队看上去就要完成他们对伊拉克的征服了。这一事件无疑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本书在未来仍需补充另外一章加以阐述。

当前的第二版完成了这个需要，它增加了美国入侵后的伊拉克这一章。而当我写下第二版的最后一段文字时，我不禁再次感到，本书依旧尚未完成，因为这个国家在界定其新的形态的奋斗中，仍然困难重重。2010 年 3 月，在我交出本书的新稿后，这个国家举行了第三次全国大选。在社会、经济冲突的严酷条件下举行另外一场选举，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伊拉克人民的恢复能力，也证明了伊拉克人民并没有完全屈从于撕裂他们的种种危险力量。此外，选举也产生了一些让人吃惊的后果。尽管许多旧有的以宗派为基础的联盟依然存在，但两个主要的挑战者伊亚德·阿拉维和努里·马里基，已经在客观上明显扩大了他们的同盟。阿拉维的“伊拉克国家运动”（Iraqi National Movement）[①]尤其如此，它以将

---

① 又称“伊拉克名单”（Iraqiyya List），是阿拉维领导的一个政党联盟。——译者

近四分之一的选票独占鳌头。选民们趋向于惩罚像什叶派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这样强大的宗派组织,它只获得了远远落后的第三名。即便在通常情况下团结一致的库尔德联盟,也因为有着像"戈兰党"(Goran)①这样挑战曾经不容置疑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新组织,而显得伤痕累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宗派主义和分裂的威胁,而是表明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显示出政治论争正在转向对国家问题而不是宗派问题的关注。不过,阿拉维"伊拉克名单"惹人注目的表现,也彰显了复兴党党员的复苏。失去 ix 公民权和被隔离的逊尼派及什叶派复兴党党员构成了阿拉维联盟的主要部分。这一被认为是边缘化的和不受欢迎的群体,无疑将在形塑国家的本质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我要感谢那些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和研究机构。我的朋友蒂娜·霍里(Dina Khoury),她也是最好的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学家之一,最初是她向编辑引荐了我。戈登·马特(Gordon Martel)要求我写作本书,并对第一版提出了一些很有帮助的建议。海赛姆·阿卜杜拉(Haitham Abdullah)亦然,他还出色地完成了本书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阿历克斯·怀特(Alex Whyte)编辑了第一版的最后一章。培生教育出版集团(Pearson Education)的海瑟·麦克考兰(Heather McCallum)、布莉·艾利斯(Bree Ellis)和梅兰妮·卡特(Melanie Carter)使复杂的管理和编辑工作进展得顺利而有效。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法兰西阿拉伯研究所(Institut Francais d'Etudes Arabes de Damas)为我提供了一流的研究设施。爱德华·梅特尼埃(Edouard Metenier)对第三章和第四章提出了建议,凡妮莎·范兰特翰(Vanessa van Renterghem)为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提供了建议,他们两人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研究伊拉克的历史学者。我还要感谢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的克里斯蒂娜·卫普·佩里(Christina Wipf Perry)、杰西卡·哈里森(Jessica Harrison)和娜塔莎·惠

① "戈兰党"为库尔德的一个独立政党,"戈兰"在库尔德语中的意思是"改变"。——译者

兰(Natasha Whelan),感谢她们出版目前的第二版。她们不得不容忍我的一再拖延,感谢她们的耐心。最重要的是,我要由衷地感谢我的妻子萨梅拉(Samera)对我的支持,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雅丝敏(Yasmine)和拉米(Rami),终有一天他们长大后会为他们的伊拉克传统感到骄傲。

x

出版者致谢

我们感谢以下出版物、机构和个人惠允复制其版权资料：

图表

图表 5.1 和 5.2 采自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Candi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tatu, Hanna 1978) p. 106, Copyright © 197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经普林斯顿大学允许重印。

文字

112 页(该页码指本书边码。——译者)的诗歌选自 *Modern Arabic Poetry: An Anth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d. Jayyusi, S. K. 1987) p. 80, Copyright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经出版者允许重印。115 页(该页码指本书边码。——译者)的诗歌选自 *Placing the Poet: Badr Shakir al-Sayyab and Postcolonial Iraq*, 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Press (Deyoung, T. 1998) p. 15。

内页图片

书中图 1.1,3.1,4.1 和 5.1 经 GNU Free Documentation 许可;图 1.2 为 Getty Images/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所有;图 2.1 为 TopFo-

to/Roger Viollet 所有；图 6.1 为 Thabit A. J. Abdullah 所有；图 6.2 为 Topham Picturepoint 所有；图 7.1 为 TopFoto/Topham/AP 所有；图 7.2 为 Corbis/Peter Turnley 所有；图 8.1 为 Corbis/epa 所有。

彩色插图

插图 1 为 Thabit A. J. Abdullah 所有；插图 2 为 akg-images Ltd：Gerard DeGeorge 所有；插图 5 经 GNU Free Documentation 许可；插图 6 为 T SGT John L. Houghton Jr，USAF 所有；插图 7 为 Corbis：Ben Curtis/Reuters 所有；插图 8 为 Reuters：Thaier Al-Sudani 所有。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无法找到版权资料的所有者，对任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版权资料所有者的信息，我们都深表谢意。

大 事 年 表

224 年	萨珊波斯人占领伊拉克。距今巴格达以南 35 公里的泰西封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都城。
580 年	阿拉伯拉赫姆王朝的国王努曼三世(Nu'man III)皈依基督教聂斯托利派。
602—628 年	拜占庭萨珊波斯之战。
628 年	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袭击了位于泰西封附近的萨珊波斯皇宫。
636 年	阿拉伯穆斯林在卡迪西亚战役中摧毁了萨珊波斯的主力部队,为征服伊拉克铺平了道路。
656 年	在巴士拉附近发生了穆斯林之间的第一次重大战争"骆驼之战"。
661 年	哈里发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在库法遇刺,穆阿维叶·伊本·艾比·苏福扬在大马士革宣布成为哈里发。反抗倭马亚王朝统治的什叶派开始其早期发展。
680 年	侯赛因·伊本·阿里在卡尔巴拉发起反抗并遇害。
694—714 年	伊拉克处于哈查只·伊本·优素福统治之下。
750 年	阿拔斯革命灭掉倭马亚王朝,穆斯林的统治中心移

	至伊拉克。
762 年	巴格达成为新成立的阿拔斯王朝的都城，该城由哈里发曼苏尔所建。
768—809 年	哈里发拉希德统治时期，阿拔斯王朝到达鼎盛。
836—892 年	阿拔斯王朝的都城暂时从巴格达迁移至北部的萨马拉。
868—883 年	黑奴起义。
900 年	巴格达的人口达到 150 万。
935 年	哈姆丹阿拉伯人夺取摩苏尔，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王朝。“埃米尔”这一新职位的设立标志着哈里发权力的衰落。
941 年	以马赫迪著称的什叶派第十二任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哈桑神奇地隐遁。
945—1055 年	信奉什叶派的布韦希波斯人掌控了埃米尔这一称号，他们统治着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
961—1150 年	马季亚德王朝在其都城希拉统治着伊拉克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1010—1097 年	乌凯勒王朝统治着包括摩苏尔在内的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
1055—1160 年	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伊拉克，恢复了逊尼派的统治。
1180—1225 年	哈里发纳绥尔统治时期见证了哈里发权威的恢复。
1258 年	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洗劫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结束。
1295 年	蒙古统治者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
约 1335—1410 年	伊拉克处在蒙古哲拉伊尔王朝无力的统治下。
1347 年	鼠疫夺取大量人口的性命，国家经济严重受损。
1401 年	帖木儿劫掠巴格达。
1410—1469 年	伊拉克处在土库曼黑羊王朝的统治下。

xii

1436 年	穆沙沙运动在伊拉克南部兴起。
1469—1508 年	伊拉克处在土库曼白羊王朝的统治下。
1508 年	伊朗萨非王朝攻占巴格达。
1514 年	查尔迪兰之战。伊拉克北部部分地区被奥斯曼人统治。
1534 年	苏丹苏莱曼大帝征服了伊拉克的剩余领土,将之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内。
1623 年	阿拔斯大帝使巴格达重归萨非王朝统治,但他没能占领伊拉克的其余部分。
1625—1668 年	巴士拉阿甫剌昔牙卜王朝统治时期。
1638 年	在让人精疲力竭的围城之后,苏丹穆拉德四世进入巴格达。伊拉克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近三个世纪。
1639 年	《佐哈布条约》,又称《席林堡条约》,确定了伊拉克的东部边界。
1723 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巴士拉设立一家永久商行。
1732—1743 年	纳迪尔·沙发动一系列战争。
1750—1831 年	巴格达和巴士拉的马穆鲁克总督使伊拉克从伊斯坦布尔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治。
1776—1779 年	伊朗人占据巴士拉。
1802 年	瓦哈比派袭击卡尔巴拉。
1831 年	奥斯曼人再次征服巴格达,建立对其的直接统治。
1847 年	《埃尔祖鲁姆条约》划定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边界。
1869 年	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加强了巴士拉与欧洲的海上贸易。
1869—1872 年	米德哈特·帕夏担任巴格达总督期间,进行了影响深远的改革。
1899 年	英国宣布科威特为其保护国。
1903 年	奥斯曼帝国政府授权一家德国公司兴建柏林至巴

xiii

格达的铁路。

1906 年　伊朗宪政革命。

1908 年　伊斯坦布尔发生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伊朗发现石油。

1914—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和奥地利一方对抗英国、法国和俄国。

1914 年　英军登陆巴士拉。

1916 年　《赛克斯-皮科协定》签署，英法两国就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中东地区达成协议。

1917 年　莫德将军进驻巴格达。

1920 年　国际联盟委派英国对伊拉克实行托管。伊拉克南部发起反英起义。

1921 年　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成为伊拉克第一任国王。 xiv

1927 年　基尔库克附近发现石油。

1930 年　《英伊条约》保证了英国对伊拉克的统治现状。

1932 年　伊拉克王国正式独立。

1934 年　伊拉克共产党成立。

1936 年　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标志着军队对政治的直接干涉。

1939—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 年　巴格达发生反对英国人的拉希德·阿里运动，引发了对犹太人的袭击。

1948 年　伊拉克普遍爆发反英起义。伊拉克在第一次阿以战争中象征性地派出一支军队。

1952 年　埃及发生纳赛尔革命。

1955 年　《巴格达条约》形成。

1958 年　卡希姆将军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拉克共和国。

1960 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巴格达成立。

1963 年　　复兴党联合军队在一次血腥的政变中推翻了卡希姆政府。

1967 年　　伊拉克军队象征性地参加了第三次阿以战争。

1968 年　　复兴党取得了对政府的单独控制。达瓦党成立。

1970 年　　同意库尔德地区建立自治。

1972 年　　石油工业的国有化。

1973 年　　第四次阿以战争。

1974 年　　复兴党领导的包括伊拉克共产党在内的全国进步阵线成立。

1974—1975 年　　库尔德斯坦战争。

1979 年 2 月　　伊朗伊斯兰革命。

1979 年 7 月　　萨达姆·侯赛因成为伊拉克总统。

xv

1980—1988 年　　两伊战争。

1982 年　　霍拉姆沙赫尔战役。

1988 年　　对哈拉比亚使用毒气,针对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由此达到顶峰。

1990 年　　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严厉制裁。

1991 年　　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并占领了伊拉克部分地区。自发形成的反对萨达姆的起义被镇压。

1992 年　　在多国部队的保护下,库尔德自治议会开始选举。

1997 年　　石油换食品计划开始实施。

1998 年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被迫撤离伊拉克。

2001 年 9 月　　针对美国世界贸易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发生。

2002 年 3 月　　伊拉克恢复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2002 年 11 月　　联合国呼吁伊拉克重新接纳国际观察员,并完全解除其化学、生物及核武器。

2003年3月	美英两国入侵伊拉克,宣称目标是结束萨达姆的独裁统治。
2003年4月	美军进入巴格达。美国控制的"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实施对伊拉克的管理。
2003年12月	萨达姆·侯赛因被抓获。
2004年6月	伊拉克临时政府正式接管这个国家。"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解散。
2005年1月	国民议会大选遭到大多数逊尼派的抵制,导致了以宗派为基础的联盟的出现。
2005年10月	新宪法在全民复决的基础上通过。
2005年12月	第二次大选产生了一届固定政府。
2006—2007年	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暴力冲突达到顶峰。
2006年12月	萨达姆·侯赛因被处决。
2009年1月	地方性选举产生了一些立足于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主义问题的新联盟。
2009年6月	美军撤出伊拉克各城市,并向伊拉克政府移交150处军事基地。伊拉克政府宣布6月30日为"国家主权日"。
2010年3月	在第三次全国大选中,顽固的宗派组织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衰落,而民族主义者却有着更为醒目的表现。

xvi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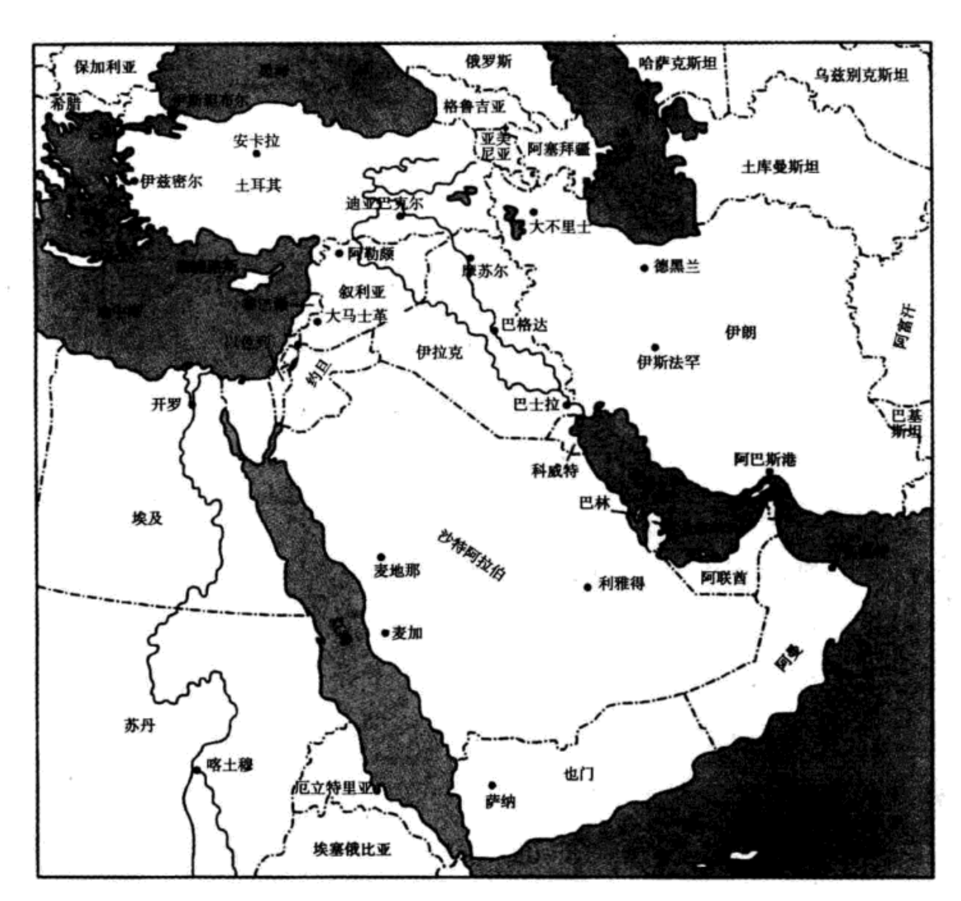
本书对上自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下及美国主导下的对伊拉克的占领及民选政府的成立这一时期，发生在伊拉克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型进行了简要考察，其重点在于现代。本书的基本着眼点是，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是怎样在这块动荡的土地上为了共存而斗争。当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为一种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时，这个国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它潜在的财富已经招致了外敌的多次入侵和吸引着移民的不断迁入，它们往往会打破社会的平衡。由于地处波斯与地中海文化区之间，伊拉克社会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常常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

“伊拉克”一词在不同时期指的是不同的地区。在本书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里，“阿拉伯伊拉克”可以被理解为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大致从北部的提克里特(Tikrit)地区直到南部的波斯湾。为了使本书所叙及的事情简单化，“伊拉克”一词将包括1921年诞生的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全部领土。之所以将阿拉伯人的征服看作是起点，原因在于它赋予今天的伊拉克社会两个至为重要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特征。首先是阿拉伯语，它后来成为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基础。虽然阿拉伯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但它没有完全消除其他的语言或种族认同，比如库尔德语、亚述语和土库曼语。其次是伊斯兰教，它同样统治着伊拉克社会，但并没有根除宗教的多样性。实际上，伊斯兰教因为其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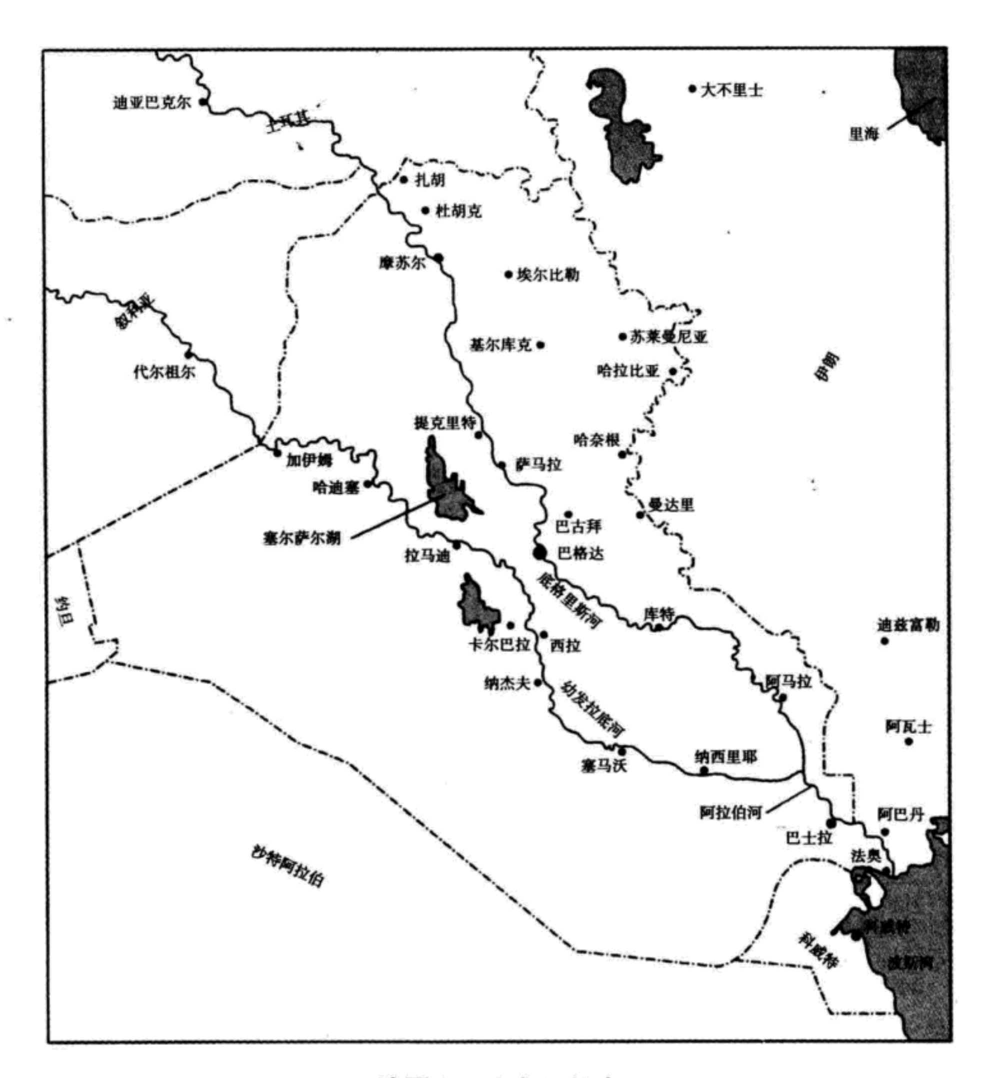
种竞争性的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反而带来了一种新层次的多样性。

第一章考察了伊拉克怎样从波斯帝国的衰落中出现，并重建其作为一个新兴而繁荣的帝国之中心的地位。直到10世纪中期，伊拉克的统治集团仍然来自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人或被阿拉伯化的其他民族。然而，从大约950年到12世纪早期，来自东部的族群（波斯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成为主要的统治阶级。尽管伊拉克的繁荣期在此前很早就已经开始衰退，但蒙古人1258年的入侵，还是应当被视作标志着中世纪伊拉克衰落的重要事件，本书将在第二章里加以说明。此后，伊拉克呈现出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状况，它成为一处贫瘠而褊狭的死寂之地，更多地转向了东方而不是地中海。第三章和第四章将涉及1534—1918年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长期统治下，国家又恢复了相对的稳定，并重新转向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世界。作为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努力的结果，伊拉克于19世纪（第四章）开始从地方隔离状态中走出，其经济也融入到不断扩展的欧洲经济之中。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控制了伊拉克。在英国人的庇护下（第五章），一个新的阿拉伯统治集团统治了这个国家，开始建立独立的现代伊拉克国家。国家体制和民族建构的发展表明，这个国家从君主制向共和国的转变将是一个动荡的过程（第六章）。在经历了20年剧烈的政治斗争后，这一过程让位于萨达姆·侯赛因的集权主义和独裁统治（第七章）。独裁统治的压迫和好战本质，用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和国际制裁考验着伊拉克的社会结构，这在2003年美国主导下的占领中达到顶峰。在美国的霸权之下（第八章），伊拉克经历了多个至今仍然在持续的阶段。法律的丧失、宗派主义和混乱失序成为后萨达姆时代的主潮，它们只是到现在才显示出颓败的迹象。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后，伊拉克数量众多的社会群体依然不得不继续寻找出路，以便在困难而痛苦的追求国家和谐的过程中，重新界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xviii



地图1　伊拉克与现代中东



迪亚巴克尔
土耳其
大不里士
里海
扎胡
杜胡克
摩苏尔
埃尔比勒
叙利亚
苏莱曼尼亚
基尔库克
哈拉比亚
伊朗
代尔祖尔
提克里特
哈奈根
加伊姆
萨马拉
哈迪塞
曼达里
巴古拜
塞尔萨尔湖
巴格达
拉马迪
底格里斯河
约旦
库特
迪兹富勒
卡尔巴拉
西拉
纳杰夫
阿马拉
幼发拉底河
阿瓦士
塞马沃
纳西里耶
阿拉伯河
阿巴丹
巴士拉
沙特阿拉伯
法奥
科威特

地图 2　现代伊拉克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从阿拉伯人的征服到巴格达的陷落:636—1258年

633年,当第一支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向幼发拉底河西岸进发时,居住在今天被称作伊拉克的土地上的人口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多数人操着各式各样的阿拉姆语方言,他们在土地之上劳作,通常受到被称作“大人”(*dahaqin*)的波斯贵族和官僚阶级的统治。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沙漠地区为阿拉伯各部落所占有,这些部落既是游牧型的也是定居型的。其时,库尔德人居住在扎格罗斯山脉的西北山麓,他们的语言与波斯语有关。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分散着希腊人、印度人、非洲人甚至一些仍然说着晚期巴比伦方言的人群。7世纪的时候,人口中的大多数都皈依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只有北部还保留着一些基督一性论派信徒。犹太人社团在这里随处可见,琐罗亚斯德教却只在波斯士兵和波斯官员中盛行。这里还有着数量不菲的诺斯替教曼达派信徒和摩尼教教徒、各种异教组织,以及少量信奉印度宗教传统的人士。阿拉伯穆斯林统治的确立,为伊拉克带来了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宗教和语言,也加强了这个新生国家的中央化程度,极大地提升了伊拉克的社会凝聚力。

在阿拉伯人征服的初期,这些民族依然能够回忆起他们悠久而光辉的传统,并为之感到自豪。大概在远至公元前3700年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就率先建立起永久性的城市中心,从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具

有决定性作用的一章。在灌溉农业这个主要基础之上，城市很快就发展出最早的文字体系，以及用于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最早法典。苏美尔人时期，伊拉克南部涌现出许多类似的独立城市国家。大约公元前1700年时，闪族人中的一支阿摩利人成功地将这些城市国家统一为一个帝国，定都于巴比伦。在穆斯林征服之前，伊拉克目睹了诸多相继出现的帝国。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美索不达米亚各族人民在科学、艺术和社会经济交往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我们很难在这里一一列举。如此丰厚的遗产日后必将给后世伊斯兰文明的发展，烙上深刻的印迹。

萨珊波斯统治的最后岁月

224年，萨珊波斯人征服了伊拉克，这里很快就成为他们广袤帝国中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帝国之都泰西封坐落在今天巴格达正南的底格里斯河河畔，位于被阿拉伯人称作“塞瓦德”（*Sawad*，即“黑土地”之意）的伊拉克中南部富饶的农业平原北端。国家对复杂的灌溉沟渠网络所作的经常性维护，使这块“黑土地”成为帝国的粮仓和主要的税收来源。萨珊波斯与拜占庭是不共戴天的仇敌，602至628年间，两个地区性大国之间的冲突变得尤其不可收拾。库斯老二世在位期间，萨珊波斯对拜占庭帝国领土发动了大规模入侵，夺得叙利亚和埃及，并于615年威胁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不过，当皇帝希拉克略将入侵的军队全部赶过幼发拉底河并深入伊拉克时，局势发生了逆转。希拉克略甚至在627到628年间袭击了泰西封郊外的皇宫。之后，萨珊波斯开始向拜占庭缴纳繁重的贡赋，作为后者撤兵的代价。两国之间的攻防给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杀戮、劫掠及焚烧城市和庄稼之后，是灌溉沟渠的破坏、洪水、瘟疫与政治动荡。632年，伊嗣埃三世恢复了一定的秩序，似乎假以时日的话，这个国家又会重建往日的繁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一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在遥远的麦地那辞世，他留给后人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将为奄奄一息的萨珊波斯帝国敲响丧钟。



图 1.1　位于摩苏尔附近的圣以利亚(Saint Elijah)修道院，修建于 595 年。GNU Free Documentation 许可

阿拉伯人之所以能够轻易征服萨珊波斯，除了后者因与拜占庭的战争而变得明显衰弱外，还在于萨珊波斯对待阿拉伯封臣的政策。大多数阿拉伯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分属大小不等的各个部落，他们的凝聚力建立在拥有共同的祖先和鼓励内部通婚而产生的家族观念之上。阿拉伯各部落在展现其同质性的同时，对外族人的接纳实际上却十分开放，外族人逐渐获得了完全的地位，被视为部落的一分子。尽管一个部落只承认唯一的领袖，即最高的“长老”(*shaykh*)，但每个部落里还包括几个次一级的群体，它们之间并不总是友善的关系。沙漠中可放牧土地的匮乏，会引发地方性的部落冲突及一种好战的文化。

3

几个世纪以来，以阿拉伯沙漠边缘的希拉(Hira)为中心的阿拉伯拉赫姆王朝，一直被视作一个附属于泰西封的独立王国。作为向泰西封领取补贴和武器的回报，拉赫姆人保卫着帝国的沙漠边界，使之不受未臣服的阿拉伯部落的侵扰。他们在萨珊波斯与拜占庭及其同盟者的冲突中，还扮演着萨珊波斯代理人的角色。580 年，拉赫姆王朝的国王努曼

三世改宗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进一步将他的部落王国与萨珊波斯在伊拉克的统治阶层联合在一起。由于萨珊波斯一贯坚持更富侵略性的立场，这种颇有成效的关系在602年破裂了。萨珊波斯吞并了拉赫姆王朝的领地，终结了这个附属王国的独立地位。这无疑增加了阿拉伯人的痛苦与仇恨，611年的济加尔之战就是一例，在那场战役中，一支阿拉伯联军击败了萨珊波斯的军队。更为重要的是，对拉赫姆的兼并使帝国丧失了与沙漠部落之间的缓冲地带。

在老练沉稳的指挥官哈立德·伊本·瓦立德的率领下，第一支穆斯林军队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就使阿拉伯部落得到了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土地，并将之纳入麦地那的势力范围。根据大多数编年史的记载，到634年初（伊拉克之战的具体日期不是很确定），希拉与南部的乌布拉都被穆斯林暂时占领。没有当地支持者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进展的，穆泰纳·伊本·哈里沙·谢巴尼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强大的巴克尔部落的著名长老，也是一位伊斯兰教的皈依者。阿拉伯亲族关系的感召力，对战利品和天国的允诺也是赢得伊拉克多数部落（尽管不是全部）去反对萨珊波斯的重要因素。在麦地那，穆斯林的新领袖哈里发欧麦尔·伊本·赫塔卜渴望通过外部征服，以释放沙漠部落沸腾的能量。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阿拉伯穆斯林与萨珊波斯及其数量众多的阿拉伯同盟者之间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战斗。尽管在634年的桥头战役中惨遭失败，但穆斯林却可以撤退到沙漠之中，沙漠在需要的时候依然能够给他们提供安全的庇护。几年之内，一支新军队在指挥官萨阿德·伊本·艾比·瓦卡斯的带领下成立了。636年，受穆斯林在叙利亚获胜消息的鼓舞，大胆的萨阿德率领他的军队取得了对一支人数远甚于己的萨珊波斯军队的决定性胜利。[①] 这场发生在希拉附近的卡迪西亚战役持续了整整三天，交战双方都筋疲力尽，萨珊波斯主要军队的核心被击垮，其最有能力的指挥官鲁斯坦也阵亡。伊拉克如今敞开大门，迎接穆斯林的征

---

① 历史学家对这次战役的时间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发生在637年，有人则认为发生在638年。

服。很快，萨阿德的军队就转而进攻泰西封。到 641 年时，摩苏尔及整个杰济拉地区都被乌特巴·伊本·法哈德的军队所占领。

早期哈里发统治下的伊拉克

在早期阿拉伯人对这些事件的记述中，总是要提及那些来自沙漠部落的人在进入萨珊波斯金碧辉煌的都城时，所表现出来的无比惊诧。很少有人见过这样的建筑奇迹——巨大的被称作“王厅”（*Iwan Kisra*）的皇宫，以及皇宫中所收藏的珍宝。樟脑被阿拉伯人当作盐来制作面包，很多人也不知道黄金的价值，很乐意用它去交换不太值钱的白银。在一个故事里（可能经过杜撰），一个部落成员以 1000 迪拉姆（*dirham*）银币卖掉了一个为他所俘虏的波斯女贵族，因为他想象不出还有更高的数目。这些粗俗的阿拉伯人显然不习惯萨珊波斯统治下伊拉克的文雅环境，但他们并不怯场。早在伊斯兰教赋予阿拉伯人“真正”的宗教享有者这种新的自豪感之前，这些沙漠部落成员就经常鄙视伊拉克的定居者，认为他们软弱而卑贱，毫无荣誉感，易于顺从严格的社会等级和专制统治。这种优越感能够保护征服者的认同，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大量吸收被征服的萨珊波斯的文化了。

为了确保萨珊波斯的财富不会削弱阿拉伯人的战斗精神，哈里发欧麦尔下令在边防设立“边城”（*amsar*），为军队及其家属提供住所。边城选址在沙漠的边缘地带，以确保安全及与麦地那的定期联系。库法和巴士拉就是按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两个重要的行政中心，摩苏尔则是位于北部的一个略小的军事定居点。在这些边城之内，说着特殊的阿拉伯语和信奉独特的穆斯林宗教的士兵构成了人口的多数，他们的生活远离这个国家的其他居民。其中的意义就在于，隔离状态能够保护他们作为独立的军事阶层的认同感，增强他们的团结，使他们一有需要就准备好全力开战。欧麦尔还通过派出大量《古兰经》诵经师[①]，颁布加强宗教操守

① 在伊斯兰时代早期，大量被称作《古兰经》诵经师的信徒能够熟记《古兰经》的大多数篇章，他们被尊为伊斯兰信仰与实践的权威。

的指令,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安排同样合乎当地居民的利益,因为阿拉伯穆斯林最初是被禁止拥有边城之外的土地,占用现有的宗教场所或广泛干涉地方事务的。在边城之内,军队的部落特性给城市的结构打上了烙印:在城市的不同区域,通常只驻扎由某一部落所组成的军队。比如,库法城被分为15个区,每个区分配给一个重要的部落。早期的成功征服引来了大量阿拉伯移民,这些移民希望通过继续征服伊朗以获得财富和光荣,他们大量涌入边城,导致士兵队伍急剧膨胀,也引发了内在的紧张关系。而居住在周边的非阿拉伯人也被边城的市场所吸引,他们同样推动了边城的发展。

在国家管理上,欧麦尔保留了萨珊波斯的基本制度,大多数官员依然各司其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从提克里特到巴士拉北部,都接受库法的管理。巴士拉的总督负责伊朗南部的广大地区。摩苏尔起初受库法的管辖,但是在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在位期间(644—656年),被纳入到杰济拉的管理范围内。国有土地被收回,将之变成"斐物"(*fay'*),即哈里发托管下的全体穆斯林的共同财产。在伊拉克,这样 6 的土地数量是巨大的,超过了埃及和叙利亚,因为上述两地的地方贵族与持续抵抗伊斯兰征服的萨珊波斯人相比,获得了有利的投降条款。不过,多数波斯地主很快就适应了穆斯林的统治,他们通过改信新的统治精英的宗教,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财产。一般而言,战利品中所有动产的五分之一要送到哈里发的中央国库,剩余的则分配给战士们。不动产,主要是土地,则需要纳税。巴士拉总督艾布·穆萨·艾什尔里的一大成就是,他在征服之后的637年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清查,大致依照土地的生产率制定了一项土地税。一般而言,阿拉伯穆斯林可以免交任何重要的税款。非穆斯林就必须缴纳一种被称作"丁税"(*jizya*)的人头税,以及其他各种赋税,包括集体承担的被称作"哈拉吉"(*kharaj*)的土地税。随着人口逐渐改宗伊斯兰教,后来的赋税尽管有所改变,但总的税收负担还是要高过萨珊波斯时期。丁税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一项特定的人头税,只向那些受保护的非穆斯林,即"吉米人"(*dhimmis*)征收。吉米人是指那些信仰唯一的神,拥有天启的宗教经典,且接

受穆斯林统治的人。以伊拉克为例,吉米人包括基督徒、犹太人、诺斯替曼达派,有时也包括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这种保护宗教团体的观念也来自早期萨珊波斯的政策。

早期的伊斯兰行政体制强调了统治者的阿拉伯认同。国家由阿拉伯部落战士组成的军事贵族统治,伊斯兰教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不过,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普世性观念,它允许改变信仰,尽管在现实中有时不让这样做。为了与阿拉伯的部落习俗保持一致,早期的皈依者迫使自己加入某个特定部落,成为受保护者,即“麦瓦利”(*Mawali*)。尽管已经改宗伊斯兰教,但这些非阿拉伯的麦瓦利却受到许多歧视。他们仍需缴纳土地税,还要单独居住,也不得与阿拉伯妇女结婚。那些自愿参加军队的“麦瓦利”也只能被招募到步兵之中,且不能拿到正常的津贴。尽管这一问题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但更严峻的问题却是如何创建一种有效的中央统治,来管理当前这个广阔的伊斯兰帝国。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将给帝国的稳定性带来更大的威胁。部落的战士虽然是帝国军队的基础,但仍然需要对他们进行压制,因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就要对这些士兵加以规训并限制其自由。欧麦尔强有力的领导是可以掌控局势的,但 644 年欧麦尔却被他的波斯基督徒奴隶所刺杀,这就使得事态走向了危机。

冲突与内战

7

欧麦尔的继承者奥斯曼·伊本·阿凡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一般被认为是虔信的,忠于先知穆罕默德,但他同时也很软弱,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来自倭马亚家族,该家族的领袖在麦加一直是穆斯林最大的敌人。奥斯曼曾将他的男性亲属委派到各个重要的职位上,此举被谴责为任人唯亲。在伊拉克,他本不该在库法总督的位置上作出错误的任命。将要担任库法总督的是其同父异母的兄弟瓦利德·伊本·乌克巴,此人因腐败和在公众场合醉酒而声名狼藉,人们经常向哈里发抱怨对他的不满。奥斯曼还允许麦加和麦地那的商人购买伊拉克的土地,而这种行为是受到欧麦尔的严格控制的。这一措施也引起了边城里部落

成员的不满,因为他们被禁止享有同样的权利。与此同时,库法和巴士拉指挥下的对东方领土的征服,在波斯东部暂停了下来,这使得战利品税明显下降。征服土地和夺取战利品的前景,一直吸引着库法、巴士拉以及面积较小的摩苏尔等地数量众多的移民,而此时他们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无法宣泄压抑不住的能量。虽然巴士拉能干的总督伊本·阿米尔足够精明,控制住了不断上涨的不满情绪,但在库法,最轻微的煽动就足以引发暴乱。比如,当奥斯曼将各种版本的《古兰经》统一为一个官方认可的版本时(这是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关键一步),包括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伊本·麦斯欧德在内的一些《古兰经》诵经师都拒绝接受。库法的部落领袖们也不顾奥斯曼的意愿,选择艾布·穆萨·艾什尔里为库法总督,这就进一步展现了库法的抗逆之心。

656年,奥斯曼被来自埃及边城的反叛者杀死。不过,从那时起,穆斯林统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却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单纯除掉哈里发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穆罕默德的堂弟暨女婿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卜被选为新一任哈里发,但很快就遭到穆罕默德的爱妻阿伊莎以及他最亲密的两个伙伴脱勒哈和祖拜尔的反对。他们指责阿里没能惩罚刺杀奥斯曼的凶手,并赶赴巴士拉举起反叛的大旗。阿里马上去寻求库法战士的支持,库法人盛赞他是勇敢和虔诚的斗士,并把他视作他们权利的捍卫者。接下来便发生了著名的"骆驼之战",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阿伊莎骑在一头骆驼上指挥她的军队进攻。这次战役标志着穆斯林第一次内战(*Fitna*)的开始。在取得节节胜利之后,阿里转而去对付另一个反对其统治的叛乱中心大马士革,该城由深受人们爱戴的总督、奥斯曼的亲戚穆阿维叶·伊本·阿比·苏夫扬统治。双方在657年展开了隋芬之战。虽然对这场战争的记述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但当时的情况似乎是阿里就要获胜了,狡猾的穆阿维叶却命令他的军队高举写有《古兰经》经文的册页,以此表明他们需要以《古兰经》来作出仲裁。虔诚的阿里接受了这个要求,下令军队停止进攻。穆阿维叶的这一举动立刻影响了阿里军队的士气。阿里的一部分军队对谈判提出谴责,宣称"仲裁只能由真主来作出"。阿里对此的回答是,"此话虽然是真理,但目的却

不公正”。这些因不满和谈而发起反叛的人被称作哈瓦利吉派(Kharijis,意为分离者),阿里不得不于659年在纳赫拉万击败了他们。但同时进行的仲裁对阿里来说却并不顺利。仲裁者很可能建议阿里和穆阿维叶分别自责一下他们对哈里发这一称号的欲求,但后者其实并无这样的要求。661年,哈瓦利吉派的同情者伊本·穆勒杰姆在库法谋杀了阿里,当时阿里正在着手准备与穆阿维叶的下一场对抗。消息一传到大马士革,穆阿维叶就立刻被宣布为哈里发。穆阿维叶很快便开始采取措施以获得领导权,他成功地威吓住了阿里之子哈桑,随后又给其以重金,换来后者的默认。哈里发在大马士革的统治从661年持续到750年,这一时期因政权掌握在倭马亚家族手中,故被称为倭马亚哈里发国家。

第一次内战凸显了伊拉克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一个事实是,交战的一方选择巴士拉、库法和大马士革,而不是麦加或麦地那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这说明了旧的中东文明的中心正在重新强调它们的支配地位。从许多方面来看,隋芬之战都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为控制这一地区,在古代展开的一连串斗争中的最后一次。阿里的军队得到伊拉克富有阶层的支持,它面对的是穆阿维叶参照拜占庭模式组织起来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阿里军队不和的主要原因,无疑是部落军队普遍难以驾驭的本性使然。不过,人们也不能完全忽视伊拉克人口在种族和宗教上高度多样化所带来的影响。尽管麦瓦利只占阿里军队中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所保有的信仰和习惯上的特点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不同集团相互争斗的症结所在,其结果也就加剧了分裂。又如,作为反抗运动产物的哈瓦利吉派,其特点是奉行严格的宗教教义和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他们认为,任何人,“即便是奴隶”,也能成为哈里发,只要他在宗教和领导才能上“是最好的”。而阿里的支持者什叶派,居然也变成反对派,因为他们担心阿拉伯贵族独揽大权。但什叶派最终还是强调了阿里(及其继承者)的血统与先知穆罕默德紧密相连的重要性,这一点成为哈里发合法性的来源。阿里死后,几乎被人们描绘成神人,他的高贵、虔信、智慧以及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莫不如此。后来,在一些极端的什叶派眼中,阿

9

里被认为受到了天启，他远离罪孽和错误，是真主的化身。而反对派所受各种地方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源自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弥赛亚信仰的发展。685 年，什叶派信徒穆赫塔尔·伊本·阿比·欧拜德，以阿里的一个儿子穆罕默德·伊本·哈奈菲叶的名义领导了一场反对大马士革的起义。起义从库法开始，很快就传到了农村，得到麦瓦利的广泛支持。687 年，起义被最终镇压，穆赫塔尔与哈奈菲叶均死去。不过，他们的追随者相信伊本·哈奈菲叶就是马赫迪——“那个蒙受正确引导的人”。马赫迪是不会死亡的，他只是被神奇迹般地隐匿起来，他将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刻回来为这个世界伸张正义。马赫迪的观念以后将渗入到大多数正在形成的穆斯林教派的信仰中。对大部分穆斯林领导人和虔诚的思想家来说，他们坚称从第一次内战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要团结一致。虽然穆阿维叶让很多人生厌，但事实上是他最终成功地为穆斯林带来了统一，这一点胜过所有对他的其他意见，也使他赢得了人们的支持。持这一观点的人构成了后来出现的伊斯兰教多数派逊尼派的基础。

倭马亚王朝的艰难统治

穆阿维叶的统治(661—680 年)为穆斯林的领土带来了统一与巩固，这很快就使得对北非、安纳托利亚以及深入中亚的征服得以延续。穆阿维叶最关心的是统治精英的团结，他通过强调统治精英的阿拉伯认同，来努力加强这种团结。他还任命他的儿子亚齐德为继承者，以此确立世袭制的原则。尽管对东方的征服为伊拉克带来了利益，但穆阿维叶在这里的统治并不受欢迎，因为这种统治是建立在叙利亚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鉴于伊拉克是哈里发国家内人口最多和最富裕的地区，所以伊拉克人对叙利亚人的统治分外仇恨。严格说来，过去的波斯地主阶级也属于麦瓦利，他们需缴纳额外的税收，但由于他们控制了行政和国库机构，故可以免于纳税。而数量不断增加的非穆斯林和下等的麦瓦利却要承受赋税中最重的部分。再加上阿拉伯人对麦瓦利的歧视，就使得麦瓦利尤其倾向支持反对派。麦瓦利的不满借助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人数

10

的增多而得到表达。例如,库法总督、什叶派的同情者胡杰尔·伊本·阿迪就坚决支持麦瓦利,他拒绝承认穆阿维叶的权威,这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的替代者穆吉拉·伊本·舒巴阿则被告知要用铁腕进行统治。不过,穆阿维叶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具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在胡萝卜与大棒之间寻找平衡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他对待他父亲的私生子齐亚德·伊本·阿比希(Ziyad ibn Abih,伊本·阿比希的意思是"他父亲的儿子")的方法最具启发性。齐亚德起初对什叶派表示同情,但穆阿维叶认可其能力,所以尽管齐亚德是私生子,但穆阿维叶仍宣布他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并委以巴士拉总督之重任。齐亚德对穆阿维叶的这一姿态非常感激,便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和能干的总督,成功而无情地镇压了叛乱。作为奖励,齐亚德还被任命为库法总督,有权平定和统治整个伊拉克,齐亚德通过发展出一种萨珊波斯式的秘密警察队伍做到了这一点。

680 年,当得知穆阿维叶去世的消息后,桀骜不驯的伊拉克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发起了反叛。阿里的次子,先知唯一健在的孙子侯赛因很快成为什叶派新的拥戴者。库法的显贵致信侯赛因,力劝他领导他们反对新任哈里发亚齐德,于是侯赛因便带领他的家人和少数支持者离开麦地那前往库法。但就在离库法不远的卡尔巴拉平原上,侯赛因遭到了倭马亚王朝军队的拦截。库法的新任总督,齐亚德之子乌拜杜拉在侯赛因到来之前,就很好地利用他父亲的手段铲除了叛乱。那些没有被杀死的人,当看到沿库法主要街道数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时,都出于恐惧而投降了。当时正是穆斯林穆哈兰月(Muharram)的第十天,即阿舒拉节('Ashura),[①]侯赛因根本没有机会反抗,他和他的大多数同伴都遭到屠杀。这一事件对于尚处萌芽阶段的什叶派运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侯赛因作为殉教者的影响更为广大,他的遇难不断在哀悼仪式和悲情戏中得到纪念。"殉教的王子"成为一切纯洁、正义和英勇的象征,他所受的苦

---

① 穆哈兰月为穆斯林的元月,穆罕默德曾将这一月的第十天作为斋戒日。但后来的穆斯林为了纪念侯赛因,也会在这一天哀悼侯赛因,并因未能全力保护侯赛因而进行自我惩罚。——译者

难和死亡被视为什叶派获得救赎的一个手段。什叶派的一个重要支派后来认为,只有阿里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结婚所生的后裔,才能作为受到天启的伊玛目来领导穆斯林。每一位伊玛目需要得到其前任的认定,服从伊玛目是全体信徒的义务。由于侯赛因的一个儿子当时病情太重无法参加战斗,因此得以幸存,阿里和法蒂玛的血脉也就没有中断,可以继续为什叶派提供伊玛目,直到10世纪。

11 不过,侯赛因的反叛在当时并不算是主要的威胁,父亲在骆驼之战中被阿里所杀的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才是更危险的对手。683年亚齐德死后,祖拜尔在麦加的叛乱获得了更广泛的基础。当时,祖拜尔被宣布为哈里发,以此反对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在683—692年间,伊斯兰世界陷入分裂和内战之中,对部落的忠诚再一次在决定结盟的性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个动荡时期,伊拉克承认了祖拜尔的权威,并接受祖拜尔的兄弟穆萨布来自库法的统治。但是,祖拜尔对权力的掌控只是暂时的,因为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都在利用混乱扩展自己的诉求。一度有四或五个人要求得到哈里发的名号。直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麦尔旺(685—705年在位)在麦加击败了祖拜尔,并再次征服伊拉克时,倭马亚王朝的权威才得以重建。

由阿卜杜勒·马利克委任的伊拉克总督哈查只·伊本·优素福是伊拉克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他身兼镇压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威胁的重任,以雄辩和严格著称,曾第一时间就在“伊拉克人民”面前立下了规矩,所谓的“伊拉克人民”,他指的是那些“有着忤逆、虚伪和邪恶性格的人民”。694年,乔装打扮的哈查只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库法的大清真寺里,那里正聚集着一大批反叛者。哈查只走上讲坛,除下伪装,用后来依然要教给伊拉克学校孩童的话,对聚会者如是说道:

> 以真主的名义,我要让恶人自食其果;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拿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来补偿。我看到谷物在我面前成熟,等着我去收割,而我就是收割者,我看到头巾和胡须上的血光……虔信者的统帅(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清空箭囊,搭弓上箭,而

> 我就是那支最毒最利的箭。他用我瞄准了你们。你们习于叛乱已有经年,不仅执迷不悟,还定下了僭越的规则。以真主的名义,我要剥掉你们的皮,捆绑你们,击败你们这群迷途的骆驼……以真主的名义,我言之必行,行之必果……①

哈查只出身普通之家。他放弃了塔伊夫一所学校教师的职位,最终成为阿卜杜勒·马利克以及其子瓦利德最忠实和最值得信赖的官员。在被任命为伊拉克总督之前,他成功地解决了大马士革的叛军问题,并且率领倭马亚军队击败祖拜尔、炮轰天房、无情地平定也门和汉志的叛乱。在伊拉克,他通过严惩不服从命令者,首先整饬了哈里发军队的军纪。然后,他派军队四处平息哈瓦利吉派的叛乱。697 年,哈查只遇到了最大的危险,其伊拉克部队的精华、由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艾什尔斯统帅的"孔雀军团"发起了叛乱。艾什尔斯的反叛其实是要推翻叙利亚人对伊拉克的统治,这在伊拉克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夺取了库法和巴士拉大部分地区后,哈查只才于 701 年在大批叙利亚援军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

12

但是,哈查只不只以平定桀骜不驯的伊拉克而著称。一俟和平到来,他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发展中去。在这方面,他于 702 年兴建了伊拉克省的新首府瓦西特,该城位于库法和巴士拉之间。瓦西特是为其忠诚的叙利亚军队所修建的一个安全的驻扎地,如今这些军队显然已经是占领军了。他还指挥建造了几项重要的农业工程,如排干沼泽、在塞瓦德开凿运河等。看到大量麦瓦利农民离开土地迁入边城,哈查只就强迫他们回到土地上去,让他们相信他们有义务缴纳土地税。作为阿卜杜勒·马利克使国家阿拉伯化努力的一部分,哈查只成立了一个铸币厂,在硬币上刻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字。他还帮助批准了阿拉伯文字书写体中新的元音符的使用,统一了《古兰经》的诵读。在他去世之前,伊拉克已

① 引自 Bernard Lewis(编),*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vol. 1, pp. 23—24。

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中心。在诸如哈桑·巴士里(卒于728年)这样的人物的推动下,伊斯兰教义学和教法学在库法和巴士拉得到发展。可能是最初信奉诺斯替教曼达派的原因,巴士里带来了诺斯替教的影响,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性。尽管他抨击暴政,但还是呼吁穆斯林的团结和对倭马亚哈里发的服从。总之,哈查只的精心治理以及对腐败和行贿的有效严惩,确实为伊拉克带来了普遍繁荣。不过,他那在史料中被夸大的严酷,还是使他在伊拉克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哈查只于714年去世,被安葬在瓦西特附近一处不起眼的墓地里,以保护他不受到他的众多敌人的侵犯。

阿拔斯革命

尽管倭马亚王朝成功地镇压了所有叛乱,但伊拉克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省份,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的威胁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随时可见。除了不满叙利亚人的统治外,伊拉克还聚集了最多的麦瓦利。随[13]着皈依者人数的增多,麦瓦利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就使得伊斯兰教的普世欲求与阿拉伯军事阶层统治之间的内在矛盾变得不可遏止。同时,倭马亚王朝亦不能解决部落分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因为官方的袒护政策变得更加糟糕。部落的存在使得对中央统治的抵制成为一种内在现象。但倭马亚王朝的伟大征服,因带来战利品和释放部落的能量使之不再针对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紧张关系。伊拉克人热情地参与这些征服,在信德和中亚地区的归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征服在8世纪中期达到极限,危机就开始增长。数千阿拉伯和麦瓦利士兵在边城中四处游荡,无所事事。对倭马亚王朝的仇恨变得如此之强,使得重大改革的努力都无法扭转反叛的情绪。

领导革命蓬勃发展的任务落到了阿拔斯家族身上。阿拔斯家族声称他们是先知一个叔父的后裔,他们认为哈里发的职位应当归于先知家族的主张对什叶派很有吸引力,而他们对倭马亚王朝缺乏同情心和不能保障全体穆斯林平等的攻击,则对哈瓦利吉派和麦瓦利具有吸引力。阿拔斯家族活动的中心在波斯东部,但在库法也有很多支持者。747年,

阿拔斯家族的一个代表艾布·穆斯林(他本人是麦瓦利中的一员)成功地发动一支大军进攻伊拉克。军队的象征着反叛与哀悼的黑旗,就此与阿拔斯家族联系起来。750年,双方在伊拉克北部大扎卜河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倭马亚的军队被击溃。在这场决战之前,阿拔斯家族的统领艾布·阿拔斯就已经在库法被宣布为新王朝的首位哈里发。获胜的阿拔斯家族并没有表现出骑士风度,他们不分老幼,抓捕并杀死了倭马亚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那些奋起抵抗的人,比如瓦西德总督,先是被答应赦免,后来却被背信弃义地杀掉。而一旦拿下叙利亚和埃及,阿拔斯家族就将矛头对准了他们从前的盟友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

从社会所发生的彻底转变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拔斯家族对国家的接管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性事件。帝国的中心从叙利亚转移到伊拉克,后者的中心位置延续了200多年。麦瓦利最终被认为是与阿拉伯穆斯林平等的人,一个详致的伊斯兰法律体系也得到发展,这种法律体制不再对信仰相同者作出区分。最为重要的是,帝国的本质从扩张的工具变成进行内部发展的有机体。随之而来的一个相应变化是,统治阶级的性质从阿拉伯武士转变为由官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更具世界性的群体。这一阶级的视野和文化不再强调严格的部落武士价值,而是强调更高雅和更温和的都市价值。 14

巴格达的辉煌

阿拔斯王朝至今仍被视作伊拉克的黄金时代。作为面积广袤的帝国的新中心,商业和各省流入的税收使伊拉克变得更加富裕。随着灌溉水渠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伊拉克自己的土地资源,如著名的塞瓦德地区,变得更加多产。900年时,伊拉克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千万,只比今天略少一些。在政府之内,哈里发的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即一个被波斯最雅致的浮华和虚荣传统所包围的伟大的帝国统治者。哈里发现在被称作"真主在大地的影子",他远离了他的臣民,被一群令人胆怯的官僚保护着。波斯顾问和大臣在一系列改革中都起到了作用,这些改革给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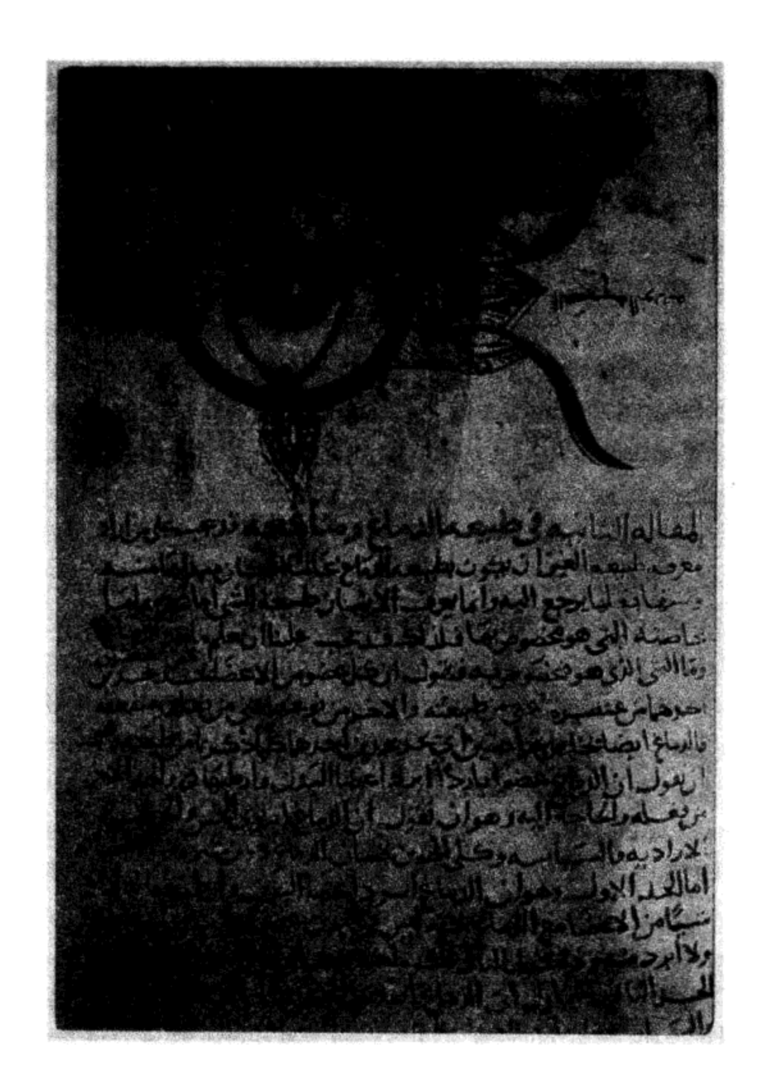


图1.2 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aq,卒于873年)《眼科十论》(*The Book of the Ten Treatises on the Eye*)中的一页。在阿拔斯王朝的赞助下,基督徒伊本·伊斯哈格写作并翻译了多部医学著作。Getty Images/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家的管理注入了理性,也为税收制定了标准。一种新的官职"维齐尔"(*wazir*)出现了,它是首席大臣的称号,地位仅次于哈里发,通常由波斯人担任。什叶派、基督徒和犹太人也经常被委以大臣或顾问这样重要的职位。在著名的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及其两个儿子阿明及马蒙(两人的在位时期为809—833年)统治期间,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

可以说,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成就是于762年建立了新都巴格达。

该城建立在一个名叫巴格达的村庄上,但它完全是个全新的建筑。[①] 哈里发艾布·贾法尔·曼苏尔(754—775 年在位)为该城选址,并亲自监督城市的建造。巴格达坐落在伊拉克中部,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即将交汇之处,水路和陆路交通都十分便利。它地处肥沃的内地,可以防范外敌的入侵。巴格达正式的名字叫作"和平之城"(*Madinat al-Salam*),它被设计成圆形,修建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作为哈里发的专用驻地,城内还有哈里发禁卫军的营房和大量的政府机构。巴格达城之外,也有一片巨大的建筑群,包括市场、清真寺和居住区,它们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巴格达城内有两条主干道,连接四个两两相对的城门。在城市的中心,是宏伟的大清真寺,用于宗教和民事活动。城内最重要的宫殿被称作金门宫(*Bab al-Dhahab*),它凸显了哈里发不可接近和近乎超凡入圣的境界。在宫殿高达 48 米的巨大的绿色圆顶之上,矗立着一尊骑士的雕像,据说雕像的手威严地指着敌人来犯的方向。 15

巴格达很快就使伊拉克的所有其他城市黯然失色,它将库法、巴士拉和瓦西特降低到卫星城的地位。800 年时,巴格达的人口达到了 50 万人左右,一个世纪之后,达到了 150 万,成为中国大都市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城市的人口高度混杂,从中可以一窥帝国之内的各个种族、宗教和语言群体。不同的群体倾向于生活在不同的居住区之中,他们处理着自己的内部事务,很少受到国家干涉。巴格达是帝国的行政和商业中心,有着极为复杂的银行系统,以及巨大的生产制造部门。大多数工业,尤其是铸剑、皮革、纺织和铜器制作部门,都是小型的家庭经营作坊,而其他的工业,如玻璃业和造纸业,则需要工厂雇佣几百名工人 16 来经营。来访者惊诧于城市的浴室、医院、公共图书馆、文学沙龙和动物园。巴格达市内没有诸如酒馆、妓院之类带来罪恶的去处,这些地方都位于城外的河边。

在阿拔斯王朝和有权有钱阶级的资助下,伊拉克的大城市,尤其是巴格达,成为学术与艺术的重镇。起初,哈里发们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学

---

① "巴格达"这个名字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之恩赐"。

者乌里玛('ulama)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给予他们大量阐述和解释法律的自由,作为回报,则要求他们承认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在经过了长期和不断的争辩与讨论之后,从占主流地位的逊尼派中涌现出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四大派别。其中三派的创建者,艾布·哈尼法(卒于767年)、穆罕默德·沙斐仪(卒于820年)和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卒于855年)都曾在巴格达生活过,并在此教书育人。另外一派的创始人马立克·伊本·艾奈斯(卒于795年)则生活在麦地那。由于不同的哈里发偏好不同的派别,因此四派均获得了合法地位。伊斯兰教法后来成为适用于所有穆斯林社会的基本行为法,不论它们是否处在巴格达的直接政治控制之下。这种法律上的统一性,有助于在伊斯兰世界保持一种强烈的社会和经济一体感。随着教法的发展,按教法审理案件的法官卡迪(*qadi*)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什叶派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教法学学派,不过这些学派通常得不到哈里发们的官方承认。什叶派最初是支持阿拔斯王朝对国家的接管的,但之后便遭到打压,又重新回到他们那让人熟悉的反对派状态。统治者有时会宽容什叶派的教义学家,他们会允许像麦地那的贾法尔·萨迪格(卒于765年)这样的著名学者去教授知识。萨迪格详尽地阐释了受到天启的、绝无谬误的伊玛目观念。伊玛目是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其作用是正确地解释真主之言。萨迪格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第六任伊玛目,他在去世之前来到了巴格达,其后继者至今仍在巴格达生活和传授知识。

阿拔斯王朝一开始就鼓励从阿拉姆语、希腊语、波斯语和梵语翻译各种科学、哲学或文学作品。许多这样的翻译是在"智慧宫"(*Bayt al-Hikma*)中完成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智慧宫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研究中心,它成立于830年,配备有图书馆,通常由诸如叶哈雅·伊本·马萨维伊(卒于857年)这样的基督徒学者管理。另一些人则争论说,智慧宫只是一个通称,指代那些从萨珊波斯继承而来的数量众多的图书馆和学术场所。不管事实怎样,发达的翻译活动无疑对之后的科学与文化大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翻译活动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但它也并非仅仅依靠国家,因为上层阶级同样以对学术和

17

知识的无私赞助著称。最受欢迎的当属希腊哲学著作,它们对伊斯兰思想和科学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学者们远不只是被动的译匠,他们对那些原著也作出了自己的评论与注释。很快,一个活跃的本土学者团体就开始对整个学术领域产生重要的贡献。那些主要在巴格达工作的穆斯林哲学家,率先系统地在信仰与理性、预言与哲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关系。哲学家肯迪(卒于 873 年)是最早的巴格达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宗教和科学虽然路径不同,但都通向真理。在数学领域,花拉子米(卒于 850 年)第一个解决了线性和二次方程式,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现代代数学之父。确实,"代数学"一词来自阿拉伯语"还原"(*al-jabr*),该词即为花拉子米所创。历史学家们,比如泰伯里(卒于 923 年),写下了以细节和准确性著称的不朽的历史著作,而以贾希兹(卒于 869 年)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则针对他们时代的方方面面创作出很多辛辣、讽刺的文章。无论如何,诗歌仍然占据着显著的位置,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涌现出大量诗人,他们开创了种种新的体裁,去反映这个富足、城市化和自信社会的品位。其中重要的一位是放浪不羁的艾布·努瓦斯(卒于 814 年),此君是巴士拉人,他的诗作尤以歌颂美酒、女人和生活的欢娱为最。在下面这首讽刺诗中,艾布·努瓦斯嘲弄了那些将时间浪费在老套的浪漫故事上的人,比如坚贞的女人公莱拉(Layla)和伊恩德(Hind)的故事。挑拨人欲的美酒、美女以及酩酊大醉是他典型的风格:

不要为莱拉哭泣,亦不必为伊恩德欢喜,
且为玫瑰干杯,饮下这玫瑰色的红酒。

琼浆玉液滑过喉咙,
眼睛里和面颊上便布满绯红。

在窈窕淑女的手里,
酒杯似珍珠,美酒如红玉。

她用明眸和素手为你敬上一杯……

一醉方休才不枉潇洒一回。[1]

绘画、雕刻和建筑亦经历了令人振奋的革新。摩苏尔尤以诞生伟大的音乐家著称,如萨尔萨尔(卒于791年)及其外甥易司哈格·毛斯里(卒于850年)。巴士拉是印度洋最大的港口之一,学者们在这里为阿拉伯语法设定了标准,理性主义的穆尔太齐赖派也在此发起了一场最有影响的思想运动。基督教、犹太教、诺斯替教学者和艺术家,会同什叶派、逊尼派穆斯林学者和艺术家,一起为伊拉克历史上如此光辉的一页作出了贡献。因此,当雅库比(卒于897年)称伊拉克为"世界中心,地球之脐",并称巴格达是"最伟大的城市,东西方无论哪座城市难出其右"时,这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奇。[2]

18

危机中的哈里发国家

虽然哈里发大权在握,但某些问题却已开始显现。哈伦·拉希德临终之前,将哈里发的权力分给了两个儿子阿明及马蒙。两兄弟之间很快就互相敌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爆发了。期间,统治着波斯的马蒙对巴格达围城超过一年之久。马蒙胜利后,哈里发的权力再次得到统一,社会也持续发展,但这一事件却预先警告了某些事情即将到来。帝国未来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其从北非直贯中亚的庞大疆域。假以时日,那些受到地方精英支持的边远省份的总督们,就会渐渐疏远与巴格达的联系。哈里发作为全体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的首领,其象征意义上的重要地位虽然从未减弱,但各行省却开始强调它们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纷纷建立了一些小王朝。北非、埃及、叙利亚、波斯和中亚诸行省,也开始逐个不再向首都纳税。到900年时,哈里发能控制的地方很少超出伊拉克之外。

---

① *Princeton Online Arabic Poetry*,参见:http://www.princeton.edu/~arabic/poetry

② 引自 Bernard Lewis,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vol. 2, p. 69。

与地方分离主义相伴随的是不断加剧的内部危机,城市与农村的叛乱明显增多。而伊拉克的财富却日益集中到精英集团手中,他们傲慢自大且剥削成性。在早期的叛乱中,吉卜赛人的反叛考验着哈里发统治的稳定性。吉卜赛人是起源于印度的一个贫穷的农村群体,从 820 年到 835 年,在他们的叛乱被镇压之前,他们给帝国的南部造成了巨大的破坏。868 年,南方再次出现了大规模反叛,这一次的主角是非洲的奴隶。作为在塞瓦德地区建立种植园农业努力的一部分,阿拔斯王朝从东非引进了数千奴隶。这些奴隶被称作"赞吉"(*Zanj*),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任务是清理盐碱地。在被认为是弥赛亚式的救世主阿里·伊本·穆罕默德的领导下,黑奴反叛者逐渐控制了南方大部分地区。他们从位于南部沼泽地的要塞之都穆赫塔拉出发,洗劫了巴士拉和瓦西特,给各大城市带来恐慌。他们还收取各项捐税,一度威胁到巴格达郊区。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哈里发的军队最终得以摧毁穆赫塔拉,并于 883 年平息了叛乱。这些运动大多提出了平等主义的要求和什叶派的主张,最能清楚表达这方面诉求的是所谓的卡尔马特派运动。卡尔马特派是个激进的什叶派支派,其首领最初以库法为大本营,宣扬《古兰经》奥义,并散布经济平等和反抗富人等主张。在卡尔马特派的形成时期,它在赞吉叛乱中起到了某种作用。但到了 899 年时,其力量在穷苦的农民和沙漠游牧部落中尤为壮大。这样,卡尔马特派便得以沿着阿拉伯半岛东海岸建立起一个独立国家。他们从那里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起攻击,923 年对巴士拉的洗劫达到其顶点。哈里发不得不再一次调动宝贵的资源,去恢复国家的秩序。

19

帝国的分裂与乡村不断增长的叛乱导致商业凋敝,税收锐减。城市中亦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变动,食物的匮乏和人们的失业引发了争抢面包的骚乱,并致使暴力频生。一些道德改革家试图通过宗教改革来应对不断增长的危机。例如,泛神论者神秘的哈拉智就强调了真主的可接近性以及全人类的平等。他著名的格言"吾即真理"(这里的真理亦即真主),严重冒犯了正统的伊斯兰信徒,922 年,哈里发下令将其处死。而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的信徒不断冲上街头,痛殴那些被认为是道德

堕落的人,或者捣毁酒馆及其他罪恶场所,则是思想界的另一个极端。罕百里曾创建了一个严格而正统的伊斯兰教法派别。这些情况给人们对待非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尽管总体而言,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这样的一神论者享有较大的权力,但他们也曾在一段时间里遭到迫害,比如国家为他们制定了特殊的着装规范,强制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为了阻止法律和秩序的衰落,阿拔斯王朝对军队,特别是雇佣军和奴隶部队的依赖更加强烈。来自中亚草原的彪悍的土耳其人为国家所喜好,他们被招入军队,数量不断增加,成为军队的支柱。长此以往,土耳其的军队首领们便寻求对哈里发更大的控制,并掌控了王位的继承。836年,为了躲避巴格达的动乱及削减土耳其士兵的影响,哈里发穆阿台缓姆将其宫廷迁往巴格达正北的萨马拉,并花费巨资营建新都。该城最大的建筑是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寺旁有一座独具特色的螺旋形宣礼塔,至今保存完好。不过,巴格达仍然保持着其中心地位,哈里发也于892年被迫重返这里。许多人也随之离开了萨马拉,它渐渐沦为一座小城市。

在军费开销增长和商业衰败之外,伊拉克的农业产量也大幅下降。几个世纪以来的精耕细作致使地力枯竭是一个原因,但农村不断加剧的动荡,以及对灌溉工程的忽视,无疑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例如,935年,人们破坏了重要的纳拉万运河,以此来阻挡叛军的逼近。大片肥沃的土地被洪水淹没,给土地的生产能力造成了长期的危害。鉴于税收减少,哈里发越来越依仗税收的外包,或通过所谓的封赐“食邑”(*iqta‘*),来支付军队的首领们。食邑乃一项旧制,统治者通过封赐食邑,将一块特定地产的税收征集和保有权转让出去。食邑是临时的,不可世袭,也不包括封赐者与受封者之间的相互义务这种机制。食邑进一步加剧了分裂和对农民的严酷盘剥。到935年的时候,摩苏尔及其肥沃的腹地(尤其是杰济拉地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独立的哈姆丹王朝。该王朝的创建者纳绥尔·道莱就是一个大食邑所有人。另外还有一些小王朝,如巴士拉的巴里迪人王朝、北部库尔德人建立的若干酋长国等。在这个多事之秋,社会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由商人、地主和官僚组成的精英阶级让位于军队首领的统治。935年,这种变化得到了正式的承认。那一年,哈

里发拉迪将统治国家的实际权力交给了一个名叫伊本·拉伊克的军事首领,后者获得了新的称号"大元帅"(*Amir al-' Umara*)。从那时起,尽管哈里发还保有着让人生畏的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宗教领袖的形象,但其权威也仅限于宫廷的大门之内。945 年,波斯布韦希人的首领获得了"大元帅"称号,他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王朝,长期统治着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直至下一世纪。

布韦希王朝下什叶派的统治

布韦希人起源于里海南部。他们在雇佣军中效力,有着强烈的团结意识,对首领也极为忠诚,被证明是十分成功的战士。布韦希人的权力在阿杜德·道莱统治时期达到顶峰,道莱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疏通了灌溉用的河道,对艺术也慷慨支持。他还发动了几场战役,来压制其他部落权力的增长。977 年,道莱夺取了摩苏尔,大体上再次统一了伊拉克。然而,983 年他去世后不久,中央权力便很快衰落了。

21

总的说来,布韦希王朝时期政治是动荡的,经济也很萧条,但文化和科学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布韦希王朝名义上统治着伊拉克的大部和波斯西部,但局部地区的分裂却让这个国家感到烦恼,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仇恨也常常使城市发生危险的暴乱。宗派冲突有时因为哈里发与大元帅之间的权力斗争反而更为剧烈。大元帅通常是粗鲁的、未受过教育的和虔信的什叶派穆斯林。而一个什叶派大元帅能够统治伊拉克,这一现实恰恰证明了哈里发的软弱。作为逊尼派穆斯林最重要的保护者,哈里发竟然接受了异端的统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更不消说是耻辱了。但是,布韦希王朝从来没有打算要废除哈里发,这个事实说明布韦希王朝仍然遵照倭马亚王朝的传统,保持着宗教上的虔敬。官方为了进一步承认大元帅的崇高地位,会在每个星期五的"主麻日"上,宣读完哈里发的名字之后接着宣读大元帅的名字,并将大元帅的名字刻在所有硬币之上,与哈里发的名字并列。这一时期,伊拉克感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复兴所带来的压力。法蒂玛王朝也属什叶派,但反对伊斯玛仪支派。在布韦希王朝和一些小诸侯国的庇护下,什叶派的主要支派获

得了充分发展。伊拉克和伊朗的什叶派都继续对阿里和法蒂玛的后代表示效忠。不过，到9世纪晚期，第十二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在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就失踪了。什叶派认为，哈桑于941年的神奇隐遁，是为了在未来以救世主马赫迪的身份重新回来，以消除人世间的非正义。因此，什叶派的主要支派被称作“十二伊玛目派”，以示与什叶派的其他支派以及埃及伊斯玛仪支派的区别。布韦希王朝同样支持什叶派的阿舒拉节，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虔诚地回忆伊玛目们的事迹，并哀悼他们尤其是侯赛因的死亡。人们在伊玛目及其信徒的坟墓之上盖起圣殿和圣陵，最著名的一些位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在布韦希王朝的统治之下，什叶派的学者享有优厚的报酬，什叶派的学校也不断增多。

对逊尼派来说，他们是带着畏惧之情看着这些进展的，但最让他们看不惯的是什叶派对伊玛目圣殿和圣陵的参拜，后者以此来虔诚地求得伊玛目的赐福。对逊尼派中最严格的罕百里学派而言，什叶派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偶像崇拜，这是伊斯兰教中最严重的犯罪。971年，罕百里派的激进分子袭击了位于卡尔巴拉的令人尊敬的侯赛因的圣陵，并放火焚烧了它，此举在巴格达引发了数日的暴力冲突。街坊邻居们严格按照宗派或社区的界线进行划分，个人则更多地依赖这种四邻之间的团结一致，而不是毫无作用的国家权威来进行自我保护。如此诸种情况，再加上经济的不断衰退，共同导致了被称作“艾亚尔”（*'ayyarun*）的平民团伙的出现。他们在11世纪尤为兴盛，1030—1033年间，在著名的领袖布尔祖米的带领下，“艾亚尔”平民帮派中的一支几乎控制了巴格达。不过，大多数“艾亚尔”只是有着复杂入会仪式的小帮派。尽管他们必然涉及诸如偷盗、勒索这样的犯罪活动，但他们同样接受了一种具有骑士精神的准则，去保护妇女的荣誉、街坊的安全以及帮助穷苦百姓。一些人则宣誓只针对富人和警察。在布韦希王朝统治的末期，由于王朝家族之间的争斗频仍，城市的衰落愈发严重。而在农村，采邑变得更加普遍，这使国家的税收减少。贾拉勒·道莱在位期间（1025—1044年），由于国家极度贫困，他不得不遣散了他的大部分仆人并变卖了自己的马匹。国力的衰弱使得灌溉系统荒废，洪水开始侵犯巴格达，给这里带来了阶

段性恐慌。在通常情况下,洪水很快会带来传染病,这就导致伊拉克的人口逐步下降。同时,商业开始从巴士拉和波斯湾转移至更为安全的红海地区及埃及。尽管如此,巴格达在这种不断增长的动荡之中,还是保持了其在知识上的中心位置。在很多方面,分裂给学者和艺术家带来了更多选择赞助人的自由。综合性的建筑在这一时期大量减少,但也不乏最著名的建筑成就,其中之一便是 982 年建造的阿杜德医院。该医院拥有 60 名全职医生,设有各种专门病房,其中包括一座精神病院。医院也有很多职位,学生可以在著名医师的指导下学习。医院的学生来自伊斯兰世界以及之外的各个地方,因为如果能得到阿杜德医院某位医师颁发的证书,则表明该学生将获得巨大的声誉。

灌溉系统虽然遭到了破坏,但杰济拉地区受到雨水滋润的大部分田地还是为摩苏尔提供了一处真正的农业基地。在 1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哈姆丹人继续统治着摩苏尔,他们在名义上依附于布韦希王朝。哈姆丹人属于什叶派,以前是贝都因人,他们的主要对手是居住在迪亚巴克尔附近的麦尔旺库尔德人。在哈姆丹王朝的鼎盛时期,他们利用库尔德、土耳其士兵以及阿拉伯部落军队,不断扩展着他们的统治范围,直至阿勒颇。10 世纪晚期,伊拉克的北部逐渐被起源于凯尔布部落的阿拉伯乌凯勒人统治。乌凯勒人与哈姆丹人一样,也是什叶派信徒,不过他们从没有放弃游牧的生活方式,哪怕是在控制了摩苏尔之后,亦没有去依靠土耳其常备军。到 1010 年时,乌凯勒人统治着巴格达附近从摩苏尔到库法的大片土地。11 世纪,土耳其各部落不断迁移至伊拉克北部和安纳托利亚。1040 年,乌凯勒人将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联合起来,击败 23 了土耳其人,确保了阿拉伯人能够继续对杰济拉进行统治。在南部,另一支来自沙漠的什叶派部落阿萨德人,在马季亚德家族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繁荣的国家,首都是西拉(Hilla)。西拉在 1101 年的崛起主要是以库法的衰落为代价的,库法是早期哈里发设立的伊拉克旧都。马季亚德王朝(961—1150 年)还统治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尤以赞助学术著称。在马季亚德王朝统治期间,西拉成为什叶派的学术重镇,为什叶派思想在整个伊拉克尤其是在阿拉伯各部落中的传播作出了贡献。现在的伊

拉克仍然铭记着摩苏尔和西拉的这些阿拉伯部落领袖，只为他们的高贵、侠义和无私资助。马季亚德王朝虽然名义上依然接受巴格达的至高统治，但它经常违背布韦希王朝的意愿，并且试图利用哈里发来反对大元帅，或利用布韦希王朝的某个首领来反对另一个首领，以获得更大的独立。

塞尔柱人与逊尼派统治的恢复

随着土耳其移民大潮的不断涌入，主要在波斯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出现了一些土耳其人建立的小国家。在 11 世纪中期，塞尔柱土耳其人成功地统治了波斯的大部分地区，1055 年，他们的首领脱斡邻勒汗(Tughril Bey)[①]夺取了巴格达。作为逊尼派信徒，哈里发最初感到很高兴，认为这一胜利将很快恢复阿拔斯王朝的威望。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这个土耳其首领并没有放弃权力的打算。即使在击败了布韦希王朝之后，脱斡邻勒汗也没有设法去觐见哈里发。相反，他继续挥兵北上，于 1057 年攻克了摩苏尔，但却将乌凯勒王朝的一位成员任命为总督。在拿下大部分伊拉克的领土之后，脱斡邻勒汗被哈里发授予“苏丹”以及“东西方之王”的称号。在塞尔柱人统治期间，哈里发与苏丹在职能上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分离，分别领导宗教和世俗事务。塞尔柱苏丹们几乎总是通过与哈里发家族的联姻，来提升他们作为逊尼派穆斯林保护者的合法性。如同以前大元帅的名字一样，苏丹的名字也与哈里发的名字一并被刻在硬币上，在主麻日的礼拜中，他的名字也随哈里发的名字一起被念及。

逊尼派力量在巴格达的恢复，最初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反什叶派行为的发生，什叶派依旧继续保有政府中的高位。逊尼派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有着共同要反对的敌人，那就是处于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进犯之心越来越明显的埃及伊斯玛仪派国家。法蒂玛王朝当时已经控制了

24

① 土耳其语“Bey”，大致相当于阿拉伯语的“Shaykh”(谢赫)或库尔德语的“Agha”(阿加)，都是指部落酋长的意思。

叙利亚,它也成功地赢得了那些对新出现的塞尔柱国家势力感到恐惧的小国领袖的心。在法蒂玛王朝的直接支持下,一个名叫白萨西里的首领成功地组织了一支包括乌凯勒人和马季亚德人在内的广泛的什叶派盟军。此前,白萨西里是由奴隶组成的布韦希王朝精锐部队中的一员,因此他能够召集足够的力量,支持他于1058年以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名义夺取巴格达。在迫使阿拔斯哈里发流亡之后,白萨西里南下攻克了瓦西特和巴士拉。不过,伊拉克臣服于开罗的状况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就在白萨西里取得胜利之后不久,法蒂玛王朝停止了支持,他那摇摆不定的阿拉伯部落联盟(其实主要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联盟)也破裂了。当1060年塞尔柱人重返巴格达时,他们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随着白萨西里运动的失败,以及塞尔柱人监护下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复辟,什叶派将面临全面的报复。包括最著名的宗教学者在内的重要的什叶派贵族都逃往纳杰夫,那里很快就成为一个新的什叶派领导人的中心。教派暴力的灾难甚至蔓延到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之外,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逊尼派沙斐仪支派和罕百里支派之间的重要冲突也被卷了进来。在这种氛围之下,巴格达的非穆斯林尤其是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只有面对不断增加的迫害了。1091年,一些基督徒群体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对犹太教徒的隔离也变得更加平常。

在塞尔柱人的统治之下,巴格达失去了光辉。多数苏丹通常选择像伊斯法罕这样的波斯城市作为这个囊括波斯、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之都。塞尔柱人的势力在整个11世纪后半期仍然相对强大,不过,以省为基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能让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分裂的力量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为了稳定他们的统治,塞尔柱人向中世纪伊斯兰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出身波斯的维齐尔尼扎姆·穆勒克(卒于1092年)求助。尼扎姆·穆勒克力图进行行政改革,以使苏丹手中的中央集权更为强大。他重点关注的一件事情是统治阶层和国家官员缺乏思想上的统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离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为了消除这一弊病,他创建了一些宗教大学(*madrasas*),这些学校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逊尼派穆斯林尤其是逊尼派官员的素质。课程的重点突出了

逊尼派教义学和教法学(尤其是更为灵活的哈乃菲学派和沙斐仪学派的教义学与教法学思想),它们与什叶派思想截然对立。在伊拉克,1067年开放的位于巴格达的三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尼扎姆宗教大学最为著名。尼扎姆·穆勒克还努力加强了对数量众多的食邑转让的控制,因为转让已经使食邑成为实际上的私产。国家收回了这些食邑,将之重新分配给土耳其将领和酋长。为了确保苏丹不必过于依赖食邑的拥有者,奴隶士兵体制,亦即“马穆鲁克”(*mamluks*)得到扩大。马穆鲁克是苏丹的个人财产,它起到了某种禁卫军的作用。

塞尔柱人在为伊拉克以及巴格达周边的动荡地区渐次带来秩序中做得非常成功。1096 年,他们推翻了摩苏尔的乌凯勒王朝,用自己的总督取而代之。而马季亚德王朝则通过纳贡和小心谨慎地避免与苏丹发生龃龉,才保有对西拉的控制。不过,马季亚德王朝还是设法进行领土扩张,它兼并了瓦西特、巴士拉以及最南边的提克里特。出于对马季亚德王朝势力日盛的担心,塞尔柱人于 1108 年摧毁了他们的军队并占领了西拉。在塞尔柱最英明的几位苏丹,如艾勒卜·艾尔斯兰(1063—1073 年在位)和马立克沙(1073—1092 年在位)的治理下,国家商业繁荣、农业兴盛,伊拉克恢复了往昔的活力。然而,与埃及的冲突,却导致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人统治下的伊拉克失去了与地中海地区的部分商业和文化联系,从而更多地转向了波斯和东方。到 12 世纪初的时候,塞尔柱人的势力开始衰落。1127 年,摩苏尔的塞尔柱总督伊马德丁·赞吉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这个王朝将产生出伊斯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人物:萨拉丁·伊本·阿尤布。当时,尽管欧洲的十字军从来没有到达过伊拉克这么远的地方,但赞吉王朝还是积极参加了与十字军的战斗。在伊马德丁及其子努尔丁的领导下,赞吉王朝取得了对当时尚未吃过败仗的欧洲入侵者的一系列胜利。1187 年,经历了史诗般的哈丁战役之后,萨拉丁收复了耶路撒冷,取得了至高的荣誉。萨拉丁 1138 年出生于提克里特,双亲是阿拉伯库尔德人,他为赞吉王朝效力,后被派往埃及协助消灭那里的法蒂玛王朝。1171 年,萨拉丁推翻了法蒂玛王朝的最后一任哈里发,在开罗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阿尤布王朝,该王朝重新

承认了巴格达逊尼派哈里发的象征性权威。阿尤布王朝下的埃及与之前一样充满了野心,在一场没有取得成功的重新统一伊斯兰中心地带的尝试中,萨拉丁本人就两次包围了摩苏尔。早在 1120 年,塞尔柱人的国家就开始遭受分裂和内讧之苦,巴格达的哈里发遂利用塞尔柱人统治的无力,控制了新一波的“艾亚尔”运动,以便获得支持重新恢复其政治权威。1135 年,哈里发穆斯塔尔希德召集了一支军队,不过却没能将塞尔柱总督驱赶出去。

26

在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人统治期间,由于民众转向神秘主义,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shari'a)受到挑战。沙里亚法强调了法律的重要性,它通常也承认国家所颁布的官方法律。国家的衰弱以及哈里发威信的下降,无疑加剧了这一趋势。神秘主义苏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初创时期,它明显受到了基督教隐修主义和东方宗教的影响,强调一个充满爱的、仁慈的真主与单个信徒之间的情感联系。信徒可以借助通常涉及玄思的艰难的直觉探索过程来发现这种联系,也可以通过公共的礼拜仪式感知这一联系,在这样的礼拜仪式中,一些神秘主义者不断重复着某种话语,逐渐进入到一种入定状态。大多数苏非教团或兄弟会是通过长老与信徒这样的等级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很盛行。这些教团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卡底里亚教团,由信徒阿卜杜勒-卡底尔·盖拉尼(卒于 1146 年)成立于巴格达。卡底里亚教团既强调要尊重沙里亚法,又提出要探索一条神秘的道路,这一主张使之风行整个伊斯兰世界,卡底里亚教团在政治分裂时期维护宗教的统一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的教团则倾向用信仰来贬低沙里亚法的重要性。另一个苏非教团是里法伊亚教团,它由信徒艾哈迈德·里法伊(卒于 1183 年)成立于巴士拉,该教团的一些成员以从事超出常人的行为而著称,比如吞剑或赤脚在炭火上行走。他们声称,与真主的亲密关系将保护他们免受伤害。随着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传播,苏非教团的简陋小屋对清真寺形成了竞争,而苏非长老对伊斯兰正统的宗教学者乌里玛也形成了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神秘主义可以看作是民众对精英不断加重的压迫的挑战,但另一方面,精英群体中的许多人,包括塞尔柱苏丹

们在内,都接受了苏非主义的方方面面,并且资助了苏非派的领袖和各个苏非派教团。

阿拔斯王朝的复兴

穆斯塔尔希德恢复政治权威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其继任者并没有放弃。1136—1160年间,哈里发穆克塔菲成功地从塞尔柱人的权力下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他同时将西拉、瓦西特、库法和提克里特置于其控制之下。哈里发新确立的权威经常受到宗教分裂和城市里不断壮大的平民团伙的威胁。替代"艾亚尔"的是新团伙"福突瓦"(*futuwwa*)。"福突瓦"可以大致翻译成"青年男子气概",这些由四邻组成的小青年团伙介于现在的青年帮派和黑手党之间。他们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亦即将他们与"艾亚尔"区分开来的特点是深受苏非派的影响。"福突瓦"不只像邻里般那样团结一致,苏非派还赋予他们一种更强的凝聚力,使他们超越了四邻甚至城市。许多"福突瓦"团伙全无害人之意,他们的重心在于玩乐或者是为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但一些"福突瓦"却更以犯罪活动著称。如同"艾亚尔","福突瓦"也有他们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与苏非派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一些"福突瓦"成员穿着特定的服装,以此表明他们同属一伙。"福突瓦"在下层民众中十分盛行,他们的行为妨碍了国家的权威,甚至由于挑起城市的骚乱而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哈里发所在的巴格达,这座城市现在不论在规模上还是财力上都遭到巨大的削弱。1184年,旅行家伊本·祖拜尔目睹此景,有感而发:

27

> 这座古代城市虽然还贵为阿拔斯王朝的帝都,但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无与伦比的特点,只保留着那个世人皆知的名字。与曾经的过往相比——即在它堕入无休止的不幸和不断的祸患之前——这座城市现在就像一座不复存在的营地或一个早已消亡的幽灵。[①]

---

① 引自 Michael Cooperson, "Baghdad in Rhetoric and Narrative", *Muqarnas*, vol. 13, 1996, p. 99。

1180 年,一位最富活力和最具思想的哈里发登上了阿拔斯王朝的王位,这就是纳绥尔,他在复兴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中比任何一位哈里发做得都多。他的改革虽说最终来得太迟,但这些改革依然表明它们是逆转不利形势的非凡事例。他不知疲倦地给所有穆斯林的统治者写信,劝他们放弃其社会地位,重新团结在哈里发之下。他还参与调解许多王公之间的敌对状态,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他的地位,而凭借其地位的上升,其影响也愈发重要。他通过研习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并成为其中的权威,在宗教上也获得了最重要的地位。同时他通过拜谒什叶派圣地并不惜重金予以修缮,展现了他对先知家族的特别尊敬。为了进一步对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和平作出表态,他任命一位什叶派信徒为他的维齐尔。不过,最具创新精神的政策还是他对"福突瓦"的态度,他并没有像其前辈所做的那样去镇压他们,而是接见他们的领袖并向之寻求帮助。后来,让他的参谋们倍感震惊的是,他宣布自己将成为"福突瓦"中的一员。这一行为极大地遏制了"福突瓦"的犯罪倾向。"福突瓦"的成员为哈里发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他们因此开始认同更为广泛的国家利益。纳绥尔有效地将"福突瓦"团结到自己身边,使之不再从事犯罪活动和神秘主义行为。在 1225 年他去世的时候,"福突瓦"成为阿拔斯国家复兴的基石之一。

28

纳绥尔的计划并非全部奏效。为了确保塞尔柱人的威胁不再重现,他与波斯东部野心勃勃的花剌子模诸王缔结了危险的盟约。1194 年,最后一位塞尔柱苏丹被处死之后,花剌子模王要求纳绥尔承认其对伊拉克的权力。在遭到拒绝后,花剌子模大军向巴格达进发,如果不是大自然的干预,他们真的会攻下这座城市。1217 年,一场来自波斯的暴风雪席卷群山,在花剌子模大军进入巴格达之前就彻底摧毁了它。这个以"福突瓦"为基础的国家向人们证明了,其局限性之强,不足以使哈里发的权力扩展到巴格达城之外。随着农村再次失去控制、税收下降和食品短缺,这些过去一再发生的事情给城市脆弱的和平造成了影响。教派纷争与城市内部的争斗与洪水的泛滥和瘟疫的爆发交替进行。在 1255 年和 1256 年两年之内,即便是哈里发的军队也参与了劫掠行为。就在巴

格达在混乱的边缘摇摇欲坠之时，另一场更为危险的风暴正在中亚草原悄然形成。那个曾经于 1217 年对巴格达微笑的命运女神，打算遗弃这座哈里发的城市了，巴格达将在步步逼近的蒙古人手中经受它最大的灾难。

636 年阿拉伯对伊拉克的征服，为这里的社会和谐引入了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它们逐渐为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所接受。既然旧的宗教和语言共同体尚存，新的诸如逊尼派和什叶派分裂这样的分歧仍然发展，一种基于自治共同体观念的和谐建立起来。在倭马亚王朝末期，毁灭性的社会冲突所带来的威胁，随着部落竞争和对麦瓦利的歧视等问题而出现。到 750 年时，阿拔斯革命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和谐观，它建立在伊拉克强大的绝对主义中央政府之上，追求全体穆斯林的平等，并对内部发展作出了更大的承诺。伊拉克所出现的一些新型的世界主义都市，特别是巴格达，成为财富的中心，并绽放出绚丽的文化奇葩。随着地区的分离、阶级的冲突、中亚新民族的进入，以及经济的整体衰退，平衡在 10 世纪时被打破，让位于不断增长的教派暴力。在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人统治期间，尽管作出了一些解决上述问题的尝试，但这些王朝却不能产生出为这个国家指引一条不同道路的新思想，其结果便是中央权力的日渐衰弱。国家内部的软弱使之无力应对外敌的不断入侵，其财富被极大地削弱，社会分裂也进一步加剧了。



第二章　蒙古人与土库曼人统治下的伊拉克:1258—1534 年

30

现在回想起来,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居然想抵抗蒙古人的征服,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到 13 世纪末的时候,从中亚草原出发的大军已经轻而易举地扫荡了整个亚洲大陆,摧毁了无数帝国和王国,其中包括中国、波斯、俄罗斯和东欧。1206 年,历史上最庞大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成功地将阿尔泰山以东的主要突厥和蒙古游牧部落统一起来,使之臣服于自己。[①] 为了保持这种统一,成吉思汗毕生以征服为业,1227 年他去世之后,征服大业依然由其后人来延续。除了个人的强健勇猛、团结一致以及高度的机动性之外,蒙古人获得成功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让人普遍感受到的残忍和恐怖。伴随他们到来的是毁灭与屠杀,由之产生的恐惧感便散播开来,加速了新的被征服土地的屈服。被征服的城市要么选择投降和纳贡,要么任其男性居民被屠杀殆尽,妇女和儿童被掳去为奴。比如,成吉思汗对穆斯林土地发起的第一次战争,就因为对波斯东部的重要城市木鹿所进行的可怕杀戮而为人所瞩目。当时的记载声称,在杀尽了该城的全部人口后,猫和狗也不能幸免。巴尔赫、赫拉特以及内沙布尔等城市也遭此厄运。在蒙古人看来,这些城市对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

① 突厥-蒙古军队有时被称作"鞑靼人"(Tatar),他们是成吉思汗同盟者中最重要的一个部落。

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更糟糕的是，蒙古人是萨满教徒，他们毫不敬畏伊斯兰教的信条。蒙古人的征服开启了一个动荡的时代，部落势力的优势地位以及外敌的不断入侵，痛苦地考验着伊拉克众多族群之间的关系。

31

巴格达的陷落

蒙古人的内斗到1251年达到顶峰，此后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1253年，他派遣兄弟旭烈兀率领一支7万人的大军去征服中东的伊斯兰之地。蒙古大军尚在波斯攻打伊斯玛仪派仍在抵抗的要塞之时，旭烈兀就送话给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斯台绥木，命令其投降。穆斯台绥木拒不投降，他威吓蒙古人说，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蒙古人的怒气会保证他不会受到任何危害。这种空洞的威吓并不能阻止旭烈兀于1257年进入伊拉克，1258年1月11日，蒙古大军已完全包围巴格达。显然，在蒙古人拥有中国大炮这个优势下，这座城市不能抵抗多久。多次求和无效后，为了避免灾难，哈里发决定在最后时刻铤而走险。他在巴格达王公显贵的陪同下，亲自去觐见旭烈兀。2月10日，虔信者的领袖、阿拔斯王朝第37任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浑身颤抖地站立在不为所动的异教大汗面前。他乞求旭烈兀不要伤害百姓，以此作为投降的条件。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在一个相关的说法中，哈里发与他所有的黄金被锁在一起，直至饿死。不管哈里发是怎样被处死的，蒙古人随后很快就进入巴格达。屠杀和破坏没有间断地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关于巴格达的屠城有许多描述，其中一些是以目击为基础的，伊本·阿西尔的记述最为著名：

>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报道这一事件。我发现，详细描述它让我感到恐惧和厌恶，因此犹豫再三。可是，谁又会觉得描述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毁灭是一件容易的事呢？……哦，要是我的母亲没有生下我，要是我在之前就已经死去，或者要是我已经遗忘了，那该多好啊！……我的报道包括了这么一个故事……类似的巨大灾难此前从未发生过，它足以震惊整个世界，当然，首先为之感到震惊的还是

> 穆斯林们。如果有人说,自伟大的真主创造人类以来,我们的世界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他讲的是实话……就是从现在起,直至世界末日……我们的世界也不可能再经历类似的事情。①

共计有 10 万多人被屠杀,城里的大多数房屋也被大火和抢劫毁坏。许多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知识与文化活力的宏伟建筑也被彻底焚毁,如哈里发大清真寺、什叶派位于卡吉姆清真寺的圣陵。尼扎姆大学和穆斯塔绥尔大学也遭到严重破坏,学校的图书馆被毁,据说许多无价的图书被扔进了底格里斯河。不过,降临到百姓身上的灾难却是最可怕的。那些从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还将面对强暴和奴役。有人如此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32

> ……他们在城市里横冲直撞,像饥饿的老鹰攻击鸽子,又像凶残的饿狼攻击羊群,无拘无束,不知羞耻,他们一边杀人放火,一边散播着恐惧……屠杀超乎人们的想象,死者的鲜血漂浮在河面上,使河水的颜色很像尼罗河……他们四处劫掠,将巴格达后宫的财宝一扫而空……人人皆能听见屋顶上和大门口传来的……恸哭之声……那些躲在后宫帷幕后面的人……被拖拽着穿过大街和小巷,她们中的每个人都成了鞑靼恶魔手中的玩物,朗朗乾坤也为这些贞洁之人变得暗淡无光。②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许多基督徒由于旭烈兀的妻子是基督徒而被赦免,但全体巴格达百姓所遭受到的痛苦却是巨大的。后来的逊尼派作家毫不怀疑,这是因为哈里发的什叶派宰相伊本·阿尔卡米背信弃义地去帮助蒙古人所致。不管什叶派的显贵们采取了何种行为,对于最终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旭烈兀手下既有逊尼派谋士,又有什叶派

---

① 引自 Bertold Spuler,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72, pp. 29—30。

② 引自同上书,pp. 120—121。

谋士，即使著名的什叶派科学家纳速剌丁·图西出面，也没能劝阻蒙古人亵渎什叶派的圣地或屠杀像伊本·塔乌斯这样的什叶派名人。不管怎样，巴格达重要的什叶派人士很快在宗教上承认了旭烈兀的权威，他们宣称，一个公正的非穆斯林的统治者也要强于一个不公正的穆斯林的统治。接受蒙古人的统治摧毁了本来就已经脆弱的伊斯兰政治权威的形象，但它可能会有助于减少破坏。发生在伊拉克的其他著名大屠杀还有 1262 年的瓦西特和摩苏尔屠城。不过，大多数城市还是很快就臣服了，也得到普遍的赦免。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外是库尔德人，他们被认为是蒙古人在伊拉克北部最顽强的敌人。例如在伊尔比尔，即使这里的总督向蒙古人投降之后，库尔德人的军队仍然拒绝放下武器，他们继续抵抗了几年，并向埃及苏丹寻求帮助。伊尔比尔及其周边的农村陷落后，蒙古人开始大肆报复，导致沙赫拉祖尔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锐减，这里的库尔德居民只得集体逃往叙利亚和埃及。直到今天，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开罗仍有不少库尔德人社区，他们都称自己是那些逃亡者的后裔。旭烈兀大军的西进步伐，直到 1260 年才被埃及军队阻挡在巴勒斯坦的艾因贾鲁。

33

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伊拉克来说，巴格达的陷落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肉体和人身所受到的伤害虽然巨大，但心理上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和长久。巴格达不仅是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哈里发国家的中心，而哈里发这一职位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建制，象征着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和其正统信仰的捍卫者。穆斯台绥木之死表明，尽管哈里发国家的痕迹在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得以继续存在，但这一根本的象征其实已经结束。此外，处决哈里发的是异教徒，这对于穆斯林的骄傲和宗教必胜信念是一次重大打击。它还进一步推动了穆斯林中发展已久的仇外倾向，这种倾向将外部世界及其文化视为敌对的和充满威胁的。直到今天，伊拉克人仍将旭烈兀的名字看作一种难以承受的灾难的同义词，而 1258 年的事件依然触动着伊拉克人的情感深处，被认为是这个地区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原因。因此，在 1991 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 2003 年美国主导下的对伊拉克的入侵期

间,伊拉克的宣传机构无法不让自己利用蒙古人的可怕征服这一意象,来激发人民的情绪。这一点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今天,在展现这个国家所遭受到的普遍的破坏和法律沦丧时,伊拉克的各家媒体还是会经常把这种情况与蒙古人入侵后的情况作比较。蒙古人统治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加深了伊拉克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分离。伊拉克与波斯的联系密切,与东地中海国家的关系疏远,很早即已有之。但是,蒙古人对埃及和叙利亚统治者的长期仇恨,以及之后所发生的蒙古人与后者的战争,更扩大了这种分裂。最后,蒙古人的统治有效地削弱了官方认可的正统派或信奉伊斯兰教法的逊尼派穆斯林的优势地位,为什叶派思想和各种各样流行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倾向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伊儿汗国的统治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伊拉克的历史呈现出一派混乱景象:中央权力的衰弱、国家的分裂、王朝的频繁更迭和外敌的不断入侵。庞大的蒙古帝国也分裂成几块享有自治权的领地,这些领地逐渐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旭烈兀及其后代所统治的领地被称作伊尔汗国,包括波斯、阿塞拜疆和伊拉克。大不里士后来成为伊尔汗国的都城,巴格达却下降为省区的中心。而伊拉克的北部,则由摩苏尔统治。伊拉克的日常行政由总督来管理(总督通常为波斯人,但亦有例外),最终的决定权却掌握在蒙古军事首领手中,他们的军队驻扎在汗国的重要城市里。蒙古入侵结束后,阿塔蔑力克·志费尼[①]担任巴格达总督,治理巴格达有二十余年,巴格达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恢复的迹象。一些建筑得到修缮,不少学者也重返巴格达,商业开始复苏,一项还不算苛刻的税收制度也开始实施。但尽管如此,整体的景象依然是衰败的,这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为了榨取农民,出身游牧部落的新的统治阶级渴望将大批农田转变为牧场,全然不顾农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损失。税收,尤其是农村的税收急剧上涨。在提高旧有的土地税和人头税之外,伊尔汗国的统治者还实行一系

34

① 阿塔蔑力克·志费尼,波斯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征服者史》。——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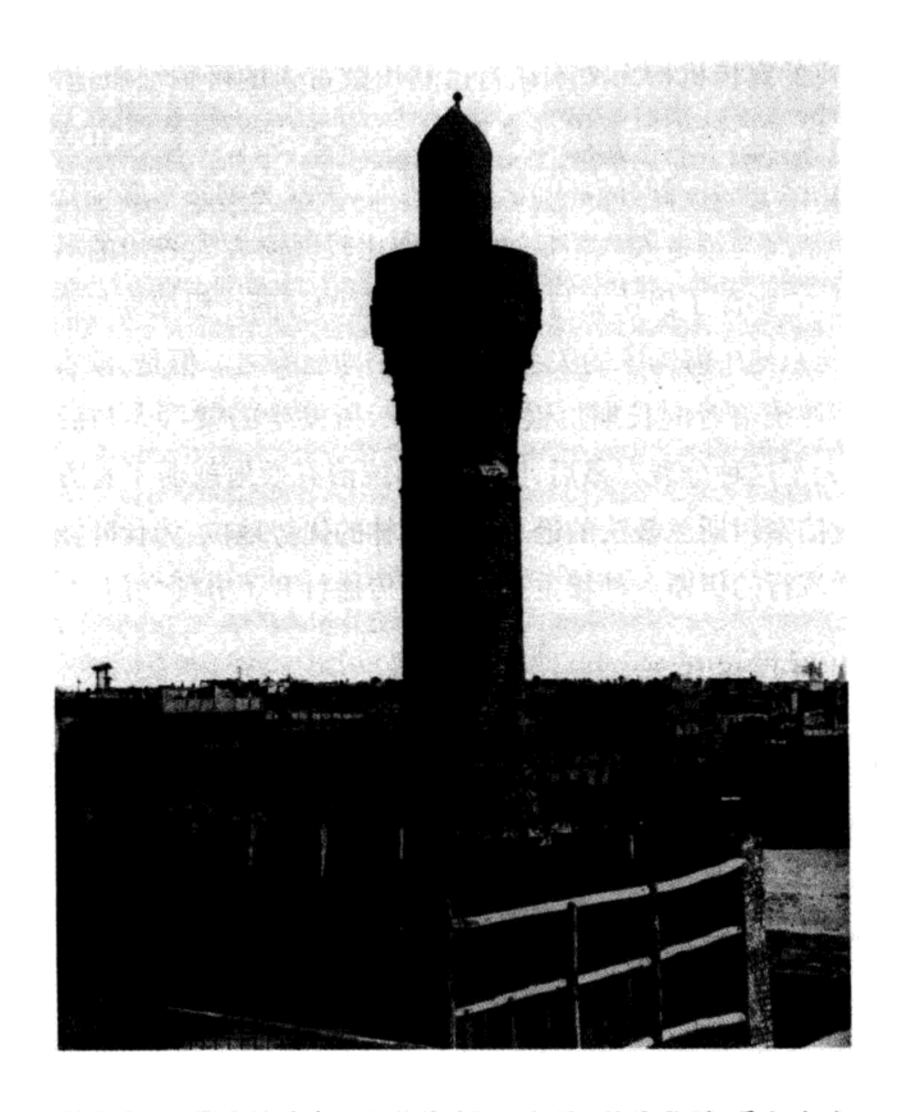


图 2.1 巴格达的苏克·加扎勒(Suq al-Ghazl)宣礼塔,最初由哈里发穆克塔菲(901—907 年在位)所建,1258 年为蒙古人所毁,后由蒙古统治者阿八哈汗(Abagha Khan,卒于 1281 年)重建。TopFoto/Roger Viollet

列的商业税和特殊税,通常在一年之内提前征收数次。税收的负担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在一些地区,农民要上缴他们收成的 66%,通常还是以实物税的形式。但在城市里,税收的负担则要小得多。

伊拉克人民同时还不得不与逐渐加强的封建行为和漫长的社会动荡作斗争,它们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并促成了政治分裂,阻碍了商业和长期投资的发展。最严重的是沟渠灌溉系统的崩溃,它导致良田面积的大幅度下降。经济上的这种恶化形势,再伴以冷酷的盘剥和对农民周

期性的杀戮,肯定会影响人口的状况。尽管人口的下降在蒙古人入侵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但普遍的下降和不稳定则是随着这一过程而加剧的。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农业中的严酷压榨和有损农民的情况外,营养不良、传染病以及人口的外逃等,共同导致了大范围的人口下降。据估计,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中部迪亚拉省的人口,从 1100 年的 40 万降至蒙古入侵后的 6 万人。受早期伊尔汗国庇护的志费尼目睹此景,也禁不住哀叹道:

> ……每个城市和每个村庄都被洗劫和屠戮过多次,它们遭受如此混乱的状况已有经年,所以,即便一代人之后的复苏时期人口有所增长,但仍没有达到此前的十分之一。①

尽管巴格达仍在努力留住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部分光辉,但其规模和重要性已经落在伊尔汗国的新都城和阿塞拜疆国际贸易的中心大不里士后面了。商业路线向东的进一步转移,使巴格达和巴士拉损失尤其严重。在蒙古人统治之前,经过波斯湾和巴士拉的巴格达—地中海—印度贸易获利甚丰。但在伊尔汗国及其后继者统治期间,这条商路逐渐被穿越波斯的霍尔木兹到大不里士的商路所取代。不仅如此,伊尔汗国与埃及、叙利亚苏丹国之间频仍的战乱,中断了伊拉克与地中海很早就已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系。虽然伊拉克并入蒙古帝国巨大的疆域之内无疑加强了它与波斯和中亚的贸易联系,但这并不能弥补它与印度和地中海贸易的衰落。更糟糕的是,腐败和管理不善使这个国家在 1294 年彻底破产。其结果是,从中国传来的被称作“钞”(*ch' ao*)的纸币得以使用,替代了日渐稀有的金属货币。但公众却完全不接受这种让人感到陌生的新纸币。为了不引起巴格达的混乱和免致整个贸易停顿,人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放弃了纸币体系。卡兹维尼所引述的国家税收数字可以很好地总结这一时期经济的普遍衰退。税款尽管很高,但国家的税收却从

35

36

① 引自 David Morgan, *Medieval Persia, 1040—1797*, London, 1988, p. 79。

哈里发纳绥尔统治期间(1180—1225 年)的 3000 万第纳尔,降至 1336 年的 300 万第纳尔。

蒙古人的统治给伊拉克的教派关系带来了重要影响。在过去 40 多年的时间里,伊尔汗国的大多数百姓都信奉萨满教,似乎只有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才从穆斯林权力的倒台中获益。基督徒的人头税取消了,新的教堂也建立起来,一些基督徒作为伊尔汗国的大使,出访欧洲国家,由于他们的权力在穆斯林之上,因此不再会被排斥在高官的位置之外。例如,在埃尔比勒,一位名叫塔吉丁·穆克塔斯的基督徒被任命为这里的总督,当地百姓也因此目睹了一段增长和繁荣时期。一些居住在高原的基督徒被招募进辅助部队中,以帮助蒙古人控制杰济拉地区的山地居民。到这个世纪末,随着伊尔汗国逐渐采纳了伊斯兰教,基督徒早年所获得的这些好处便开始经常性地遭到暴力剥夺。1295 年,蒙古人摧毁了三座教堂,1310 年,在暴民的攻击下,埃尔比勒的整个基督徒社区最终被铲除。巴格达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暴民的攻击使这里繁荣的迹象消失了。犹太人也从人头税的取消中受益,1283 年,一位来自摩苏尔的被称作赛尔德·道莱(即"国家的好运"之意)的犹太人,被任命为国家的财政大臣。赛尔德·道莱利用国家的庇护,安排他的两个兄弟分别当上了巴格达和摩苏尔的总督,其他一些亲戚也在伊拉克被委以高位。在为伊尔汗国效力期间,他的工作还是很称职的,平衡了国家的收支,也增加了税收。尽管如此,他的傲慢自大还是招来了敌人,等他的保护人 1291 年去世后,他也就被他的敌人处死。赛尔德·道莱之死,引发了对巴格达、摩苏尔和其他城市犹太人的大规模攻击。1295 年,伊尔汗国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标志着非穆斯林悲惨日子的到来。他恢复了人头税,下令捣毁许多教堂和神庙,为犹太人和基督徒制定了单独的着装规则,对暴民袭击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奈之下,许多人都改信了伊斯兰教,但基督徒却按照惯例逃到了农村,城市里基督徒的数量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犹太人由于更习惯这种定期的迫害狂潮,他们因此能够从这场风暴中存活下来,他们在大多数伊拉克城市中,依然能保持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 20 世

纪中叶仍是如此。

什叶派同样从逊尼派穆斯林的垮台中获益。什叶派对伊尔汗国的宫廷,以及当时什叶派的学术中心西拉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在蒙古人入侵期间,什叶派从这场劫掠中得到赦免,这使它能够迅速渗透到其他城市中去。尽管合赞汗皈依的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但他对什叶派依然高度赞赏,这从他经常拜谒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什叶派圣地中可以看出。1309 年,合赞汗的继任者完者都竟然皈依了什叶派,并将之定为伊尔汗国的国教,直到 1316 年他去世时为止。总的说来,过去几个世纪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紧张、有时也经常充满暴力的关系,在伊尔汗国期间得到大大改善。整个伊斯兰教在蒙古人统治初期所面临的威胁,反而将它的两大支派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学者中可以看到,比如针锋相对的争论性著作的数量下降了,学者在辩论时也采用一种更为尊重的语气。更重要的是,两个教派之间开始大量借用对方的思想。在逊尼派中间,一些人强调了阿里以及先知家族的道德作用,他们虽不接受天启的观念,但认同阿里的地位要高于前三任哈里发。逊尼派的神秘主义,也深受什叶派的影响,比如苏非派就很重视阿里的深奥学识,甚至接受了什叶派的一些实践。对什叶派来说,逊尼派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逊尼派学者支配下的伊斯兰神秘主义逐渐进入到什叶派的信仰之中。

蒙古人之皈依伊斯兰教,虽然说不上是一件让人感到十分吃惊的事,但也是他们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与他们在中国的亲族一样,伊尔汗国的蒙古人起初并不打算接受他们所统治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的文化与习俗。同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合赞汗 1295 年皈依伊斯兰教是一个重要时刻。起初,蒙古人倾向于接受对伊斯兰教法学派产生影响的苏非派神秘主义。但合赞汗的皈依是创建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国家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国家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疏远关系会得到改善,经济的生产能力也会得到提高,税收也会相应增加。在宰相拉施德丁[①]的指导下,伊尔汗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最主要的是税收

① 又译拉施特,即《史集》的作者。——译者

法规的制定。其他的改革还有挖掘沟渠，增强旅行商人的安全保障，统一度量衡，重开瓦西特、西拉和巴士拉的铸币厂，制定一套基于伊斯兰教法的更有效的司法体系，以及集中并控制食邑的封赐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制定有着很大影响，但因为国家并不能全面实施它们，故而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事实上，1304 年合赞汗去世后，国家便陷入派系之争当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丘拜尼与贾拉伊尔两大部落的争斗。1327 年，伊尔汗国的第九任君主不赛因恢复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中央集权的迹象得到部分恢复，但由于他 1335 年死后无嗣，这就使国家的内斗更为剧烈，帝国也逐渐分裂了。最后，应当一提的是，伊尔汗国接受了波斯的文化，成为各种艺术热心的资助者。伊尔汗国时期，中国和中亚的情趣以及装饰艺术被引入中东，改变了这里既存的建筑传统，并使书籍的插画艺术获得新生。这一时期，许多圣陵都具有明显的中亚设计风格，如祖勒·卡法尔清真寺的大圆顶(建于 1316 年)和苏哈拉瓦迪清真寺(建于 1334 年)就与在蒙古发现的佛塔结构相似。

38

贾拉伊尔王朝与土库曼人的统治

随着伊尔汗国的慢慢瓦解，许多人都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提出了要求，朝代的更迭亦很频繁。而伊拉克则被哈桑·布祖格的贾拉伊尔家族所控制。在哈桑·布祖格之子谢赫·乌畏思(1356—1374 年在位)的带领下，贾拉伊尔王朝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通过扩张囊括了大部分阿塞拜疆。虽然贾拉伊尔王朝并不能扭转伊拉克总体的颓势，但他们却因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建筑而被人所牢记，比如巴格达的迈尔坚汗清真寺。那时的贾拉伊尔王朝在国家管理上有一个严重的弊端，即卖官鬻爵，这其中就包括一些重要的总督职位。贾拉伊尔王朝的统治后来被反叛和外敌的入侵打断，谢赫·乌畏思死后不久，苏丹扎剌勒丁和其两个兄弟——巴格达总督及巴士拉总督之间展开了血腥争斗。在这之后不久，这个国家就不得不与来自撒马尔罕的伟大征服者跛子帖木儿的入侵相抗争。帖木儿的征服在某些方面要比蒙古人的征服更具毁灭性。1393 年，帖木儿赦免了巴格达的居民，因为大多数贵族都欢迎他的到来，希望他能消除贾

拉伊尔王朝统治的弊病。但是,到了 1401 年,他不得不再次征服这个城市,这一次却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帖木儿的第二次征服甚至比一个半世纪前旭烈兀的征服还具破坏性。除了可以看到的破坏和生灵涂炭外,大量有技术的工匠和学者——这可是经济和文化生产的基础——被掳往撒马尔罕。这一次,巴格达不能再恢复哪怕是一丁点往日的地位。与阿拔斯王朝统治的黄金时代相比,尽管巴格达的影响已经急速下降,但在伊尔汗国和贾拉伊尔王朝时期,它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不过,在经历了这场最后的打击后,巴格达降低到省级城市的次等地位,除了关于过去辉煌的记忆外,它不能再给我们任何东西。

39

帖木儿征服了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之间的大片土地,却不能将之凝聚成一个长久的帝国。1405 年帖木儿去世后,帝国便解体了。贾拉伊尔王朝的统治者在帖木儿大军到来之前便弃城而逃,他于 1405 年返回巴格达,试图恢复他的统治。但此时,由于帖木儿的攻击,贾拉伊尔王朝国势已衰,无法再持续太长时间。1410 年,一个被称作“黑羊”的土库曼人联盟夺取了大部分巴格达,黑羊土库曼人系一支游牧民族,他们的牧场从摩苏尔逐渐扩张到北部的凡湖地区。黑羊土库曼人与贾拉伊尔王朝冰释前嫌,与其末代君主组成了一个无力的联盟,以抗击帖木儿的入侵。在当时的混乱形势下,这个联盟很快就破裂了,贾拉伊尔王朝的末代领导人被驱赶至南方,他们在那里继续实施对西拉、瓦西特和巴士拉的统治,直到 1432 年。在伊拉克北部,贾拉伊尔王朝的最牢靠的同盟者是库尔德人,尤其是以管理和军事著称的比德里斯部。在黑羊王朝统治期间,伊拉克经受了新的悲惨和贫困。伊拉克地区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巴格达与摩苏尔之间的对立更为严重,国内普遍存在的中央权力的丧失也加剧了。黑羊王朝的创建者、伊拉克的征服者卡拉·优素福以残忍著称,根本不考虑受害者的社会和宗教立场。1417 年,他在盛怒之下,下令将伊拉克的教法执行官,70 岁的塔吉丁·艾哈迈德的鼻子割掉,就因为他无礼的举止。据时人的记载:“卡拉·优素福的后代们都是真主创

造的最野蛮的人,伊拉克、波斯和巴格达城就是毁在了他们手里。"[1]黑羊王朝的这种暴政加速了伊拉克城市,尤其是巴格达和巴士拉的衰败。

黑羊王朝时期,各种什叶派倾向在人民之中广泛兴起,不过却是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发生的。什叶派的蓬勃发展也影响到了统治阶层。杰汗·沙赫(1439—1467年在位)统治期间,黑羊王朝的势力达到顶峰,杰汗·沙赫本人对什叶派表现出某种好感,在他发行的铸币上,同时刻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铭文。据说,他的兄弟巴格达总督在1444年皈依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不过,与以往一样,什叶派深受大众反抗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1467到1469年间,黑羊王朝被驱赶出伊拉克,其继承者采用的却是一种坚定的逊尼派观念。新的统治者是另外一个土库曼部落联盟,它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被称作"白羊王朝"。白羊王朝的牧场最初以迪亚巴克尔和阿米德为中心,毗邻黑羊王朝的领地。两个部落在现实中已经竞争了好几代。在迪亚巴克尔,白羊王朝对其库尔德同盟者的敌人实施了报复,杀尽了他们主要家族的成员。乌尊·哈桑时期,他们在征服伊拉克之外,还征服了大部分阿塞拜疆和波斯。白羊王朝是最后一个完全统治伊拉克的游牧民族。在随后50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将目睹几个稳定帝国的崛起,它们能够运用新的军事手段给这里强加一种高度的秩序。这种变化的迹象首先发生在1473年,当时乌尊·哈桑的游牧骑兵被日渐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炮兵彻底击败。尽管经历了这场失败,白羊王朝对伊拉克的统治还是延续至1508年。他们的统治为伊拉克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直到统治结束时,他们还在进行一系列改革,旨在削减游牧部落首领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些改革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用伊斯兰教法彻底取代部落的习惯法。不过,这种做法肯定会激起统治阶级内部和下层民众的共同抵制,它加速了土库曼人统治的灭亡。

土库曼人的统治给伊拉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长远而重要的

① 引自 E. Ashtor,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Berkeley, 1976, p. 268。

后果。这一时期,封建分裂达到了顶峰,旧的食邑地产成为一种可以继承的封赐。但在过去,苏丹却可以撤销和重新分配土地。在中央权力衰弱的新情况下,地主获得了管理他们地产的权力,国家不得进行任何干预。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这种情况或许可以使人们更多地投入到土地生产中。但是,在 15 世纪的伊拉克,地主的这种权力却导致分裂加剧、农民所受盘剥的加重以及农业生产的进一步衰退。与此同时,商业也出现了倒退。在贾拉伊尔王朝统治下,普通的商业税只有 2.5%,而在土库曼人统治期间,则达到 10%。此外,伊拉克在东西方中转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全面下降。中央政府的软弱和农业、商业的衰败,却鼓励了放牧人群的发展,与之伴随的是游牧部落和半定居部落权力的上升。这些部落中不仅有蒙古和土库曼侵略者,还有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中央政府的贪婪和游牧部队劫掠的双重压力下,农民被迫委身于更大的部落联盟之下,如幼发拉底河中下游的赫法加部落、蒙塔菲部落,底格里斯河沿岸的拉姆部落、拉比亚部落,以及北部的库尔德比尔巴斯部落、贾夫部落和哈尔基部落。很快,这些部落就控制了乡村和大多数城市,从今天伊拉克社会的特性中还可以看到这些部落的烙印。即使到了 19 世纪,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还与乡村部落有着很强的联系。 41

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动荡与生产力低下而来的是饥荒与疾病。1342 到 1343 年间,一场大饥荒影响到整个伊拉克,14 与 15 世纪又发生了几次饥荒。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于 1347 年夏天袭击了伊拉克,1349 年又卷土重来。我们缺少鼠疫对人口影响的精确数据,但它在欧洲夺取了四分之一人口的性命,它对伊拉克造成的危害也一定十分严重。之后所发生的记录在案的流行病年份分别是 1394 年、1416 年、1425 年、1431 年、1436 年、1438 年 和 1470 年。由于一些城市缺乏安全且经济衰败,人们彻底遗弃了它们。巴格达的主要入海口,中世纪世界著名港口巴士拉(伟大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在 14 世纪中期造访过这里),就在这一过程中被人遗弃。沙漠部落的威胁、沟渠的淤塞、沼泽地的扩散将巴格达的居民驱赶到阿拉伯河附近,也就是现在巴士拉的所在地。而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国都和铸币中心瓦西特,则在

1438年、1440年和1442年分别遭到什叶派叛军的袭击。1454年，叛军再次发动进攻，将这里的居民驱赶至其他城市。即使是什叶派的学术重镇西拉也不能从战乱中幸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什叶派部落于1453年袭击了这里，并将之夷为平地。

穆沙沙的挑战

面对如此种种灾难，一个社会内部所固有的反抗行为必然会发生。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反抗运动都是通过宗教思想，通常是有着救世精神的什叶派思想来进行自我表达的。其中，最强烈的反抗运动是发生在15世纪中期的穆沙沙反叛。这场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伊本·法拉赫是先知的后代，他同时也是15世纪西拉城重要的什叶派学者的信徒。伊本·法拉赫深受神秘主义和弥赛亚思想的影响，这两种思潮在蒙古人统治结束后盛行于整个中东。1436年，伊本·法拉赫因其异端思想被驱逐出西拉，他和他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神秘追随者，在居住于瓦西特周边沼泽地的阿拉伯部落里找到了避难之处。在那里，他说服了几个部落的领袖，特别是苏拉玛部落和塔伊部落，从而将这些部落团结在他的权威之下。伊本·法拉赫最初以深奥的知识和超自然行为的神秘能力，赢得了部落领袖们的忠诚，为此也获得了穆沙沙的称号，意思是“光芒照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本·法拉赫自称为马赫迪，他要领导穆斯林在末日审判之前战胜一切非正义行为。他的儿子毛拉阿里将其思想更进一步，宣称他是什叶派第一位伊玛目阿里的化身。有意思的是，穆沙沙运动与9世纪和10世纪的黑奴运动以及卡尔马特派有着许多相同之处。除了其什叶派信仰外，穆沙沙运动强调了穷人的困境，谴责了富有地主的残暴和虚伪。与之前的类似运动一样，穆沙沙运动的根据地在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那里面积广大，人们很难进入，但叛乱者却能很容易在这里找到避难之处。这片沼泽地也为各种各样的持异见者提供了庇护，直到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沼泽地的水才被排干，从而结束了自古代苏美尔人以来就延续下来的这种不变的生活方式。

穆沙沙运动的这些观念的确为其赢得了一些人心，但伊本·法拉赫

领导地位的巩固,却来自他和他儿子成功组织袭击的能力。当人们能够从他所发动的袭击中获利时,就会有更多的新成员加入到这一不断壮大的运动之中。伊本·法拉赫最初的袭击目标是瓦西特附近的地主,但在那里遭到一次失败后,他便转向南部,夺取了胡维伊扎,作为他的主要基地。黑羊王朝衰落之后,穆沙沙发动了对瓦西特(穆沙沙对这里的统治是时断时续的)、巴士拉甚至巴格达周边地区的袭击。1453 年,西拉被摧毁,其附近的农村被伊本·法拉赫所控制,直到 1466 年他死后才结束这种局面。在穆沙沙的攻击下,旅行变得很不安全,即使前往麦加朝觐的队伍亦不例外。伊本·法拉赫的继承者是苏丹·穆罕默德,他试图通过更为长久地控制被占土地、委派总督和定期收税,来巩固穆沙沙运动所建立的新国家。苏丹·穆罕默德的权威遍及整个伊拉克南部,后来又延及巴格达周边地区。为了提高他在城市中的形象,苏丹·穆罕默德努力吸引受人敬重的什叶派学者来到他位于胡维伊扎的宫廷。这些学者的到来,如谢赫舍姆斯丁·阿斯特拉巴迪,反过来也有助于缓和穆沙沙运动的观点,使之更加接近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的主流思想。16 世纪早期,穆沙沙国家逐渐并入波斯萨非王朝,其独立状态宣告结束。穆沙沙是唯一挑战土库曼王朝权力的本土运动,但即使在鼎盛时期,其运动范围也仅限于农村,因此它没能在重要的城市地区发展出坚定的支持者。

城市组织

43

蒙古人和土库曼人统治期间,伊拉克的城市中心形成了各自解决暴政和动荡问题的方法。城市里的剥削没有农村严重,激进行为也没有农村普遍。对城市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优先要解决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办法来保护其社区的安全。由于通常的维持国家的机构,如警察部门和司法系统日渐衰弱,各种社区团体就试图填补这一真空。种种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新的作用,并走向前台。最重要的组织当然要数"先知后裔会"。所谓的"先知后裔"(*sharifs*,又作 *sayyids*),是指那些具有一种得到承认之权力的人,他们是先知的后代,其家族身份能够保证他们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除了出身高贵外,在学识和财产上

却较为普通，不过却享有很多特权，比如可以不用缴纳大多数税款。他们的行为代表了穷人的利益，诸如在斋月期间派发免费的晚餐，或者用赠品和恩惠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家庭等，他们因此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先知后裔们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集团，他们依靠各种协会组织起来，每个成员在其四邻中都有较大影响。这些协会的首领被称作“先知后裔之领导”(*Naqib al-Ashraf*)。先知后裔协会的作用是保护宗教圣地，并在管理四邻、解决争端、安排对穷人的救济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一旦需要，他们还可以充当人民的代表。比如，在蒙古人征服期间，一位什叶派先知后裔麦吉德丁·穆罕默德·伊本·塔乌斯，就作为西拉的主要代表，就和平投降一事与蒙古人展开谈判。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半世纪后的帖木儿围攻摩苏尔期间。当时，摩苏尔的“先知后裔之领导”纳绥尔丁·欧拜杜拉·阿拉吉也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谈判，解决了和平投降的问题。

理论上，“先知后裔之领导”一职的选定是经由统治者与重要的先知后裔讨论后任命的。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只在统治者能够牢牢控制这一职位时才会发生。为了能使各种先知后裔协会趋于稳定，“先知后裔之领导”逐渐由一两个家族把持。在摩苏尔，阿拉吉家族一般保有这一职位，在巴士拉则是里法伊家族。巴格达由于是政府的所在地，这里的先知后裔协会经历了一番周折后才获得自治，先知的后裔们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拥有一位得到官方承认的领袖。不过，盖拉尼却在巴布·沙伊赫的大城区里行使着实际的权力。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先知后裔们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承认，成为位于巴格达的“先知后裔之领导”机构的世袭占有者。由于城市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先知后裔协会也自然受到这些力量的影响。比如，在巴格达和巴士拉，苏非主义就在决定协会领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巴格达，盖拉尼家族的成员同样也是卡底里亚教团的领导人，而在巴士拉，里法伊家族的成员则是里法伊亚教团的领导人。在什叶派思想中心纳杰夫，控制各种协会的先知后裔就来自什叶派学者，而在卡尔巴拉，先知后裔们通常属于统治该城的两个部落联盟当中的一个。

其他在这一时期起到突出作用的重要社会组织是各种苏非派教团或兄弟会。蒙古人之后,正统的或拥护教法的伊斯兰信徒受到如下两次沉重打击:一是其重要人物被处决,如哈里发和一些重要学者;一是其主要的庇护者伊斯兰国家的灭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里发国家的失败,也意味着这个国家思想基础拥护者的失败。这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法学者在蒙古人入侵后信誉完全扫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新形势下所起到的作用使他们的影响受到了限制。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许多人求助于苏非神秘主义。苏非信徒因在公开场合展示入定状态、表演超自然行为,以及他们的禁欲主义、自我否定和献身慈善事业等行为,与大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故而具有较高声誉。他们注重讲述讽喻性的故事,对宗教作出解释的方法通常更为灵活,因此比教法派学者墨守成规的观点更能吸引普通百姓。苏非派也倾向于强调信仰的情感层面。哲拉鲁丁·鲁米(卒于 1237 年)曾访问过巴格达,并在那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的诗歌就具有典型的上述特征:

在你的光辉中我学会了如何去爱
在你的美貌中我知道了如何作诗
你跳动在我心中
虽然别人不能看到
但我却可以时刻感受
这种律动就是诗歌的艺术[①]

苏非思想的核心观念是,要获得玄奥知识,就必须首先发展出一种稳固而亲密的导师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其特征是对苏非导师的绝对服从和尊崇。除了信徒之外,许多普通民众也定期参加神秘主义的礼拜仪式,仪式通常每个星期四在被称作"扎维雅思"(*zawiyas*)的小屋中举行,

45

---

① 引自 Patrick Laude, *Singing the Way: Insights in Poetry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Bloomington, 2005, p. 69。

目的是在这个无常和危险的时代里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和认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一种有力的联系建立了起来,它超越了阶级和群体的划分,成为社会团结的要素。作为苏非兄弟会的核心人物,苏非导师的意见得到人们的高度尊敬,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群体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拉克是率先发展出苏非教团的地方。除了前面提到的卡底里亚教团和里法伊亚教团外,还有其他一些教团,它们对正统伊斯兰信徒情感的漠视,让许多学者气愤。最反正统的要数卡兰达底亚教团,13 世纪时,该教团在巴格达拥有一个被称作"卡拉达卡那"的大礼拜堂。卡兰达底亚教团的信众公开蔑视伊斯兰教法,并以占星术、预言和制作魔药知名。还有一个教团在土库曼人中尤其流行,名字叫作梅夫拉维亚,以通过急速旋转而进入入定状态著称。梅夫拉维亚教团在做礼拜时,有时会击鼓和演奏音乐,因而能吸引大量观众,但诚心诚意的信徒却不多。15 世纪时,起源于中亚的纳克沙班底亚教团逐渐在摩苏尔和萨赫拉祖尔的库尔德人中发展起来,该教团的领导人将在 20 世纪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各种苏非派教团与数量众多的行会组织有着一种特殊关系。蒙古人入侵之前,手艺人、工匠和小商铺老板都受到国家某种程度的管理。但是在中央的权力衰落之后,这种管理上的重担就更多地落到城市各阶层自己身上。行会(*asnaf*)因之发展起来,但进度却比较缓慢,直到 18 和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才达到成熟。行会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再一次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行会的早期发展深受阿拔斯王朝末期"福突瓦"组织的影响。行会内部不同职位的称呼,以及某些仪式上的用语,如接纳新成员,都与"福突瓦"组织的用语相似。除了管理各种商贸经济活动,如为政府征税外,行会还起到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一职能有助于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

行会通常按照等级来组织,最高领导是一位选举产生的长老,辅以司库和秘书。如同苏非教团一样,行会的领导权很快就成为一种世袭的职位,由显贵的家族垄断。长老负责行会的管理和经济事务,并处理成

员之间的争端。在与其他行会或政府当局会见时,在节日和游行等仪式性的活动中,长老还要代表其成员的利益。在长老之下,至少还有四个等级,从商业主管开始,直到最低一级的仆人。巴格达有如下行会组织:屠夫行会、厨师行会、磨坊主行会、面包师傅行会、织工行会、裁缝行会、染匠行会、制革工行会、金银匠行会、铸剑工人行会、泥瓦匠行会、眼科医生行会、水手行会、造纸工人行会、木匠行会、经纪人行会、守夜人行会、看门人行会、铁匠行会、马鞍制造者行会等。苏非教团通常与行会组织相重叠,因此有时很难区分两者。多数行会在开始它们的会议之前,都要举行几个小时的苏非仪式,然后才安下心来处理所要面对的各种商业事务。苏非的长老通常也是一个行会的长老,苏非教团和行会的各种等级也趋于重合。行会虽然具有宗教特征,但许多行会也包括一些非穆斯林成员。不过,宗教上的分裂也反映在劳动的分工上,这一特征非常普遍。举例来说,食品业由穆斯林商人控制,兑换钱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除此之外,一些行业则由城市周边农村的特定部落所控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末期,巴格达的大多数看门人都来自阿尔布·马福拉吉部落,厨师通常来自伊兹部落,芦席工来自贾伊福尔部落,屠夫则来自马赫迪亚部落。

萨非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

15 世纪时,随着萨非运动在阿塞拜疆的兴起,发生在蒙古人统治结束后的什叶派和苏非派反抗活动开始合流。萨非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是一个名叫萨法维亚的苏非派教团,其创立者是 14 世纪早期的萨非丁,该运动后来控制了伊朗,并把什叶派思想传播到那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萨非运动的政治抱负愈发彰显,它重点强调了对阿里和十二伊玛目的崇敬之情。1494 年,年仅 7 岁的伊斯玛仪成为该运动的领导人,其时土库曼人的白羊王朝正处在混乱之中,各个竞争者都在为王位而战。那时的伊斯玛仪不仅被视作一位需要人们绝对服从的苏非派长老,更是一位具有神赋品性的领导人。这个极端反正统的运动在土库曼人中有一群坚定的追随者,他们因为头戴红色的帽子而被称作"红头军"(*Qizil-*

bash)。“红头军”异常忠诚,作战十分勇敢,他们是伊斯玛仪击败白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并于1501年夺取大不里士的保证。伊斯玛仪在大不里士加冕为王,并宣布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为帝国的官方宗教。由于当时伊朗盛行逊尼派,所以什叶派不得不依靠武力将其教义强加给人们。一些重要的宗教人士被迫去诅咒前三位哈里发,并公开宣布接受新信仰,否则他们便会遭到报复,甚至是死刑。在这项政策之下,伊朗社会逐渐改信什叶派,但是当1508年,伊斯玛仪命令他的大将拉拉·侯赛因·别乞·沙姆鲁去征服伊拉克时,这项政策就发生了巨大转变。对萨非王朝来说,伊拉克不仅在战略上十分重要,由于那里的纳杰夫、卡尔巴拉、卡吉姆和萨马拉等地拥有许多重要的什叶派圣陵,征服那里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威望与合法性等重要资源。萨非人进入巴格达后,大肆屠杀重要的逊尼派人士,并亵渎了像艾布·哈尼法清真寺这样的逊尼派圣地。基督徒也被专门挑出来加以迫害,他们很快就从这个城市里销声匿迹了。之后,萨非人从南部向伊拉克挺进,巴士拉不战而降,那里的穆沙沙国家也宣誓效忠新的什叶派帝国。尽管萨非王朝夺取什叶派圣地的意义十分重要,但它对伊拉克的统治却是无力的。

47

如果不是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萨非帝国无疑已经作好了统治伊拉克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心脏的准备。奥斯曼帝国承自塞尔柱土耳其人。刚开始,这个帝国只是13世纪晚期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小的公国,但它却乘拜占庭帝国衰落之际开始了稳步的扩张。1401年,奥斯曼人惨败给帖木儿,但他们并没有停止扩张,1453年他们夺取了君士坦丁堡,赢得了伊斯兰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在埃及的逊尼派国家衰落之际,奥斯曼人渴望成为阿拔斯王朝的后裔逊尼派穆斯林的领导人,并将这种新的宗教传播至异教欧洲。对奥斯曼人来说,什叶派不仅是异端,更是他们意欲做伊斯兰世界至高无上统治者的威胁。因此,当萨非王朝建立后,与奥斯曼人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便不可避免。萨非王朝的影响当时已经波及安纳托利亚东部,1511年和1512年那里发生了重要的反奥斯曼人统治的什叶派叛乱。作为回击,奥斯曼苏丹“无情者”塞利姆严酷镇压了这次叛乱,并对萨非王朝的领地大举进攻。两个代表了伊斯兰教

主要竞争支派的大帝国,于 1514 年在阿塞拜疆的查尔迪兰相遇。由于奥斯曼人在数量和武器上都更占优势,尤以炮兵和火枪队著称,因此他们在对“红头军”及其年轻的神王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48

伊斯玛仪从战场上逃跑后,萨非帝国又进行了一天的殊死搏斗,但奥斯曼逊尼派与波斯什叶派孰高孰下已经一目了然。苏丹塞利姆一度占领了大不里士,可不久后便被迫撤离。摩苏尔、沙赫拉祖尔、迪亚巴克尔都被纳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下,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叙利亚和埃及也将臣服。为了回报支持者,苏丹塞利姆允许沙赫拉祖尔的库尔德人建立一些自治的小公国,如巴班公国、苏兰公国、巴赫迪南公国等。虽然萨非王朝仍然统治着伊拉克的其余土地,但这种统治愈发无力。萨非王朝对伊拉克的统治并不是直接的,他们承认库尔德马武希鲁部落的领袖为巴格达总督。1526 年,一位名叫祖勒·法卡尔·努克胡德·苏丹的马武希鲁部落领袖击败了萨非王朝的巴格达总督易卜拉欣·汗,宣布效忠奥斯曼帝国。祖勒·法卡尔显然是一个受欢迎的统治者,他统治伊拉克中部达 20 年之久,直到 1529 年萨非国王太美斯普重新夺回巴格达为止。太美斯普将伊拉克纳入到萨非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看上去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完全融入到萨非帝国之中。然而,在祖勒·法卡尔支持的鼓动下,奥斯曼人于 1533 年在苏丹苏莱曼——西方人称之为苏莱曼大帝——的领导下,发动大军去征服伊拉克。1543 年 11 月 18 日,巴格达逊尼派重要显贵将巴格达城的钥匙交到了苏莱曼手中,苏莱曼进城时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奥斯曼苏丹希望避免对城市的破坏以及没有必要的教派冲突。他命令他的军队在城墙之外扎营,并同时拜谒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圣陵,向全体人民承诺和平与公正。奥斯曼人尽管展示了这些善意,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还是与波斯的统治者冲突不断,这对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伊拉克之融入奥斯曼帝国,标志着这个动荡时期的结束。这一时期,经济普遍凋敝,人口不断下降,分裂的力量愈发强大,部落势力也在全国范围内崛起。这种衰弱由于外敌的不断入侵而日益凸显,它不利于

能够带来某种秩序的本土力量的成长。国家的凄凉现状与居民对辉煌往昔的想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数量不多的城市精英来说,繁荣的过去依然是他们骄傲的来源。尽管受到完全分裂的威胁,但巴格达依然是伊拉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与各地都保持着联系。查尔迪兰之战以及苏丹苏莱曼随后发动的战争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伊拉克此后便置身于中东两个大国的夹缝之间。伊拉克也因此经常成为两个大国不断冲突的战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和萨非王朝的斗争愈发呈现出一种宗教特性,之前顺利发展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相对平和的关系也受到了威胁。

49



第三章　奥斯曼人统治下的前三个世纪:1534—1831年

50

奥斯曼人对伊拉克的征服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显贵们的欢迎。不少什叶派穆斯林无疑会担心新统治者的逊尼派特性,但这并不会让他们感到不习惯,因为苏丹苏莱曼的宽容姿态和承诺非常有助于打消他们的顾虑。另外,什叶派与他们的逊尼派、犹太人和基督徒同胞一样,同样渴望更加稳定和安全的统治。而这一点,正是奥斯曼人能够很好给予的。当伊拉克被并入帝国时,奥斯曼人的统治范围已经从匈牙利扩展到也门,从阿尔及利亚延伸至大不里士。帝国囊括了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一些圣城,并因其高效的管理和宽容的法律传统而享有盛名。帝国的境内形成了一个面积广阔的贸易区,这里的赋税普遍很低,但道路却相对很安全。帝国的中心矗立着伟大的都市伊斯坦布尔,它是那个时代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它所展示的充分自信,足以配得上帝都的称号。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宣称他们是崇高的伊斯兰统治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习惯性地将自己比作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而哈里发作为一种象征,依然让伊拉克的权贵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阿勒颇是当时帝国重要的城市之一,在巴格达被征服之前,它就迅速发展成为伊拉克北部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伊拉克逐渐从波斯和中亚转向了安纳托利亚和地中海。

51

新秩序的建立

奥斯曼治下的伊拉克在初期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氛围,但3个世纪以来外敌的不断入侵、内部的混乱无序以及经济的严重衰退所带来的问题,并不能很容易地就消失。苏丹苏莱曼在进入巴格达之后,听到了巴士拉投降的消息,他放弃了进一步挥兵南下的要求。在整个萨非王朝统治时期,这座港口城市在强有力的蒙塔菲部落的首领拉希德·伊本·穆卡米斯的统治下,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即便在苏丹苏莱曼从穆卡米斯手中接过象征城市的钥匙后,巴士拉的独立地位还将继续,苏丹苏莱曼也恰当地任命穆卡米斯为该城的总督。但十年之内,伊拉克南部的部落就发起了全面的反叛。由于担心奥斯曼人通过建立要塞和更为频繁地征收赋税,来实施对伊拉克南部的直接统治,蒙塔菲部落联合一些同盟部落,特别是之前与穆沙沙结盟的部落,发动了对政府驻军的袭击。1546年,巴格达总督阿耶斯·帕夏击败了蒙塔菲部落,将巴士拉置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下。随后,奥斯曼军队直取阿拉伯半岛东海岸,于1555年征服了哈萨河流域。虽然奥斯曼的总督们经常与伊拉克的部落首领们合作,以推动贸易发展和保障安全,但这种合作却不得不定期性地重新协议,这就带来了反复的冲突和不稳定。这种模式在伊拉克尤其是南部十分明显。

其他危及奥斯曼人早期统治的当然还有始终存在的来自波斯的危险。征服巴格达之后,苏丹苏莱曼发动了对已经重归萨非王朝势力范围的沙赫拉祖尔的进攻。1548年,苏莱曼侵入萨非王朝领地,暂时夺取了大不里士。在经过了另外一场战争后,两个帝国于1555年签订了《阿马西亚条约》,确保了几十年的和平。这一条约为人所知之处还在于它在伊拉克北部确立了一条边界线,今天伊拉克与伊朗的边界线也大致如此。1574年,萨非王朝国王太美斯普死后,奥斯曼人乘波斯持续不断的内斗之机,再一次入侵阿塞拜疆。萨非王朝的新国王阿巴斯被迫于1589年签订了一个耻辱性条约,将整个库尔德斯坦和包括大不里士在内的大部分阿塞拜疆,割让给奥斯曼人。但是在阿巴斯获得力量之后,

他便于 1603 年再次发动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夺回了割让的领土。这个世纪的重要战争都发生在阿塞拜疆和沙赫拉祖尔的部分地区,但伊拉克中部并没能免于危险。流亡者,主要是逃避战争的士兵,大量涌入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城市,这就引发了暴力事件。1586 年和 1604 年,巴格达附近发生了战争,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巴格达总督吉格哈尔萨达也发动了几次对波斯南部的袭击。1605 年,波斯人在局部成功地阻挡了巴格达的入侵,1616 年,他们洗劫了伊拉克的边界城市曼达里。

52

当时,伊拉克对奥斯曼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以此为基地可以组织军队抵御萨非王朝。因此,奥斯曼帝国在这里的早期建筑,主要都是为了加固防御性的城墙。此外,奥斯曼帝国还在这里专门为苏莱曼布置于此的据说是 32000 名士兵建造了城堡和营房。在这些军事建筑之外,奥斯曼人还兴建了其他一些建筑。苏莱曼在伊拉克逗留期间,亲自为大兴土木定下了基调。他下令为艾布·哈尼发清真寺重建一个圆顶和一所学院,并在阿卜杜勒-卡底尔·吉拉尼建筑群附近重建一座清真寺和苏非派礼拜用的小屋。他还命令修整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卡吉姆的什叶派圣陵。卡尔巴拉的胡赛尼亚运河得到了疏通,之前废置的土地也重新用于生产。阿耶斯·帕夏还在巴士拉开设了一座新的铸币厂,修缮了这里破旧的清真寺,并建造了一座新的清真寺。他还打造了一支小型舰队,并配以一座海军的兵工厂,以抵御阿拉伯海上部落的袭击和葡萄牙人的侵犯。新的安全措施的实施使得每年前往麦加的朝圣重新开始,阿勒颇到摩苏尔、巴格达到巴士拉的商路也重新繁荣起来。

统治措施的调整

与当时的其他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是不稳定的,它在随后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按照一般的经验,原本对重要的城市地区所实行的更加强硬的直接控制,这个时候却缓和了许多,对农村的控制更是如此。奥斯曼人发现,越是遥远的地区,就越要心平气和地承认当地的部落力量,这样反而可以换来和平,并得到某种临时性的贡赋。在这些部落的土地之内,国家遵循了赋税分担和社会正义的传统模式,这与奥斯

曼帝国中心地带所要遵守的伊斯兰教准则是截然不同的。整个伊拉克被专门划分为三个或四个省区，每个省区由一位“帕夏”[①](*pasha*)来统治。每个省又被划分为若干州(*sanjaq*)，由州长(*sanjaq-bey*)进行管理。赋税普遍比前代要轻，共计有三大种类。农业税的征收依据土地的大小或者产量的多少。城市里的赋税名目则较为繁多，按照不同的行为分为销售税、进出口税、小型的工厂税、船只使用税、洗澡税、旅馆税和道路税。最后一种赋税针对受到保护的宗教少数群体，他们主要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需要缴纳人头税。其他一些特别的赋税则根据具体情况来征收。上述赋税的征收方式很多，可以由总督和帝国的税收官直接征收，也可以通过一种与之前的食邑类似的土地分配体系来征收。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分配无论在面积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但最为普遍的是被称作“采邑”(*timar*)的农村小块土地封赐。采邑的持有者需要维护其土地上的秩序，并征收各种税款，税收的大多数可以归为己有。作为回报，他需要在国家召唤之时向帝国军队报到，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装备齐全的骑兵。与食邑一样，采邑的赏赐并不是私人财产，它可以定期性地重新分配给不同的持有者。

53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早期，伊拉克被分为四个省区：巴格达、摩苏尔、沙赫拉祖尔和巴士拉。巴格达作为组织抵御波斯的基地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其他省都由低等级的帕夏来统治，唯独巴格达的帕夏级别最高，被称作“维齐尔”。其地位可以在其出征时所持有的以三条马尾为特征的旗帜中看出。[②] 巴格达的权力也因此比其他省都大。起初，巴格达的帕夏有权任命或罢免沙赫拉祖尔的库尔德王公。后来，由于波斯人经常性的威胁以及库尔德领袖们的归顺，沙赫拉祖尔被并入巴格达省。鉴于巴格达省不断接受政府的号召去阻止部落叛乱、波斯人的威胁或者本省内部的分离倾向，巴士拉省也就被并入巴格达省。直到18世

---

① 帕夏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亦即总督。——译者

② 奥斯曼人的军旗起源于中亚。旗帜为白色，上面饰有几条马尾相缠的图案。州长旗帜上可以有一条马尾，普通的帕夏是两条马尾，级别最高的帕夏三条马尾，苏丹的维齐尔为五条马尾，苏丹本人则九条马尾。

纪早期,巴士拉仍处在巴格达的直接管理之下。甚至摩苏尔这个享受自治、地理位置更加安全的省份,也不能完全摆脱巴格达不断增长的势力。到 18 世纪晚期,巴士拉大部分土地被巴格达兼并,其行政事务上也经常受到巴格达的干涉。

奥斯曼人统治时期,包括摩苏尔省在内的伊拉克北部最先走向衰落。与巴格达或巴士拉等省不一样,摩苏尔省农村的部分土地被分割成了采邑。该省除了摩苏尔城外,还有南部的提克里特和北部的阿马迪亚。随着之前占重要地位的什叶派人口的下降,这里的逊尼派开始占据上风,他们主要由库尔德人和部分阿拉伯人构成。在奥斯曼人统治初期,摩苏尔与西边的迪亚巴克尔有着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但很快它与巴格达的联系就超过了迪亚巴克尔。伊拉克东部是库尔德人的沙赫拉祖尔省,其重要城市是基尔库克。到 18 世纪末,这座城市被新兴城市苏莱曼尼亚取代。沙赫拉祖尔饱受部落战乱之苦,这些部落通常支持奥斯曼人反对萨非王朝。作为支持的回报,奥斯曼人承认了他们的自治地位,但允许帕夏对沙赫拉祖尔进行有限的干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沙赫拉祖尔被并入巴格达省为止。巴士拉省由于地处边远地区,且腹地都由部落控制,故很难进行统治。16 世纪时,奥斯曼人在巴士拉的统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这里发展出一支能够挑战波斯湾的葡萄牙人的海军。1507 年,在著名的统帅阿方索·德·亚伯奎的率领下,葡萄牙人试图夺取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的要塞。之后,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建立了一系列商站,巴士拉就有一个。其实早在苏莱曼征服伊拉克之前,奥斯曼人的舰队就于 1529 年从埃及开拔到巴士拉附近,但并没有什么长久的影响。阿耶斯·帕夏征服巴士拉之后,奥斯曼人的舰队袭击了葡萄牙人在波斯湾的商业据点,但没有能够将之驱逐出去。1559 年,奥斯曼人作出了夺取巴林的大胆决断,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他们只是在 1581 年暂时占领了马斯喀特。渐渐地,这些军事行动都被取消了,只有一支小型舰队留在这里以保卫阿拉伯河的安全。

在整个 16 世纪,伊拉克的大多数总督都由伊斯坦布尔任命。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奥斯曼人却放松了它对伊拉克的直接统治,这就

54

为地方领袖实施自己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每个地方领袖都建有自己的军队,这种趋势也使他们的统治变得更为容易。每一位出身地方领袖的帕夏都由一位“卡雅”(*kahya*)来辅佐,他是帕夏主要的执行官,专门负责执行纷繁的军事行动。18 世纪时,卡雅这一职位变得重要起来,成为通向总督的跳板。帝国在每个重要的城市里都驻扎有军队,这些军队被称作禁卫军,由苏丹的奴隶士兵构成,会使用火器和大炮。禁卫军的将军(*Agha*)由伊斯坦布尔任命,虽然他们表面上要听从总督,其实却是中央控制帕夏权力的手段。禁卫军是一支独创的完全职业化的精英部队,它在伊拉克也只有几百人。17 世纪时,禁卫军的军阶开始向地方参与者开放,禁卫军的数量也开始增加,但军纪和战斗精神却下降了。禁卫军还被允许在营房之外寻找工作,这就削弱了他们对伊斯坦布尔的忠心,使之变成经常是难以控制的地方军队。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禁卫军与一些手工业者行会发生了重叠,而在摩苏尔,几乎所有拥有武装的人都和禁卫军有某种联系。一般来说,禁卫军只会带来混乱和具有危害性,他们的不顺从有时表达了城市的部分人口对总督政策的不满。

其他直接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官员还有“卡迪”(*qadi*),即教法执行官,以及“大夫塔达尔”(*daftardar*)——国家的财务主管,负责一般的簿记。大夫塔达尔还负责管理前总督的财产,直到他们把所欠国库的债务还清为止。卡迪在整个奥斯曼帝国都是很有权势的人物。他不受总督管辖,主持伊斯兰教法法庭,管理的事情极为宽泛,包括犯罪、婚姻、继承、个人遗嘱、市场物价和税收争端等。他还负责监督总督的行为,确保其行为不与伊斯兰教法抵牾。奥斯曼人比较倾向哈乃菲学派对教法的解释,但也认可其他三个教法学派的法庭。各省除了遵守教法外,同样听命于苏丹所颁布的各项政令,这些政令都是与伊斯兰教法不相冲突的习惯法。一般说来,巴格达的卡迪级别要高于巴士拉、沙赫拉祖尔及摩苏尔的卡迪。每一位卡迪都配有一到两名地方助手,他们十分熟悉当地城市的状况,可以发挥广泛的影响。伊斯兰的法庭还配有穆夫提(*mufti*),即“教法说明官”,一旦需要清楚了解教法就可以向他们咨询。每个省的总督可以得到一个顾问会议的帮助,这个会议由禁卫军将军、大夫

塔达尔、卡迪、穆夫提和城市里的一些重要人物组成。

波斯人的再次征服

苏莱曼大帝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萨非王朝仍然保持防御状态。1574 年太美斯普之死，加剧了萨非王朝的困境，国家陷入长期的内乱之中。不过到了 1588 年，萨非帝国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阿巴斯。在他统治的头十年里，他先是经历了一些失败，但到 1603 年时，他开始转守为攻，除了伊拉克外，他重建了对萨非王朝过去领地的统治。17 世纪早期对奥斯曼人来说则是一个关键时期。他们在内部经受着省区的叛乱、国库的破产和中央政府的衰落，外部也要继续防范欧洲以及伊斯坦布尔所面临的海上威胁。随着阿巴斯在阿塞拜疆展开军事行动，波斯人得以定期前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圣地朝圣，再加之当地大量什叶派显贵对他的支持，阿巴斯因此能够很好地了解伊拉克事态的发展。1605 年，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发动叛乱，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巴格达，并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将奥斯曼的援军阻止在城外。禁卫军的叛乱是经常发生的，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1619 年，禁卫军的一位残忍而野心勃勃的首领巴克尔·苏巴什，成为巴格达最有权势的人物。构成苏巴什权力基础的首先是一批忠心耿耿、装备良好的追随者，他们的力量因受到资助而变得更为强大，其次一些重要的家族及行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特点在当时很有典型意义。苏巴什对巴格达采取了恐怖统治，但他却逃脱了奥斯曼总督优素福·帕夏和一些显贵试图暗杀他的活动。在残忍地杀死包括总督和穆夫提在内的敌人之后，苏巴什便面临力图恢复政府权威的萨非王朝大军的讨伐。在随后的围城期间，苏巴什将巴格达的钥匙送给了阿巴斯，以此作为后者支持他并任命他为萨非王朝伊拉克新任总督的回报。可当阿巴斯 1623 年进入巴格达并声称拥有该城时，苏巴什再一次改变了立场，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成功，最终被处死。

56

在夺取巴格达之后，阿巴斯重复了其伟大的祖父在一个世纪之前所做的事情，即攻击逊尼派穆斯林。他下令摧毁了逊尼派的两个重要象征，艾布·哈尼法清真寺和盖拉尼清真寺。并处死了包括巴格达卡迪在

内的一些重要的逊尼派人物。然而，卡尔巴拉的逊尼派圣地的保护人赛义德·达拉吉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什叶派学者，他也是萨非王朝的一位合作者。达拉吉勇敢地保护了许多逊尼派贵族的性命，他的事例说明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断裂。无论如何，反逊尼派的运动很快就减弱了，但什叶派显贵如今却占据了政府部门里之前由逊尼派把持的职位，一种处于国家监督之下的常态也得以缓慢恢复。在萨非王朝统治的 15 年里，伊拉克与波斯之间的贸易，特别是丝绸贸易得到发展，什叶派的圣地也获得了新的资助。不过，萨非王朝的统治依然是无力的。摩苏尔和巴士拉仍在奥斯曼人手中，虽然巴士拉只是名义上为奥斯曼人所控制。1625 年和 1629 年，波斯军队两次进攻巴士拉，但在巴士拉总督的领导下以及巴士拉人的团结抗战下，再加上周边许多阿拉伯逊尼派部落的支持，夺取巴士拉的计划均告失败。

奥斯曼人统治的恢复

不管奥斯曼人在欧洲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他们还是致力于恢复对巴格达的统治。在 1625 和 1626 年，以及 1629 和 1630 年之间，奥斯曼人的军队两次包围了巴格达城，但在萨非防军的顽强抵抗下都以失败告终。1632 年，苏丹穆拉德四世成功地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顺利解决了一些即时的危险。1638 年，他亲率大军进攻巴格达，在经过了 40 天的艰苦围城后，穆拉德夺取了巴格达。奥斯曼人第一次征服巴格达时，苏丹苏莱曼所表现出的骑士风度已经成为过眼烟云。这一次，穆拉德下令对包括罪犯在内的全体波斯人进行大屠杀。据说，他这样做是别无选择的。一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两个互为对手的帝国之间的仇恨：一名奥斯曼士兵拒不接受苏丹最初的大赦承诺，因为他的父亲、兄弟都在之前与萨非王朝的战争中丧生。一些报道说，被杀的人中还包括一些什叶派居民，但他们的数量显然是很有限的。

57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奥斯曼人与萨非王朝国王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以期建立一个长久的和平。1639 年 3 月 17 日，双方最终签署了《佐哈布条约》，该条约也以《希林堡条约》著称。与之前的许多条

约不一样,[①]这个条约的细节更为丰富,它详细地确定了这个国家北部的边界。条约也保证了波斯朝觐者前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的道路安全。但是,对于库尔德人的贾夫部落来说,这一条约却是灾难性的,因为波斯与伊拉克的边界线将他们的领土划分给了这两个帝国。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这条边界得到更为严格的贯彻,而贾夫部落为了获得统一所进行的斗争,则造成了这个地区的动荡。《佐哈布条约》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巴士拉附近的南部边界,尤其是沿着沼泽地带和阿拉伯河的边界问题。尽管如此,这一条约还是保证了和平,并使这种和平状态延续至下个世纪。

海外的和平对伊拉克国内的政治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638 年到 1704 年,是巴格达内部纷争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对奥斯曼人来说,问题是伊拉克太遥远了,不能保证对它的直接统治。而如果给予总督太多地方自治权力的话,就连保持名义上的控制也很难做到。其结果便是频繁更换总督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因为没有任何总督有足够的时间去执行有意义的政策。这一时期,巴格达的总督不下 24 位,他们还经常受到地方集团尤其是禁卫军的骚扰和威胁。比如,1646 年,禁卫军因为巴格达总督易卜拉欣·帕夏支持发展地方民兵组织,而对之起了疑心,于是便起兵闹事。1655 年,巴格达总督像个普通罪犯一样,在街道上被人追捕,他后来因为另外一场禁卫军的叛乱而逃亡。上述这些问题由于伊斯坦布尔的内讧变得更加严重。大约有一半的巴格达总督成为斗争的受害者,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命。在这种氛围之下,有时一些总督会鲁莽行事,比如绰号"疯子"的侯赛因·帕夏(1644 年在任)以及穆萨·帕夏(1648 年在任),他们的压制手段将许多居民赶出了巴格达城。这种氛围有时也激发了一些总督的反抗心理,他们担心自己有可能会被处死,便拒绝放弃自己的官位。政治上的不稳定也使得当时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在 1649—1693 年间,洪水摧毁了巴格达部分地区,1690

58

① 奥斯曼帝国与萨非王朝在 1555 年、1568 年、1590 年和 1613 年缔结了多项条约,大致确定了伊拉克的边界。

年,瘟疫夺去了这里大多数人的性命。尽管时世艰难,但一些总督还是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巴格达的城墙得到重新修建,邻近巴格达的一些运河(其中最著名的是杜加尔运河)也得到疏通,一些宗教建筑(如艾布·哈尼法清真寺和盖拉尼清真寺)和客栈也得以重建。

巴士拉的地方统治以及部落的影响

虽然奥斯曼帝国于1546年征服了巴士拉,但伊拉克南部仍然由诸多部落联盟所控制。什叶派在这一地区的悠久历史,强化了部落成员摆脱逊尼派奥斯曼政府统治的独立意识,而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大片的沼泽地依然成为阻碍中央统治的有效屏障。17世纪与18世纪期间,来自阿拉伯半岛中北部的移民加强了伊拉克南部部落的力量。早在15世纪晚期,可能是受到干旱的影响,纳杰迪部落的大量移民就涌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最早来到这里的还有阿纳伊扎和扎菲尔部落联盟,随后而来的是沙迈尔部落、穆泰尔部落、巴努拉姆部落。他们的到来引发了部落间的无数冲突,但也把更多的部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部落居民为自己先前的独立地位感到自豪,他们因此组成了更大的部落联盟不断挑战奥斯曼帝国的权威。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部落领袖是贾瓦泽尔部落的伊本·伊拉彦,他不断袭击商队,并于1549年包围了巴士拉。他的追随者则于1566年和1596年试图夺取这个港口城市。巴士拉总督在上述两次战斗中都没能取得对贾瓦泽尔部落的决定性胜利,这就导致了巴士拉商业的衰退,并引起市民对其统治的不满。1625年左右,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总督由于对其不力统治感到灰心,就将这一职位卖给了一位名叫阿甫剌昔牙卜的官员,巴士拉因而可以自行处理它的事务。继续效忠奥斯曼苏丹,则是阿甫剌昔牙卜成为总督的一个前提。

这个饶有趣味的时期尽管不为人所熟知,但阿甫剌昔牙卜的统治显然是成功的,他增进了总督、城市显贵(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人)和周边部落之间的相互理解。阿甫剌昔牙卜并没有消除与某些部落的冲突,可他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政治上自治的王朝,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1668年。在其子阿里和其孙侯赛因的统治下,巴士拉经历了商业上的繁荣、

城市建筑的兴起和各种文化事业的复兴。由于建造了坚固的城墙，城市的安全保障得到提高，它经受了波斯人的数次进攻。也是在阿甫剌昔牙卜统治时期，巴士拉与英国和荷兰的贸易公司建立了商业联系，并重建了与葡萄牙之间的关系。

这些成功的事例激发了阿甫剌昔牙卜家族的雄心，他们试图将王朝的领地向南沿阿拉伯海扩张至哈萨河绿洲，西北则扩张至巴格达。但是，曾经坚决支持阿甫剌昔牙卜家族的巴士拉人民却转而反对起他们来，因为他们的野心已经危及巴士拉与巴格达的奥斯曼当局有限但却是友好的关系。巴士拉有影响的商人团体显然是欢迎地方自治的，但他们更想要的却是苏丹统治下的安全，因为完全独立只是一个冒险的意愿。1653 年，奥斯曼军队逼近巴士拉，总督侯赛因由于不能得到居民的支持，只得逃离。巴士拉周边的部落却不是这种态度，由于担心奥斯曼统治权力的扩张，他们便以阿甫剌昔牙卜家族的名义团结在一起。而阿甫剌昔牙卜家族也的确想重返巴士拉，以恢复其总督统治。不过，1668 年巴格达再次发兵，最终结束了这个地方王朝的统治。尽管如此，部落反抗奥斯曼人的斗争依然剧烈，1694 年，蒙塔菲部落的首领马尼·伊本·穆卡米斯最终统治了巴士拉。直到 1699 年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卡洛维茨条约》，与欧洲的关系得到缓和后，它才得以发动一场有效的战争，将巴士拉置于巴格达的直接控制之下。在整个伊拉克，是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还是保有有限的地方自治，城市居民与部落居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形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不过，什叶派城市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是个明显的例外，那里的居民对逊尼派的统治依然怀有深仇大恨。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总的说来，奥斯曼帝国在伊拉克统治的初期阶段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之前不断发生的传染病和水患得到控制，国家不仅没有出现严重的倒退，反而出现了生产和商业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大。为了评估土地的产出和税收的特性，奥斯曼帝国的官员对土地清册进行了调查。理论上，苏丹是所有土地的监护人。除了将国家的土地分

60 成若干采邑外,苏丹有时还委派政府官员去对农民直接征税。这些官员(通常是总督本人)要么是由国家发给薪水,要么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包税人。一些家庭为了对土地拥有更大的权利和逃避税收,就将其土地注册为宗教财产(*waqf*),并以此来办理土地契约,这样土地上的大部分收益就可以归家庭所有。另外一种持有土地的方式是绝对的不动产(*mulk*),这在当时的伊拉克十分少见。土地作为不动产,只赐给那些国家承认的对国家有功的显贵家族,他们在土地上的权利基本和对待私产一样。大多数部落的土地则被国家归为公地(*musha'*)。部落使用公地的方式十分不同,其中一些公地被留出来作为部落首领的赏赐或居住之地,有一些公地则分给农民和牧人。每个部落的传统领地被称作"迪拉"(*dira*)。

17 世纪,在军费增加以及为对经济施加更大影响而经常性地与地方显贵展开斗争的情况下,奥斯曼人将包税制度(*iltizam*)加以推广。通常情况下,土地的征税权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就为地方显贵提供了新的机会,他们很快就从中获得极大利益。早期的包税权只有一年的期限。然而到了 18 世纪,显贵们通过继承权(*malikana*)赢得了终身享有包税权的权利。部落的土地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些地区,部落首领们和一些重要的部落成员逐渐获得了对某块土地的私有权(*lazma*)。农民通常要与他们的领主,不论是包税人还是部落首领,去签署分成协议。理论上,税率和可以接受的税收种类严格受到中央政府的管理,并接受地方法官卡迪的监督。但是在实践中,包税人和部落首领会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以及任何可能的借口去尽其所能地压榨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也只能勉强糊口。另外,尽管这一时期较前代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与波斯的战争,以及中央政府定期发动的对不顺从的部落的战争,都限制了农村的发展。

绝大多数的地主生活在城市里,当时的城市无论规模还是人口都所有扩大。在 16 世纪晚期到 18 世纪晚期,巴格达的人口从 68600 人增加到 80000 人,巴士拉和摩苏尔的人口则从 20000 人增加到 40000 人,基尔库克、伊尔比尔和卡尔巴拉的人口增长率也很明显。城市的发展要受

惠于贸易的发展。16 世纪与 17 世纪的时候,印度和中东强大帝国的建立,以及欧洲舰队的参与,都支持了海上贸易的重要发展。在 18 世纪前半期,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势力在这一地区逐渐衰落,这就使得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波斯湾主要的商业力量,也为后来英国在这里建立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贸易活动和新型海关的建立,大幅度提升了巴士拉作为伊拉克主要出海口的地位。巴士拉主要出口枣椰、阿拉伯马和香料。进口主要有印度的纺织品和香料、也门的咖啡、巴塔维亚的糖以及其他众多物品,这些货物通过水路或陆路运往巴格达和波斯。大型的骆驼商队,有时人数达到 4000 人,将巴士拉和阿勒颇也联系起来,一些小型的骆驼商队则南下沿着阿拉伯海进行贸易。商队和船只也往返于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大马士革、迪亚巴克尔、伊斯法罕、马尔丁以及安纳托利亚和波斯的其他许多城市。帝国内部的贸易运转,需要在商人、奥斯曼政府和部落利益之间建立一种微妙的平衡。各种协商和收入分配的形式,都需要经过一再的谈判与妥协(叛乱有时也会中断谈妥的协议),这取决于有争议的贸易路线和商期。在通常情况下,商人在经过重要的城市时必须向帝国政府缴纳关税,在通过部落的领地时,他们也必须向部落缴纳某种形式的过路费,才能确保安全。

奥斯曼帝国治下贸易的复苏和相对稳定,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与波斯的战争虽然总是毁灭性的,但它们也鼓励了制造业的发展。许多城市都有羊毛、棉花和丝绸的纺织作坊,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纺织业中心是摩苏尔。染色和刺绣等相关工业也繁荣起来。巴格达作为针对波斯的主要军事行动基地,成为军火业的中心,18 世纪晚期,那里有着 16 座军火工厂。这些工业和许多传统造船行业,仍然由行会协会来组织其活动。奥斯曼帝国时期,行会协会比以往得到更为严格的管理。与农业领域一样,包税制度也应用于征收海关税等城市活动中。包税人通常是商人、地方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乌里玛)甚至部落首领(比如欧拜德部落的首领)等既有影响也很富有的人,他们的传统领地都紧邻城市。重要的乌里玛通过管理宗教捐赠,还可以从中获得额外的财富。包税制度的引入(尤其是终身包税),极大地强加了这些显贵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

借助联姻,放债活动和资源聚集活动也得到加强。到18世纪末,类似的社会联系在部落首领之间同样愈发明显。随着诸如巴士拉的阿甫剌昔牙卜、沙赫拉祖尔的巴班、摩苏尔加利利等地方王朝的兴起,城市显贵的权力在政治上也得到显现。由地主阶级支持的军事寡头政治,也在18世纪的巴格达得到发展。但是,鉴于奥斯曼中央政府仍然需要分享地方税收,再加上下层阶级也随时可能因为压迫过重而造反,地方政权的势力也因此受到遏制。

城市的新的财富——尽管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城市相比还是不足——也表现在这一时期所建造的众多公共建筑上。城市建筑的规划受总督家族或私人的赞助,它们并不追求统一的形式,而是表现出了文化上的某种自治。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可以在清真寺的建造上看到某种明显的建筑风格,其特征是有着像铅笔一样细长的宣礼塔、扁平的圆顶和门前的顶棚。这种风格此前从未在伊拉克出现过,那时伊拉克大多数地区的建筑风格深受波斯风格的影响。波斯建筑风格最明显的特征是,特别喜欢用绿瓦铺设在圆顶和宣礼塔的顶端。而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清真寺,则使用金黄色的瓦片。在摩苏尔,清真寺的建造却体现出一种十足的地方风格,其特点是用装饰性很强的砖块去垒建宣礼塔,这是阿拔斯时代传统的延续。赞助的增加也促进了文学活动的繁荣,这在地方历史的写作和传记辞典的编纂上尤为突出。

宗教团体

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教既有的传统,他们承认某些一神教团体的自治地位,并将这些一神教教徒视作不同的民族(*millet*)。大多数宗教团体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阿拔斯王朝末期以来就消失在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带的人数不多的诺斯替教曼达派,此时又重新出现了,并慢慢进入巴士拉。曼达派信徒的生活状况都较为贫困,他们多为手艺人、造船匠和木匠。1625年,曼达派信徒全然不顾其宗教的非暴力特性,参加了抵御萨非王朝进攻的城市保卫战。城市生活中经常能看到的犹太人,其状况也有所改善。到18世纪末,一些很有声望的犹太商人成为重要的

63

银行家，专门为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总督服务。巴士拉的一位名叫雅各布的犹太教拉比兼金融家，在 1775 年到 1776 年间抗击波斯侵略军的一次战斗中，因向奥斯曼军队提供资助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努力在 1780 年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承认，后者为了对之表达敬意，专门颁布了一条特别的法令，允许他终身不用向国家纳税。还是在这个世纪末，另一位名叫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的犹太教领袖，被擢升为巴格达总督最具影响的顾问。到 19 世纪早期时，巴格达重要的犹太教团体已经占到城市人口的 20%。其实在 17 世纪晚期，犹太人的数量就已经有所增长，但那时的原因是伊朗的犹太移民为躲避宗教迫害所致。犹太人生活在自己独立的城区内，大多数都很贫困，但有些人却成为成功的商人、商店老板和金融家。19 世纪早期时，金融家赫斯克尔成为伊拉克最富有的人。苏丹赏识他的能力，任命他为伊斯坦布尔的总司库。不过，这一时期的宽容气氛并不能完全避免对犹太人的各种形式的迫害。在达乌德·帕夏统治期间（1817—1831 年），犹太银行家开始遭到巴格达总督的嫉恨。一位名叫沙逊·本·萨利赫·巴尔·大卫的银行家逃到了印度，他在那里发了大财，成为英国著名的沙逊家族企业的创始人。①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看作是达乌德·帕夏所制定的一项全面反对犹太人政策的证据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在他身边的顾问之中，仍然有其他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同样，穆斯林商人也会遭到类似的迫害，这通常是政治和经济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出于宗教仇恨。

这一时期，基督徒的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改善，这表现在亚美尼亚教徒的增长和天主教影响的增加上。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是从亚洲传播而来的，14 世纪晚期，跛子帖木儿摧毁了伊拉克东部的大部分聂斯托利派教堂，使该教派受到沉重打击，只有印度的聂斯托利教徒得以幸免。1551 年，聂斯托利教大主教约翰·苏拉卡在罗马皈依了天主教，随后他重返伊拉克北部，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其信徒与梵蒂冈之间的松散联盟。

---

① 沙逊家族最初从西班牙避难而来，其家族的大卫在孟买创建了著名的沙逊洋行，在上海亦有业务。上海的沙逊大厦即专为沙逊洋行上海分行所建，解放后成为和平饭店。——译者

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这些被称作“迦勒底人”的改宗天主教的东方信徒，通过一些额外的协议，与罗马更加接近。迦勒底教会的大主教最初以摩苏尔为大本营，后来迁移至巴格达。伊拉克基督教徒经常在摩苏尔周边的许多农村地区活动，他们所信仰的聂斯托利教会此时以亚述教会著称。1628 年，萨非王朝国王阿巴斯允许嘉布遣会[1]在巴格达建立教堂，天主教徒由此得到更多的支持。1638 年，巴士拉成立了一支加尔默罗会[2]传教团，1721 年，另一支加尔默罗会也在巴格达成立。根据伊斯兰教的训谕，这些传教团必须将其活动限制在非穆斯林中，也就是说，他们期望赢得信众的人群主要来自诺斯替教教徒和非天主教的基督徒。到 19 世纪早期时，基督徒已经占到巴格达人口的大约 10%。伊拉克的亚美尼亚天主教会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即已出现，他们捍卫了自己教会的独立地位。1604 年，萨非王朝国王阿巴斯将大批亚美尼亚商人及其家眷，从其故乡迁移至他的新都城伊斯法罕。由于他对这些商人十分友好，后者很快就成为萨非帝国最重要的远程贸易的主体，他们与远至西欧、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地都有联系。通过控制利润极大的波斯到奥斯曼帝国的丝绸之路，亚美尼亚商人于 17 世纪逐渐来到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定居。亚美尼亚人是巴士拉最重要的商人团体，他们与印度和阿勒颇开展贸易，也是犹太人的主要竞争者。

64

逊尼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官方唯一承认的穆斯林信仰，这保证了逊尼派显贵对伊拉克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垄断。尽管如此，伊拉克并没有发生直接针对什叶派的清洗行为（这一点可以与叙利亚及安条克的例子相比较），因为这势必会引起什叶派的强烈反抗，而这一点是奥斯曼帝国无法控制的。反过来，什叶派也只是退缩在他们自己的社团和机构之中。不过，这种隔离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比如，仍然有许多信仰不同的人比邻而居，逊尼派和什叶派商人之间也有合作，两个教派的部落之

① 嘉布遣会是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修会的三个独立分支之一，该修道会于 525—528 年间创建于意大利。——译者

② 加尔默罗会，俗称圣衣会，是天主教隐修会之一。12 世纪中叶，由意大利人贝托尔德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译者

内都有来自对方的成员。当时,萨非王朝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仍然有很大影响,因为这里的什叶派学者和显贵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庇护者的支持。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部落里就明显缺乏这种支持,它们蔑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也不在意这个国家的宗教本质。这些部落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一样,都地处阿拉伯沙漠的边缘,受这些部落的鼓励,纳杰迪部落的许多成员也皈依了什叶派。纳杰迪部落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进入伊拉克,他们从根本上充实了什叶派人口。这一时期,"穆智泰希德"(*Mujtahid*)的地位在什叶派的城市中心得到发展,穆智泰希德是信徒承认的权威,他可以就什叶派法律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很快,穆智泰希德就成为什叶派的领导,在他们的引导下,什叶派摆脱了苏非神秘主义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正统"。由于什叶派学者与他们在伊朗的同行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清除苏非派影响的行为就必然得到伊朗什叶派学者的支持,这反过来也强化了伊朗对苏非派权力的限制。不过,萨非王朝同时也鼓励与苏非派传统尤其相关的大众仪式的发展,比如纪念侯赛因殉教的公开悼念仪式,以及去拜谒十二位伊玛目及其后继者陵墓的活动。由于阿赫巴尔派[①]的崛起,穆智泰希德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阿赫巴尔派告诫信徒,对教法过于灵活的解释是危险的,依此观点,阿赫巴尔派与逊尼派的教法解释的有限性这一观点更为接近。阿赫巴尔派的影响后来逐渐衰弱了,但在伊拉克依然有众多追随者。

65

在伊拉克所有的宗教团体中,受奥斯曼人迫害最严重的或许要数雅兹迪教派。[②] 该教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0 世纪早期,与库尔德人反抗阿拔斯王朝有关。雅兹迪教派借助赞美倭马亚王朝,尤其是赞美哈里发亚齐德·伊本·穆阿维叶(这也是这一教派名称的来源),表达了对阿拔斯王朝的反抗。12 世纪,倭马亚家族的后代,神秘的教长阿迪·伊本·穆萨菲尔的出现,加强了雅兹迪教派的团结。在随后的三到四个世

---

① 阿赫巴尔派属十二伊玛目派,是什叶派的少数派,他们否认理智,只相信《古兰经》的裁定。该派在萨非王朝末期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译者

② 又译亚齐德教派,是一种混合了多神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的一种宗教。因为他们认为造物主已经原谅了魔鬼,所以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为拜魔鬼者。——译者

纪的时间里,该教派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宗教,它具有苏非派和前伊斯兰教时代伊朗传统宗教的某些特征。他们被错误地认为是拜魔鬼者,不断受到穆斯林库尔德人和奥斯曼军队的打击,很多信徒因此被驱赶至高加索和叙利亚。尽管如此,雅兹迪教派的重要团体却能继续存在,尤其是在摩苏尔附近的谢克汉和辛贾尔山地区。

马穆鲁克统治下巴格达的自治

18 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和社会的普遍发展是显著的,但政治上的不稳定依然让帝国的总督们感到烦恼。1704 年,苏丹任命他最有能力的长官哈桑·帕夏为巴格达总督,希望他能最终控制这个棘手的地区。新总督所面临的是一项真正艰巨的任务。当时,波斯依然是一个经常性的威胁,阿拉伯和库尔德人的部落也像以往那样强大有力和具有攻击性,乡村人口中什叶派信徒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禁卫军仍然是城市里独立的军事力量。哈桑的政策是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为此他让格鲁吉亚的马穆鲁克人进入巴格达,后者也很快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军事阶层。马穆鲁克人自幼便被带入奥斯曼帝国,他们被要求改宗伊斯兰教,并加入以军事和宗教教育为重点的特殊学校。每个班上的马穆鲁克人不超过 200 人,在学校服役期间,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主人之间,都建立了一种牢固的联系。哈桑·帕夏使苏丹相信,给他一份长期的职位对于有效控制巴格达至关重要。因此,他得以统治巴格达 20 年之久,他的儿子后来继承了总督的位置,后者也统治巴格达至 1747 年。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没有理由去担心地方统治权力的发展,因为帝国普遍处于和平之下,作为忠实的仆人,哈桑·帕夏的表现也非常称职。

66

新的马穆鲁克军队证明了他们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部门里都很有能力。在国家定期和严酷的军事行动打击下,伊拉克南部部落和库尔德人的反抗行为得到遏制。这些军事行动是毁灭性的,它们确实让桀骜不驯的部落首领臣服,也使他们不能发展得过于强大。其结果是,这种安全状态不仅促进了贸易利益,也为哈桑·帕夏提供了机会,以便让巴格达直接控制巴士拉和包括基尔库克和马尔丁在内的摩苏尔周边

地区。到 19 世纪早期,除摩苏尔及其毗邻的边远地区外,巴格达总督所控制的范围已经大致与现在的伊拉克相当。贸易的发展,也有赖于某些税收的取消和客栈的建立与修缮。为了进一步提高统治的合法性,哈桑·帕夏及其子艾哈迈德·帕夏慷慨捐资修建了大量宗教建筑。为了削弱禁卫军的力量,艾哈迈德·帕夏将巴格达的某些禁卫军军团调往摩苏尔和其他地区。受这些政策的鼓舞,一些重要的商人、地主、宗教领袖和城市显贵热切地团结在这个以马穆鲁克为基础的制度之下,他们支持巴格达采取一种更为自治的立场。艾哈迈德·帕夏统治期间巴格达的自治尤为明显,当时巴格达上缴给伊斯坦布尔的年贡已经大为减少,仅有一种象征意义。包括卡迪和大夫塔达尔在内的所有重要职位也都由巴格达来任命。

艾哈迈德·帕夏要远甚于他的父亲,他增加了政府里来自格鲁吉亚的马穆鲁克的数量,还处心积虑地与其重要官员建立家庭联系。1747 年艾哈迈德去世后不久,他的女婿,深受其信任的出身马穆鲁克的苏莱曼,在马穆鲁克和地方权贵的帮助下,获得了总督职位。由于再次受到欧洲的压制而无力强行安排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奥斯曼人别无选择,只得承认了苏莱曼的要求。而在当时,伊斯坦布尔派出的一些官员,甚至还未到达巴格达就被谋杀了。苏莱曼(1750—1762 年在位)是巴格达的第一位马穆鲁克总督,他以"阿布·莱拉"即"黑夜"著称,原因在于他喜欢在夜晚对部落发动攻击。在接下来的 80 年里,尽管马穆鲁克对总督权力的争夺十分剧烈,伊斯坦布尔也在不断地驱逐他们,但总督的宝座还是继续从一位马穆鲁克官员传给另一位马穆鲁克官员。与此同时,马穆鲁克还是承认苏丹的统治权,他们依然将苏丹的名字刻在铸币上,依然在主麻日的聚礼中念及苏丹的名字。同样,苏丹对总督合法地位的官方承认依然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候选者从其他竞争者中胜出的保证。苏莱曼大王(1780—1802 年在位)统治时期,被普遍认为是马穆鲁克权力的顶峰,当时他们可征用的奴隶士兵超过 12500 名,另外还拥有 20000 到 50000 名武装战士。苏莱曼大王统治期间,禁卫军的威胁已经过去,建筑活动、经济生产和文学作品都在增长。1784 年,一座以苏莱曼大王

67

名字命名的新城苏莱曼尼亚在库尔德地区的中心地带建立,这是巴格达对伊拉克其他地区霸权的开始。马穆鲁克统治者与巴格达显贵之间联系也很密切,这在苏莱曼大王践位之前就已经十分明显。1779年,已经城市化了的欧拜德部落领袖领导巴格达人民发动了一次集体行动,仅凭此次行动就挫败了奥斯曼人安插一位非马穆鲁克总督的计划。不过,双方的关系也有紧张的时候。由于马穆鲁克出身奴隶和来自外国,他们从来没有完全被当地权贵阶层接纳为自己的一员。巴格达人经常说马穆鲁克人有"瞎了一只眼",意思是他们耻于自己的出身背景。这或许解释了苏莱曼·阿布·莱拉那出身显贵的妻子阿迪拉·可敦何以能够独揽大权,甚至控制着一个独立于其丈夫,有时也反对其丈夫的宫廷。

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战争

只要巴格达的自治能够遏制来自波斯的威胁,奥斯曼人是乐于容忍其不断增强的。1722年萨非王朝解体后,波斯的威胁再次出现。一开始,奥斯曼人将这种威胁看作是扩张领土的机会,并命令哈桑·帕夏去进犯哈马丹地区。尽管这一军事行动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不过当纳迪尔沙·阿夫沙尔重新统一波斯,并于1732年、1733年、1735年和1743年数次入侵伊拉克后,奥斯曼人便很快转入防御。纳迪尔沙发动的战争再一次将伊拉克置于奥斯曼帝国抵抗前沿的位置,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也不断地经受着长期被围攻的局面,波斯军队的入侵还导致大量村民的死亡。纳迪尔沙性格暴躁,喜爱可怕的暴力行为,他一再声称:"我不是人类;我是上帝的愤怒和惩罚。"不过,受到入侵的城市依靠自己的资源,最终还是顽强抵抗住了波斯人的进攻,伊拉克与波斯之间的疆界也回归到《佐哈布条约》划定的状态。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在这一时期间的战争,较之以前殊为不同,因为纳迪尔沙军队的规模,尤其是发动1743年那场战争时的军队规模,比以前更加庞大,装备也更加精良。同样,与其萨非王朝先人不同,纳迪尔沙打算承认什叶伊斯兰教为逊尼派传统中四大教法学派之外的第五个学派,即加法尔学派,希望以此努力压倒逊尼派人口。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纳杰夫发起了一次大会,计划消弭伊

68

斯兰教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并从根本上允许什叶派采纳逊尼派的生活方式。这场引人注目的实验虽然有可能解决伊斯兰教的大分裂,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参加会议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的确达成了一项共同声明,即谴责什叶派极端分子的行为,并承认加法尔学派。不过,这次大会后不久,两派学者又重新回归各自传统的立场,拒绝对另一方的承诺作出让步和予以信任。

纳迪尔沙 1747 年遭人谋杀,他的国家也随之瓦解,波斯与奥斯曼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卡里姆汗·赞德统一了波斯南部,卡里姆汗是一位虔诚的什叶派,他很快就废除了纳迪尔沙的亲逊尼派政策。一般说来,卡里姆汗是不愿意卷入战争的,但是为了与沙赫拉祖尔巴班部落势力渐盛的王室家族进行竞争,他还是参与了伊拉克战事。此外,卡里姆汗对富饶的巴士拉港垂涎已久,因为该地与波斯南部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虽然与沙赫拉祖尔的战争陷入僵局,但卡里姆汗的军队却乘一场毁灭性的大瘟疫之机,占领了巴士拉。这场瘟疫爆发于 1773 年,夺去了巴士拉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这使它无力再回击部落的进攻。就在瘟疫肆虐之际,一位英国人目睹了整个事件,他如是写到:

> 向你们描述每时每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可怕场景,以及每天来自巴士拉的可怕消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死亡人数之多,以至于很难找到敢于为他们死去的朋友或亲属尽最后义务的人……穿城而过的河流之上……漂满了衣服和死人的病床,许多装有死孩子的篮子,在风浪的吹打下恣意漂流。死者中可能有些是商人,当他们正在赚取每天的钱财时,却未曾想会遭受如此这般的无妄之灾。[1]

69

---

① 引自 Thabit A. J. Abdullah, *Merchants, Mamluks and Mu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ighteenth-Century Basra*, Albany, 2001, pp. 52—53。

三年之后,在经过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残酷的围城后,卡里姆汗的军队进入了这个垂死的城市。波斯人占领巴士拉达三年,在此期间,巴士拉的贸易衰落,许多商人逃往波斯湾的其他地区,尤其是科威特这个小避风港。伴随战争发生的还有兴起于中亚的具有清教性质的瓦哈比运动,这一运动使事态更加恶化。瓦哈比派利用巴格达被波斯人占领之机,袭击了巴士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从而深入到伊拉克腹地。这些袭击中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发生在1802年的卡尔巴拉,有3000名平民被屠戮,受人崇敬的侯赛因清真寺也惨遭洗劫和破坏。战争除了留下有形的破坏和人心的焦虑外,那些与强大的显贵家族有关系的地方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对奥斯曼帝国造成巨大冲击。当时,巴格达和巴士拉由马穆鲁克统治,摩苏尔则被控制在一个阿拉伯地方家族手中。加利利人也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他们几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就做到了。地方势力除了与城市显贵建立良好的关系外,也与周边的部落,尤其是塔伊这个地方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地方势力的成功在1743年纳迪尔沙的围城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示。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摩苏尔领导人凭借其能力有效地调动人力和资源,最终击退了入侵者。尽管巴格达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明显确立了霸权,但与伊拉克的其他地方不同,摩苏尔从未受到巴格达的直接统治。

达乌德·帕夏与马穆鲁克统治的结束

最后一位马穆鲁克帕夏达乌德或许最具争议,他是个虔信的信徒,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1816年,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权力斗争后,达乌德·帕夏登上了总督的宝座。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31年,期间见证了形成现代伊拉克历史的两大重要因素的早期进展。其一是更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其二是英国经济影响的扩张。作为推动伊拉克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政治家,达乌德·帕夏经常被人与同时代的另一位更著名的人物,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进行比较。可能受开罗与伊斯坦布尔军事改革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他建立地方政权的抱负,达乌德·帕夏一开始就注重加强军队的力量。他邀请一位法国军事

顾问负责军队的训练(当时军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20000 人),并将现存的禁卫军完全融入到常备军中。他依据欧洲工程师的构想建立了一座军工厂,其他与军队相关的工业也得以建立。他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推行一种更有效的赋税制度,这些都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在他的授意下,针对部落的军事行动也定期展开。此外,达乌德·帕夏还建立了纺织工厂和国家的第一个印刷厂,这些都说明他有兴趣去深化这些务实的改革。然而,与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不同,达乌德·帕夏并没有依靠普遍的征兵制来扩大其军队的基础,他也没有革新官僚体制。同样,达乌德·帕夏的工业规模也无法与穆罕默德·阿里的庞大计划相比。但不管怎样,在他统治期间,巴格达见证了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生活,他的宫廷也吸引着巴士拉和摩苏尔的学者及诗人纷至沓来。 70

达乌德·帕夏对英国驻巴格达代表不断增长的势力十分担心。英国人与巴士拉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 1635 年,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关注。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这些英国人最初的兴趣仅限于贸易。1723 年,英国人在巴士拉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商号,1763 年,这个商号升级为东印度公司驻波斯湾的主要代表。随着英国人对印度控制的加强,以及他们贸易活动的增长,英国对巴士拉的商业影响在 18 世纪得到飞速发展。1767 年,东印度公司与苏莱曼大王签署了一项条约,允许英国海军为巴士拉的贸易提供保护。之后,东印度公司在巴士拉的商业和安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加之巴格达在财政上所欠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这些都为英国人在这里的政治影响奠定了基础。到 18 世纪末,英国的代表开始进驻巴格达,1802 年,英国领事馆成立。克劳狄乌斯·詹姆斯·里奇是达乌德·帕夏时期最有权力的英国领事。里奇于 1808 年被任命巴格达领事,是巴格达公认的二号权力人物。1821 年,达乌德·帕夏不满里奇的干涉行为,迫使他离开伊拉克。但是,由于英国人在这里的影响愈发重要,仅仅一年之后,巴格达就真心实意地迎来了第二位英国领事。

1830 年,伊拉克走到了十字路口之上。当时,奥斯曼帝国处在精力旺盛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统治下,他决心将帝国诸省纳于其直接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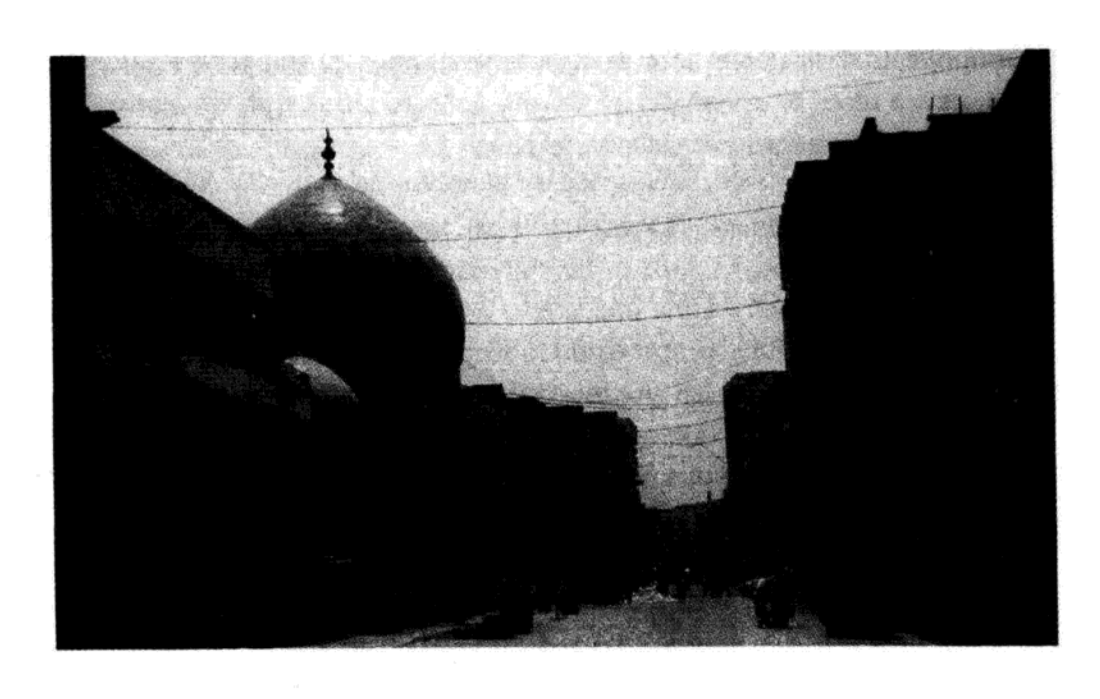


图3.1 海达尔哈纳清真寺(Haidar Khana),由达乌德·帕夏建于1827年。GNU Free Documentation 许可

之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哈茂德推行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旨在加强军队和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达乌德·帕夏的政策已经将伊拉克推向了完全独立的边缘。当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萨迪克·埃芬迪要求达乌德放弃他的总督职位时,这一要求遭到后者的正式拒绝。1831年4月,正当达乌德·帕夏布置好军队准备迎战由阿里·里达·帕夏统帅的即将来犯的奥斯曼大军时,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了巴格达。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据说每天有1500人被传染病夺去性命,而伴随瘟疫发生的则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就在瘟疫最糟糕的时期看上去就要过去时,巴格达北部的底格里斯河却发生决口,洪水摧毁了那里的要塞,附近地区也被夷为废墟。根据当时在巴格达的加尔默罗会传教士的记载:

71

> ……河水涌入城市之中,冲毁了无以计数的房屋,房屋砸在主人的身上,将安居之所变成了坟墓。就好像瘟疫和洪水这两场灾难还不够似的,强盗也四下出没在城市之中,他们破门而入,偷抢他们

所能发现的东西:珠宝、装饰品和其他贵重的家庭用品。[①]

直到二十多年后,这场灾难的后果依然很明显,巴格达的人口仍没有恢复到1831年之前的水平。尽管遭受如此打击,城市的显贵也没有普遍表现出要达乌德投降的迹象。由于感觉到抵抗无望,达乌德犹豫再三之后,将其位置让给了一位新总督,达乌德后来也得到苏丹的宽恕。巴格达马穆鲁克统治结束的消息,激励了摩苏尔势力不断增强的反加利利人集团的信心。这些显贵从摩苏尔的自治中获得巨大回报,但他们依然担心权力和财富会逐渐垄断到加利利家族手中。1834年,历经一系列动荡之后,奥斯曼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结束了摩苏尔长达一个世纪的地方政府自治状态。 72

奥斯曼帝国强加于伊拉克之上的直接统治,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人对伊拉克并不完善和稳定的统治,有利于促进主要由地主、大商人和宗教领袖组成的强大的城市精英的发展。到18世纪,这些阶级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可以利用帝国在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去促进地方自治统治的发展。在部落势力尤其强大的巴格达和巴士拉,稳定的统治需要一个依靠外国奴隶士兵的不受约束的基础。不过,在摩苏尔,某个家族的领导就能够解决该省自己的事务。历史学家曾就马穆鲁克时期是否奠定了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基础,展开过无休止的争论。这虽然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可以假设的是,如果不是大自然以如此这般的毁灭性方式介入进来的话,达乌德·帕夏有可能在1831年抵抗住奥斯曼军队的进攻。他也有可能迫使奥斯曼帝国签署一个与埃及类似的条约,这个条约曾让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人在埃及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地方势力支持独立的决心不够坚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波斯再次入侵的长期担忧。而对奥斯曼人来说,虽然他们

---

① 引自 Charles Issawi (ed.), *The Fertile Crescent, 1800—1914: 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1988, p. 102。

乐于看到伊拉克的各个城市不依赖伊斯坦布尔提供重要帮助就可以进行自我防卫,但他们仍然需要与地方建立某种联系。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伊拉克的地方显贵希望建立一种与赋税、税收分配以及地方政策相关的松散的联系,而不是一种与抵抗波斯威胁的军事协助有关的密切联系。对伊拉克普通百姓而言,他们身处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这简直是命运给他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句显然源于那个时代,在伊拉克盛行已久的谚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特点:“夹在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这是何等的灾难啊!”但无论如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对伊拉克的教派分裂,以及后来出现的逊尼派对政府的控制所产生的影响,将在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继续对伊拉克政治发展的本质产生作用。



第四章　坦齐马特改革与青年土耳其党时期:1831—1918年

74

与中东其他地区一样,19世纪影响伊拉克历史的两种主要力量分别是势力渐盛的奥斯曼中央集权国家和将这一地区统合在一起的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较小的范围来看,这两种进程在19世纪之前,特别是在马穆鲁克和加利利人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

整合所面临的问题

将伊拉克完全整合到奥斯曼帝国中的任务,在马穆鲁克统治结束后的头40年里进展得十分缓慢。摩苏尔的事态发展得较为顺利,但就整个伊拉克而言,奥斯曼人还是缺乏与各地的联系,以及缺少地方支持的稳固基础。在伊拉克所有城市被奥斯曼人控制之前,直到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奥斯曼人的军事行动都运转良好。在帝国的北部边界,奥斯曼人与卡加王朝再次统一下的波斯时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只是在英国和俄国调停下,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才勉强得以避免。1847年,双方严格按照《佐哈布条约》签署了《埃尔祖鲁姆条约》,一致同意更为准确地划分两国边界。不过,这并不能免除双方之间定期的相互侵犯,以及彼此之间的领土索求,还有因对条约的不同解释而引发的争执。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试图挑起部落之间的内战,并鼓动部落之内的竞争者去为领导权而争斗,这就加剧了帝国与部落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

担心伊拉克自治倾向的发展,奥斯曼人改变了限制总督任期的政策。在一个仍然依靠类似雇主与主顾之间的关系网而不是职业官僚体制的系统里,经常性地更换总督会严重妨碍有效的统治。不过,职业官僚体制的建立不久就会实现。因为伊斯坦布尔越来越明白,帝国与欧洲列强打交道时的弱势,需要一场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才能明显扭转。在1839到1876年间,一场总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规章制度的意思)的系列改革发生了。改革的某些方面具有自由主义的形式,如1876年宪法的制定,但受益更多的是军队。但是,这种"以军事为先导的现代化"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广泛的后果。用马尔科姆·雅普的话说就是:

> 军队所花费的金钱必须依靠税收和贷款。这就需要借助更有远见和更加有效的管理来调动帝国的资源。产生政府所亟需的官员的教育改革因而就势在必行。[①]

对伊拉克来说,坦齐马特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到1869年才能显现。尽管如此,某些变化却是非常明显的。原属达乌德和阿里·里达部队的士兵组成了驻扎在巴格达的现代化的奥斯曼第六军团的核心。该军团的招募是有限制的,但后来扩展到了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指挥官外,第六军团逐渐被伊拉克当地人所控制。第六军团常常听从征召去维持伊拉克三省的秩序。所以,尽管奥斯曼人一再将伊拉克分成三个省,但第六军团还是有助于加强这个国家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系。对许多出身贫寒的伊拉克人来说,即便在早期阶段,军队也代表着向上流动的手段。到1912年,估计有1200名伊拉克军官在奥斯曼军中服役,而人数最多的集团则来自阿拉伯诸省。这里要提到一位最著名军官马哈茂德·肖卡特,此人1910年时已是奥斯曼军队的高级军官之一,后来则荣升至帝国的首相。帝国在选拔较低级别的官员时也注

① Malcolm Yapp,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don, 1987, p. 109.

重地方因素,如来自基尔库克的会说土耳其语的人,来自过去马穆鲁克家族的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显贵之家。但国家依然忽略对什叶派官员的选拔,新任命的政府官员和军官绝大多数是逊尼派。就这一点而言,几乎所有有资格的学校,其强调宗教教育的课程都有些褊狭。19 世纪时,一些开放性的教会学校能够提供更宽泛的课程,其重点在于科学、数学和各种语言。巴格达最好的早期“现代”学校或许要数“世界以色列人联盟”于 1865 年创建的一所学校。学校教授的许多科目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是新鲜的,如英语、法语、数学、化学和科学。学校大多数老师来自伦敦和巴黎。尽管这所学校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犹太人团体获益,但它同样对有限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开放。传教士通过引入现代的印刷技术,如 1860 年在摩苏尔成立的多明我印刷所,对提高伊拉克的文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伊拉克的交通状况也由于汽船的使用而有所改善,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汽船航线将返程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 10 天。1861 年,一家服务于巴格达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电报所成立,几年过后,电报服务涵盖伊拉克所有重要城市。除此之外,提高公路质量的工程也已完成。

76

对中央化的早期抵制

国家在尝试扩大权力的每一步中都遭遇到强硬的抵抗。1832 年,继巴士拉爆发原马穆鲁克士兵领导的叛乱后,巴格达也发生了由穆夫提阿卜杜勒·加尼·阿尔·贾米勒领导的反叛。如人们所预料的,最顽固的反抗都来自部落和城市里的什叶派集团。1843 年,巴格达总督纳吉布·帕夏派兵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在过去 10 年中,这两个什叶派城市都处在半黑帮性质集团的掌控之中,这些集团让人们想起了中世纪巴格达的“艾亚尔”组织。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半黑帮组织是不尽相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卡尔巴拉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可以获得众多担心奥斯曼中央统治的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的支持。当前来讨伐的奥斯曼军队到来时,它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群人:不管他们之间如何不同,但都能团结在城市组织的领导之下。奥斯曼军队对卡尔巴

拉的占领,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什叶派清真寺也遭到亵渎。九年之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纳杰夫。除了为这两座城市选派了一位逊尼派总督外,奥斯曼人还通过任命逊尼派卡迪,力图根除什叶派的司法体制。尽管第二种措施很快就失败了,但这两座城市再也没有享受到和以前一样的自治。对卡尔巴拉的劫掠,使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关系尤为紧张,并带来了一段宗教迫害时期,什叶派在此期间不得不隐藏他们的信仰和仪式。奥斯曼人还发起了针对库尔德人自治国家的军事行动,尤以针对辛贾尔山地区的军事行动为甚,但那里性格强悍的独立的雅兹迪教派一直顽强抵抗到19世纪70年代。

伊拉克对奥斯曼统治的抵抗得到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于1805—1848年间统治着埃及,他逐渐为这个国家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使之能够有效地挑战奥斯曼苏丹。1832年,穆罕默德·阿里入侵并兼并叙利亚的消息给伊拉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些人主张与穆罕默德·阿里结盟,以此作为一个提高地方自治的战略手段。像沙迈尔、乌凯勒、祖拜德这些强大部落的首领们都宣布效忠于穆罕默德·阿里,阿纳与希特的总督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不过,在奥斯曼帝国看来,雅赫亚·加利利的反抗最危险,后者力图让埃及支持他成为摩苏尔总督。摩苏尔始终呼喊着要与埃及结盟,直到1839年它才归顺奥斯曼政府。

77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相比,伊拉克早期中央化的进展还是比较缓和的。与中央化相伴随的是伊拉克与英国飞速增长的商业联系。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及波斯南部发现石油之前,英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主要是为了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因为巴士拉的贸易对印度某些地区十分重要,伊拉克作为波斯湾桥头堡的战略位置因而就更为重要。伦敦与印度之间的联系经常需要穿越从阿勒颇到巴士拉的"沙漠大道",但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这条道路被海水冲断。所以,伊拉克就被视作英国在印度利益的延伸。为了进一步发展在印度的利益,孟买政府于1830

年到 1860 年之间,派出了几支探险队去测定经由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水路的可行性。1831 年,弗朗西斯·切斯尼完成了对幼发拉底河的探测工作,之后不久 H. B. 林奇就开始了沿底格里斯河的探险。林奇后来成立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汽船航运公司”,经营两条从巴格达到巴士拉之间的固定的汽船航线。在与奥斯曼汽船的竞争中,英国汽船因为在服务的可靠性上拥有更好的声誉,而更受顾客的喜爱。到 1862 年,巴士拉与孟买之间也建立了固定的汽船服务。大约在同一时期,伊拉克与印度之间也建立了一条电报线,但穿越伊朗与伊拉克的铁路线却从未完成。

随着与外界交往的增加,巴士拉的货运量激增。1864 年到 1869 年之间,巴士拉的奥斯曼轮船码头数量从 552 个增加到 1105 个,英国轮船码头数量从 27 个增加到 52 个。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巴士拉与英国的直接联系成为可能,这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增长。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伊拉克在对外贸易上已经严重依赖英国。1913 年,伊拉克三分之二的进口来自英国及其印度属地,几乎一半的出口要运往英国及其印度属地。英国的商船也控制了当地的运输业。到 1896 年,英国商船在巴士拉与阿拉伯半岛之间运营货物的数量,是阿拉伯或奥斯曼当地航船运输量的十倍。除了交通条件的改善外,定期而有效的外交压力所促成的低关税,也推动了伊拉克与英国之间的贸易。虽然奥斯曼政府在最初屡次试着提高关税,但直到 1907 年,关税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 8% 左右。

78

米德哈特·帕夏改革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总督们竭其所能地扩展中央权力,但坦奇马特改革的影响直到 1869 年才开始在伊拉克显现。这一年,两个事件标志着伊拉克与过去的明显背离:一个是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另一个是米德哈特·帕夏就任巴格达总督。前一个事件使伊拉克更加接近欧洲,使之可以与欧洲进行直接贸易并更容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一个事件为伊拉克带来了奥斯曼帝国最杰出和最有活力的改革家。在米德哈特·帕

夏短暂的任期内(1869—1872 年),他进行了旨在使官僚体制现代化、全面提升经济水准、促进教育以及将伊拉克与帝国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远改革。米德哈特·帕夏虽然只是巴格达总督,但其负责的改革(尤其是行政改革和土地所有权改革)却遍及整个伊拉克。由于米德哈特·帕夏之前曾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进行过改革,因此他是满怀热情和真诚来完成他的任务的。虽然大多数宏伟的规划彻底失败了,但伊拉克人仍愿充满深情地去谈论这位最忠诚的总督为了垫付回伊斯坦布尔的旅费,不得不卖掉他的手表。根据英国代表的记载,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重要的权贵们通告他的改革计划:

> 米德哈特·帕夏阁下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对听众说,他是带着最诚挚的愿望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国家受益并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富裕——他计划实施众多变革及改革,他希望这些变化是有助益的。大会成员可能一开始并不会全部赞同这些改革,可一旦他们感受到了改革的好处,他们就会重视这些改革,并由此去实施下去。①

79 米德哈特·帕夏最为成功的改革或许是对 1864 年帝国行省法的推行。这项法律的目的在于为帝国的行省管理作出解释和制定标准,以便使普通人更容易进入国家的管理体系。在米德哈特·帕夏的监管下,伊拉克三个省区的边界,连同各省之间的边界得以划定。每一个行政区划(最低级别的是居民点和村庄)都由一位国家任命的官员进行管理,官员通常由地方显贵或部落首领担任,另外还首次设立了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会来辅助官员进行管理。在巴格达,大约有一半的会议成员通常从两类非穆斯林中,即犹太人和基督徒中选出。这些代表会,特别是巴格达代表会,后来构成了早期伊拉克国家重要机构的基础。

---

① 引自 Issawi, Charles (编), *The Fertile Crescent, 1800—1914: 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1988, p. 115。



图 4.1 米德哈特·帕夏(1822—1884 年),1869 年至 1872 年间的奥斯曼帝国巴格达总督。GNU Free Documentation 许可

与行政改革相伴随的是一项更为宏大的计划,旨在改变土地所有的性质,并通过实施 1858 年帝国的《土地法》来让游牧民族过上定居生活。土地法一方面是要取消包税制度,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和增加税收。国家虽然在严格意义上仍然拥有土地,但实际上的耕种者却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即所谓的地契(*tapu*),这样他们就拥有和土地私有者几乎相同的权利。国家对游牧及半游牧部落承诺只向他们收取较低的税款,只要他们登记土地并定居下来。为了使这项土地改革得以通过,米德哈特成立了一个土地委员会,在国家选定的一些地区发行地契。在某些定居点,主要是巴格达附近以及阿拉伯河周围的枣椰林地带,土地登记确实带来了有利的后果。但在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却比以前更为糟糕。原因在于,首先伊拉克的大多数农民对部落都十分忠诚, 80

且严格遵守部落的行为准则，他们一般只承认土地的共同所有权以及部落首领在保护土地中的作用。其次，过往的经验表明，任何政府登记土地的行为一定是征兵或征税的先兆。最后，不论行政改革进展得如何，农民仍然没有权力，也不会对巴格达的总督尤其是效率低下和无法避免腐败的土地委员会有任何实际上的影响。在陋习、担心、恐吓以及无知的共同作用下，绝大多数拥有地契的土地以某些部落首领、显贵和城市商人的名义，停止了登记。许多部落成员因而渐渐变成佃农。从理论上来说，土地登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是蒙塔菲部落联盟的王位世袭者萨顿家族。虽然该家族的成员在行使其土地的所有权时还存在困难，但他们在伊拉克南部最终还是能够拥有地契的最大份额。不过，土地的转让同样会破坏家族的团结以及家族成员有效领导他们部落的能力。当时土地登记改革的主要结果是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或半私有化，以及土地的集中化。这两种现象其实在之前的世纪里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不清楚最终有多少土地登记成为拥有地契的土地，据估计数量在全部耕地面积的10%到20%之间。但不管怎样，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这一计划的缺陷，到1881年，新地契的发行停止了，甚至被彻底取消。

其他对部落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改革还表现在灌溉、运输、征兵等方面。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政府操纵着灌溉沟渠的水源，以此来奖励或惩罚某些部落，这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和部落间的冲突。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幼发拉底河中游附近的卡扎伊尔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在其著名的领袖哈马德的带领下，于马穆鲁克统治时期开始日渐强大，在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成功地发挥着重要的权力。米德哈特·帕夏于1869年发兵远征此地，给卡扎伊尔部落联盟以沉重打击，但是真正击溃其权力并进入其领地，还是在1913年辛迪亚运河大坝建成之后才得以实现。大坝的建成使得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可以灌溉当地肥沃稻田的水源，这就将卡扎伊尔部落联盟置于巴格达政府的掌控之下。运河也被用于运输和交通，但手段却更为现代化。在发展汽船航运和电报系统之外，现代公路得到修建，邮政服务得以建立，巴士拉港口的设施也得到提高，一条有轨电车将巴格达与卡吉姆附近联系起

81

来。通过谨慎地将征兵的范围扩大到农村,奥斯曼帝国的第六军团也更加强大。米德哈特最大程度地运用了他身为第六军团指挥官这一职位,将其权力扩大到伊拉克各个省份,甚至扩展到科威特,并沿阿拉伯海岸南下,直到远至今天卡塔尔的地方。另外,米德哈特还新成立两所军事学校,负责招募和训练第六军团的地方军员。城市里的警察力量也得到扩大,从 800 人上升到 6400 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普遍的世俗教育也得到提高。除了两所军事学校外,米德哈特·帕夏成立了一所技术学院,一所旨在培养国家公务人员的中学,几所小学,所有这些学校全部免费。这之后,米德哈特·帕夏于 1899 年建成了一所专门招收女生的中学,并于 1900 年成立了一所小学教师学院。不过,除了 1908 年开放的法学院外,伊拉克当时还没有中学以上的教育。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伊拉克仍然落后于帝国其他地区,只有 100 多所学校,其中只有五所提供中学教育。但不管怎样,识字率尤其是城市的识字率在缓慢但稳步地上升。识字率的上升推动了对出版物的需要。1869 年,米德哈特成立了一个新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包括课本和国家第一大官方报纸《扎瓦拉报》在内的各类出版物。这一时期,巴格达也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城市发展规划。为了使城市的发展更为便利,同时也为了给新建筑提供砖块,米德哈特下令拆除阿拔斯王朝时期就开始建造的巴格达城墙。底格里斯河上架起了一座大桥,巴格达有了它的第一个用水供应系统,以及第一条用砖铺砌的大路。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和公共设施出现了,比如人口普查局和商业局、巴格达的第一家储蓄银行、竣工于 1879 年的一所新医院,以及一家孤儿院和一座公园。工业是改革最少关注的领域。米德哈特虽然计划取消某些税收以发展生产,但伊拉克还是缺乏现代机器化大工业。工业生产还是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只是一些使用人力或畜力的小型工场。

82

社会的转型

伊拉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家中央化的改革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伊拉克国家未来发展相关的最重要变化或许发生在农村。

马穆鲁克时期,土地改革明显加速了农村变迁的进程,阶级的分裂因此加深了,部落内部的联系也多多少少被削弱了或者改变了。在几十年之内,一批势力不断增长的部落首领成为大地主,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过去,部落首领的权力仅限于他们的领导才能,尤其是在战争时期的领导能力。如今,土地占有上的变化给部落首领的权限带来了新的权力关系,它基于所有制之上,最终受到第六军团的保护。曾经骄傲的部落成员心中,不满情绪在不断滋生,因为他们现在新的身份是佃农,需要与地主进行收益分成,并经历着半封建性质的改造。部落首领或城市显贵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由于他们中的多数通常都是在外地主,所以小地主愈发经常性地参与到生产的组织当中。这就使得部落首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并在部落之内催生出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权力结构。一些部落首领,比如萨顿部落的首领,实际上已经获得了政府的官职,他们与国家建立了一种更为紧密的新型关系。纳绥尔·萨顿被认为是米德哈特·帕夏坚定的同盟者,被后者任命为蒙塔菲地区的总督。1870 年,作为政府鼓励定居政策的一部分,纳绥尔·萨顿建造了新城纳西里耶,1876 年,作为对其的奖赏,他更是被任命为巴士拉的总督。纳绥尔·萨顿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嫉妒,有人控诉他背叛了对部落的忠诚。因此,几年后,当纳绥尔·萨顿与政府的关系恶化时,奥斯曼人便可以利用其对部落成员权威的衰弱之势,决定性地击败了蒙塔菲部落,使之再也没有恢复之前的独立地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沙迈尔部落和其他部落之中。不过,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部落凝聚力的削弱。许多位于南部难以进入的沼泽地带以及北部山区的强大部落,就拒绝与政府合作并普遍保持着他们的团结。大多数耕地都直接归苏丹而不是部落首领所有,它们由政府委派的代表进行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传统的部落关系受到影响的地区,部落也没有必然解体,不过它们在这种新的环境中却发生了转变,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一种依靠共同的部落遗产来维持的庇护关系。用当时巴格达一位显贵的话说就是:

83

依靠部落比依靠政府要强一千倍,因为政府并不能有效地平抚

部落成员的情绪,反之,不论一个部落多么软弱无力,一旦它意识到它的某个部落成员受到了不公,它便会准备为这个成员实施坚决的复仇。①

不管土地改革和社会分裂带来了什么样的矛盾后果,社会的进步还是真实存在的。长期被视作伊拉克繁荣昌盛之弊端的游牧部落,其人数从 1867 年占人口总数的 35% 下降到 1905 年的 17% 。与之相伴随的是永久定居人数在人口比例中的增加,从 1867 年的 41% 上升到 1905 年的 59% 。全国总人口数也发生了明显的增长,从 1867 年的 125 万增加到 1905 年的 250 万。部分原因是过去曾经定期袭击这个国家的严重的瘟疫和传染病消失了,但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原因还在于新耕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稳步上升。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是推动农业生产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出口(主要是枣椰、小麦和大麦)从 1864 年的 8.9 万英镑,增加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结束时期的 270 万英镑左右。这种向商品农业的转变给土地带来了新的价值,也加剧了奥斯曼政府、地方权贵以及土地耕种者之间对土地控制的争夺。不过,与之相伴随的进口的增长却对一些地方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和铜器制造业,以及地方工业的行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影响。

世俗教育逐渐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地方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都占据了政府的重要职位。尽管这些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并与其传统的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但他们还是对现有的城市阶级构成了威胁,而后者凭借他们宗教上的影响,仍然实施着难以被挑战的地方权威。正是这些传统的阶级,特别是先知后裔们,首当其冲地领导城市反对奥斯曼政府的中央化行为,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吃惊。不过, 84 伊斯坦布尔与伊拉克城市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这常常会使一些事情产生矛盾的后果。下面这个关于宗教学者暨先知后裔艾布·

① 引自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1978, p. 21。

塔那·阿鲁西例子可以作出说明。达乌德·帕夏下台后,阿鲁西登上了位高权重的巴格达大穆夫提的位子。此后15年,阿鲁西一直保持着对奥斯曼国家的忠诚,甚至捍卫奥斯曼政府的中央化努力,即使面对来自与之竞争的盖拉尼先知后裔家族的抨击也不为所动。1847年,巴格达新任总督很随意地剥夺了阿鲁西丰厚的宗教捐赠收入,并免除了其巴格达穆夫提的职位。阿鲁西前往伊斯坦布尔寻求公正,却没有得到奥斯曼中央政府的任何同情,奥斯曼的财政大臣不断对这位前来请愿的宗教领袖说:"国库里没有为你准备生计,天堂里有你的生计。"[①]许多事例证明,权贵阶级能够非常灵活地维护自己的职位和限制中央国家的影响。巴格达的盖拉尼家族普遍比阿鲁西家族更为保守,但国家却动不了他们,他们甚至还能提高他们在宗教捐赠上的收入。另一个相关的例子可以从穆斯塔法·沙拉比·萨本齐在摩苏尔扮演的角色中看出。萨本齐是个有钱的显贵,他似乎并不受奥斯曼总督和官员的影响,他是1895年到1911年摩苏尔城实际的统治者。不过,对什叶派来说,改革几乎对其宗教领袖的地位没有什么影响。奥斯曼政府虽然直接统治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但什叶派群体的自治状态使他们多少隔离于政府的统治。这种自治状态随着其宗教领袖权力的集中化,甚至还有所提高。而下个世纪穆智泰希德力量的崛起,更是为整个什叶派群体出现一位唯一得到认可的领袖铺平了道路。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叶再次出现,当时伊拉克的穆智泰希德同意在宗教实践和律法方面,听从他们当中最有智慧者的意见。这位重要的穆智泰希德被称作玛尔加·塔格里德(*Marja' al-Taqlid*,即"效法的渊源"或"唯一榜样"之意)。第一位最高的玛尔加·塔格里德可能是纳杰夫的穆尔塔达·安萨里,他得到伊拉克和伊朗的双重承认,很快就成为伊拉克最富有和最强权的人物之一。

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或许是犹太人,他们与欧洲的联系也在日益增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成为富有的商人、金融家,他们还凭

① 引自 Hala Fattah, "Representations of Self and the Other in Two Iraqi Travelogues of the Ottoman Period", 载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0, no. 1, Feb. 1998, p.66。

借自己的人数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这在巴格达表现得尤其突出。1908 年,巴格达犹太人的数量即便与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口相比,也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以从一位当代学者的估算中明显看出:[①]

85

逊尼派穆斯林　40000 人
什叶派穆斯林　50000 人
基督徒　7000 人
犹太人　53000 人
合计　150000 人

犹太商人是最能从与欧洲不断增长的进出口贸易中完全获益的人。到 1926 年,当巴格达商会首次成立时,占成员多数的便是犹太人。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坦奇马特改革者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的“奥斯曼主义”,即强调不分宗教信仰的法律面前的公民权与平等。尽管改革“自由”的一面在部分程度上被 1878 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和泛伊斯兰统治所打断,但改革者所关注的国家的世俗化进程此后仍在继续。对非穆斯林来说,这些改革措施为他们开辟了晋升的新途径,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和法律部门。在奥斯曼帝国末期从事法律的犹太人中,沙逊·赫斯克尔后来成为伊拉克的第一任财政大臣。

青年土耳其党、民族主义与石油

1876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临着诸多严重的威胁。民族主义者的起义遍及巴尔干半岛,国库也完全破产,欧洲的军事干涉已成为现实,苏丹却变得软弱无能。包括米德哈特·帕夏在内的一些官员逼迫苏丹逊位,强行指命了一位新的继位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并通过代表大会批准了一部宪法。宪法和大会被认为是保护帝国摆脱昏庸君主统

① Issawi, Charles(编), *The Fertile Crescent, 1800—1914: 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1988, p. 124。

治的制度保证。不过,奥斯曼帝国议会(其中一些代表来自伊拉克诸省)仅仅维持了两年。由于议会不能有效地解决巴尔干半岛日渐增强的危机,阿卜杜勒·哈米德便解散了议会,并废止了宪法,建立起绝对主义统治。在某种程度上,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漫长统治代表了对坦奇马特改革者更加自由也更为世俗的政策的反动,而不是去保持改革的中央化成果。苏丹再次强调了他作为全体穆斯林哈里发的职责,并利用泛伊斯兰思想作为其统治整个帝国及其海外领地的基础。作为回应,包括部队军官、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在内的各种对政府不满的群体组成了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以"青年土耳其党"著称,该党组建了一些秘密团体来反对专制统治,并主张恢复1876年宪法。在这些团体中,最著名的要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1908年,军队的一次叛乱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同意了青年土耳其党恢复宪法的要求。一年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被"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所控制的议会依照有效章程罢免。

86

远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政治变动并没有给伊拉克的人们带来什么影响。伊拉克的一些库尔德人还被招募进了阿卜杜勒·哈米德新成立的非正规的边防军"哈米迪耶"(*Hamidiyya*)。这些边防军在19世纪90年代十分活跃,他们残酷地镇压了曾博得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亚述教会的基督徒同情的亚美尼亚人叛乱。由于边防军沿部落之间的边界组建,因此国家对库尔德社会的渗透并不会削弱部落的结构,也不会导致明显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整个伊拉克,许多逊尼派的重要人物都受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宫廷的友好对待。但是,对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来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奋斗目标,却是他们与帝国政府深刻冲突的根源。伊斯兰复兴主义虽然也受到阿卜杜勒·哈米德泛伊斯兰政策的鼓舞,但却反对其专制统治,伊拉克最杰出的伊斯兰复兴主义代表是穆罕默德·舒克里·阿鲁西。阿鲁西来自显贵的赛义德家族,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宗教学者,这种高贵的声誉让他受到人们的广泛敬重。阿鲁西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表达了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所熟知的主旨,即赛莱菲耶思

想(*Salafiyya*)[1],它强调了伊斯兰教与科学进步的共存性,并试图将伊斯兰教的宗教实践恢复到先知和早期哈里发时代的原初状态。持有赛莱菲耶观念的穆斯林思想家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关系是彼此不容的,1902 年,穆罕默德·舒克里·阿鲁西因为攻击某些苏非派团体的"迷信"思想,以及宣传瓦哈比派的"煽动言论"而被流放,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青年土耳其党所表达的世俗主义与平等思想同样对伊拉克的思想家产生了影响。像诗人贾米勒·西德基·扎哈维就写下了一些感人至深的同情穷苦百姓的作品,并呼吁结束女性的从属地位。他的许多诗歌都主张宗教平等,并间接地有助于提高民族意识,正如下面两句诗所述:

> 基督徒、犹太人与穆斯林生活在同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 他们都是兄弟。[2]

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的结束为政党和出版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在这方面,伊拉克与帝国其他地区没什么区别。伊拉克拥有 50 份报纸,成立了众多政治组织和俱乐部,可以广泛表达思想。这些组织中重要的有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伊拉克支部,以及其竞争对手"温和自由党"。长期缺席伊拉克政治舞台的什叶派也逐渐参与到青年土耳其党重新强调的世俗主义,或邻国伊朗政治发展的争论之中。1906 年,伊朗的一场大众运动挑战了国王的权力,并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拥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的宪政政府。因为与伊朗有着直接的电报和邮政联系,伊拉克的什叶派,特别是穆智泰希德,可以及时听到来自德黑兰和大不里士的消息,并参与到下一步的政治讨论之中。伊拉克的各什叶派中心,通过为伊朗宪政革命的领导人提供安全的避难所和组织有效的运动,也为革命的成功贡

87

---

① 赛莱菲耶思想是指伊斯兰教史上以恢复伊斯兰本来面貌,净化教义,简化教规,反对外来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的一种革新思想,"赛莱菲"的意思是"前辈"或"先贤"。——译者

② 引自 Yusuf Rizq-Allah Ghanimah, *Nuzhat al-Mushtaq fi Ta'rikh Yahud al-'Iraq*,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97, p. 260。

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1908年召开的奥斯曼帝国议会中,伊拉克诸省的代表有17人。其中大多数来自老派的显贵家族,如巴士拉的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和穆罕默德·舒克里·阿鲁西的堂兄赛义德·阿里·阿拉丁·阿鲁西。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发现,他们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帝国其他阿拉伯省份的代表的。由于分享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还发现了一种基于他们所关注的众多共同紧迫问题之上的团结意识。随着来自开罗、贝鲁特与大马士革阿拉伯语出版物传播,以及阿拉伯文学社团的发展,这种正在萌发的民族主义获得了支持。像语言学家兼历史学家佩雷·阿那斯塔西神父,诗人贾米勒·西德基·扎哈维、马儒夫·拉撒菲,作家艾哈迈德·沙维、阿卜杜勒-穆赫辛·卡兹米,以及巴格达的文学俱乐部"民族科学俱乐部",都为阿拉伯的历史、文学和文化感到自豪。除了逊尼派知识分子外,什叶派、犹太人和基督徒也表达出这种早期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参与并帮助在伊拉克各宗教团体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

从政治上来说,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超出要求建立更多的自治这一范围。帝国议会中阿拉伯人的代议机会不足,某些伊拉克人与"反对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中央化政策的"奥斯曼行政分权党"、"自由和谐党"之间的联系,都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在1913年巴黎的阿拉伯人大会上,有两名伊拉克代表出席,他们也提出了相似的建立更大的省区自治和保护阿拉伯语的要求。1908年革命期间,青年土耳其党开始严格限制新获得的自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放下宗教从属关系,将帝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一个单一民族的目标很快就让位于种族和文化歧视的新政策。到奥斯曼帝国末期,建立单一的土耳其民族、在文化上"土耳其化"的政策开始实施。这一政策遭到了所有阿拉伯省区的顽强抵抗。知识分子此时开始对政治分离观念产生兴趣,他们将之视作保护阿拉伯人利益的唯一方法。各个文学团体在抵抗文化土耳其化中再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巴格达的民族科学俱乐部倾向于支持阿拉伯人在帝国内保持自治,但摩苏尔的"科学社"和巴士拉的"改革社"却明确地表达了脱离主义的思想。当时,要求独立呼声最高的是巴士拉具

88

有极强政治抱负的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他渴望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伊拉克国家。帝国政府对这些俱乐部的取缔,以及对其领导人的恫吓与囚禁,只会激化这一运动并使之转向地下。这些秘密团体中最重要的是"契约党",其大多数成员来自阿拉伯军方,主张阿拉伯各省独立。虽然契约党创建者是埃及人,但来自伊拉克军队的军官努里·赛义德、亚辛·哈希米、贾法尔·阿斯卡里和贾米勒·米德费控制了该党,他们后来在伊拉克独立国家早期领导人的位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行动虽然已经有所展开,但它不如叙利亚或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那样成熟和具有民众基础。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下的政府除了在国内提倡土耳其民族主义外,对外也力图通过发展与德国的密切联系,来反对英国、法国和俄国。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期间,之前修建一条连接伊拉克与欧洲铁路的想法再次由一家德国公司提出。面对崛起的竞争者德国,英国作出了反应,它在 1899 年与科威特的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达成协议。按此协议,这个小公国将接受英国的援助和保护,作为回报,英国将控制其对外政策,包括控制在修建计划延长至科威特的铁路上达成的任何协议。1903 年,奥斯曼政府同意对修建所谓的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线作出让步。这个让步还赋予德国人沿这条铁路线的采矿权。由于担心德国人在这一地区的野心,英国人本打算破坏这一协议。英国人后来放弃了反对意见,但需要奥斯曼政府保证最终的巴格达至波斯湾的铁路线由一家英国公司来建造,且铁路线的终点应设在巴士拉。1913 年,在英国与奥斯曼政府的协议草案中,英国人同意收回 1899 年与科威特的谢赫所签署的协议,并承认科威特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与巴士拉联系在一起的自治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条铁路线只有巴格达至萨马拉一小段完工。1908 年,距伊拉克边界不远处的伊朗境内发现了石油,这使英国人对这一地区的利益明显增加。1914 年,英国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①]开始从阿巴丹进口提纯的石油,这条石油线路正好穿过阿拉伯

89

① 即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译者

河。当时,英国海军正决定将其舰队的燃料从煤炭改为石油,英国政府遂决定控制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并及时获得了该公司51%的股份。由于预计伊拉克很快也会发现石油,英国便于1912年成立了一家由英国控股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伊朗的石油是英国人重提解决奥斯曼帝国与波斯沿阿拉伯河边界争端的主要原因。在英国与俄国政府共同的施压下,奥斯曼和波斯当局被迫接受了一项签署于1913年的议定书,该议定书对这条边界作出了更为详致的设定。虽然波斯获得了在阿拉伯河上收取停泊税的权力,但奥斯曼人再次赢得了对阿拉伯河两岸的统治权。

战争、被占与秘密协约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列强中爆发。出于对俄国人野心的担忧,奥斯曼人在仔细考虑和犹豫再三后,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决定,即在12月初加入德国一方作战。早在奥斯曼参战之前,英国就准备派出一支远征军从印度入侵伊拉克南部。考虑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人们不会为英军在奥斯曼宣战之后的第二天就于1914年12月6日在法奥登陆感到吃惊。英国人几乎兵不血刃地就占领了巴士拉,但他们对伊拉克的征服却十分艰难。在这场军事行动中,英军死伤超过10万人,损失2亿英镑。英国人最初只打算占领巴士拉省,他们也在12月初做到了。但是,受到初期成功的鼓舞,英军决定继续北上直至巴格达,英军的行动直到1915年12月被奥斯曼的第六军团阻挡在库特·阿马拉才停下了。汤森将军率领的英军在被围五个月后,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耻辱性的失败让英国的战争部确信必须加强增援,斯坦利·莫德将军授命担任战争的全权指挥。1917年3月,在一场新的攻势下,英军成功地夺取了巴格达,到1918年12月战争结束时,英军刚好到达摩苏尔南部。在签订了保证结束对奥斯曼帝国及其盟国战争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后不久,摩苏尔被英军占领。

战争对伊拉克北部和南部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巴士拉在军事行动中受到的损失很小,其经济随着来自印度货运的增加,很快又繁荣起来。

英国的工程师在巴士拉展开工作,力图扩大这个港口,并使港口的设施现代化,以便更好地解决大型货运问题。为了提高军队调动的效率,新的道路和铁路线得到建造,对食品生产的更大需要则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就业机会。但对巴格达来说,其海上经济出口的阻断,以及日益增长的兵役负担,都使其蒙受了较大的损失。摩苏尔同样由于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毁灭性战役而损失惨重。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和俄国都鼓励亚美尼亚人和安纳托利亚亚述教会的基督徒去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反奥斯曼统治的起义招致了大范围的屠杀,它逐渐使许多亚述教会的基督徒逃到了伊拉克北部。这些避难者的突然出现,以及他们在近期历史上与库尔德穆斯林的严酷冲突,给巴格达带来了更大的仇恨,这种仇恨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会不断加剧。

随着战争的进展,英国人寻求与众多党派达成协议,以加速胜利的到来。1914 年,科威特的谢赫得到英国承认,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独立的统治者。1915 年,英国与麦加总督谢里夫·侯赛因也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侯赛因宣布发动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作为英国人支持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土之地阿拉伯人独立的回报。不管这种情况是否能为阿拉伯人带来一个统一的王国,还是只不过是一些与以往类似的普通举动,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还是出现了一些例外情况。具体到伊拉克来说,英国人以下述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 对巴格达和巴士拉诸省而言,阿拉伯人需承认大英帝国在这里的既定地位和利益,以便使特殊的行政协议成为必需,即保证这些领土不受外国侵略,提高当地人民的福祉,并保障我们彼此的经济利益。①

所谓“特殊的行政协议”被普遍认为是指英国人对伊拉克的建议和

---

① 引自 P. M. Holt, *Egypt and the Fertile Crescent, 1516—1922 :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1966, p. 266。

援助,它或许是某种保护性的协议。尽管只是一种猜测,但1916年还是爆发了起义,领导者是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费萨尔的军队中有一批重要的军官,他们脱离了奥斯曼的军队,投身到民族主义的事业当中。大多数此类军官,如贾法尔·阿斯卡里(他实际上是伊拉克军队的总指挥)和努里·赛义德,都是契约党成员。起义成功地遏制了奥斯曼军队,到战争末期,起义军夺取了大马士革。

就在英国人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费萨尔达成协议的同时,他们91 也与法国人就未来阿拉伯领土问题展开秘密谈判。1916年,法国和英国两国的谈判专员夏尔·皮科与马克·赛克斯同意在战争结束后瓜分新月沃土之地。法国将得到今天黎巴嫩、叙利亚和摩苏尔的领土,英国将获得巴格达、巴士拉以及从巴士拉到巴勒斯坦沿海的部分领土。尽管有诸多限制条件,但在与谢里夫·侯赛因的信件中,英法两国毫无异议地承诺伊拉克独立,不过后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却没有承认这一点。而莫德将军在进入巴格达时,曾明确宣布英国人是作为"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来到这里的,这就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了。为了平复阿拉伯人一旦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条款后的担忧,英法两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承诺将由伊拉克人民自己决定国家的独立。然而,当战后面对谁将实际上控制有争议的领土这一现实时,所有这些协议最终都失去了意义。

自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结束以来,伊拉克在19世纪第一次目睹了城市对乡村霸权的稳步扩张。虽然伊拉克在这一时期没有完成统一,但巴格达仍旧是一个让摩苏尔,尤其是巴士拉都高看的中心。英国在这一地区商业利益的增长,尤其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使伊拉克得以首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来。随着伊朗附近石油的发现,英国人的利益更是有了质的增长,他们强烈希望能够在伊拉克也发现这种宝贵的商品。在社会层面上,中央化的改革力图使旧有的显贵阶级和部落首领附属于国家,而来自国外的经济影响也有效地促成了商业阶级的利益。社会与经济上的这些发展鼓励了世俗化,由此为非逊尼派群体创造出更多

的机会。但是,这些进程远不是所向无敌的,国家的发展和欧洲经济的渗透都面对着顽强的抵抗,它将逐渐改变改革发起者预期的结果。比如,米德哈特·帕夏的土地政策就脱离了其利用土地的用益权来缔造一个广泛的农民阶级的初衷,最终促成了大地主的崛起和分成制的发展。此外,对一战前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抵抗逐渐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第五章　委任统治与君主制：1918—1958年

93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军管下的伊拉克领土上居住着许多按种族、宗教和部落忠诚划分而成的不同群体。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所有省区中，只有伊拉克诸省展示出对中央化统治的强烈抵制。虽然历经了19世纪的各项改革，伊拉克仍是帝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一战结束时伊拉克的人口在250万到300万之间。操阿拉伯语的人口构成了稳固的多数，占人口总数的75%—80%，这些人一方面被严格划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另一方面也被划分为不同的部落联盟。库尔德人也深受部落分裂的折磨，他们居住在伊拉克人迹罕至的地区，占人口总数的15%—20%。余下的则是土库曼人、波斯人和亚述人。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90%，其中55%是什叶派，剩余的10%是基督徒、犹太人、诺斯替教曼达派和雅兹迪派。犹太人在巴格达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占该城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些部落，如阿纳伊扎部落、沙迈尔部落和祖布尔部落，依然参与部落的暴力争斗。伊拉克拥有一座重要的城市巴格达（人口约20万）和两座小一些的城市巴士拉和摩苏尔（每座城市的人口约5万）。大约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冒险走到村庄附近之外的区域。这个国家没有机器化的工厂工业，只有5%的人口具有读写能力。到一战结束时，中学在校学生只有大约200人。一战后，伊拉克重新划定了边界，这让伊拉克脱离了从前的奥斯曼帝国。

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突然成为不同的国家,新的边界使得同一族群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之中,存在几个世纪之久的商路也被打断。如此种种问题虽然构成了难以解决的障碍,但现代伊拉克国家毕竟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巴格达长期以来的中心地位,以及这座城市逐渐延伸的对包括苏莱曼尼亚和库尔德斯坦部分地区在内的其他地方的统治力。

94

总的说来,伊拉克面对英国入侵的最初回应是保持中立,但当英国的长期占领变得愈发明显时,伊拉克就转入到积极的抵抗之中。不过,伊拉克各城市的反应是不同的。巴士拉由于长期以来就与英国交往,并从英军的到来中获益匪浅,它通常是有目的地与英国合作。即使是巴士拉的影响力巨大、满怀抱负的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在一开始也没有选择抵抗入侵。而巴格达则保持着平静,因为巴格达的显贵们不能确定新形势会带来什么。在库尔德人的苏莱曼尼亚,人们最初欢呼新征服者的到来,因为他们希望英国人可以为库尔德人的自治甚至独立铺平道路。可是,等一战刚结束,库尔德人就开始积极反抗英国人的存在。唯一从一开始就抵抗英国人的是什叶派中心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一战期间,多位穆智泰希德举起了圣战的大旗,以此反对非穆斯林入侵者。1918 年,由于担心伊拉克的新统治者不仅会危及什叶派的独立,甚至会威胁到整个伊斯兰宗教,在纳杰夫一些显贵的帮助下,成立了战后首个政治组织“伊斯兰复兴党”。第二年,一些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士聚在一起成立了“捍卫独立党”,这是伊拉克第一个专门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一战期间,民众的反奥斯曼政府运动不再继续,多数逊尼派显贵继续以苏丹之名为荣,甚至战后亦复如此。不过,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仍是例外,那里反抗奥斯曼人统治的起义时有发生。

战后英国的政策

英国官员普遍承认的事实是,他们的国家在伊拉克的首要利益是石油,以及建立某些实体以便使英国可以轻易地控制这种有价值的商品。不过,这种实体应当是什么,英国官员的争论很大。到一战结束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思想派系。一是所谓的“东方派”,其支持者是巴

格达的市政长官阿诺德·威尔逊,旨在将英国对印度的政策扩展到伊拉克。这意味着,建立直接而有效的殖民统治将是英国人首先考虑的,当地人对国家管理的参与基本不被考虑。威尔逊认为,这种政策不仅会确保欧洲的必要利益,而且还会实现将现代文明传播到亚洲落后民族中的崇高使命。毕竟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帝国主义被"白人的负担"和"教化的使命"等观念所合法化,威尔逊也坚信,伊拉克将成为英国实施进步统治的光辉范例。不过,威尔逊对于实现这一想法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抱有幻想,他不断劝说伦敦要做好长期准备。这一政策起初是占有优势的,但后来却遭到其竞争对手,在开罗阿拉伯处形成的"西方派"的不断挑战。这项政策的反对者,如著名的T.E.劳伦斯认为,间接地控制亲英的阿拉伯政府才会给英国带来更大的利益。反对者坚信,威尔逊的政策代价太大,极有可能引发阿拉伯人的不满和仇恨,他们更愿意通过顾问和条约来保持英国的影响。

95

尽管如此,威尔逊还是强制推行他的计划,1920年,伊拉克的政府部门里的英国官员几乎达到3000名。伊拉克人被排除到任何重要的岗位之外,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选举议会也被取消。由于国家发展的中心在城市,这项政策因而对城市的显贵尤为不利,威尔逊也为此特意向伊拉克城市里某些有影响的人物表达了敬意。但在农村,这项政策就殊为不同了。为了赢得部落首领的支持,英国人试图提高他们的权力。正如一位英国官员在1919年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根本任务不是给无权者以权力,而是确保掌权者的权力。"[①]这一原则在1916年通过的《部落犯罪和市民争端法》中得到体现。依据这项法律,愿意向新秩序表达忠心的部落首领,将被给予在其领土之上的最高司法、行政(包括收税)和警备权。这项政策有效地扭转了奥斯曼帝国末期部落权力明显衰落的局面,也让许多人提出了希望成为部落首领的不合理的要求。这样一来,一些地区,特别是巴格达南部沿底格里斯河一带,地主们构成了英国

① 引自Marion Farouk-Sluglett and Peter Sluglett,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Tenure and Rural Social 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Iraq c. 1870—1958", 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5 (1983), p. 504。

支持者的坚强基础。对此,另一位英国官员写道:

> 在多数情况下,部落首领的职位是直接由国家政府部门决定的。他们也意识到,获得职位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他们会积极地与政府官员合作。[①]

英国人的如此打算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其统治的反抗,这种反抗将影响到新国家的发展。纳杰夫的人民以示威游行和暗杀英国官员,表达了他们反抗的决心。即便在库尔德斯坦,这里的人民虽然一开始欢迎英国人的到来,但局势紧张的迹象亦很明显。由于库尔德斯坦地区地处偏远,英国人在这里采取的策略是允许它实施很大程度的自治。1918 年,苏非派卡底里亚教团领袖、一位很有影响的部落统帅谢赫·穆罕默德·巴拉赞齐被任命为苏莱曼尼亚总督。很快,雄心勃勃的巴拉赞齐就得到了一些部落将领的支持,试图摆脱英国人的庇护,成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无奈之下,英国人只有对库尔德斯坦展开军事行动,巴拉赞齐遭到流放。伊拉克的其他地区亦不平静,北部就在不断的起义和对英国官员的刺杀活动中变得越来越动荡。土耳其此时仍然宣称对摩苏尔省拥有权利,它鼓励伊拉克人去反抗英国。

96

给伊拉克带来致命一击的事情发生在 1920 年。当时新成立的国联在意大利的圣雷米召开会议,宣布将新月沃土之地分为几块托管地。叙利亚(包括今天的黎巴嫩)交法国托管,英国则获得了对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法国依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同意让出它在摩苏尔的权力,以此换来对该省石油的共享权。委任统治以如下方式获得了合法性:

> 原属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共同体已经发展到如下阶段,即它们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地位可以被暂时承认,但要接受委任统治国的建

① 同前页注①所引书,第 496 页。

> 议和帮助,直至独立。在选择委任统治国时,这些共同体的愿望应被予以慎重的考虑。[①]

委任统治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殖民主义的掩饰。伊拉克人民的愿望当然从未被认真考虑过。一位美国人建议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伊拉克,以“发现当地人民的意愿”,但遭到英国拒绝。后来,这个以“金-克莱恩委员会”著称的委员会确实来到了伊拉克,但被禁止在那里发挥作用,该委员会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调查结果也被完全忽视。如果需要进一步证实协约国意欲将其“征服的权力”用于统治中东,圣雷米会议结束后不久的叙利亚可以提供详细的佐证。当时,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处在费萨尔的阿拉伯政府的统治之下。在顽强抵抗法国人的侵略期间,费萨尔于大马士革召开了一届国民大会,大会拒绝了圣雷米会议的决定,并宣布叙利亚独立(当时叙利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成立君主立宪制国家。费萨尔被选为国家的开国君主。不久,一个规模小一些的大会也在大马士革召开,会议成员多为费萨尔的伊拉克官员,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伊拉克国王。两个大会一致同意两个国家应以某种方式结为联邦。“伊拉克国会”很难说是代表制的,阿卜杜拉甚至也不是很渴望去接受国会提出的要求,不过伊拉克国会的意义在于它形成了又一个愿意挑战英国人统治的民族主义中心。事实上,当法国人准备入侵大马士革时,这些伊拉克官员中的不少人在伊拉克边界上的代尔祖尔成立了一个基地,去帮助并支持反英运动的发展。

97

1920年的起义和伊拉克国家的诞生

当圣雷米会议的消息传来后,伊拉克看上去已经到了发动大规模起义的边缘。不论是在巴格达的清真寺里还是在咖啡馆里,每个公共场所

---

① 引自 Justin McCarthy, *The Ottoman Peoples and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2001, p. 176。

都在谴责委任统治。通过共同使用礼拜场所来动员群众,逊尼派和什叶派表现出鲜有的团结意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威尔逊根本不去关心这些事情,他以自负和傲慢的态度接见了前来拜访他的伊拉克代表。巴格达的街头示威首先揭开了起义的序幕,接下来便是幼发拉底河中下游部落的武装反抗。库尔德人的部落同样利用混乱向摩苏尔的英国人施压。随着反抗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卡尔巴拉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为抗英运动的堡垒。城市里出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旗帜和鼓动人们奋起反抗的小册子,它们也在向伊拉克的其他地方传播,与此同时,诸如阿亚图拉·设拉子这样的著名宗教人士都力劝穆斯林发动圣战。传统的宗教禁忌不再禁止妇女去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偷运武器、收集捐款、担任送信员等。如其为人所知的那样,1920 年的反英大起义无疑清楚地显示了伊拉克早期的民族主义。尽管时间短暂,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城市人民与农村人民之间、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各个部落之间都发展出一种团结意识。英国人对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皇家空军和大规模的增援部队在打击部落军队时,甚至动用了芥子气。

起义阵营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弱点来。幼发拉底河中下游的部落渴望参加并最终领导这场斗争,但他们却固执地反对任何建立革命普遍领导权的尝试。城市的许多逊尼派显贵拒绝支持抵抗运动,他们担心这有可能会使什叶派势力增强。同样,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什叶派部落首领因为从英国人的慷慨政策中获益匪浅,并掌握着大量土地,他们也反对起义,一些部落首领甚至调拨部落军队来对抗起义者。在库尔德斯坦,反抗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库尔德的民族主义者和部落领导人对阿拉伯人的领导权仍然很怀疑。尽管如此,反抗还是从 7 月持续到了 10 月,英国人死亡 450 多人,损失达 4000 多万英镑。伊拉克这边也有大约 1 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部落成员。就在同一时期,邻国叙利亚的事态发展同样影响了伊拉克事件的进展。获得委任统治权的法国发兵攻打了费萨尔年轻的阿拉伯王国,法国人击败了费萨尔的军队,于 1920 年 7 月占领了大马士革。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费萨尔的大部分伊拉克官员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其中一些人就参加了伊拉克的反英大起义。

98

尽管1920年的反英大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它还是给威尔逊直接统治伊拉克的计划以决定性打击。广泛受人尊敬的珀西·考克斯爵士重返巴格达,就任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以解决英国的统治问题。考克斯全面推翻了威尔逊的政策,他成立了赛义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盖拉尼领导下的伊拉克过渡政府,后者是巴格达的一位最受人敬重的逊尼派显贵。过渡政府表现出将伊拉克所有群体都纳入其中的愿望,但什叶派代表的人数却再一次不足。1921年,时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英国的中东属地政策。会议决定在英国的监护下,成立伊拉克政府,但它必须是"立宪的、代表制的和民主的"。经过一番讨论,叙利亚的流亡国王,反抗奥斯曼人统治的阿拉伯起义领袖费萨尔应邀担任伊拉克新国家的领导人。费萨尔被认为是理想的候选人,因为他能够满足多方利益,同时也能对英国保持忠诚。作为哈桑王族的先知后裔,他被认为可以为穆斯林的传统所接受。从他对奥斯曼人的反抗,以及他对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领导中,可以看到他的民族主义信念。经过艰难的考验,费萨尔证明他是一位高效且温和的领导人,并赢得了追随者的敬重。同时,他也被认为乐于与英国人合作,因为他并不是伊拉克人,缺少稳固的本地基础,并在挑战欧洲强权的过程中已经遭受到法国的打击。

在接受伊拉克王权之前,30岁的费萨尔坚持进行全民复决。但复决太过仓促,96%的伊拉克公民支持费萨尔成为国王的说法让人质疑。由于苏莱曼尼亚和摩苏尔省(土耳其仍然声称对其保有权利)的大部分地区都未参加,这个结果很难说有代表性。基尔库克也没有人参与投票,巴士拉的很多人则支持流亡的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而在什叶派中间,大多数穆智泰希德都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谴责。尽管如此,在英国人的护卫下和乐队演奏"天佑吾王"的乐曲声中,费萨尔于1921年8月23日加冕为现代伊拉克的第一任国王。人们显然对此缺乏热情,在主麻日的礼拜上,逊尼派领导人在提及新国王的名字前,还是要首先念到哈里发和苏丹的名字。与穆斯塔法·凯末尔1924年废除哈里发和苏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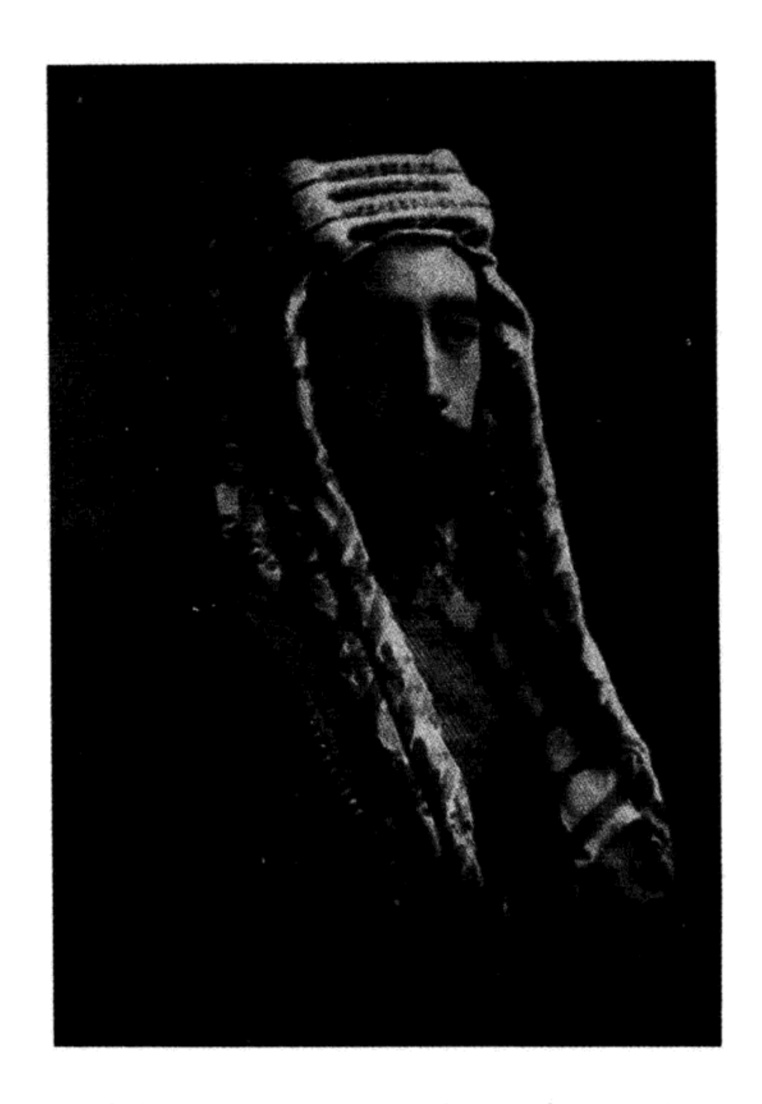


图 5.1　费萨尔国王(1921—1933 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现代伊拉克在英国的托管下建立。GNU Free Documentation 许可

丹相比,费萨尔的所作所为确实被大加宣扬,但在库尔德人中,他的权威却遭到了不知疲倦的穆罕默德·巴拉赞齐的挑战,后者于 1922 年从流亡中归来,声称他才是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的国王。他在他的城市苏莱曼尼亚颁布法律、征收赋税并发行税票,直到英国皇家空军再一次将他驱逐出去,巴格达再一次控制这里为止。 100

费萨尔成为伊拉克国王,意味着英国对这个国家立场的某种调整。费萨尔不仅没有蔑视委任统治,反而坚持以一项新的条约详细阐明伊拉克政府与英国的关系。事实上,1922 年的这项条约以双边协议的形式体现了委任统治体制的全部条款。在英国直接掌管伊拉克的防务和内

部安全的同时,政府的其他各个部门中要有英国人担任顾问和督察员,并能够行使否决权。此外,伊拉克政府必须支付英国驻伊拉克官员的一半开销。国联也根本无视这一条约,继续正式指称伊拉克为委任统治领地。

委任统治下的发展

新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真正困难的,因为纵观伊拉克的全部历史,多种族的伊拉克从未成为一个易于统治的国家。作为中东之一部分,这个新兴国家品尝了战后影响整个地区的混乱的苦果。对费萨尔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得不在建设这个国家时,一只眼既要紧盯着英国保护者,另一只眼又要紧盯着对屈从于外国强权深表不满的民众。为这个新兴国家划定边界也是极为困难的。1929 年之前,礼萨汗,即后来的礼萨·沙·巴列维领导下的伊朗复兴国家,拒不承认伊拉克。两国之间的根本冲突在于对地区霸权的争夺,但下述三个问题是两国亟待解决的。首先,双方都在争夺两国边界上的库尔德斯坦。崎岖的地形和经常性的部落移民,使得在这里划定两国边界极为困难。其次,1925 年伊朗对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军事占领,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因为那里的多数居民都是阿拉伯人,边界两端的部落间的联系亦很密切。最后,伊朗仍然不承认伊拉克对整个阿拉伯河的统治权,反而要求两国的边界从河中间穿过。尽管双方之间互派大使,其中费萨尔还访问过德黑兰,但在委任政府期间,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

1922 年,珀西·考克斯组织召开了乌凯尔会议,将伊拉克与其南部邻国的边界确定了下来。参加会议的双方是伊拉克国王的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后来的沙特国王),以及一位代表科威特酋长的英国官员。最后的决议实际上是在考克斯的授意下作出的,边界在有利于伊拉克的情况下在阿拉伯半岛上作出划分。但在另一方面,伊拉克提出对科威特(当时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拥有主权的要求却被拒绝。伊拉克国王没有得到科威特,意味着这个国家几乎成为一个内陆国,这就给它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不过,当时最棘手的是与土耳其的边界问

101

题。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新共和国一致认为,要获得对摩苏尔的控制权。他们指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英国人占领摩苏尔时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议,而将摩苏尔并入伊拉克违反了该协议。此外,他们还认为,库尔德人在文化上接近土耳其人,呼吁用一场公民复决来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库尔德人都担心他们的民族会被分裂到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等国中,就支持土耳其人的主张,尽管他们也知道其不可能成为一个占人口多数的群体。英国人的理由则建立在摩苏尔与巴格达的历史及行政渊源上。虽然也有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但问题最终还是要由实际的现实情况所决定。英军当时占领着摩苏尔省,而土耳其人因为刚从一场与希腊的可怕的战争中走出,因此不愿意再次作战。对英国人来说,摩苏尔的重要性在于它的石油,且有助于年轻的伊拉克国家的生存。巴格达和巴士拉有影响的逊尼派显贵同样渴望把摩苏尔并入伊拉克,因为那里的逊尼派人口可以平衡南部什叶派的力量。

摩苏尔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同伊拉克与英国的关系纠结在一起的。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如什叶派大臣贾法尔·艾布·提曼,坚决要为实际的独立而战。即便是费萨尔,尽管他是靠着英国人才当上国王,且严重依赖葛楚德·贝尔这样的英国顾问,但也并不总是按照英国领事的意愿行事。不过,摩苏尔问题的目的是要加强英国人的力量。英国人要求伊拉克同意其控制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后来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获得75 年的采油权,以此作为英国帮助伊拉克的回报。伊拉克政府一直以来就拥有该公司 20% 的股份,但害怕会失去摩苏尔,便最终屈服了,并让出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财产的股份。1925 年,在英国的压力下,国联将摩苏尔判给了伊拉克,条件是保证库尔德人能够控制他们自己的地方政府以及拥有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巴格达虽然经常漠视这些权利,但只有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才享有这些权利,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人是没有这些权利的。从此刻起,伊拉克政府开始倾向于与英国人完全合作。可是伊拉克早期的一些政治家,有时又目睹了太多的人民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欲求与政府不愿挑战英国霸权之间的矛盾。一位来自著名的赛义德家族的强权人物阿卜杜勒-穆赫辛·萨顿,不堪忍受如 102

此之绝望,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说明他为何自杀时,他哀叹了这个国家无力获得独立而人们却仍希望政府有所作为的事实。

在这个国家之内,没有人会怀疑为伊拉克众多的族群塑造一种民族认同的困难性。费萨尔在1933年晚些时候写道:

> 我要满怀悲伤地说,伊拉克至今仍不存在伊拉克人,那里只有你不能想象到的乌合大众,他们缺乏任何爱国思想,深深沉浸在各种宗教传统和荒诞不经之中。没有一个共同的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听到的只是邪恶,心向混乱,时刻准备着起来反抗任何形式的政府。我们希望在这些群氓之外塑造一个民族,让我们能够培养它、教育它和改进它……①

根据1925年的宪法——该宪法在整个君主制期间基本未作改变——伊拉克有了一个包括两院的议会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国王拥有可以否决任何法规、解散议会以及要求重新选举议会等重要权力。但选举实际上是被控制的,军事管制法则定期宣布保证国家牢牢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手中。1922—1958年间,在君主制被推翻之前,伊拉克的议会共进行了10次选举,内阁更换了59次。不过,这些中断只不过代表了国家职位的重新洗牌而已。在君主制期间,政治精英是非常稳定的,他们多是前奥斯曼时期的官员和一些城市显贵。君主制期间任职最长的政治家是出类拔萃的实用主义者努里·赛义德,他在几届内阁中都担任职位,曾任国家首相。由于意识到需要扩展自己的政治基础,费萨尔在象征性地使用犹太人和基督徒官员的同时,决心提拔一些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将之纳入自己的政府。逊尼派和英国人却都反对这一主张,他们需要确保什叶派在议会中只能保持少得可怜的人数。逊尼派所占的统治地位在省区政府,甚至在什叶派控制的地区里也十分明显。

---

① 引自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1978, p. 25。

为了帮助国家培养一种民族感,费萨尔任命出身叙利亚的热心的泛阿拉伯主义者萨提·胡斯里为教育总长。胡斯里制定的学校课程提升了伊拉克的爱国主义,同时也为人们注入了一种从属于以逊尼派为主的更宽广的阿拉伯世界的意识。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抵抗殖民主义和分裂的意识形态。它寻求的是提升对光辉历史的自豪感,对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必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强调了国家的阿拉伯认同意识,胡斯里渐渐疏离了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对库尔德人来说,他们担心的是在一个扩大了的阿拉伯国家中丧失本民族的认同,对什叶派来说,他们同样担心会在一个逊尼派的国家中成为少数分子。在费萨尔看来,建构民族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军队。他认为,与各部落拥有 10 万步枪队相比,一个只拥有数量为 15000 人步枪队的政府是什么也干不了的。但英国人却担心民族主义的影响会愈来愈大,他们无视费萨尔创建足够军力的不断请求,坚持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伊拉克的部队只能保持在 7500 人这个可笑的、极低的数量上。

103

通过顾问和皇家空军,英国人得以控制伊拉克政府。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意识地提高对英国人抱有忠心的部落首领的力量。1916 年的《部落犯罪和市民争端法》被并入宪法之中,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国家选举让人怀疑的本质和各省部落首领近乎绝对主义的权力,确保了大地主对议会的控制。在君主制期间,议会通过了几项法律,目的都在于提高农村的半封建关系,强化地主的所有权以及以损害工业为代价的支持农业的倾斜发展。在城市里,家庭和个人的法律地位(包括财产继承)继续由伊斯兰教法法庭来解决。逊尼派法庭和什叶派法庭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则依据各自不同的传统,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民族主义者的反抗是软弱的、不成系统的,且集中于某些胸怀抱负的个人身上,但它的确给政府带来了压力。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英国人的支配作用,它被人们称作阻碍发展的"非自然状况"。1929 年,英国新成立的工党政府邀请伊拉克代表前来就一项保证独立的条约谈判。在首相努里·赛义德的强硬领导下,1930 年两国签署了《英伊条约》。这项条约在两年之内就得到了批准,但伊拉克获得独立却要再用去 25

年。条约同时也寻求重建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盟”,这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英国对伊拉克的支配作用。条约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它赋予英国人否决伊拉克一切外交决策的权力,并使英国人可以垄断军队的训练及装备的购买,以及战时使用伊拉克领土的权力。皇家空军将在巴格达附近的哈巴尼亚,以及巴士拉附近的舒艾巴拥有两座空军基地。伊拉克同时也要支持北部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条约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损害了伊拉克的主权,而同时许多库尔德人和宗教少数群体却担心,英国人的撤离或许会使他们失去保护。这种担心在现实中也确实发生了,因为政府开始替换库尔德官员,并强迫学校使用阿拉伯语。此时,穆罕默德·巴拉赞齐再次出现,他于1930年领导了一次起义,英国人也再一次帮助伊拉克进行镇压。这一次,巴拉赞齐的领导地位遭到了致命一击,后来的人们则开始将目光转向谢赫·艾哈迈德·巴拉赞尼和他的兄弟,即与巴拉赞齐形成竞争的苏非派纳克沙班底亚教团的穆拉·穆斯塔法。尽管存在上述挑战,议会还是通过了这项条约,1932年10月,伊拉克正式获得独立。

104

独立的王国

1932年伊拉克的独立以及同一年伊拉克加入国联,无疑是这个现代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一步。不过,政府依然经受着合法化危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对国家屈从于英国十分不满。对这一代人来说,问题不仅在于爱国主义的自豪。他们认为英国对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和农村部落首领阶层的支持,削弱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国家虚弱和落后。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则特别担心阿拉伯逊尼派会继续控制中央权力。

独立之后最重要的制度变迁就是军队的增长。新王国所做的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于1934年颁布征兵法,以扩充军队。军队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天然港湾。军队的军官几乎都是逊尼派,他们视自己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人,羡慕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同时对自己的独立精神非常自豪。1933年,在巴克尔·西德基将军的领导下,军

队要求遏制北部的亚述武装团伙。该武装团伙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所谓的“伊拉克军团”,他们是由英国控制的独立于伊拉克军队的亚述人部队。虽然他们已被政府解散,但他们反对巴格达的控制,拒不交出军队。这场军事行动的后果是300名手无寸铁的亚述村民被屠杀,但它却被编造成针对英国雇佣军的爱国主义胜利。1933年,费萨尔病逝,他的年轻幼稚的儿子加齐继位,君主制由此开始衰弱,这就为军队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更多机会。1936年,西德基发动了其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第一次。由于军队还不够强大,它并没有去直接控制政府,但却在内阁的更迭中起到了政治仲裁者的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伊拉克的政治变得更具分裂性和更加动荡,各种派别都与不同的军官结盟。政治上的分歧总是通过宫廷阴谋得到解决,最具危害性的是,对解决分歧所采用的办法仍是老一套的挑起部落反叛的伎俩。

105

对英国人和他们在伊拉克的同盟者来说,许多因素都要考虑。与军队势力的崛起及其所导致的政治上的动荡相比,英国人更担心的是君主制本身的地位。国王加齐被认为性情鲁莽、脾气暴躁。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加齐明确表达了他对泛阿拉伯分子的支持,如他明确声明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反英起义,不断宣称对科威特拥有主权。当英国与希特勒的战争愈发临近时,加齐却支持亲纳粹分子,以显示与德国的亲近。据信,努里·赛义德这位伊英联盟的坚定支持者曾调查过废除加齐,支持另一位哈桑家族成员的可能性。1939年,加齐死于车祸,许多伊拉克人怀疑英国人曾介入此事。由于加齐的儿子费萨尔二世年纪尚幼,他的叔父阿卜杜勒-伊拉赫被任命为摄政。虽然努里·赛义德与阿卜杜勒-伊拉赫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他们还是联合形成了一个稳固而亲英的领导权,以便控制伊拉克的政治,维持这个残留的君主制。

尽管困难重重,这个积弱的政府最终同意于1937年与伊朗解决边界问题。《伊拉克-伊朗边界条约》也被称作《萨德巴德条约》,该条约承认伊拉克对整个阿拉伯河拥有主权,但要让出伊朗石油出口港阿巴丹附近的水域。此时取得的重要成就还包括伊拉克-叙利亚边界争端问题的

解决,底格里斯河沿岸灌溉工程的完成,通向地中海港口海法的石油管道的开通,以及连接波斯湾与欧洲铁路最后一段的竣工。

反抗

君主制的特别失败之处是它无力为这个新国家的认同创造一种愿景。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意愿之争中,伊拉克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精英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第一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它主要是对殖民统治的反应。阿拉伯民族主义认为,现代伊拉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都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其天然属性不能与一个从摩洛哥延伸至波斯湾的单一的阿拉伯国家相分离。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特性是它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经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看重的是团结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目标,这是带来进步的关键环节。阿拉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冲突的发展,引起了伊拉克的热切关注,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支持阿拉伯团结的有力论据。不过,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于疏离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它同样忽视了国家内部的迫切问题,因为所有其他问题都低于支持阿拉伯统一这一更高目标。这一观念是与伊拉克独特的民族主义相违背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认为,伊拉克国家不仅仅是殖民主义的产物,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人类历史的初曙。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更大的地区统合甚至阿拉伯人的政治统一,但他们更为关注这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如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受压迫状况。伊拉克民族主义更能成功地得到逊尼派阿拉伯民众之外的支持,但它也因为接受殖民者强加的边界以及忽视阿拉伯人的团结而受到批评。但这两种倾向都批评了政府的精英主义以及它对英国人的依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政党只不过是各个显贵追求各自利益的工具。直到二战结束,意识形态上的考量才真正开始形成政治政党的基础。

106

纵观20世纪20年代,君主制统治下历史最悠久的组织是那些分布在巴格达、摩苏尔和巴士拉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其中巴格达泛阿拉伯主义者的"穆泰纳俱乐部",由于吸引了数量众多的军官而尤为重要。

它同时也是二战后成立的“独立党”的前身。独立党的领导人是什叶派,但大部分党员却是城市里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其他重要的泛阿拉伯主义政党还有最初成立于叙利亚的“复兴党”。该党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伊拉克出现,吸引了许多教师和学生,不过它在君主制垮台之前规模一直很小。在这些政治团体之中,强调伊拉克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纲领的是“国家民主党”,该党成立于 1946 年,由极具领袖魅力的卡米尔·查迪尔奇领导。国家民主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阿哈里俱乐部”,具有要求独立、民主、土地改革和建立社会安全系统的基本的社会民主思想。而组织性最强的是“伊拉克共产党”(Iraqi Communist Party,简称 ICP),该党成立于 1934 年,它是伊拉克最具历史的政党,直到今天依然活跃。伊拉克共产党扎根于有知识的社会主义者,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较早发动的劳工运动之中。当时伊拉克社会由大地主所控制,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因此人们尤其愿意接受阶级斗争和社会正义等观念。许多伊拉克人不仅被反英的民族主义所鼓舞,也深受苏联影响,后者的出现被认为是挑战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一种力量。此外,伊拉克共产党高举平等主义和社会正义的旗帜,它把与伊拉克密切相关的大众运动文化调动了起来,这在共产党势力特别强大的南部尤为明显。由于共产党强调了世俗主义和国际主义,它吸引了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伊拉克全体人民。在 1941 年担任领导职务的半传奇人物法赫德领导下,共产党以其严格的组织和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导能力成为伊拉克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反对力量。

107

在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各个团体,最初是远离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但后来却开始支持他们。多数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是由诸如穆罕默德·巴拉赞齐这样的部落或宗教领袖领导的。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领导权却转到了苏非派纳克沙班底亚教团的巴拉赞尼家族手中。该家族最重要的人物是穆拉·穆斯塔法·巴拉赞尼,他在 1945 年组织了一场反对政府干涉库尔德省政府的部落反叛。英国皇家空军又一次来营救巴格达了,他们将穆拉·穆斯塔法和他的战士驱逐到边界另一边的伊朗。这些人在建立库尔德马哈巴德共

和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共和国1946年被伊朗军队摧毁。穆拉·穆斯塔法四处寻求庇护,最后得到苏联的收留,但许多城市知识分子还是反对由部落首领组成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该党起初规模有限且局限在北部的城市中心里,但后来它在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当1939年二战爆发时,所有这些趋势都已经十分明显了。对军队里的军官集团来说,二战是一个极佳的摆脱英国人的机会。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反抗运动被英国人挫败,之后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哈吉·阿明·胡赛尼来到巴格达,两件事都激发了公众的舆论且促使军队采取行动。在抗英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萨拉丁·萨巴格上校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军官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观点,他这样写道:

108

> 我既不相信英国人的民主,也不相信德国人的纳粹主义,同样也不相信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我是一名阿拉伯穆斯林。在自我权利和人生哲学上,我不需要任何替代物。①

1941年4月,在军队的大力支持下,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盖拉尼成为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希望得到轴心国的军事支持,当伊拉克政府拒绝英国按照1930年《英伊条约》的规定让军队穿过伊拉克领土时,他骤然发起了一场行动。随着与英国关系的恶化并走向武装冲突,努里·赛义德和摄政阿卜杜勒-伊拉赫逃离伊拉克。在轴心国不能或许也不愿提供承诺的支持的情况下,英国军队在5月轻松地击败了伊拉克军队,再次占领这个国家。"拉希德运动"尽管短命而且彻底失败了,但却为军队获得了民族主义斗争卫士的声望。之后萨巴格的被害也赋予军队一个象征性的殉国者形象,这赢得了包括伊拉克未来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叔父和养父在内的许多伊拉克人的心。而努里·赛义德和阿卜杜勒-伊拉赫在英国保护下的归来,

---

① 引自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Boulder, 1985, p. 80。

也只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君主制的疏离感。1934 年,好像要强调其亲英倾向的证据似的,新政府对德国宣战,伊拉克也因此成为联合国的创建国之一。

拉希德运动除了没能结束英国人的再次占领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好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子里,伊拉克的犹太人逐渐变得繁盛起来,许多犹太人都接受了犹太人学校的良好教育,他们成为这个年轻国家新的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的重要部分。犹太医生、律师和教师取得的成就很快就与犹太工匠、店主和商人的成就一样明显。在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圈子中,特别在巴勒斯坦当时的局势下,犹太人被认为是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谋者,是伊拉克社会的第五纵队。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犹太人不断受到单独对之采取的攻击,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巨大的恐慌。不过,随着拉希德・阿里政府的垮台,巴格达街头的反英情绪空前高涨。一些四处游荡的准军事集团,此时涌入巴格达支持拉希德政府,他们希望利用英军来临之前的这段权力真空期,发动以“法胡德”(*farhud*)著称的大屠杀。秩序在两天后得到恢复,但在这两天的时间里,150 到 180 名犹太人被屠杀。值得注意的是,有更多的穆斯林在保护他们的犹太邻居时也被杀害。巴格达著名的什叶派领袖赛义德・艾布・哈桑・穆萨维谴责了对犹太人的攻击,并禁止其信徒危害犹太人和掠夺他们的财物。1941 年的大屠杀开启了对伊拉克最古老和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进行清除的序幕,它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在这一事件之后的日子里,伊拉克政府受到了巴勒斯坦对其违背阿拉伯团结的指控,并因此变得孤立和敏感起来,进而趋向制定鼓励反犹的法规。由于大多数反抗行为都受到压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便因为可以在公开场合自由提出伊拉克犹太问题而获益。 109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直到 1950 年之前,伊拉克政府都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状态,故而不能展开任何系统的经济发展规划。那一年,政府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发展机构,它将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样就可以不受各种既定利益的影响。“发

展委员会”成立两年后，国家的石油收入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气候尽管持续动荡，但伊拉克政府还是可以对国家的发展怀有巨大的期待。

对石油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在1927年的基尔库克附近。1934年，仅新开通的沿地中海的从基尔库克到海法的输油管道，就带来了滚滚的商业利益。但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国家从石油中所获得的收益并不大。首先，伊拉克基本是个内陆国，石油出口较为困难，深受与这一不稳定地区邻国关系的制约。这一因素在1948年变得十分明显，那一年以色列建国，海法一段的输油管道便被关闭。其次，外国所拥有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垄断了石油的生产和销售，但当时它并没有兴趣提高石油的产量，因为担心这样做会在石油出口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1952年，伊拉克政府成功地与伊拉克石油公司达成了一项新的利益分成协议。伊朗石油工业的国有化，以及沙特阿拉伯新的五五分成协议，也让伊拉克石油公司认识到要与伊拉克签署一项类似的协议。同一年，新的通往叙利亚海岸巴尼亚斯港口的输油管道开通，石油收入有了进一步提高。第二年，巴士拉附近发现了新的油田。石油收入出现了巨大增长（见表5.1），从1948年占国家总收入的7.5%提高到1958年的61.7%，这意味着伊拉克现在完全依赖于一种为外国利益集团所拥有并控制的商品。对外国依附程度的加剧，使得伊拉克政府固执地拒不将伊拉克第纳尔与英国英镑分离。

110

表5.1　1948—1958年的石油收入

年份	收入（千第纳尔）	百分比
1948	2012	7.5
1950	5286	15.7
1952	37405	47.0
1954	68371	65.7
1956	68859	62.1
1958	79888	61.7

资料来源：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 s Old C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 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 106。Copyright © 197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经普林斯顿大学允许重印。

新成立的发展委员会的政策集中在农业的长期发展上,目的是使之获得最大的投资份额。像治水、蓄水、灌溉等大规模规划压倒了产生即时利益的短期计划。这样的规划需要谨慎使用国家稀有资源。但事后证明,君主制下的国家明显高估了人民等待承诺的果实的意愿。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一开始是十分明显的。新的桥梁、各种公共建筑和一座新的议会大楼建成了。依靠石油收入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伊拉克于 1956 年完成了巴格达北部塞尔萨尔河上的一项庞大的治水工程。伊拉克的耕地面积提高了两倍,这个长期在粮食作物上自产自足的国家甚至开始出口大麦。不过,农村的半封建关系却成为现代农业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地主们因为担心劳动费用上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害怕帮助其获得权位的部落忠诚会瓦解,所以仍然依靠小佃农而不是雇佣劳力,依靠开辟新耕地而不是使用机械化生产提高生产率。农业生产的耗费越来越大,亩产量实际上反而下降了。在石油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只占国家收入的 30%,而农民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70%。国家的农业收入不仅下降了,政府也对人民大众的土地改革要求越来越不关心。

表 5.2　1948—1958 年的土地收入

年份	收入(千第纳尔)	百分比
1948	3 037	11.3
1950	3 963	11.5
1952	3 051	3.8
1954	2 919	2.8
1956	2 190	2.0
1958	2 229	1.7

资料来源: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 106. Copyright © 197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经普林斯顿大学允许重印。

通过表 5.2 中的数字,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尽管农业规模在扩大,但国家在农业收入上的份额按绝对价值计算却下降了。原因主要在于土地税下降了,地主自然从中获益。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农

111 村压迫关系的加重。到1958年,60%的农田为大地主所有,17%的农田仅仅控制在49户人家手中。1932年,国家通过一项法律,将负债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他们生活在泥屋之中,生活水平仅仅高过生存线。农村几乎没有教育、健康保护和卫生设施,农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估计是在35岁到37岁之间,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到君主制末期,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农业的商品化以及农民所受的压迫和赤贫状态,使得150万农民(总人口为650万)失去了土地,许多农民被迫逃往大城市。1958年,超过10万农村移民生活在巴格达附近的由简陋窝棚构成的区域里。农民发现,从事劳务杂役还能提供给他们一份较好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们在大城市里也要受到陌生文化、更明显的阶级差异和互相对抗的政党的支配。在整个君主制期间,居住在简陋窝棚里的人是在政治上最容易被发动起来的群体。

尽管国家投入巨大财力发展社会基础设施,但经济体系完全是私有的。工业的发展很有限,1958年国家的工人只占人口总数的7%,工业产值只占国家收入的10%。教育尤其是城市里的教育在发展,国家成立了一些高等教育学院,它们逐渐被并入国家的大学之中。不过,国家的文盲总数还是很高,1958年时占到人口的85%。农村移民的到来和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的出现,使城市的发展十分明显,人口从1947年的50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80万人。城市化和教育对代沟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在现代学校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试图努力与奥斯曼帝国时期老一代人的传统和理想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国家在民族整合上大步前进。城市化和国家统治的扩展

112 使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愈发密切。对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来说,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越来越普遍,但逊尼派在总体上依然占据着军队官员和公务员群体的大多数。妇女的教育进展也很大。委任统治期间出版了第一本妇女杂志《莱拉》(*Layla*),这本杂志上偶尔会发表一些主张给予妇女更多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文章。二战之后,伊拉克共产党的壮大鼓励了一些妇女组织的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是"妇女权利保护协会"。协会的工作除了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福利外,对全面批评君主制也作出

了贡献。

这些发展也体现在国家充满活力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上。最好的和最为人广泛阅读的是那些不断削弱统治集团之思想基础的反对派的作品,它们抨击了传统价值、政治腐败、民主匮乏、对英国的依附以及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艺术家如哲瓦德·萨利姆获得了国际性声誉,诗人如穆罕默德·马赫迪·贾瓦希里则以其抨击时代恶魔的诗歌让读者感动。他的诗歌《饥饿摇篮曲》是他讽刺风格的典范:

> 睡吧,饥饿的人,睡吧!
> 食物之神在守护着你。
> 如果你不厌烦失眠那就入梦
> 长眠不醒会满足你
> 睡吧,想着如黄油般柔软的承诺,
> 还有如蜜糖般的甜言。
> 入梦且享受这最好的健康
> 对受苦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美事![1]

革命的来临

拉希德运动和英国再次占领的相继发生,让国家的统治更加衰弱。为了安抚反对派,首相努里·赛义德和摄政阿卜杜勒-伊拉赫开始给予人民更多自由。在政府的软弱之外,共产党也从德国入侵苏联以及之后的苏联与美国和英国结盟中多少获益。伊拉克共产党的反应是,暂时不再公开反对英国。不过,在包括国家民主党和独立党在内的一些政党获得国家的许可权时,伊拉克共产党却被拒绝给予这项权利。这一时期,一些工会组织也成立了,它们大多数被共产党所控制。从政治上来说,

113

① Salma Khadra Jayyusi(编), *Modern Arabic Poetry: An Anthology*, New York, 1987, p. 80。

最敏感的工会是那些大型的、由外国控制并经营的工业(如港口、铁路和石油),这些工业中的阶级斗争总是与国家主权问题交织在一起。

不过,上述自由并不是长久的。外国的、地区的和国内的因素都对自由进行了压制,让人困惑不解的政治发展最终也摧毁了君主制。盟国的胜利很快就让位给了冷战,美国和英国开始领导对抗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的斗争。在这种氛围下,伊拉克获得了新的战略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的石油和地理位置,而且因为它是反苏联运动在这一地区的结盟者。政府对伊拉克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态度,自然也受到了消极的影响。二战的发生,使中东地区更加意识到要进行地区的经济合作。1954 年,在伊拉克的帮助下,阿拉伯联盟成立,后来它扩大到包括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国家。然而,地区间的合作却被两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与伊拉克之间的竞争削弱了。1946 年叙利亚的独立使事态更加明朗化,伊拉克很快便提出建立对叙利亚的霸权。努里·赛义德也提出了统一新月沃土之地的思想,同时,阿卜杜勒-伊拉赫也不打算给已经成年的国王让位,他策划着要在大马士革为自己加冕。由于担心丧失主权,叙利亚和黎巴嫩就向埃及寻求保护。除此之外,巴勒斯坦危机也呈现在这一背景之中,人们重点谴责了英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危机的恶化也削弱了人们对英国撑腰的伊拉克政府的支持。在伊拉克国内,共产党的壮大让人们再次呼吁进行社会改革,但这些新运动的中心只局限在为数不多的由外国人控制的大型工厂之中。1946 年,基尔库克的石油工人要求成立工会,同时也希望增加工资。在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之后;一场罢工爆发了,来自当地两个长期不和的部落的工人放下前嫌,共同面对政府军队。罢工最终虽然失败,但这一事件表明,对政府的反抗也能提高国家融合的进程。

所有这些因素在 1948 年达到顶峰,当时国家在大众起义中已经摇摇欲坠,君主制和现存社会秩序都受到了威胁。起义的火花始于政府计划用一个新的、经过"改进的"版本来替代 1930 年备受谴责的《英伊条约》。英国人要求有权在危机时继续使用伊拉克领土(尤其是空军基地),以及只有英国有权训练和装备伊拉克军队。努里·赛义德预感到

会有麻烦,便于 1947 年从首相的位置上辞职。接替他的是在一场让人怀疑的选举中上台,出身低微的什叶派人士萨利赫·贾布尔。这是伊拉克自 17 世纪以来,首次拥有一位什叶派领导人,它为国家带来了某种乐观主义气氛。当贾布尔开始新的一波压制浪潮时,希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即便温和的政党也遭禁止,其领导人被投入狱中。与此同时,来自巴勒斯坦的消息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联合国在 10 月份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两个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公众都被伤害了,英国尤其要为给阿拉伯独立带来最后也是最重一击的这一事件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与英国签署一项新条约是极为不利的。尽管如此,1948 年 1 月,贾布尔放弃了早期的保留态度,在回国面对革命风暴之前于朴次茅斯和英国签订了新条约。

考虑到人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群情激奋,伊拉克政府走出如此一步,确实有些不可思议。《朴次茅斯条约》的签订在很多方面清楚地说明,政治精英已经脱离了民众所关心的问题。人民对此的反应是迅速的,独立党很快就组织了一场学生游行。游行的声势变得愈发壮大,它得到了工人和居住在简陋窝棚里的穷人的支持,而之后发生的镇压活动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伊拉克共产党很快就无可争议地成为这场后来被称作"瓦萨巴"(*Wathba*,意思是跃进)的日渐壮大的起义的领导人。这场运动的激进特点(甚至有人自发地提出建立共和国),以及运动赢得士兵支持的现实让国家感到恐慌,国家遂下令采取极端的手段。1 月 27 日,300—400 名游行示威者在与政府军队的冲突中被杀死。之后不久,萨利赫·贾布尔辞职,政府也正式宣布否决《朴次茅斯条约》。然而,动荡仍在继续,罢工和游行示威一直持续到 5 月,直到以色列宣布建国和随后的阿以战争,才促使伊拉克颁布战争法并有效地结束了起义。伊拉克共产党受到的镇压尤为严酷,包括法赫德在内的一些党员都被杀害了。

"瓦萨巴"之后的事件导致了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危机的出现。伊拉克军队象征性地参加了 1948 年损失惨重的阿以战争,得到的却只有痛苦。许多军官认为,他们的政府腐败不堪且顺从于英帝国主义,其政策

就是要阻止国家有效地援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在这些年轻的军官中，有一个人便是未来共和革命的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

115 巴勒斯坦的事件也为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群体带来了厄运。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对犹太人的侵扰持续上升。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这一过程中主导了政府，他们渴望转移民众的愤怒情绪，默认了那些反对犹太人的措施。1951年，政府同意直接将伊拉克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到第二年，大约16万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但丢下了他们的绝大多数财产。只有6000人留在了伊拉克，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这些犹太人也将离去，这个国家最活跃的和最有能力的一个族群消失了。

1951—1952年间，以下两个事件危及中东每个国家的稳定，同时也加重了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对伊拉克的什叶派依然产生重要影响的伊朗，民族主义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成为首相。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他促成国家通过一项法律，将伊朗的石油工业国有化，并承诺进一步实施民族主义立法以挑战西方的利益。第二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领导军队推翻了埃及的君主制，宣布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并结束国家对外国的依附关系。对许多伊拉克人来说，伊朗和埃及出现的问题与伊拉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就在同一年，伊拉克爆发了一些相互声援的游行示威。伊拉克的统治集团亟需一位新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度过这场风暴。1953年，已经成年的费萨尔二世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变化。费萨尔二世既无经验，性格也不强硬，他仍然深受普遍让人厌恶的阿卜杜勒-伊拉赫(此时已经成为王储)的影响。与此同时，政府也被控制在努里·赛义德手中。在巴格达街头，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年轻的诗人白德尔·沙吉尔·萨彦布，在下面的诗句里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期待：

我几乎能听到，伊拉克正培育雷鸣
在山间和平原储藏闪电，
如果人们再胆敢撕毁誓约

来自赛莫德[1]的劲风
将吹散山谷里的所有痕迹[2]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反对派所提要求的唯一反应似乎就是用一个更为复杂的安全机构来更加严酷地镇压它。如果不是冷战和纳赛尔不断聚集的声望的话,残酷的镇压加上国家在石油收入的推动下所出现的发展,或许有可能真使伊拉克走出危机。在冷战初期,美国采用了通过一系列结盟以包围苏联的战略。美国策划了伊朗首相摩萨台的倒台,此时它转向中东,希望建立类似的结盟。1955 年,美国和英国促成了后来著名的《巴格达条约》的签署,逐渐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纳入到同盟之中。纳赛尔此时已经成为埃及总统,被不结盟运动视作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指责这个结盟是又一个损害中东地区利益的殖民条约。阿拉伯国家看着自己疑心重重的人民,看着声望越来越大的纳赛尔,很快就使自己纷纷脱离了《巴格达条约》。当看到哪怕是最温和的政治家也作好了准备反对伊拉克加入这样一个联盟时,纳赛尔便扔出了另一颗炸弹。纳赛尔的声望在经他斡旋致使英军撤离之后,进一步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扩大,此时他强调要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宣布发起有效清除大地主势力的土地改革。1956 年,他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幸运地击败了以色列、法国和英国的进攻后,纳赛尔的声誉达到顶峰。纳赛尔此刻最终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英雄。他挑战了英国及其同盟者的权力,为埃及赢得了政治和经济独立。

116

伊拉克对此的反应是两方面的。首先,反对党再一次走上街头,发动反对《巴格达条约》和支持纳赛尔的游行和罢工。其次,一些低级军官试图仿效纳赛尔发起自己的“自由军官运动”,推翻君主制。1957 年,运动在军衔最高的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的领导下爆发了。

---

① 赛莫德是前伊斯兰时代的一个部落,《古兰经》中曾提到这个部落,说真主因其邪恶而将之毁灭。

② 引自 Terri Deyoung, *Placing the Poet: Badr Shakir al-Sayyab and Postcolonial Iraq*, Albany, NY, 1998, p. 15。

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结成一个新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使得君主制完全被孤立。伊拉克政府则与约旦一起,创建了一个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竞争的同盟,以作最后的挣扎,但这一联盟根本就没有机会实现。7月14日,自由军官发动袭击,迅速接管了各权力中心和巴格达的通讯。在几个小时之内,君主制就彻底被推翻了。

现代伊拉克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在奥斯曼人统治时期就已显现。在英国委任统治和独立的君主制期间,这一进程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国家的体制改进了,边界明晰了,实质上的进步在发生,民族的融合也在深化,一批新的受过教育的中坚力量获得了各种重要的职位。同时,选举和民主进程成为人们普遍的愿望,政治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宽容,新闻出版也享有了一段明显自由的时期。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家所依赖的却是一个主要由大地主组成的日渐狭窄的社会基础。但是国家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在深化,特别是在石油收入增加后,统治集团也开始无视地主的利益。统治基础的狭窄疏远了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受过教育的中间阶级,后者希望分享更大的权力和财富。而地主的权力则建立在半封建关系和对农民的严酷剥削上。国家的剥削程度之高,以及人们在石油收入增加后涌现出的对国家不断增长的预期,导致政治上的反对派采取了激进行动。而冷战和阿以冲突所产生的国际和地区政治气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激进行为。局势是如此紧张,以至于1958年7月14日的政治行动很快就引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117

第六章　为共和而战：1958—1979 年

118

7 月 14 日的军事政变是迅速、周密和高效的。参与者只有一小部分士兵和 200 名左右的军官。当日清晨 6 点 30 分左右，政变者包围了王宫和电台之后，卡西姆在政变中的得力助手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上校向这个被震惊的国家宣布了君主制的垮台。军队的"第一号公告"这样写道：

> 尊贵而虔信真主的伊拉克人民，在人民之子和国家武装力量的帮助下，我们已经从帝国主义所安置的腐败的政府手中解放了我们深爱的祖国……军队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为你们服务的，它完成了你们心之所想……我们向你们呼告，请向当局举报一切罪犯、叛徒和腐化堕落的人，以便我们彻底将之根除……我们接下来将保证继续为你们的利益服务。国家的权力将委托给一个来自你们且受到你们鼓励的政府。只有创建一个人民的共和国才能实现这一切……为此，新的国民政府将被称作伊拉克共和国。①

---

① 引自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1978, p. 802。

军队行动的消息一经传开，数千名主要来自贫穷的街道和简易窝棚里的民众便涌上街头，前往旧制度的象征：王宫、努里·赛义德的府邸和英国领事馆。费萨尔一世和莫德将军的塑像被喜怒交加的人们当场捣毁。作为唯一有影响力的大众政党，共产党立即呼唤党员们走上街头，给群众有效的指导。群众的热情参与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阻止了仍然忠于国王的军队的任何可能行动。群众行动的本质虽然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但它明显被一种强烈的民族理想主义所驱动，没有降格为宗派暴力或失控的抢劫。清晨 8 点整，国王、摄政和大多数王室成员都被处死。第二天早晨，旧制度的顽固分子努里·赛义德在试图逃跑时被捕，被当场击毙。暴民们将他和阿卜杜勒-伊拉赫的尸体扯成碎块，然后再放火焚烧。

不过，群众巨大的愤怒并没能得到释放。由于担心社会秩序会完全崩溃和失控，军官们呼吁人民冷静下来。军队先是颁布了战争法，随后又发布了宵禁令。7 月 14 日群众参与的性质和作用，以及新制度所带来的变化，将军队的接管转变成一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在接下来的 10 到 15 年的时间里，伊拉克将目睹这个国家在走上新方向时所发生的剧烈的斗争。君主制虽然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摧毁，但人民还远不能看清新共和国的实质。

革命所带来的变化

与他们的埃及同路人一样，伊拉克自由军官的政治倾向十分复杂。他们都同意推翻"腐败"的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结束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并解决社会不平等这个问题，但是一俟他们坐下来去面对这些要解决的问题时，就出现了目标上的严重分歧。在埃及，类似的分歧通过内部清洗而得到解决。但在伊拉克，这些分歧却迸发成暴力冲突。不过，在统治集团逐渐分裂之前，新政府确实努力让许多领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在全国大选举行之前，国家总统的事务由一个三人领导委员会负责。委员会只是仪式性的，并没有真正的实权，但



图 6.1　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右)与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中)和巴格达大学校长阿卜杜勒-贾巴尔·阿卜杜拉博士(左一)在一起。虽然卡西姆的许多改革都受到欢迎,但他在政治上和行政上却是孤立的,这导致他的政权最终垮台。

其成员,一位什叶派、一位逊尼派和一位库尔德人,却象征着在这个国家分离的族群中创建平等的意愿。君主制下的议会被解散了,临时法专门宣布了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同为伙伴关系。卡西姆兼任总理、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军衔低于某些自由军官的阿里夫担任国家副总理、内务部长和军队副司令。政府内阁的代表囊括了所有反对力量,尤其是国家民主党的代表,代表中亦包括杰出的库尔德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巴拉赞齐的儿子。君主制期间妇女权利运动的领导人纳齐雅·杜拉伊米博士于1959 年被任命为市政部部长。她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位担任部长级别的女性。共产党从革命之后普遍自由的气氛中获益甚大,他们虽然不被官方承认,但却很快领导了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共产党员通过组织群众游行,进而控制"街头"的作用十分明显,他们赋予革命一种明显的左派表现。 120

这种代表制和平民主导的内阁让新政府获得了稳固的合法性基础,

使之能够发起一些改革。政府宣布进行大赦,所有政治犯都被释放。流亡在外的老派人物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和穆拉·穆斯塔法·巴拉赞尼(他被认为控制着库尔德民主党)都得以回国。花费在健康、教育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款项,是君主制时期最后一次预算的两倍,新的对租金所采取的控制也有利于穷人。尽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对伊拉克共产党的影响在不断增强,但这些改革并不是在苏联的鼓舞下进行的。卡西姆在一些场合常常说,革命的目标是“在不危及富人应有的121 生活标准的前提下,提高穷人的境遇”。[①] 受卡西姆这种混合着逊尼派和什叶派背景的影响,伊拉克国家的世俗本质受到人们的称赞,这尤其表现在个人的法律地位和教育上。通过严格限制宗教法庭处理事务的权限,以及扩大单一法律面前的平等范围,国家的整合程度得到提高。严格控制一夫多妻制是彻底根除这种婚俗的第一步。男人随意离婚是违法的,童婚也是违法的。从伊斯兰教法的角度看,最引发争议的立法是男女享有同样的继承权。教育上的投入也有了巨大增加,各级别学校的入学率都得到提高。组建并扩大巴格达大学的新倡议得到执行,阿卜杜勒-贾巴尔·阿卜杜拉博士被任命为大学的校长。阿卜杜拉博士是一位受人欢迎的物理学家,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来自曼达派少数族群。

在所有发展规划中,城市的发展居于优先位置,但大多数革命性改革涉及对农村关系的彻底改造。人们期待已久的国家土地改革法颁布了。该法仿效了埃及的土地法,它设定了拥有土地的最高上限,超过最高上限的土地要予以没收(但会给予补偿),没收的土地则分给无地的农民。在新土地法正式颁布之前,大地产盛行的库特和阿马拉地区的农民就已经开始亲自动手夺取土地和焚毁地主的财政记录。这场“第二次农村革命”对伊拉克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从根本上摧毁了在君主制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到 1971 年,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不过,农业生产却遭到打击。导致这种现

① 引自 Uriel Dann, *Iraq Under Qassem: A Political History, 1958—1963*, New York, 1969, p. 14。

象发生的最初原因是混乱以及伴随混乱自然而然发生的激进社会转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偏重城市经济发展和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所带来的明显转变。1960 年，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7%，到了 1980 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8%。君主制时期的谷物出口国，到这时已经变成粮食的净进口国，并占国内进口需要的 70%。国内的混乱以及伴随着混乱发生的早期土地改革，也加剧了已经让人感到担忧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的趋势。

在工业领域，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是要明显避免的。政府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便更好地保护民族工业。其结果是某些消费工业得到了发展，如法塔赫·帕夏的毛毯业。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引导着国家的政策，如进一步加大对国家资源的控制。这在国家重要的工业部门石油业中尤为明显。在经过与各大石油公司一系列紧张的谈判后，政府通过了《第 80 号法律》，宣布没收伊拉克石油公司 99.5% 的特许油田，只允许其保留基尔库克油田。但伊拉克石油公司从未接受这项法律，它试图通过破坏生产予以回击。尽管如此，这项法律被证明还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它为伊拉克最终完全控制其主要经济财富搭建了一个平台。民族主义在国家力图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姿态时也表现得十分明显。1959 年，伊拉克退出了《巴格达条约》和英镑区，与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全面建交。在阿拉伯世界之内，伊拉克成为阿尔及利亚和尚在形成中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重要援助国。 122

对革命的反应

变革在国内外都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约旦、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君主们都担心自己国家内的共和呼声。英国在为它的石油利益忧心忡忡，美国也惊恐于伊拉克共产党的壮大和苏维埃影响的扩张。作为对伊拉克革命反应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在黎巴嫩登陆，以支持这里的政府。就伊拉克国内而言，从君主主义者、大地主到宗教领袖和部落首领等各式各样的保守分子，渐渐组成了一个反对集团。这些人一开始在力量上很软弱，也为革命的盛行而担惊受怕，但他们却逐渐能够利用自由军官内部

的分歧,以及现存体制内两大重要人物卡西姆和阿里夫之间日渐深化的矛盾。卡西姆和阿里夫的矛盾从表面上看是与埃及和叙利亚结盟问题引起的,但两人之间的争斗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卡西姆和阿里夫都表现出对国家制度的忽视,并且都强调了个人统治在管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而言,两人都暴露出他们最明显的弱点,即不能为早期共和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基础。或许他们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尽管都很受欢迎,但支撑他们的有组织的基础是狭窄的,他们也没有为扩大这个基础而做太多的工作。卡西姆在驱逐了他的竞争者之后,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但他主要的支持者却仅限于军队。纵观其统治时期,卡西姆总是身着军装,他更多的是在国防部而不是首相的办公室里。卡西姆在思想上更接近国家民主党,但大多数国家民主党党员在对民主改革的进度感到失望后都退了党。群众基础迅速扩大的共产党渴望与卡西姆联合,但后者却怀疑其动机,也不为其意识形态所动。尽管伊拉克共产党始终忠于卡西姆,但它还是被卡西姆有意回避,最终遭到了镇压。

123

阿里夫则是一个纳赛尔主义者,狂热支持阿拉伯的统一和反对共产主义。他呼吁即刻与纳赛尔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统一,这使他很快就将所有反对卡西姆的力量集合起来。卡西姆不主张马上与埃及统一,因为这将使伊拉克屈从于纳赛尔的独裁统治,他呼吁组建一个权力更为下放的联邦。不管他们各自的理由是什么,当泛阿拉伯主义者于 1963 年夺取政权后,他们就明显不再实现统一的承诺,任这件事情渐渐退去。在 1958 年这个多事之秋的前一年,卡西姆就面对着一系列军事政变的企图。比如,君主制期间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就在一场由部分部落首领支持的政变中被挫败。1959 年 3 月,一场由纳赛尔公开支持的政变在摩苏尔失败。之后基尔库克便发生了库尔德人与土库曼人之间的种族暴力冲突,一些共产党员也卷入其中。10 月,复兴党试着在卡西姆的轿车驶过巴格达时暗杀他。萨达姆·侯赛因就是这次没能成功的暗杀行动的参与者之一,他们后来逃到了埃及。

一系列的政变和阴谋给政权带来了危害,也影响到日渐多疑和孤立

的卡西姆。政府扩大了抓捕范围，包括伊拉克共产党和国家民主党党员都受到缉捕，一些报纸也被查封。政府还试图控制商会，但没有完全成功。1960 年，在表现了最初的友善之后，卡西姆与穆拉·穆斯塔法·巴拉赞尼的关系恶化了。当时，库尔德人的领导权仍把持在部落将领手中，他们担心土地改革和中央权力会扩展到北部地区来。卡西姆出于自身的考虑，试图分裂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并孤立巴拉赞尼。双方之间最终爆发了战争，到 1961 年 2 月，三分之二的伊拉克军队陷入北部的群山中不能自拔。就在这场战争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影响时，两起地区性事件的发生也加剧了伊拉克普遍的动荡氛围。首先，叙利亚的一些军官夺取了国家权力，宣布国家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尽管这一事件证明了卡西姆拒绝加入这个失败的同盟是正确的，但叙利亚的退出却加重了地区间的紧张关系，并增加了埃及人的仇恨。与此相比，1961 年卡西姆兼并科威特的尝试，后果却更为严重。那一年，英国答应科威特独立，但卡西姆拒绝承认这个新国家，相反他宣称伊拉克对这个海湾酋长国拥有主权。之后，科威特请求英国军队前来替换由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组成的联军。虽然没有发生军事行动，但科威特事件将不必要的压力放在了这个已经不堪重负的国家身上，它严重破坏了伊拉克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

124

1962 年，卡西姆彻底成为被孤立的领导人。他始终保持着其忠于国家，以及运用自己的权力为国家赢得更大福利的声誉。与其后继者相比，他的那些非民主的言行很快就显得相形见绌。卡西姆需要群众的有效支持，但他却不能或不愿将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并赋予其权力，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复兴党

阿拉伯复兴党于 1944 年成立于叙利亚，它后来推翻了卡西姆政府，并最终完全统治了伊拉克。该党（后来被称作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基本思想宗旨由在法国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米歇尔·阿弗拉克确立。复兴党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上，这场运动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反欧洲殖民主义的浪潮中。复兴党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的政党,它呼吁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以及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该党有着一个高度中央化的组织,它将成为阿拉伯人民争取统一和独立的领导者。为了强调其对人为分裂阿拉伯世界的"殖民边界"的抵制,复兴党有着一个泛阿拉伯的结构。其领导小组被称作民族指挥部,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区指挥部。每个地区代表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复兴党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由叙利亚教师传到伊拉克。早期的党员中有一位什叶派教师福阿德·里卡比,他后来成为复兴党在伊拉克的第一位领导人。在整个君主制期间,复兴党的规模很小且微不足道,但在1958年革命之后却具有了某种重要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瓦解后,复兴党经历了几次分裂,最终形成了两个分离且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的根基分别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种情况形成于1966年,至今没有任何变化。叙利亚的复兴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都宣称自己代表了党的真正路线,但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地区竞争下,两个复兴党的裂痕始终存在。

复兴党的思想是含混不清的,它体现了一种矛盾的纠结。分析一下125 复兴党的基本口号"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或许会大有裨益。"统一"指的是坚信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其基础有时是指阿拉伯的语言与历史,但更多地被描述为一种能够界定其本质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所谓的单一阿拉伯国家在疆域上从摩洛哥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是最重要的目标,其他的任何考量都是次要的。因此,复兴党的其他重要口号是"建立单一的阿拉伯国家是永恒的天职"。可是,就是这个"永恒的天职",其含义也是模糊的。复兴党在20世纪60年代的分裂,以及该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相邻的国家都获得权力后依然不能促成一种联盟,使党的这一目标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自由"与民主改革这样的政治自由并没有关系,它其实是指摆脱外国统治的自由。因此,复兴党强调了坚决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要求,而犹太复国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最危险的表现。斗争的对象还包括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当地的代理人,以

及本民族的叛徒。斗争中蕴含着对军国主义话语的一贯使用,也让人看到了不断与仇视阿拉伯民族的外国势力长期抗争的图景,这一点从复兴党政治报告的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

> 我们必须做好身心两方面的准备,以便将阿拉伯人的生活与长期抗争的迫切需要完全联系起来。经济、政治与日常生活都要听从指挥,以引导阿拉伯人在战场上战斗。①

虽然复兴党偶尔也会与共产党形成联合,但它基本上还是对共产党怀有敌意,因为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外国"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危及了民族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社会主义"与财富的平均分配没有任何关系。社会主义最初被复兴党仅仅描述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用阿弗拉克的话说就是"国家的经济财富属于国家"。②

阿里夫兄弟的统治

1963 年,在复兴党的领导下以及包括阿里夫在内的一批不抱幻想的军官的支持下,一场推翻卡西姆的军事政变发生了。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泛阿拉伯理想的驱动,但更紧迫的任务是要消灭共产党。由于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复兴党很快成立了一支准军事性质的国民卫队,以完成令人可怖的、挨家挨户的杀戮或逮捕那些知名的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卡西姆和他的一些追随者都在这次斗争中被杀。按照卡西姆的性格,他起初的确拒绝群众拿起武器保护他。激烈的巷战持续了几天,街道上的穷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共产党的大多数骨干都已被卡西姆投入监狱,共产党的抵抗也就很难持续下去。运动场和学校都变成了集中营和审讯中心,最臭名昭著的一个设在阿卜杜勒-伊拉赫位于巴格 126

① 引自 Marion Farouk-Sluglett 和 Peter Sluglett, "Iraqi Ba'thism: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载于 CARDRI, *Saddam's Iraq, Revolution or Reaction?*, London, 1986, p. 94。

② 引自同上书,第 103 页。



图6.2 1963年夺取政权不久后的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
Topham Picturepoint

达的旧别墅里，名字被改为“末日宫殿”（*Qasr al-Nihaya*）。在军事政变的第一个星期内，有3000到5000人被杀，数千人被拘留。考虑到冷战的127 气候以及担心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和法国情报部门对这场政变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经过这次打击后，伊拉克共产党确实再也没有恢复其以往的力量，而内部的分裂又使之更加衰弱，它无力再给新政权带来重要的威胁。

尽管总统阿里夫不是复兴党党员，但新政府却完全被复兴党所控制。考虑到仍然需要军队的支持，阿里夫被认为是政变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艾哈迈德·哈桑这位较少受到拥戴的复兴党军官成为总理。由于

复兴党的势力在国民卫队中不断扩大,阿里夫与其泛阿拉伯主义支持者的联盟很快就与复兴党的关系紧张起来,甚至到了破裂边缘。国民卫队很少受到训练,他们难以被控制,有着犯罪活动的倾向,更像是一帮匪徒而不是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力量。人民对国民卫队的普遍仇恨以及复兴党内部不断加深的分裂,使阿里夫有机会将国民卫队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并进行直接的军事管制。国民卫队被解散,重要的复兴党党员也被投入监狱,对人民的普遍性压制也有所减轻。由于与军队有着诸多关系,并且包括阿里夫在内的多数军官都是逊尼派,因此逊尼派复兴党党员能够免遭迫害,他们只受到较轻的处罚,也没有人被判入狱。这种情况使得复兴党内来自逊尼派占多数的提克里特派系很容易在党内形成支配地位。负责围绕以提克里特为领导中心来重组复兴党的两个人分别是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1966 年,贝克尔成为复兴党的正式领导人。

阿里夫的政权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上,甚至比卡西姆的政权还不稳定。由于缺乏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阿里夫试图通过倚重他的来自拉马迪地区祖梅拉部落的亲戚,来形成自己的统治基础。他早期的行动之一是承认科威特的独立,但是两国之间确切的边界并没有划定。他呼吁与埃及和叙利亚结成新的同盟,企图以此来增强其政府的合法性。1963 年到 1964 年之间,三个国家召开了几次统一大会,除了象征性地采用统一的国旗和国歌外,并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原因在于,纳赛尔在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后变得加小心谨慎,而由权力分配的方式所引发的分歧最终使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严肃讨论不了了之。不过,纳赛尔主义对伊拉克新政权的国内政策还是有着明显的影响。1964 年,政府宣布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国有化政策。银行、保险公司、大型工厂和国家绝大多数的对外贸易都被国家直接控制。从本质上来说,国有化是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它通过将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进而可以对选中的规划进行再投资。与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这一办法很快就引起资本外逃和管理不当,其结果就是经济的萧条。政府在随后几年便从这一政策中退出。石油工业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政府成立了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 128

并与苏联签署了帮助开发南部油田的协议。尽管如此,政权的不稳定还是限制了其有效性。1964—1968 年间,伊拉克先后任命了 5 位工业部部长、7 位公共建设部部长、6 位计划部部长和 6 位农业改革部部长。

复兴党政变后几个月,阿里夫政权也面临着曾经导致卡西姆垮台的库尔德问题。新政权的泛阿拉伯主义倾向,使人们不能期望它过多地表现出对库尔德民族意愿的同情。不过,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巴拉赞尼却暗中保证支持库尔德独立的谋划者们,一旦他们夺取权力,就宣布在库尔德地区停火。他期望以此行为换来库尔德人的更好待遇,以及在保障北部库尔德人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去试着解决这些分歧。但是,巴拉赞尼与政府的对话再一次破裂了,双方之间的战斗也再次打响。政府对库尔德地区发动了几次进攻,却均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在政府与库尔德人的这场冲突中,库尔德人阵营里原有的意识形态分裂和部落分裂更加明显了,原因就在于贾拉勒·塔拉巴尼成为巴拉赞尼重要的竞争者。战争在艰难地进行,这一次它又削弱了政权。最终决定政权命运的是另外两起事件。1966 年,阿里夫死于直升机空难。他那充满活力,有时却强硬的个性是国家摇摇欲坠的联合得以为继的原因。阿里夫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夫因为性格十分软弱,因而成为唯一能被军队里的各个派系所接受的候选人。另一起事件是 1967 年的阿以战争。以色列压倒一切的胜利让阿拉伯世界开始慌乱起来,也让纳赛尔和所有支持其路线的人蒙羞。除了象征性的参与军事行动并与美国和英国断交外,伊拉克并没有在这次战争中出太大的力。第二年,经过重组的复兴党发动了一场基本没有流血的军事政变。复兴党在开始时还需要复兴党之外的将领帮助,但当它夺取了政权后,就将所有异己驱逐出联盟,以便能够完全控制政府。

复兴党重掌政权

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党依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它却能够比 1963 年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组织也更为严格。为了阻止内部分裂的再次出现,萨达姆·侯赛因被委托去组建党

内的安全机构,这些机构成为其个人权力在党内的基础。党的总书记贝克尔同时兼任国家总统、总理以及武装军队总指挥的职务。他同时也是政府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导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简称 RCC)的主席。萨达姆·侯赛因担任党的副书记和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副主席。虽然夺权在实际上是没有流血的,但随后复兴党指挥下的镇压浪潮却直接针对共产党,因为后者已经开始显现出复兴的迹象。此时,伊朗国王利用伊拉克政局的不稳定,突然宣布废除 1937 年的萨德巴德边界条约。伊朗派出巡逻艇去执行国王的要求,即两国应当以阿拉伯河的中段为界。伊朗的这一侵略姿态部分是为了竭力尝试填补英国人离去后波斯湾的权力真空。伊拉克与其阿拉伯邻国间的关系这时也紧张起来。复兴党通过外交辞令继续谴责约旦和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反动的”君主制。1966 年伊拉克复兴党与叙利亚复兴党的分裂,使这两个传统的地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双重威胁下,复兴党试图扩大其支持者的基础,或者至少去赢得人民的默认。

1969—1970 年间,国家通过了第二部土地改革法,它进一步降低了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更强调土地的分配,并主张建立合作社与国家农场。这些措施虽然对提高农业产量没有多大帮助,但它完成了始于 1958 年土地改革的向农民无地状态开战的进程。1970 年 3 月一项更受民众欢迎的措施被采用,政府宣布与巴拉赞尼达成协议,以最终解决库尔德人问题。协议特别强调了要建立库尔德人自治区,它可以拥有自己的选举产生的议会。库尔德语和阿拉伯语同时被承认为这一地区的官方语言,一位库尔德人还成为国家的副总统。不过,最终解决这一破坏性冲突的喜悦很快就消退了。库尔德人仍然担心巴格达当局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会在意库尔德脱离国家。1972 年,政府与苏联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这一行动使政权赢得了重要的国际支持,也有助于安抚伊拉克共产党。1974 年,伊拉克共产党与其他组织(不包括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同意加入复兴党领导的全国进步阵线。共产党在内阁中拥有了一个席位,且被允许出版一份日报。

130　这一时期,复兴党政府最重要的成就或许是1972年国家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最初只有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特权被国家收回,但在1973年阿以战争结束后,其他的外国财产也被收回。采取这些措施的时机是很偶然的。因为苏联的技术援助尽管十分重要,但政府更多地是从1973年所谓阿拉伯石油禁运后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获益。石油产量的削减是为了惩罚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虽然这一措施对阿以冲突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它的确提升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权力和形象。随着石油价格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节节攀升,石油工业的卡特尔也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的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6亿美元飙升至1976年的85亿美元和1980年的265亿美元。南部油田的发展和北部油田产量的扩大,使伊拉克成为海湾地区的第二大产油国。

不过这种财富也是一柄双刃剑。政府现在可以对需要发展的工业项目投入巨资,经济上的数据也普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伊拉克的官员甚至宣称,国家已经做好准备,将在20世纪末进入次级工业化国家行列。大多数的工业发展都与石油工业有关,如石油化工产业,但肥料生产和钢铁业也得到政府的投资。除此之外,巨额的石油收入意味着国家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一种单一的商品。到1980年,石油收入占到外汇收入的98%,占国家收入的90%。与此同时,国家的石油业却是很脆弱的,因为伊拉克依然缺乏可以依赖的出海口以保障石油业的安全。伊拉克几乎是一个内陆国,出口仍然依靠与邻国的关系。为了使这一情况得到缓解,南部的港口设施得到扩大,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今,这笔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国家的手中。作为一个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工业,石油业几乎不用去依靠其他的工业部门,石油业使国家能够脱离社会,获得高度的自主权。

集权主义国家的建立

复兴党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多方面是显著的。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村的供电率达到75%,城乡之间的平衡已经被彻底扭转。1957年,有38.8%的人口生活在主要的城市区,1983年则增加到75%。仅巴

格达一个城市就生活着全国27%的人口。健康条件的提高以及几乎是完全免费的医疗,使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得到提高,1958—1983年间,伊拉克人口增加了一倍,总数达到1400万。1979 年,联合国授予伊拉克一项特别承认奖,鼓励其发动的轰轰烈烈的识字运动。免费教育扩展到了各个层次,女性成为学生群体数量不断增长的主体。大众生活的综合指标得到提高,人均收入从 1968 年的 96.9 伊拉克第纳尔增加到 1973 年的 135.5 第纳尔以及 1979 年的 825.9 第纳尔。这样的成就,使得政府比之前任何政府都更有能力扩大自己对社会的控制。石油工业也将国家转变成最大的雇主。1974 年,伊拉克通过一项法律,保障一切工作的权利。由于大多数工作都属于国有部门,因此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约 40%的伊拉克家庭的收入都直接依赖国家。国家的大量投资也使私有企业获益,在复兴党统治时期,私有企业的发展也很明显。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复兴党对国家的镇压机器投入甚巨。到 1978 年,所有国家雇员中的整整 20%为一个或几个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军队人数从 1958 年的 5 万人扩大到 1970 年代中期的 20 万人,军队的装备主要来自苏联和法国。

政府在获得稳定后,就开始执行复兴党的一套成体系的政策。在党的直接控制下,一批民众协会成立了,它们为社会不同部门提供联系,并积极宣传复兴党的意识形态。这些协会中有教授协会、工人协会、学生协会、青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和农民协会。协会成员可以得到各种好处,他们作为社区的领导人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不受党的控制的协会是要被禁止的。每个街道都有一个地方党委会,负责详细记录每家每户的情况。非复兴党党员不得担任公职和在多数大学任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党与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为了把复兴党的教导用于正规军中,党努力创建所谓的"思想坚定的军队"。不值得信赖的军官一定要被清除,到 1980 年,所有的军官都已是复兴党员。儿童要在青年旅中接受军事训练,妇女则可以参加一个单独建制的"人民军"。学校的课程也被修改,以便纳入党的有力教导,新课程强调了战斗精神、对秩序的热爱、对外国人的怀疑,最为重要的是要忠于现存的政权。用萨达姆·侯赛

因的话说就是：

132 为了阻止父母以落后的手段管教家庭，我们必须让小孩子从内心去抵制父母。一些父亲由于种种原因逃跑了，但是小孩子仍然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将之转变成家庭中能发挥作用的辐射中心……除了使用其他手段，你也必须用孩子们去包围他们的家长。如果孩子听到他的父母在谈论国家机密，就教会孩子去反对他的父母，并警告他的父母这样做是错误的……你必须在每个角落都安置一个革命之子，他有着值得信任的眼睛和坚强的思想，可以接受来自革命负责中心的教导。[①]

监视人民的安全部门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之间也互相监视。这些处于阴影之中的部门的主管人大多来自所谓“阿拉伯逊尼派三角区”的外省城市，其覆盖地区从巴格达、摩苏尔和伊拉克西部，延伸至叙利亚边界。安全部门人员的部落特性是他们绝对效忠主管人（主管人通常是他们的亲属）尤其是萨达姆的基础，萨达姆负责监管安全部门的发展。安全部门成员贫穷的农村背景，使他们具有一种渴望过上好生活的意愿。用伊萨姆·卡法吉的话说就是：“无须洗脑就可以将新成员对稳定的城市居民，尤其是伊拉克市民奢华生活方式的嫉妒，转变成一种对某些人的感激和忠诚，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去征服其他城市。”[②]对反对派残酷地施加酷刑和死刑变得越来越普遍。惩罚反对派的家人和亲属的政策，让社区之间的分裂更加严重。人们的一切会谈与交往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一位外国记者在 1984 年写道，“大多数外国居民都坦陈感受到了幽闭恐怖症”：

---

① 引自 Samir al-Khalil, *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 Berkeley, 1989, pp. 77—78。

② Isam al-Khafaji, “State Terror and the Degradation of Politics”, 载于 Fran Hazelton, *Iraq Since the Gulf War: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London, 1994, p. 25。

按照那些在伊拉克工作的外交官和其他外国人的看法,不管对外国人监视的程度如何,它都远远比不上统治集团对人民控制的程度。"有这么一种感觉,至少有300万伊拉克人在监视其他的110万伊拉克人"……安全部门对社会的渗透程度之深,以至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①

这些政策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个人不再属于部落、宗教团体,独立的市民机构也不被允许出现,个人因而直接与控制一切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由于石油收入的增加,国家成为国内最大的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对各种各样规划的切实欲望,国家雇佣了一支由企业家、承包商和经纪人组成的大军,以便与外国公司建立联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不提供任何产出的寄生阶级,成为政权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主要靠的是与政府和党内有权人物的良好关系(通常基于亲属关系和地域联系)。国家也依靠这种方式,通过给予这些人利润丰厚的合同,从而获得他们的忠心。合同多分派给进口的商品,从消费品、食品到机器和建筑材料,无所不包。到1980年,建筑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超过了制造业和农业。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对外贸易业急速发展起来。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尽管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133

集权主义国家的发展自然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复兴党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依然处于巴拉赞尼的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下的库尔德民族运动。在1970年签署一项给予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的协议后不久,与这个地区的确切边界相关的争议就出现了。争议的焦点是盛产石油的基尔库克地区。库尔德民主党正确地指出,政府正在迫使数千库尔德人家庭搬离此处,以便努力改变这里的种族构成,从而使政府取消自治区的行为合法化。1974年战争爆发,巴格达再次派军队进攻这里,局势形成僵持。不过,这次事态的进程并不有利于库尔德人。很多年以来,库尔德

① 引自前页注②所引书,第62—63页。

人的抵抗都仰仗伊朗政府的支持,伊朗政府尽管也采用了压制本国库尔德人的政策,但它十分渴望破坏伊拉克的稳定。1975年,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朗国王在阿尔及尔举行会晤并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放弃对阿拉伯河的权利,承认阿拉伯河的中端是两国的分界线。作为回报,伊朗国王承诺终止对库尔德人运动的一切援助并关闭边界,以阻止武器的转移和拒绝库尔德战士在撤退时为之提供避难场所。库尔德人的抵抗几乎是立刻就瓦解了。巴拉赞尼最后逃到了美国,他于1979年逝世。紧接着伊拉克政府采取了强硬而残忍的种族清洗政策,旨在将与土耳其和伊朗交界的库尔德村落全部消灭。到1978年,估计有20万库尔德人被迁移,许多村庄被毁灭。政府在库尔德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以摧毁库尔德军事领袖的力量,政府还鼓励阿拉伯部落在北部定居。阿拉伯语再次成为政府和教育的唯一用语。这次打击导致库尔德民族运动在两个主要政党兴起后进行了重组。原先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现在由巴拉赞尼的两个儿子领导,新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也在贾拉勒·塔拉巴尼的领导下成立。在击败库尔德人之后,伊拉克共产党就开始受到不断的侵扰。1979年,在政府追捕和大多数党员被投入监狱或被杀的情况下,伊拉克共产党退出了全国进步阵线并转入地下。由于埃及因与以色列签订和约而遭孤立,在这种背景下,伊拉克的地区影响力就显得尤为强大。但到当时为止,伊拉克在阿以冲突上的立场一直非常极端,这使它与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1978年,伊拉克作为东道国召开了阿拉伯国家元首紧急会议,组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抗埃及-以色列和约的反对集团。这次会议为伊拉克提供了改进与其邻国关系,特别是约旦和海湾国家关系的契机。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关系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两国边界得到开放,两国政府甚至宣布他们愿意结成一个联盟。不过,这种关系很快就因为谁将领导计划中联盟这一问题而变得糟糕起来。

134

由军队发动的1958年革命最初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因为它消灭了大地主的政治权力,为更多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国际关系方面,

革命采取了更加独立的态度,并让国家走上了完全控制石油产业的道路。民族团结显得更加紧密,这在革命之后的头两年中尤为明显。革命之后,伊拉克陷入到十年剧烈的权力斗争中。这些权力之争通常表达了革命重要参与者个人的野心,他们试图填补君主制垮台后留下的空白。但是,他们也卷入到与共和国未来的性质、它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何种制度最适于领导这场转变等意识形态之争中。尽管目标重在夺取城市的权力,但十年动荡中大多数重要的参与者都有着外省农村的背景,他们因而具有非常强烈的部落团结观念。在这种政治动荡的气氛中,国家的团结开始受到伤害。1968 年之后,复兴党力图取代军队,使自己成为国家首要的机构。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这位与原先的自由军官运动有关联的军官和复兴党领导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代表这个转型时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军队和政党的权力都逐渐让位给萨达姆·侯赛因的安全部门。安全部门已经成为持续不断的权力之争和各种阴谋诡计所带来的恐惧的不可或缺的根源。安全部门虽然与复兴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倾向于淡化意识形态,强调控制与服从。当贝克尔由于健康原因于 1979 年辞职后,国家最后的转变发生了。贝克尔将自己的权位让给了忠于其在安全部门所扮演的角色的萨达姆·侯赛因,后者最终拥有了绝对的独裁权力,复兴党也最终失去了与其意识形态相关的一切东西。

第七章　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1979—2003年

136

萨达姆·侯赛因担任总统之后就即刻开始对政府和复兴党进行大规模清洗。一个又一个为萨达姆效力数十年的官员鱼贯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萨达姆冷眼看着他们作出参与叙利亚"阴谋"反对伊拉克的"忏悔"。这场让人感到恐惧的电视转播一结束，超过22名官员就被立即处决，其他人则被长期投入监狱。与叙利亚刚刚改善的关系自然又急剧恶化起来。在除掉所有对手之后，萨达姆安排了国家自1958年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由于不允许重要的反对派参加，这次选举完全是欺骗性的。国民议会是一个无权的实体，基本上对总统的决定一概接受。在接下来的24年里，独裁统治将把伊拉克拖入数次痛苦的战争、使国家瘫痪的国际制裁和恐怖统治之中，它给国家的民族团结带来了危害。

萨达姆·侯赛因的上台伴随着空前的个人崇拜。他的照片出现在每一份报纸上，有关他形象的巨幅壁画覆盖在所有建筑物之上。伊拉克人开玩笑说，萨达姆具有英雄色彩的塑像已经足够多了，可以确保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每户人家都被要求展示他的画像，他的生日成为全国性的庆祝节日。不管是城市、街道抑或会堂还是奖学金，一切东西都可以以他的名字命名。萨达姆被认为是现代伊拉克的拉希德哈里发，他甚至还

超过了这位经常悄然走出宫殿来到臣民中间,有着神话般形象的仁慈的哈里发。每天晚上人们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出现在国家各地,与农民交谈、在访问“事先无准备”的工人阶级家庭时喝着茶、与中学生一起上 137 课、低调地走访医院以确保公众能得到恰当的治疗。萨达姆被视为一切事物的权威,遍及哲学、艺术、婚姻和孩子的抚养。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一样,伊拉克电视上播放的对礼拜活动的呼告也经常伴随着对古兰经段落和先知话语的引用。但在萨达姆的统治下,礼拜还伴随着对萨达姆众多演讲的引用。所有歌手都希望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能够演唱一首颂扬“伟大领袖”、“革命思想”和“骑士”的原创歌曲。学生们被教导在提及萨达姆的名字后要加上一句“愿真主保佑他”。历史书也很快被重写,以表明他是这个国家近期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的中心——他是伊拉克和阿拉伯人的真正英雄。在一部反映其生平的影片完成之后,扮演他的演员就被严格限制不得在将来饰演其他角色。这位演员后来被指称为叛徒,遭到杀害。

反对派

1979 年 2 月,中东被伊朗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革命所震惊,这场革命推翻了伊朗的君主制。驱动革命的是这样一种伊斯兰思想:它认为只有运用伊斯兰理想和法律,才能根除社会的非正义和外国的统治。革命的领导和重要思想家阿亚图拉·霍梅尼很快就尝试将革命输出到伊拉克(因为什叶派是这个国家的多数派),他呼吁伊拉克人民推翻“无神论的复兴党”政权。霍梅尼在伊拉克的重要同盟者是达瓦党(Da'wa Party,亦即号召党)。该党成立于 1968 年,创建者是一些重要的什叶派宗教人物,如阿亚图拉·穆罕迈德·巴克尔·萨德尔。达瓦党的出现是对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统治的回应,也是对诸如伊拉克共产党这样吸引什叶派支持的世俗政党的反应。受伊朗革命的鼓舞,达瓦党成员完成了一系列针对复兴党高官的大胆的暗杀活动。他们还在受到拥护的南部什叶派中心组织了一些群众游行。作为回应,国家进行了严酷的镇压。阿亚图拉·萨德尔和他的姐姐被捕,他们的命运一直不为人知,很有可能已被杀害。

达瓦党的领导骨干也遭到同样的厄运。为了震慑反对派，政府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策，凡是涉嫌参与反政府活动的人，其家属也要对此负责，并受到相应的惩罚。任何参与反对活动的人都要处以死刑。这种镇压手段对达瓦党是有效的，直到今天，达瓦党内与萨德尔的路线相似的力量仍得不到承认。

138

1982年，当时正在与伊拉克交战的伊朗政府召开了一次包括达瓦党在内的全体伊拉克伊斯兰政党大会。一个以“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著称的庞大组织成立了。不过，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达瓦党对伊朗的干预尤其感到不满。1988年，达瓦党终止了它在“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里的成员资格，认为委员会正在成为伊朗的利益工具。达瓦党与其他反对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它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在库尔德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按照其政治伊斯兰的特征，民族认同较之宗教联系反而是次要的。既然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同为穆斯林，自治问题就不应当提出。达瓦党后来重新表述了这一观念，也更多地去关注库尔德民族的意愿，但在意识形态上与库尔德人的关系仍然紧张。不像其他大多数反对派，达瓦党对民主口号的接受也较为迟缓，认为民主是一种西方观念。达瓦党最终因其是一个什叶派组织而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它与逊尼派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也没能在民族统一问题上让他人信服。

除了什叶派反对派外，库尔德人在1975年的失败之后也得以东山再起。1979年，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召开了会议，穆拉·穆斯塔法的儿子麦斯欧德·巴拉赞尼当选为新领袖。他承诺党要走一条摆脱部落影响的新道路。虽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贾拉勒·塔拉巴尼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面临共同的问题，但双方之间的关系依然很紧张，有时甚至会发生武装冲突。塔拉巴尼的政党主要倾向于吸引城市里的库尔德人，尤其是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1979年之后，伊拉克共产党也在北部开始建立根据地，但是到了1988年，由于其行动自由经常受到限制，他们被迫将众多办公机构迁至叙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之

后,伊拉克共产党对其过去的地位采取了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共产党员如今强调了党内更大的民主,也允许更为多样化的言论出现。在两伊战争期间,库尔德斯坦成为反对派游击战的大本营。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包括持不同政见的复兴党党员(他们常常与叙利亚的复兴党联合),也宣称他们反对萨达姆的统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组织上很脆弱,但军队和复兴党内部都明显支持他们。反对派们多次试着组织一个联合战线或至少某种形式的协调行动,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过去就存在的猜疑以及叙利亚和伊朗这样的地区大国的干涉,使这种意愿没能实现。而在萨达姆亲戚组成的统治集团内部,也时常发生分裂和危机,这些人经常发现他们之间也很难相处。比如,1983 年,在经历了一系列与伊朗作战的失败后,萨达姆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就被处以半流放。

139

两伊战争:1980—1988 年

伊朗与伊拉克之间有着长期的边界纠纷,1980 年爆发的战争是伊朗革命与萨达姆草率放纵地追求个人野心的直接后果。战争持续了八年,致使 100 多万人伤亡(伊拉克方面伤亡 40 万人),损失估计达1280亿美元,战争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双方又退回到战前的状态。两伊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其危害常常也超出了两国的范围。与 1958 年的伊拉克革命影响到这一地区君主制政权的稳定一样,1979 年的伊朗革命使周边的大多数国家匆忙行事以对之进行抑制。伊朗革命在初期是绝对受到这一地区人民的欢迎的,他们庆祝了王权的垮台。革命也引起了各国政权的关注,他们担心革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这些担心都源自霍梅尼希望将革命输出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邻国伊拉克的明确声明。同时,革命削弱了曾经强大的伊朗国王的军队。对高级军官的清洗、联合国禁运所导致的某些稀缺部门的匮乏(特别是空军)以及通常与大众反抗相关的普遍混乱,都使伊朗的防御力量相当脆弱。这一切,加之伊朗与美国和苏联关系恶化所导致的国际上的孤立,使萨达姆相信,发动迅速的军事打击以除掉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时机已经成熟。

萨达姆或许还希望两国的边界会发生有利于伊拉克的变化，以及能更好地控制石油储备丰富的伊朗胡齐斯坦省，这样伊拉克就会成为海湾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更重要的是，萨达姆可能还希望一场迅速的胜利会使伊朗的政权发生人们希望看到的变化。

1980 年 9 月 17 日，萨达姆宣布废除 1975 年签署的划定两国边界的《阿尔及尔条约》。9 月 22 日，在经过一系列边界冲突后，萨达姆不顾其 140 高级将领的建议，命令伊拉克坦克部队蜂拥穿过边界，侵入伊朗西南部。在经过残酷的挨家挨户的战斗后，霍拉姆沙赫尔市被攻陷，但令人吃惊的是，阿巴丹却抵抗住了伊拉克的进攻。入侵并没有使伊朗完全崩溃，反而在实际上使伊朗的分裂因素团结在一起，各个派别也都重新集合在亲霍梅尼阵营的身边。到了 10 月份，伊拉克的进攻陷入停滞状态。伊朗拒绝了所有调停，坚持伊拉克必须撤退，并承认其发动战争的罪过和进行赔款。让萨达姆感到更为糟糕的是，以色列由于担心伊拉克核武器的发展，于 1981 年发动空袭，摧毁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也就在这一年，伊拉克加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请求被拒。海湾合作委员会由海湾地区的全体阿拉伯国家组成，目的在于抗衡伊朗与伊拉克的力量。第二年，支持伊朗的叙利亚关闭了其用于出口伊拉克石油的边界。这一最后行动是对伊拉克脆弱经济的一次巨大打击。在所有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中，伊拉克是唯一一个受制于其有限的港口设施的国家。与此相反，伊朗却能够依靠其更南端的远离前线的港口出口石油，这样就避免了从外国借入大量资金以支持战争的进行。

1982 年，伊朗的反攻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多数伊拉克军队被赶出国境，一时间萨达姆的掌权似乎都成了问题。但是，伊朗宣布要在巴格达安置一个伊斯兰政府的言论，让萨达姆的将军们再一次团结在他的领导 141 下。由于伊朗的进攻缺乏空军的掩护或足够的炮火，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伊朗采用了过时的人海战术，这就使它遭到了巨大的伤亡。尽管如此，伊朗人还是坚持了下去，并于 1986 年夺取了伊拉克的唯一出海口法奥港。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夺取法奥港似乎很有可能意味着巴士拉及伊拉克整个南部地区很快将落入伊朗人手中。伊拉克则以打击伊朗的经



图 7.1　身处前线的伊朗士兵。TopFoto/Topham/AP

济作出回应。伊拉克空军以新购买的法国飞鱼导弹为武器,袭击伊朗的港口、城市、石油设施和油轮。伊朗则攻击伊拉克的支持者,如科威特的油轮作为报复。当美国和苏联同意为油轮护航时,战争就到了扩大化的危险边缘。

战争期间,伊拉克开始将其地区盟国的目标从所谓的激进国家如叙利亚和利比亚,转向海湾君主国和约旦这样的传统国家。埃及与以色列之间虽然有和约,但伊拉克与之的关系也改善了。海湾国家,特别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答应给予伊拉克巨大的财政支持,约旦则为伊拉克的贸易和军事物质进口开放了自己的港口。土耳其、科威特与约旦之间也建立了新的公路联系。埃及以出口或提供一些特种部队的方式,给伊拉克以直接的军事援助。伊拉克也利用从埃及输入的劳动力来帮助经济运转。伊拉克允许土耳其对其国内的库尔德人反叛进行跨国界打击,而作为回报则要土耳其保持伊拉克输油管道的畅通。伊拉克与土耳其之间的这一协议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国际上来说,伊拉克开始将目光更多地转向西方,特别是自 1958 年以来就与其有着糟糕关系的美国。1984 年,伊拉克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同意为伊拉克提供伊朗部队活

动的情报。由于担心伊朗的胜利可能会使海湾国家陷入动荡，美国在战争末期特别倾向于伊拉克。但总的说来，美国似乎更愿意看到两个国家在战争结束后都被削弱。

当战争的局势再一次发生转变后，伊拉克所享受到的支持在 1988 年就消失了。这几年来，伊拉克在战争中一直使用包括芥子气和神经毒气在内的化学武器。1988 年 3 月，靠近伊朗边境的库尔德城市哈拉比亚遭到了致命的火力轰炸。由于伊朗支持这里的库尔德叛乱，因此伊拉克决定对这里的库尔德人进行惩罚，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摄影师所拍下的一动不动的父母怀抱着孩子躺在城市街道上的图片传遍了整个世界。估计有5000平民被杀。伊拉克不管这一事件是否对其形象不利，继续推进其优势，最终将伊朗人赶出法奥港。在这次行动中伊拉克再次使用了化学武器，此次行动也得到了美国军队的直接支持，后者攻击了伊朗的几艘船只和海上钻井平台。7 月，伊朗宣布准备接受停火。用霍梅尼的话说，尽管这一决定“比喝毒药还致命”，但伊朗的领导人还是不得不承认他的国家已无完全获胜的希望。消息传来，伊拉克立刻举行了庆祝，当权者随即又将之变成一场“胜利”庆祝。8 月，停火协议最终签署，两国回到了敌对之前的状态。在经过了八年毁灭性的岁月后，战争还是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除了过去的边界争端外，在撤出全部兵力和交换战俘上又涌现出新的分歧。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确实展现了伊拉克政权的强硬。虽然这个政权残暴且不受欢迎，但它还是从损失惨重中幸存了下来。战争同样体现了伊拉克民族团结的力度。在明显排除了众多库尔德人后，伊拉克各个族群都对国家表现出忠诚。例如，在 1982—1985 年间，南部的什叶派阿拉伯部落在国家的领导之外，自发组织了对伊朗进攻的抵抗。

战争的结束赋予伊拉克政权一个解决与其国内敌人特别是库尔德人之间宿怨的机会。从 1987 年末开始，伊拉克军队就开拔到北部与那里的叛乱分子作战。到第二年 8 月，臭名昭著的“安法尔行动”[1]已经转

---

[1] “安法尔行动”一词来自《古兰经》第八章的标题“安法勒”，意思是“战利品”。

变为对库尔德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全面进攻。大量库尔德村庄,尤其是靠近边界或难以进入的山区地带的村庄全部被摧毁,居民被转移到大路附近的营地里或者沿途被处决。那些依靠反叛力量顽强抵抗的村民则遭到化学武器的轰炸。在一次复兴党领导人的会议上,此次行动的负责人,萨达姆的表弟阿里·哈桑·马吉德这样说道:

> 一旦我们完成对库尔德人的驱逐,我们将在各地依照系统的军事计划开始打击他们(库尔德叛乱分子)……然后我们将把他们包围在一个小块区域里,用化学武器对付他们。我不会只在一天的时间里对他们使用化学武器,我会在 15 天的时间里不断地对他们使用化学武器。①

此次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致使 90% 的库尔德村庄和至少 20 座小城市被毁灭。在库尔德人被迁出的整个地区,估计布置了1500万颗地雷。数十万库尔德人被安置在集中营里,其中一些集中营在伊拉克的南部。涌入土耳其的难民估计有 10 万人。

143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政府提升了展示其正义统治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象征。伊拉克第一次倡议召开了各种类型的伊斯兰大会;电视台也经常展示萨达姆礼拜和拜访宗教场所的镜头,国家控制的媒体开始讨论使用伊斯兰教法的可能性。在阿拉伯国家看来,伊拉克是“东部大门的守卫者”,两伊战争也被官方称作“第二次卡迪西亚战役”或“萨达姆的卡迪西亚战役”,以与 7 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和萨珊波斯人之间的战役相比较。在伊拉克国内,人们更多地强调了伊拉克民族的阿拉伯本质,这就使人很自然地怀疑非阿拉伯人的忠诚,尤其是库尔德人和有着波斯血缘

---

①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New York, 1993, p. 349.

的伊拉克人的忠诚。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政府就下令将 25 万伊朗裔伊拉克人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之分给政府所选定的支持者。随后,伊拉克政府发起了一场广泛针对一切与波斯相关的事物的运动。1982 年,国家通过法律,给予与伊朗妻子离婚的男人金钱奖励。历史书籍被重新撰写,波斯人被描述成阿拉伯人的历史敌人,他们对伊斯兰文明产生了消极和腐化的影响。在这些书中,有一部是萨达姆叔父的研究著作,书中声称波斯人"是真主依照人形而创造出的野兽"。① 伊拉克的语言、传统和习俗都必须不再受到伊朗的影响。同时,萨达姆·侯赛因也被描述成伟大的阿拉伯战士,堪与萨阿德·伊本·阿比·瓦卡斯甚至哈里发欧麦尔本人的继承者相比。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一个用于纪念胜利的巨大的纪念物就被竖起来。这个被称作"胜利之手"的纪念碑就建立在一个新建的游行场地的入口处。两把重达 24 吨的阿拉伯弯刀用在战斗中阵亡的伊拉克士兵的步枪制成,弯刀分别被握在两个巨大的手掌之中,手按照萨达姆的手雕刻而成,用在前线收集而来的5000顶伊朗士兵的钢盔制成。

到 1988 年,伊拉克军队人数达到 95 万,人民军的数量达到 25 万,军队人数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二分之一,这给伊拉克的劳力和资源带来巨大消耗。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不及伊朗。比如,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油田几乎没受到战争的危害。尽管如此,伊拉克的港口设施几乎被全部摧毁,巴士拉的炼油厂也损失惨重。在战前,伊拉克有着 350 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到战争结束时,它所欠的外债就在1000亿到1200亿美元之间。重建国家所需的费用大体约为4526亿美元,这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更糟糕的是,国际油价从1986 年开始就急剧下跌。国家对此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所有被认为是不良分子的财产予以没收的行为。那些从财产分配中获益最大的通常是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来自逊尼派外省地区,如提克里特、库白西斯部

144

① 引自 Samir al-Khalil, *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 Berkeley, 1989, p. 17。

落和祖布尔部落等。多亏了这个国家的慷慨大度,这些新贵们取代了过去的城市精英,成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统治阶级。1987 年,政府采用了一项政策,通过出售国家农场和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石油、国防和钢铁之外的工业,以加速私有化的进程。与此相伴随的是,政府通过废除充分就业法、削减津贴以及取消最高限价等措施,结束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这些政策除了让某些家族利用新机会受益之外,更多的是导致生产的下降、对外国经济的更大依赖以及物价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遭受最大打击的是支领薪俸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工资由于通货膨胀而严重萎缩。经济窘困的一个明显迹象就是,依靠不正规的活动或小型商业生活的人数在不断上升。由于担心在如此萧条的经济状况下让士兵复原会导致局势更加糟糕,伊拉克继续从埃及输入廉价的劳动力,以便让工资保持较低的水准,并进一步降低人们普遍的购买力。

脆弱的两年和平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渴望复苏的热情仍是高涨的。伊拉克估计还保留有1000亿桶石油,这仍然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此外伊拉克在国际上也不乏借贷者。1989 年,萨达姆甚至通过宣布进行新一届的国民议会选举、反对党的合法化以及普遍的大赦,来表明某种放松权力控制的迹象。国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完成自 1958 年革命以来就缺乏的永久宪法的草案。不过,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权却对来自萨达姆的拜贾特部落里的官员更加依赖。萨达姆家族除了垄断着权力之外,有传言说这个家族要求每一笔重要的商业交易都要给他们 7% 的回扣。他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控制着敏感的地区,而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表兄弟和其他亲戚也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就将政权变成了一种共和国外衣下的家族统治。在此期间,媒体开始为萨达姆一个儿子的继任铺平道路。比如,萨达姆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描写乌代: 145

伟大的主啊

我们不能觉察到的你的伟大秘密
如今已经能从你伟大的儿子的眼中看出①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成为海湾地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在与邻国打交道时,萨达姆试图尽量利用这一优势。伊拉克的军事援助有选择地给予了巴勒斯坦人和反抗叙利亚的黎巴嫩人,因为他们可以作为传播伊拉克影响的工具。伊拉克在不同的场合也公开威胁以色列、叙利亚、伊朗甚至土耳其,科威特也接受了伊拉克的要求,割让了其海岸附近的布比延岛。通过肆无忌惮地购买或发展各式各样的武器,伊拉克继续加大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投资。苏联的解体则为伊拉克提供了购买国际社会所禁止的生化武器的更多可能性。伊拉克还成立了一些假冒的公司,来获得生产核武器所需要的原料。这些行为再加上政府让人感到惊恐的人权纪录,都招致西方不断的批评。不过,这些非生产性的投资也给伊拉克已经衰竭的经济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到1990年,伊拉克便陷入危机之中。伊拉克的武装力量超过了50万人,很难指望他们退役后能够进入到一个可以吸纳他们的经济之中。士兵中的焦躁情绪是明显的,他们在战争中受尽折磨,却又无法宣泄。不断有报道说,愤怒的士兵和经常遭受清洗和调动之苦的军官纷纷举行了单独的叛乱。萨达姆希望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取消伊拉克的债务,甚至是提供伊拉克重建资金的愿望也都没能实现。就在这一年,石油价格从每桶20美元跌至每桶13.7美元,这使伊拉克每年的收入损失大约70亿美元。到1990年夏,萨达姆公开谴责科威特和阿联酋通过超出它们在欧佩克中出口限额的手段,故意保持油价的低落。他宣称,这无异于是一场伊拉克不能容忍的经济战争。之后,萨达姆又谴责科威特非法从邻近两国边界的伊拉克油井中偷采石油。随着伊拉克的军队调动所表现出的更大威胁,危机在不断深化,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所做的调停

① 引自 Fatima Mohsen,"Cultural Totalitarianism",载于 Fran Hazelton, *Iraq Since the Gulf War: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London, 1994, p. 17。

争端的努力也走到了尽头。

科威特的灾难

146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声称这是对科威特官员当天早些时候夺取政权的反应。因受到美国大使不干涉言论的鼓励,萨达姆豪赌国际社会不会对此采取行动。就在占领科威特后不久,伊拉克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大体上重新肯定了 1975 年的阿尔及尔条约。伊拉克的入侵是大规模的(士兵超过了 30 万人),许多人认为它还会入侵沙特,但并没有发生。入侵结束后几天,伊拉克就宣布兼并科威特——“树枝又回到了树干上”。国际社会的反应是迅速的。联合国对此次行动进行了谴责,并通过《661 号决议》强制执行制裁,制裁有效而全面地封锁了伊拉克。之后不久,英国和美国组成了包括 34 个国家在内的多国部队,宣布目标是解放科威特。多国部队中还包括埃及、叙利亚和沙



图 7.2　从科威特城到巴士拉公路上的“死亡英里”。图片显示的是 1991 年 2 月 25—26 日,美军对撤退中的伊拉克军队进行空袭后的情景。

资料来源:Peter Turnley , *The Unseen Gulf War* , http://www.digitaljournalist.org/issue0212/pt_intro.html

特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但是美国军队的数量超过联军总数的75%。萨达姆通过将伊拉克的撤军与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及叙利亚撤出黎巴嫩联系在一起,试图获得一些支持。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47 对伊拉克的这一动向作出了积极响应,它们的媒体也坚决站在伊拉克一边。阿拉伯世界的多数国家也声援伊拉克,认为它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帝国主义入侵。

萨达姆政权与美国之间不断发展的仇恨不仅仅是因为伊拉克入侵并兼并科威特这么简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重要问题:抗衡苏联的影响、对以色列军事优势的战略性保证以及石油。20世纪80年代,当萨达姆镇压共产党、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将伊拉克建成防御伊朗扩张的前线时,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苏联的衰落和之后的解体减少了美国支持反共政权,如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需要。同时,伊拉克野心勃勃地制造多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进展,以及它所具备的跨地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引起美国对伊拉克与以色列均势问题的关注。再者,伊拉克军事实力的提高也让美国担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最终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大国。因此,就这一点而言,美国的目的是削弱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使之不能在海湾地区发挥其威力。在所有这些考量中,人权问题都丝毫没有被认真考虑过。

在一连串的外交活动陷入僵局后,多国部队于1月16日对伊拉克展开大规模空袭。伊拉克几乎没有作出抵抗,但却对以色列发射了一些经过改装的飞毛腿导弹,以努力赢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多国部队进行了一个月不间断的空袭(飞机出动超过116000架次),几乎摧毁了伊拉克所有的基础设施并杀死了大量士兵和平民,之后多国部队便发动了地面进攻。当多国部队迅速进入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时,撤退中的伊拉克军队焚烧了科威特的大多数油田,大火持续了几个星期,以致战争结束后给这里的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大约有6万伊拉克士兵不战而降,这让多数观察家认为伊拉克政权的末日指日可待。然而,美国却下令军队停

止进入巴格达,这就给了萨达姆宝贵的时间去重新集结部队。尽管常规部队死伤惨重,但萨达姆政权的精英部队共和国卫队却并未出动也没有什么损失。最终的数字显示萨达姆所谓的"百战之母"的声誉言过其实。伊拉克除了基础设施被摧毁外,战争中以及随后的骚乱中死亡的人数在94000人到281000人之间。多国部队却只有不超过数百人的伤亡。

148 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呼吁伊拉克人民起来反抗萨达姆的独裁统治。1991 年 3 月,撤退的伊拉克士兵的确在巴士拉附近发起了一场起义。起义后来延伸到北部,那里的库尔德人抓住机会夺取了整个库尔德斯坦。起义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很快席卷了整个国家,只有巴格达及其北部地区还在政府手中。国家控制的丧失使得老百姓能够对复兴党党员、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或者在现实中代表独裁统治的任何象征事物及制度进行报复。但是,反对派的力量是分裂的,美国也拒绝支持叛乱分子。这就使得政权得以发起一场残酷的重建控制权的反攻。萨达姆的军队试图把已经成为推翻独裁统治的自发起义转变成一场宗派冲突。为此,坦克上写上了反什叶派的口号,报纸上也发表了攻击什叶派信仰的文章,位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什叶派圣陵也遭到亵渎。政府军在夺回南部后,便转而对付库尔德人。由于担心政府会再次使用化学武器进攻,数千库尔德人又一次逃往土耳其,4 月份时库尔德人的抵抗便失败了。在这几个月的动荡中,大致有 200 万人被迁移。库尔德反对派的领袖巴拉赞尼和塔拉巴尼都放弃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他们前往巴格达试图与萨达姆达成某种协议。与政府在南方的暴行大多不为公众所知不同,库尔德人的遭遇得到了广泛报道,电视向公众们提供了大量难民潮和个人惨状的画面。报道让欧洲人呼吁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一块受保护的"库尔德飞地",美国和英国的部队最终也护送大多数难民返回库尔德斯坦。联合国后来宣布北纬 36 度以北为伊拉克空军的"禁飞区",迫使巴格达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块库尔德人的"安全港湾"后来包括了苏莱曼尼亚和哈拉比亚。另一个禁飞区最终也在北纬 32 度线以南建立,但联合国部队将不会入驻。这就使得伊拉克政府可以自由在此行动。政府动用大量物力排干了绝大多处反叛分子藏身的沼泽地。

到2000年,这片与美国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类似的、曾经布满野生动物的区域成为荒芜的沙漠。这个国家再一次遭到了蹂躏,而萨达姆却再一次宣布了胜利。萨达姆不仅经受住了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打击,曾经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伊拉克军队现在也支离破碎。

149

国际制裁下的伊拉克

有形的和人为的破坏给伊拉克带来的困境,比联合国所施加的严厉惩罚要严重许多倍。边界朝有利于科威特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伊拉克30%的石油出口被用于战争赔款(估计超过了1000亿美元)。在完成某些条件之前,伊拉克还需要承受历史上最严格和范围最广泛的制裁。这些条件包括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销毁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释放科威特战俘以及定期支付战争赔款。战争赔款由联合国所掌握的一个特别基金管理机构控制。实际上,这些限制将伊拉克的石油抵押给了可预见的未来,并从伊拉克政府手中夺取了大多数对财政的控制权。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显示,伊拉克在进行一项制造大规模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计划。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摧毁了40座核武器研究中心,销毁了38000件化学武器和625吨化学试剂,其中包括用于制作致命的VX毒剂和芥子气的试剂。公开的记录显示,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之前就已经贮存了8400升炭疽菌和19000升肉毒菌。一克的炭疽菌孢子据信可以杀死100多万人。

制裁最初针对伊拉克90%的正常进口和97%的出口,后来逐渐得到减轻。这些情况再加上两伊战争期间就负有的沉重债务,引发了现实中已经在使伊拉克中间阶级消失的超级通货膨胀。伊拉克的第纳尔从开始时的1第纳尔兑换大约3美元,下降到后来的兑换15美元需要2万第纳尔。其结果是,食品价格上涨了50多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9年的2840美元下降到1997年的区区200美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不断上升的癌症发病率,特别是南部的癌症发病率,这是投放到伊拉克的炸弹所释放出的300—800吨铀的直接后果。12年之后,作为一场进攻的序幕,更多的这类引发争议的物质再一次投向伊拉克。药物的

匮乏、可使用的纯净水及足够的营养物的下降,导致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从 1984—1989 年的 56‰上升到 1989—1994 年的91.5‰和 1994—1999 年的 130.6‰。有三分之一的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超过 50 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制裁的直接后果。

这些数据肯定导致了国际社会对制裁是否明智和是否道德的批评。当看到伊拉克政权实际上十分成功地稳定了统治,并很好地适应了这种制裁导致的匮乏时,美国官员关于制裁的"目标是针对政权而不是人民"的言论便不再有效了。1995 年,制裁得到轻微的缓解,伊拉克被允许卖出部分石油以购买食品和药物。1997 年,所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开始实施,但该计划还是因缺乏人道主义需求而受到批评。1998 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丹尼斯·哈利戴谴责制裁就是一场"种族灭绝",并立即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仅仅一年多过后,他的继任者同样以辞职表示抗议。在联合国安理会内部,法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呼吁如果不能彻底取消制裁的话,也要明显地减轻制裁。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关于使用"聪明制裁",即只针对伊拉克军事力量予以制裁的呼声不断加强。然而,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去实施,因为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它要求解除萨达姆的权力,以此作为减轻制裁的条件,这让伊拉克政权无法照办。1998 年,伊拉克终止了与联合国的合作,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被命令离境,这导致了又一轮空袭。

150

制裁对伊拉克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长达 13 年的制裁,使超过 160 万的伊拉克人直接依靠某种形式的援助。政权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通过将稀少的收入分配给最忠心的支持者而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政权还从一种平行的走私经济中获益,这使得关系显得更为重要。来自各省的阿拉伯逊尼派依然受到政权的偏爱,但政权也赢得了一些从政府的大度中获益的什叶派、库尔德人和基督徒的支持。国家制定了粮食的配给量和补贴,但收回了大部分之前给予多数人口的大量资助。私有化的程度加快了,这给那些少数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人带来巨大利益,但却使大多数人失业或就业不足。受到打击最大的是领薪水的专业人

员。关于大学教授不得不去开出租车以糊口的事情在巴格达非常之多。中学也受到资源匮乏的打击,学生的旷课率居高不下。其结果是,成年人的识字率从 1987 年的 80% 下降到 1995 年的 58% 。由于缺少许多国家服务部门,人民重新起用了旧的社会习俗以获得帮助,如部落关系或各种各样的群体关系。宗派主义和部落主义得到国家的鼓励,这在 1991 年的起义之后特别明显。国家通过成立部落大会从官方上认可了一些部落首领,这种情况自君主制以来就未出现过。1991 年 3 月的起义发生后不久,萨达姆就接见了打着部落独特旗帜的各部落首领代表。151 在这次会面上,萨达姆就土地改革法给部落首领带来的危害公开道歉,并答应作出补偿。部落权力被认可要高于某些司法和税收部门之上,像支付血金这种长期绝迹的行为也得到了政府的准许。国家在与各个部落打交道时,按照部落忠诚于萨达姆的程度,采用了一种非正式的按等级排列的方式。萨达姆所在的拜贾特部落自然被认为居于等级之首。不过,这些"新"部落与其早期形式相比,表现出了一些重要的不同。它们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没有明确划定的疆界,它们的领袖也多以城市为基础。虽然部落认同基于共有的血缘神话,但新的部落缺乏维持长久的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在现代伊拉克高度发展的城市化社会里,部落成员并没有去工作,他们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生活在一起。此外,他们比国家正式机构的人员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时也表现出挑战警察力量和安全部门的意愿。

政权在与不同集团打交道时所表现出的偏袒(物质匮乏时期尤为明显),在各个宗派与部落之间引起了一种恶性竞争的氛围。平行的走私经济也引发了犯罪,以及相互竞争的帮派之间争夺地盘的斗争,这些帮派通常包括政府的下级官员。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子就是 1995 年萨达姆两个女婿的叛逃、被遣送及被杀。1994 年,政府作出反应,通过了一些严酷的法律,即使轻微的犯罪也要遭受烙刑、截肢甚至死刑。这些刑罚只是选择性地使用,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但这种氛围给人们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也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观念,比如之前在伊拉克从未听说的贿赂,如今已变得非常普遍。为了抵制这种道德的堕落感和在艰

难时事中求得一些平静,宗教习俗普遍复苏。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更多的伊拉克妇女开始佩戴面纱,前往清真寺的人数大为增加,在斋月里封斋食的人也更多了。在伊拉克人中间,对外在世界持玩世不恭态度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认为,美国人使自己继续留在伊拉克的理由越合法,萨达姆就越要有意长期保持其权力。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人出于报复会完全同化伊拉克。到 2003 年,全国总人口的2550万人中,有大约 30 万人流亡海外。

在受联合国担保下受到保护的北部库尔德人安全区也有人出逃,其主要原因是制裁所引起的艰苦处境。相对的安全为这里更加稳定的经济创造了基础,但其未来却是不确定的,因为库尔德人担心土耳其人的不良意图,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之间不断的斗争也使这里的走私和投机猖獗,这种平行经济主要是由这两个库尔德政党造成的。1992 年,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埃尔比勒的库尔德议会进行了选举。两个相互斗争的政党在选举期间产生了分歧,最终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控制了埃尔比勒,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控制了苏莱曼尼亚,两个政党几乎是平分了议会的议席。新成立的库尔德政府呼吁与阿拉伯人的伊拉克组成联邦(比自治更进一步),这意味着库尔德人在不能直接脱离伊拉克的情况下,需要更大程度的独立。库尔德政府的言论引起了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严重关注,因为这几个国家中都存在大量库尔德少数族裔。1994 年到 1998 年之间,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人们对一个库尔德人国家的存在产生了疑问,也认为这有引发另一波移民浪潮的危险。巴格达、德黑兰与安卡拉的分歧也因为相互之间的挑拨而加剧了。1998 年,美国作为中间人成功地缔结了一份和平协议,两个库尔德政党将根据地域划分其行政职能。正当这种安排还在进行之中时,所谓的“伊斯兰辅助者组织”(*Ansar al-Islam*)带来了新的威胁。在海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支持下,这个新成立的伊斯兰政党利用人们普遍存在的幻想破灭所带来的失落感,开始坚持要求在库尔德政府中获得一定的代表。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伊拉克的反对派没能抓住机会,这尤其表现在

152

1991年3月的起义中。随着起义的进展,所有重要的反对派政党和要人首次参加了在贝鲁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不过,会议召开后不久,他们之间原有的分歧就支配了会议。伊斯兰主义者拒不接受性别平等的言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质疑了库尔德人的自治理念,共产党则对美国不断增强的影响提出警告。尽管如此,贝鲁特会议还是作出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但是会议并没有建立一个长久的组织性机构。1992年,伊拉克国民大会在维也纳成立。大会是各种反对集团的保护性组织,但因为怀疑美国对它有所影响,许多最为活跃的政党离开了。在战争、镇压和制裁的折磨下,筋疲力尽的伊拉克人民不愿在不久的将来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一些人指出,变革最可能的来源应当来自政权内部。但是萨达姆让自己远离人们的视线,至少有六次推翻他的政变都失败了。不仅如此,萨达姆的恐怖统治一再阻止了很多可能阴谋反对他的人,这在下面这段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被俘虏的军官的证词中可以明显看出:

153

> 我们十分害怕这个人。即使现在我和像你这样的美国人说话时,你也会注意到我在提及他的名字时,会出于习惯压低自己的声音。他的间谍无处不在。如果他知道我在对你说他的坏话,他会杀掉我在伊拉克的妻子、孩子和父母。如果我的首长命令我掉转枪口去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我会愿意的。可是有哪位长官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呢?我自己就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①

萨达姆两个儿子之间的继承问题也得到解决,萨达姆倾向于他的小儿子,头脑更冷静但也更冷酷的库赛。很明显,乌代刚愎自用的行为方式曾在伊拉克人中引起长久的恐怖,甚至也冒犯到他的父亲。1988年,乌代杀死了他父亲的一个忠诚的警卫,这让萨达姆把他关入监狱几个

① 引自 Ahmed Hashim,"Saddam Husayn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Iraq: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and Power,"载于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7, no. 1, winter 2003, p. 27。

月。1996 年,一场暗杀使乌代的身体部分瘫痪,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进一步下降了。

伊拉克在重建萨达姆数量众多的巨大宫殿、雕像和壁画时浪费了大量资源,但让许多观察家吃惊的是,这个国家似乎适应了这种物质匮乏的生活。在巴格达及其北部的逊尼派地区,道路、桥梁、发电站和许多工厂都得到重建。打破了禁飞令的飞机开始定期从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飞来。物质匮乏至少在巴格达不是十分严重,医院可以较好地获得药物,商店里的货物也比较充足。尽管纸币没有恢复以前的状况,但显示出稳定的迹象,收入实际上又开始上升了。食品进口的数量依旧很高,但在杰济拉地区私营农场的推动下,农业有了巨大发展。虽然南部的情况在持续恶化,但是上述成果,特别是最重要的城市巴格达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被否认。在国际上,伊拉克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它从一个侵略者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阿拉伯世界对伊拉克受苦儿童的同情尤为强烈。在 2002 年 3 月召开的阿拉伯峰会上,伊拉克恢复了它与沙特的关系,并在修补与科威特关系的路上迈出了步子。萨达姆也想利用巴勒斯坦长期的反抗打破他的孤立地位,他不断支付现金给阵亡将士的家庭。为了显示伊拉克对英美等国家的蔑视,并进一步提升萨达姆作为成功领导人的形象,政府宣布在巴格达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被命名为“百战之母清真寺”,其宣礼塔的造型酷似伊拉克在 1991 年战争时使用的飞毛腿导弹。

与美国的危机

伊拉克政权能够抵抗住十年的制裁、北部主权的丧失以及定期的空袭所带来的后果,表明美国和英国决策者的“积极遏制”政策已经不能消除萨达姆给地区稳定带来的危险。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发展同样鼓励美国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苏联的解体为美国处理中东事务腾出了手,科威特战争也允许美国在海湾地区建立强大的军事基地。2001 年 9 月 11 日,伊斯兰基地组织对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自杀性炸弹袭击,成为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那根稻草。美国的决策者更加确信,美

154

国需要在全球扮演更为直接和更具侵略性的角色,以便阻止类似的袭击,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在这点上,美国总统小布什主动提出了针对伊拉克的言论攻击,他将伊拉克打上了"邪恶轴心"成员的标签(另外两个国家是伊朗和朝鲜),并公开呼吁让这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2001 年 10 月,美国主导的对阿富汗的入侵获得成功,这进一步鼓励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同样的行动。一场期望之内的对伊拉克的打击将展现美国的力量,并威慑其他可能挑战它的国家。布什在 2003 年早些时候说道:"通过挫败这一威胁,我们将向其他独裁者表明,侵略的道路将导致他们自己的灭亡。"[①]

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支持。俄罗斯、中国、法国和德国批评了这一建议,伊拉克的邻国一想到美国的每次军事行动之后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就不无担忧。人们都确信,只有通过暴力和流血才有可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多年来的独裁统治和战争加深了伊拉克不同群体之间的分裂,中央政权的垮台很有可能导致内战、移民浪潮和地区动荡。出于继续支持以色列和维持西方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遗产的考虑,美国对战争可能给中东多数地区带来的特殊影响视而不见。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如沙特、约旦、埃及甚至土耳其都担心,对伊拉克采取坚决行动后会引发民众愤怒的反弹。伊拉克中央政权的垮台还有可能鼓励库尔德人中的分离运动,这是土耳其强烈反对的,此外伊朗也有可能将其势力扩展到伊拉克南部,海湾国家则担心这会影响它们的稳定。

不过,这些反对意见并没有阻止美国和英国入侵伊拉克。两国在外交上谴责萨达姆重新启动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并与基地组织有着一定的联系。2002 年 11 月 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441 号决议》,给予伊拉克"依照安理会相关决议遵守其解除武装之义务的最后机会"。[②] 这些义务需要伊拉克完全交出并销毁所有的生化武器与原

155

① 引自 *The Washington Post*, 21 February 2003, p. A20。

② 引自 *The Washington Post*, 9 November 2002。

子武器及运载它们的工具,并拆除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441号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监测、查核与视察委员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视察员重返伊拉克。国际视察员拥有广泛的权限,其中包括:

> ……迅速、无阻挡、无条件和不受限制地接近他们希望视察的任何地下结构、地区、机构、建筑物、设备、记录和交通工具,也可以迅速、无阻挡地私自接近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希望会谈的任何官员和其他人……不论是在伊拉克国内还是国外……亦不需要伊拉克的观察员出席。①

与此同时,大量的军队不断在集结,到2003年3月初,已经有大约25万主要由美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入驻中东。当这些准备都就绪后,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再次加大了赌注。在2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讲话中,鲍威尔谴责伊拉克拖延国际视察员的工作,无视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禁令,并直接支持基地组织,因而违背了《1441号决议》。很快人们就明白,这是为了传递错误情报而有意为之的活动的一部分,鲍威尔后来也承认他被情报机构有意提供的错误报告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虽然战争一触即发,但美国依然没能像1991年击败伊拉克那样建立一个广泛的同盟。法国、德国受到俄罗斯、中国及阿拉伯国家(科威特除外)的支持,坚决反对战争。一场国际性的反战运动逐渐产生了效果,它在限制对美国的支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伊拉克危机在美国、北约、欧盟和阿拉伯联盟内部都引起了严重的分歧。人们除了担心美国侵略性的新帝国主义外,非常确定石油在决定国际社会对伊拉克的立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俄罗斯是伊拉克重要的贸易伙伴,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得到了伊拉克给予的可以获利的交易,一旦制裁结束这些交易就会生效。法国对伊拉克的出口从2000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6.61亿美

---

① 同前页注②。

元,以及2002年的10多亿美元。法国的石油巨头道达尔菲纳埃尔夫公司同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开发马吉农油田的协议,仅马吉农油田一处就含有满足法国未来30年需求的充足的石油。另一方面,美国的公司,156 如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已经控制了科威特的石油产业,它们渴望扩展跨国界的运作。法国认为接受美国"政权变化"的计划会给其利益带来风险,认为不必发动战争就有可能迫使萨达姆逐渐改变其统治。

在伊拉克国内,人们的一个最大期望就是独裁统治和制裁的即将结束,但这种期望也混合着一种对萨达姆倒台后这个国家将发生什么样的动荡的深深忧虑。人们还担心一些土库曼人领袖率先挑起的种族杀戮,他们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保护他们免受库尔德人的攻击。美国官员在不止一个场合中告诫伊拉克的邻国不要点燃共产主义的火焰。谈到伊拉克战争之后可能出现的局势,一位官员说道:

> 我们不希望一个虚弱的政府被地区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不愿伊朗人给什叶派好处,也不愿土耳其人给土库曼人好处,沙特人给逊尼派好处。①

在经过几年的分裂和无所作为后,库尔德议会于2002年11月召开。会议明确反对脱离伊拉克,但它还是严重警告了土耳其,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会议迈出了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的第一步。一个月后,伊拉克的反对派最终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更大的会议。一些重要的个人和党派,如共产党和达瓦党都拒绝参加会议,认为会议没有公正地给予他们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并且担心美国代表在其中会扮演"霸权"的角色。亲伊朗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显然在确保会议成功召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拒绝外国军事的控制,但欢迎任何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伊朗推翻独裁统治的帮助。在中东地区内部,阿拉伯

① 引自 *The Washington Post*, 21 February 2003, p. A1。

国家的外交重点是尝试说服萨达姆离开伊拉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予伊拉克最强烈支持的竟然是叙利亚,它在与伊拉克经历了数十年的敌对后开放了其边界,以便使贸易和旅行得以展开。

在这一连串的外交表态和战争准备期间,美国官员逐渐揭开了创建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计划的面纱。这些计划在外观上与将近 90 年前的英国委任统治十分类似。正如 1917 年莫德将军所言,布什总统声称美国将解放而不是征服伊拉克。与英国的委任统治一样,美国希望将这个国家变成民主与繁荣的范本,一个美国宽宏大量的光辉范例。布什大胆地说:"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希望之源……伊拉克不会威胁到它的邻国和庇护恐怖分子,相反它能成为这个地区所需要的进步和繁荣的范例。"[①]为了实现这一奇迹并避免多年来的混乱与地区动荡,美国计划在建立一个美国的临时政府之后,保持对伊拉克的直接军事控制。这个临时政府在保证法律和秩序、战后重建和建立新的"代议制"政府中将起到直接作用。建立代议制政府需要一项在不大动干戈下可以清除现存政府机构中复兴党因素的政策。美国公司将收到重建合同中的最大份额,这样它们就会享有巨大的财源。一个强大的、热爱和平的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最终将成为美国真正的盟友,可以保证它在中东地区享有无人能及的影响。然而,这些计划也意识到伊拉克人民只会消极地参与,因为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些计划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美国在伊拉克国内的反对派盟友,如卡南·马基雅和艾哈迈德·沙拉比也批评这些计划是"毁灭性的"和"帝国主义的"。

157

将近 25 年的独裁统治在各个方面都给伊拉克带来的破坏。镇压、战争、起义、让人窒息的国际禁运和国家主权的逐渐丧失是萨达姆·侯赛因统治的主要遗产。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经济的恶化和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与其他的独裁政府一样,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似乎总是通过经常让国家陷入真正的或想象的危机之中而不断强大。但

① 引自 *The Washington Post*, 21 February 2003, p. A1。

是,萨达姆统治最具毁灭性的后果或许是它给民族融合带来的危害。从英国委任统治初期开始,伊拉克的民族统一就显得是如此之脆弱,以致许多人都质疑这个国家是否已经处于分裂的边缘。在摧毁了市民社会的一切存在物之后,萨达姆政权挥舞着宗派主义的武器去对付反对派,这在两伊战争和1991年的起义当中十分明显。过去十年的制裁限制了国家的慷慨大度,部落因此开始复苏,它们受到怂恿去争夺有限的资源。即便在具有优势地位的逊尼派团体内部,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势等级的基础也只是部落和地方关系。随着国家的倒退和法律的失序,社会的分裂变得愈发明显。部落作为一种适用于游牧或农村隔离生活的社会组织,尽管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实践功能,但部落认同还是突然展现出一种更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在反对派之内,部落、宗教、地区和种族之间的分裂也变得更加明显,这阻挠了多次组建某种联合战线的尝试。从158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萨达姆的统治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梦的完全破灭。伊拉克取代了泛阿拉伯整合运动,成为中东地区的被遗弃者,其内部的分裂也加剧了。很快,在美国主导的入侵和西方殖民主义所开启的新的历史时期下,即便是复兴党实现民族独立自主这一并不过分的目标也将消失。



第八章　美国霸权下的伊拉克：2003—2009年

159

当我们看着伊拉克无比凄惨地进入第二个千年时，两个因素在导致伊拉克被外国征服和丧失民族主权中显得最具决定性。首先，伊拉克所经历的超过十年的其现代历史上最为广泛的制裁，使这个国家及其曾经让人叹服的防御机制破败不堪。这一切，与十年前苏联的解体一样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这场入侵竟然没有作出任何明显的军事或外交抵抗。其次，美国以小布什当选总统揭开了新千年的序幕，而布什的国际政策主要是由新保守主义思想决定的。新保守主义理论长期以来就主张以一种更有力和更直接的方法去保障美国在伊拉克和中东的总体利益。伊拉克政权所遭受的制裁和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政府，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美国主导下的入侵和伊拉克的被占领。然而，美国的统治并不能带来它所承诺的稳定与繁荣。与80年前英国人征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伊拉克不同，美国人很快发现，他们所着手应对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它不会轻易屈从于征服者简单的（通常也是强制性的）改革和重建理念。占领军不仅低估了伊拉克人基本的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意识，还低估了萨达姆24年独裁统治所留下的累累伤痕，这些伤痛也因为国家恐怖主义、战争和制裁而更为严重。美国人在治理上所犯下的大错、地方与区域的反抗以及宗派主义的浪潮有着将这个国家推向内战的

危险。而就在这混乱之中,深刻的社会变革仍在发展。与复兴党时期密切相关的精英阶级如今很快就让位给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主要与正在兴起的政党有关,也与后萨达姆时代法律秩序全无的氛围下劫富济贫的犯罪因素相关。在某种层面上,伊拉克 21 世纪之初与上一个世纪开始时所面临的情况类似:外国的占领以及与之相伴的根本性社会变革。不过,在上个世纪之初,即便在抗击英国人的伊拉克人中都存在某种乐观主义氛围,但在这个世纪之初,占主要地位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和悲观主义。只有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在伊拉克人名义上的对国家的控制开始之后,人们才能够看到稳定和希望的微弱光芒。

“自由”伊拉克行动及其后果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国和英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全面进攻。此次行动的代号为“自由伊拉克”,意在推翻萨达姆的统治,占领伊拉克,并重建一个对西方友好的新国家。与 1991 年的那场战争一样,战争以大规模空袭开始,基本上使伊拉克的基础设施瘫痪。之后便是从科威特发动的地面进攻。美国领导下的被派去占领和夺取这个国家的多国部队,从一开始就在人数上明显严重不足。在入侵开始之前,美国陆军参谋长在国会上声明,需要至少 30 万到 40 万人的部队才能保证安全和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但最终派出的部队只有 16 万人,其中 13 万为美国军人。不过,单看结果来说,入侵部队的训练和军事技术毫无疑问要高于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政权的威吓及大量裁军所导致的低落士气,使伊拉克军队很难展开有效的战斗,因为多数士兵只想着回家,他们并不愿在一场拯救独裁者的没有希望的战斗中冒险。到 4 月末,包括巴格达在内的整个国家都被占领了。美国士兵在战斗中仅仅死亡 138 人,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则在 1 万到 10 万人之间。

由于占领军的数量较少,加之他们对维持这个国家的治安明显缺乏兴趣,街道上的法治和秩序很快就消失了。在过往的十年里,国际制裁所导致的不断加强的物质匮乏和一个元气大伤的政权,共同催生了伊拉克主要城市中心高度动荡的局势。起初,大多数劫掠行为的目标主要集

中在粮店、政府建筑和被废除的政权高官的府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裁期间就得到发展的犯罪团伙强盛起来，抢劫变得更加普遍和更有系统，它影响到了普通商人和私人的住所。抢劫者拿走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从计算机、重型机械、医疗设备到普通的灯具、铜线和足球球衣。161 正如 13 年前从科威特抢来的物品一样，伊拉克人将这些被抢来的东西称作“哈瓦西姆”(*hawasim*)，这个词是“哈西姆”(*hasim*)一词的复数形式，意思是“决定性的”。萨达姆在入侵科威特后，经常将这场正在进行的被称作“百战之母”的战争描述为“哈西马”(*hasima*)，意思就是它对整个阿拉伯民族是决定性的。这个词与被抢来的物品联系在一起是战争的结果，到 2003 年时它再次得到使用。犯罪团伙组织严密的特点使它很难被镇压。犯罪活动也逐渐包括了敲诈勒索、赎金绑架和一切从政治冲突到个人恩怨所引发的支付薪金的暗杀。这些犯罪活动不仅造成了结构和人员上的损失，还有助于使精英阶级的性质发生社会性转变，这有点像某种形式的原始积累。那些通常主要来自逊尼派三角地带、与复兴党的统治秩序相关的阶级，逐渐让位于一个与 2003 年之后的政治组织有关的新的集团。就在本书写作之时，这一现象仍在进行之中，如果想当然地以纯粹宗派或种族的词汇来描述这些新的人群，显然是不明智的。什叶派和库尔德人无疑受益最大，逊尼派虽然有所压制，但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新秩序中寻找他们的位置。不管其背景是什么，与这个崛起中的阶级相关的犯罪活动很难提高它们在公众眼中的合法性。由于具有一切种族和宗派背景的伊拉克中间阶级成为最大的失败者，这一问题也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宗派观念。伊拉克的中间阶级在历史上一直是世俗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观念的支持者，他们的衰落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超级通货膨胀和制裁时期的物质匮乏。在 2003 年之后，伊拉克的中间阶级深受犯罪活动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卖掉了房子，离开了祖国。由于库尔德地区的两个主要政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民兵组织成功地维持了秩序，这一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基础设施和抢劫活动的影响。

抢劫活动无疑给国家本来就很脆弱的基础设施带来又一次重击，但

更重要的或许是它对大众心理的影响。随着新秩序下深刻的悲观主义情绪的涌现,对美国能够引导这个国家的所有信任都破碎了。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混乱的日子里,最让人感到痛心的事件就是闻名世界的巴格达博物馆的被劫。对伊拉克人来说,博物馆里所包含的不仅是大量历史文物,它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伊拉克文明尤为有力的象征,是伊拉克人民自豪与希望的来源。窃贼们带着链锯闯过展柜,数万件珍稀的文物被偷走或毁掉。盗窃行为加重了已经高涨的因占领所直接导致的屈辱感。对许多伊拉克人来说,博物馆遭到洗劫,与其他可以比较的机构如国家图书馆和大学的被抢劫一样,证实了他们心中的忧虑,即美国占领的目的是有意针对伊拉克和伊斯兰文明本身。让感到震惊的伊拉克公众更加痛心的是,美国军队在保护石油部和内务部时却表现出迅速和高效,这就充分说明了美国人的意图。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随后对这一事件所采取的不太理想的做法,更加重了人们当中的挫败感。一些抢劫者还有着其他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伊拉克军队所丢弃的数量众多的武器供应站。一位后来成为反对占领的抵抗运动领导人说:"美国人太愚蠢了——他们几乎是送武器给我们……他们想着我们是窃贼。他们看着我们拿走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和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我们正在与伊拉克的军队作战。"①

162

美国人的统治

与不能为伊拉克提供法治和秩序相伴的,是美国人在决策上所犯的一系列其他错误。美国领导下的对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管理,是在一个被称作"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机构的组织下进行。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后来酿下愚蠢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选择工作人员的方式,对布什政府的政治可信度和忠诚完全代替了技术和专业能力。据巴格达资深通讯员拉吉夫·昌德拉斯卡兰的报道,那些应征薪水

① 引自 Patrick Graham, "Beyond Fallujah: A Year With the Iraqi Resistance",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4, p.43。

丰厚的职位的人,

> ……在求职面试中被问的问题可能会把一位私人部门的雇主拽上法庭……两位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职员说,他们被问及是否支持"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1]以及他们是否投票给了小布什。一位前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雇员曾拥有一份近似于白宫联络员的职务,他在给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中描述了招聘的过程:"我看到前来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应聘职位以帮助这个国家的人员的简历被扔到了垃圾堆里,这些人员都是极富才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并不确定坚持'总统对伊拉克的看法'。我看到一些来自财政部、能源部……和商务部的资深公务人员被拒绝给予巴格达顾问职位,这些职位反而被分派给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重要资助者们。"[2]

包括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在内的美国行政官员看上去完全忽略了伊拉克的具体情况,他们被彻底隔离在巴格达城内被称作"绿区"的地方里,这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帮助。只有一位资深的行政官员懂阿拉伯语,几乎没有人理解伊拉克文化、历史或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无知导致了众多不明智的决断,其中最致命的一个决断是下令废止伊拉克的军队和复兴党。毫无疑问,军队和复兴党都深受旧政权所犯罪行的侵蚀,非常不受人民欢迎。但是即刻遣散军队和复兴党,这种草率的方式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一夜之间,35 万军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拥有武装)被投入到失业者的大军当中。而废止复兴党行动所针对的 4 万人,曾经从根本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管理阶层。许多加入复兴党的官员只是为了仕途顺利,他们并非特别献身于复兴党的意

163

---

① "罗伊诉韦德案"是 1973 年美国最高法院处理的一起取消堕胎限制的案件。小布什政府是完全反对这一裁决的。

② Rajiv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s Green Zone*, Vintage Books, New York, 2006, pp. 103—104.

识形态或萨达姆的领导。由于对军队和复兴党这两个基本机构的废止并没有其他可信赖的选择,这一决定因此只是加重了法治的丧失和混乱。然而,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一针对复兴党政权基础的行动被普遍认为是针对逊尼派的行动,这就加重了本来就在增长的宗派分裂。

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的其他工作重点是在经济自由化的基础上重建国家。对布雷默来说,所面临的问题是异常明确的:

> 市场对资源的分配远比政治家更有效。所以,我们在未来几个月内的战略目标是启动多项政策,以便有效地将国有企业的人员和资源再分配到生产效率更高的私营公司当中。①

但麻烦的是"市场"已经被数十年的战争、制裁和腐败所毁掉了。1991 年和 2003 年的空袭以及之后的劫掠,已经使伊拉克的基础设施成为一片瓦砾。考虑到这些情况,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法只会导致资本的普遍外逃,而不受限制的外国进口也使许多地方工业崩溃。尽管如此,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还是成立了一个被称作"私营部门发展办事处"的新机构,其目的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国营公司的全面私有化。在地方的激烈抵抗下(包括破坏行为和对官员的暗杀),办事处很快明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作为第二选择,美国的管理部门计划将一些工厂出租给私营部门。但是私营部门的数量在经历劫掠后已经大为减少,它们对未来异常谨慎,因此拒绝合作,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到 2004 年 6 月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将权力转交伊拉克临时政府时,没有一家计划中的国营企业被租出去。与私有化相伴的是大量国家补助的取消,在两伊战争和十年制裁期间,国家补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汽油、化肥、种子、食品配给和数量众多的其他物品的补贴,占国家年预算的一半,它们有助于减轻社会的压力和

164

① 引自 Rajiv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s Green Zone*, p. 235。

保持经济的发展。取消国家补助的尝试虽然再次落空,但它却引起了人们严重的焦虑,并进一步削弱了公众本来就已经薄弱的对被占状态的信心。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联盟驻伊拉克临时当局迅速增加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并通过将伊拉克第纳尔与美元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而成功地稳定了纸币。这大大减轻了私营部门和众多拿薪金的雇员的压力。然而,获利最大的还是美国的企业,如哈里伯顿公司和柏克德公司,[①]它们赢得了巨大的重建合同。法治的丧失和绝望的状态为许多肆无忌惮的合作活动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联盟驻伊拉克临时当局并非一家合法的美国实体这一事实,再加上 2003 年后在伊拉克经营的外国公司所享受到的豁免权,从根本上意味着这些公司根本不用对任何人负责。

联盟驻伊拉克临时当局的政治改革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后果。伊拉克各地拥有了基本的自由,如演讲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一部《临时行政法》为这个国家将这些权利保留了下来。尽管保守的宗教团体竭力反对,但妇女权利还是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新的军队和警察力量的基础也确定下来。利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它们关心的问题十分宽泛,从慈善工作到主持关于民主权利的集体讨论。不过,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联盟驻伊拉克临时当局对伊拉克社会在根本上分为三个相互仇视的群体的简单理解,为它的改革打上了烙印,也加深了而不是抑制了不断上升的种族和宗派分裂情绪。尽管宗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伊拉克的历史上随处可见,但是自 1921 年现代伊拉克国家建立以来,提高伊拉克民族认同的任务还是要优先于其他所有地方或宗派认同。即使在宗派主义行为十分明显的时期,人们至少在言论上还是会致力于实现那个无所不包的民族主义。然而,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制裁的重压所导致的国家的衰落,这一点也开始发生变化。2003 年,当保罗·布雷默对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这个直接建立在种族和宗派认同基础上的咨询组织的成员进行任命时,联盟驻伊拉克临时当局就褪去了国家统一的所有伪装。这一先例在后来的伊

① 哈里伯顿公司是一家石油公司,柏克德公司是一家工程建设公司。——译者

拉克政府中得到延续，并在下级政府机构中不断重复。

165

抵抗的实质

对伊拉克的征服完成后不久，各种采用传统游击战的小股部队就开始了抵抗，这并不让人惊奇。尽管没人确切知道抵抗力量的总人数是多少，但假定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各种安全力量的总数为10万人并不牵强，这些人都训练有素，并且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弄到金钱和武器。当多国部队于2003年在伊拉克迅速推进时，这些萨达姆的忠臣们便转入地下，静待新政权会如何对待他们。布雷默废止伊拉克军队和复兴党的决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新秩序感到厌恶。一位记者对抵抗运动的温床费卢杰附近的反抗活动作出了评论，他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记录了一位决心参加武装集团的人的心声：

> 穆罕默德参加抵抗运动的原因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平民的被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古兰经要求穆斯林去与非穆斯林占领者战斗。他担心美国人会把权力移交给什叶派多数派，后者在萨达姆政权期间遭受到的痛苦要远甚于逊尼派，他担心他们会报复。他说，如同大多数“善良的穆斯林”一样，他憎恨萨达姆，但是他怀疑美国会去解放伊拉克。他认为这是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目的在于威胁叙利亚和伊朗，以保护以色列。最后，他参加反抗与愚蠢的占领理念有着很大关系：他就是不愿在自己国家里看到外国士兵。①

人们对武装反抗的支持在不断上升，到2005年，一天平均要发生70次针对占领军的袭击。2004年，反对美国人的抵抗传播到了什叶派，特别是与穆克塔达·萨德尔教士有关联的那些人当中。支持萨德尔的基

---

① Patrick Graham, “Beyond Fallujah: A Year With the Iraqi Resistance”,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4, p.41.

地集中在贫穷的城市中心,尤其是巴格达附近的城市中心。这些贫穷的什叶派市民对于社会公正和经济机会等问题十分敏感,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都受到联盟驻伊拉克临时当局的危害。缩减国家补助或解雇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等政策肯定在贫穷的城市里不受欢迎。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这些人因为同样的原因曾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在 2006 年底反抗的高峰时期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伊拉克人声称他们支持针对美国人的军事行动。大量的支持者中还包括那些并非穷苦的人们。帕特里克·格拉厄姆描述了经济自由化与当地资产阶级的反应之间的密切关系:

166

> 反抗并不缺乏资金的资助。巴格达一位富有的逊尼派人士告诉我,一些反抗组织正在得到他所认识的一些商人的资助。这些商人被新颁布的外国投资法所伤害,因为投资法允许外国公司以低廉的价格大量买进伊拉克的工厂。他们的收入暴跌,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充斥着外国商品。付给公共部门的工资在不断上升,这就激起了这些部门里工资水平低下的工人的怒火。这些商人意识到,暴力是他们唯一具有的竞争优势。这就是简单的商业逻辑:伊拉克的问题越多,外人的涉入就越困难。[①]

反对占领的武装行动十分成功,美国和英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面临危险而巨大的消耗。就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将近4400名美国人和 179 名英国人已经被杀,超过31000人受伤。美国和英国对此的回应通常是笨拙的,但也是残酷的。例如,2004 年对费卢杰的进攻导致大量平民的伤亡,这引发了民众愤怒和复仇的火焰。2003 年末对萨达姆轰动一时的抓捕,也没能减缓人们的反抗。萨达姆后来遭到了审判,被指控曾下令杀死 148 名杜贾尔当地居民,这是萨达姆在逃脱一次暗杀行动后所采

① Patrick Graham, "Beyond Fallujah: A Year With the Iraqi Resistance",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4, p. 42.

取的报复行为。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大部分村民被转移到拘留营里。不过,这次审判并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它所急需的宣泄感和心灵的整体治愈,因为美国人的干涉、糟糕的准备工作和极度褊狭的眼界都让这场审判受到了玷污。杜贾尔事件是作为一件单独而特殊的犯罪行为来解决的,并没有将之在整体上作为政权统治的实质性症状加以解决。此外,萨达姆多次被允许打断审判的过程和质疑法庭的合法性。同样,萨达姆在 2006 年 12 月被匆忙处死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死刑是在伊斯兰节日当中执行的,它中断了对他更多凶残犯罪的指控,比如针对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

1918 年的占领与 2003 年的占领之比较

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已经看到,英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省、巴格达省和摩苏尔省的占领是怎样给伊拉克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美国人的影响会更小一些。考虑到这两个不同的时期以及它们所面临的不同的国际和地区状况,比较一下两个事件或许是危险的。但是,用彼得·斯鲁格莱特的话说就是:“决策上所酿成的大错,其后果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让人们在今天不安地想起 1914—1917 年间英国人的美索不达米亚行动。”同样,今天大多数伊拉克人都倾向于认为这两个事件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就使得有必要对这个主题作出一番比较。

167 或许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就是两次行动主要都是帝国主义利益而非当地事务的结果。伊拉克位于波斯湾顶部的战略位置,说明它是一条重要的连接印度的通道。这是英国在一战开始之前就在伊拉克开展其帝国主义计划的主要因素。美国人同样表达了将伊拉克用作战略地区的想法,借助伊拉克美国可以将其影响覆盖到整个中东。就这一点而言,两次占领都建立了能够超出伊拉克国界而发挥其权力的大规模基地。另一个原因当然是石油。我们已经详细描述了石油对于一战开始时的英国和 21 世纪伊始的美国的重要性。在 20 世纪初,伊拉克的边界与当时英国控制的伊朗南部的油井十分接近,伊拉克国内发现大型油田的形

势非常乐观。1921 年伊拉克政府成立后,英国人最想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取得长期控制伊拉克石油的特权。同样,对美国人来说,石油是制定对伊拉克政策的中心议题。今天,人们知道伊拉克拥有世界已探明的油田储藏量的 10% 。这个国家已知的 80 处油田中,只有 17 处在开采。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的 20 年,伊拉克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从 1984 年的1010万桶迅速上升到 1990 年的51450万桶。与英国人一样,美国人所做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颁布允许外国公司更多地进入伊拉克油田的新法律。美国人并没有让伊拉克政府给予其以往的受人蔑视的石油特权,而是迫使伊拉克政府签署一系列所谓的"产品分成协议"(Production Sharing Agreements,PSAs),这就使得外国人能够有效地控制石油,而伊拉克对石油的国有权就流于口头。

在这两个例子中,占领者作为解放者而受到伊拉克人民欢迎的愿望,都因为反抗的发生而破灭了。同样,在这两个例子里,这些反抗都加速了伊拉克政府的正式建立。不过,占领后所建政府的政权都受到了与占领者所签署的条约的限制。在第一个例子里,英国人于 1922 年、1930 年和 1948 年与伊拉克签署了多个条约,以确保英国在伊拉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但这些条约同时也加深了人民的仇恨,这有助于推动伊拉克 1958 年革命的发生。今天,大多数伊拉克人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 2008 年底与美国签署的《美军地位协定》的。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61.3% 受调查者反对《美军地位协定》。

两次占领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或许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所受苦难的程度。国家恐怖统治、战争和制裁留给伊拉克社会深深的伤疤,是不能和一战开始时人们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不满程度相比较的。伊拉克人民对占领国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尽管许多人对英国人的宗教立场持谨慎态度,但很少对其过去在伊拉克的作为感到异常愤怒。然而,美国进入伊拉克是带着巨大的政治包袱的。包括美国的支持者在内的人们所持有的一个流行观点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主要是受石油利益的驱动。更重要的是,美国以往在中东的记录,不管是它为人所知的对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还是对包括伊朗国王和 1991 年前的萨

168

达姆·侯赛因在内的不受欢迎的政权的扶持，使得人们很难去信任它。这种信任的丧失为2003年之后美伊关系的平稳变化带来了许多障碍。

伊拉克政府的选举与建立

一俟入侵的尘埃落定，各个被流放的组织就迅速返回伊拉克，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而言，四种力量控制了被占之后伊拉克的政界。第一种，或许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是以贾拉勒·塔拉巴尼的库尔德斯坦爱国同盟和麦斯欧德·巴拉赞尼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为主要代表的库尔德人。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建立近似直接独立的自治、扩大他们的自治区以囊括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省的部分地区，以及让巴格达虚弱的中央政府保证他们的收获有效。库尔德人对美国人的到来非常友好，趋向于支持美国人延长停留的时间。第二种力量是一些阿拉伯逊尼派政党，如“伊拉克伊斯兰党”。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伊斯兰主义者，主张在国家管理中使用伊斯兰教法。由于其支持者的大本营正好在巴格达北部所谓的逊尼派三角地带，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权力下放的联邦主义。他们也强调国家的阿拉伯认同，试图削弱伊朗不断增强的影响。逊尼派阿拉伯人最支持反美的反抗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曾与萨达姆的政权有着联系。不过，他们对反抗的支持与同情旧政权并无什么关系，而是与担心在什叶派所控制的新秩序下他们会被边缘化有很大关系。第三种力量包括达瓦党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下的各种什叶派组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后来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这支力量也包括穆克塔达·萨德尔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人。这支力量在政治上是最为多元化的，他们受到具有政治倾向的什叶派的流行观念所鼓动，也被一种在萨达姆统治下遭受迫害的强烈意识所激励。除了主张推进伊斯兰改革外，根据对联邦主义、占领以及与邻国伊朗的关系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他们在政治上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派系。最后一支力量也是力量最薄弱的，它由一些世俗政党组成，如过去的伊拉克共产党和伊亚德·阿拉维的支持者。它同样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包括共产党员、过去的复兴党党员、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者。他们倾

向于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主张用立法来保障性别与宗教的平等。在占领与反抗的氛围下,所有这些政治力量都受到了影响,因为他们需要忍受腐败和族群分裂带来的痛苦。

反抗的趋势在迅速扩大,2004 年 6 月,美国人不得不接受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政府的要求。临时政府由伊亚德·阿拉维总理领导,他是过去复兴党的成员,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都有联系,行使对国家正式但也是有限的控制。伊亚德·阿拉维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世俗主义者,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粉碎反抗活动和举行全国大选。他完成了后一项任务,但是在前一项任务上却输得很惨。很明显,几十年的艰难岁月和中央权力所受的打击,鼓励了种族和宗派分裂气氛的发展,这种气氛依然

表 8.1 伊拉克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比较

候选名单	2005 年 1 月的选举		2005 年 12 月的选举	
	所得选票的百分比	赢得的席位	所得选票的百分比	赢得的席位
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什叶派)	48.2	140	41.2	128
库尔德联盟(Kurdish Alliance)	25.7	75	21.7	53
伊拉克协议前线(Iraqi Accord Front,逊尼派)	拒绝参加	拒绝参加	15.1	44
伊拉克国家阵线(Iraqi National List,世俗派)	13.8	40	8.0	25
其他以什叶派为主的阵线	1.3	5	1.2	2
其他以库尔德人为主的阵线	0.7	2	1.3	5
其他以逊尼派为主的阵线	2.1	6	4.1	14
其他以教派为主的阵线	1.5	4	1.3	3
其他世俗派阵线	1.3	3	0.3	1
其他	5.4	0	5.8	0
总计	100	275	100	275

资料来源:Republic of Iraq, The Independent High Electoral Commission, http://www.ihec.iq/English

支配着伊拉克的政治形势。2005 年举行的两次全国大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表 8.1 所示，在 2005 年 1 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将近五分170 之四的选票投给了表格中名单上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有着明显的种族或宗派支持的基础。在 2005 年末举行的第二次选举中，投给名单上具有种族或宗派特征的候选者的选票上升到选票总数的 85% 左右。

第一届国民议会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后来经过公民复决得以批准。宪法保障了公民的基本自由，并为民主制度建立了框架。但是这部宪法亦有不足之处，因为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有限，更重要的是，新国家的本质（如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本质）并未被提及。尽管如此，权力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得到移交，由来自达瓦党的总理努里·马利基和来自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总统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政府能够平稳地推进国家的稳定。然而，新诞生的伊拉克国家的实质，却是让人感到最为不安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看起来是由与选举人选票一样重要的各宗派之间的力量分配决定的。总理是什叶派，总统是库尔德人，国民议会的发言



图 8.1 伊拉克领导人努里·马利基总理（右）与贾拉勒·塔拉巴尼总统（左），2010 年。Corbis/epa

人是逊尼派。内阁职位的分配同样也考虑到了种族和宗派的平衡。尽管宪法中并没有说明要这样做,但很多人担心,这种情况会成为一种弊病,并催生出更多的分裂。

171

内战边缘

正当新选举产生的政府在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复杂而混乱的情况下扬帆起航时,反抗活动却发生了非常不祥的转向。一些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试图将反对占领的斗争变成一场全面的宗派冲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情况是由之前的政权导致的,但新出现的混乱环境却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推进他们日程的绝佳机会。在 2005 年的一封信中,基地组织的伊拉克领导人这样写道:

> 什叶派信仰是一种不能与伊斯兰教并存的宗教……其信徒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伊斯兰人民喉咙中的一根刺,是一把刺进他们脊梁上的匕首,是毁掉楼房的蛀洞,是一座让伊斯兰教的敌人从上面通行的桥梁。①

2006 年 2 月 22 日,什叶派最为神圣的清真寺之一,萨马拉的阿斯卡里清真寺被威力巨大的爆炸严重损毁。当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与反攻浪潮传播开来时,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领袖都尽最大的力量去平息人民的紧张情绪。之后不久,在一些之前人口杂居的地区发生了宗派清洗。在 2007 年巴格达宗派冲突最严重的时候,帕特里克·卡克伯恩这样描述道:

> 如今的巴格达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了多个不同的部分,它们之间在发生战争。墙上写着黑色的标语:“去死吧,密探!”一个什叶派若在逊尼派的街区里被抓住将会被处死,反之亦然。交战的双方都

---

① 引自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Next Iraqi War? Sectarianism and Civil Conflict*, Middle East Report no. 52, February 27, 2006, p. 15。

> 设有检查站:身穿平民服装的武装分子需要司机出示身份证,凡是怀疑属于相反宗教阵营的人就被叫到一旁;然后对这些人进行审问,并施以酷刑,最后再将之处死。检查站很难躲开:它们没有事先的警告就突然出现。警察每天都会运走30到40具尸体,这些尸体通常都是残缺不全的。[1]

到2006年末,联合国估计大约有3000人死于每月发生的宗派冲突中,使得这个国家的境内以及境外有着将近400万难民。这是自1948年巴勒斯坦人流亡国外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担心,伊拉克难民会像巴勒斯坦难民一样,很快就成为地区动荡的最大根源。那些有办法的人,比如懂技术的专业人员,更愿意远走海外,这就导致国家重建所急需的宝贵人才的流失。宗派冲突深入到国家的体制172之中,因为伊拉克并不成熟的安全力量也被分成逊尼和什叶两大派,每一派通常都会对与自己不同的群体采取行动。

到2008年中期,暴力活动开始衰退。一些因素在减少公开的宗派冲突中起到了作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伊拉克政府日益坚定和自信起来,它对那些非常担心美国占领的人肯定产生了影响。马利基同样作出了重要的努力,去建立一个基础更加广泛的民族团结政府。就这一点而言,瓦解复兴党的运动放慢了,一些军官重新被委以任务。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政府已经将其安全力量扩大到近50万人,尽管许多人还不能胜任,但他们已经能够开始在战斗环境中较好地执行任务了。虽然美国人的存在是明显的,但一些人开始相信这个国家正在慢慢走向独立。2007年,美国决定派遣额外的2万名士兵与反抗分子作战。美国士兵在数量上的所谓"激增"对诸如安巴尔省这样抵抗尤为强烈的地区产生了影响。在一次更惹人争议的行动中,一些反对基地组织的部落首领受到鼓励,在美国的资助下建立起准军事力量。这些所谓的"觉醒会"成员证

---

① Patrick Cockburn, "Nowhere to Hid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2 February, 2007, p. 14.

明他们在稳定本地区的秩序上十分有效,但他们也为巴格达的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因为他们根本不受控制。从更为消极的一面来说,宗派冲突的衰落或许也可以归于这个事实,即伊拉克的庞大派别已经被清洗了,且被相互竞争的群体有效地分裂了。但这一过程有多么彻底,它是否还会翻转过来,人们依然不甚清楚。

稳定的迹象抑或暂时的缓解?

当后萨达姆时期的停战过去六年之后,我们再细想一下伊拉克的情况,其复杂的结果和未来的可能依然十分不确定。一个明显可以看到进展的领域是伊拉克与其邻国的关系。考虑到萨达姆所留下的几十年的冲突与战争的烂摊子,这一任务的完成也是很不容易的。伊拉克与其邻国成功地签署了一些协议,涉及全面的外交往来、经济关系、安全以及难民问题。伊拉克所欠阿拉伯国家的大多数外债得以解决。几年之前还是伊拉克世敌的伊朗同意训练伊拉克的警察学员,伊拉克与叙利亚位于地中海的港口之间也计划修建几条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公路。伊拉克的所有邻国都表达了对遏制并最终消除具有跨国境威胁的暴力的真正关切。特别是土耳其,它可以从一个强大的伊拉克国家那里获益甚多,因此它决定遏制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同时保持伊拉克石油向其港口城市杰伊汉的输送。考虑到萨达姆过去发动的侵略行为,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为一个强大的伊拉克感到担心,但它们更担心的是,如果伊拉克的中央政府过于衰弱,它将不能阻止国家的分裂。这一点是很真切的,即便伊朗也认为,阻止伴随伊拉克内战而产生的威胁越过边界,似乎比过去不惜发动一场 20 世纪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来惩罚这个国家还要急切。伊朗同样认为,一个稳定的、领土完整的伊拉克会加速美军的撤离。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2006 年对此总结道:“伊拉克政府在建立安全的过程中越成功,外国人就越没有理由和借口继续他们的占领。”①

173

① 引自 Ray Takeyh, “Iran's New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1, winter 2008, p. 28。

不过,伊拉克最需要提高的是国内安全。大概从 2008 年开始,对所有其他事务都至关重要的安全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根据建立在伊拉克的智库"伊拉克调查与战略研究中心"2008 年 10 月的调查,68.4% 的人说他们对所在街区的安全问题感到"非常安全",这一数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尽管如此,回答者也表达了他们对法治和秩序问题的不安定感。当问及他们最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时,55.3% 的多数人依然认为是提高安全。虽然 70% 的受调查者依然倾向于主要认同自己是伊拉克公民,而不是去认同种族、宗教或地区联系,但国家的团结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暴力活动的下降对政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今有迹象表明,曾经控制政治环境的种族或宗派集团正在开始分裂。新集团的出现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而不是宗派问题的。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的权力平衡。由于库尔德人正在进一步推进公开的独立,什叶派集团开始发生分化,一派支持马利基总理的建立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坚决要求,一派支持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促进一个权力下放的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近来也有一些迹象表明,库尔德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也在加大,这主要与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同盟之间久已存在的权力分配有关。甚至逊尼派集团也是脆弱的,在参与政治进程中所引发的争执、对近来不断激化的反抗活动的支持,这些都引起了逊尼派领导权的重要变化。

这些变化在 2009 年 1 月举行的 14 个省区(伊拉克全国共 18 个省,其中有争议的塔米姆省[Ta'mim]和三个库尔德省推迟了选举)的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与之前的选举不同,伊拉克的安全力量已经能够独立负责提供法治和秩序了。尽管发生了对八位候选人的暗杀事件,但安全力量已经做得相对很好了。与 2005 年市政选举中 200 名候选者惨遭杀害相比,这一数字尽管表明安全问题依然存在,但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2009 年,逊尼派政党在抵制了四年前的选举后,此次全部参加了选

174

① 调查报告的结果可参见 http://musingsoniraq.blogspot.com/2008/10/iraq-center-for-research-strategic.html。

举。多数人依然倾向于以宗派为基础的政党,但这些政党并没有像2005 年那样在宗教人口杂居的省份联合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阵营。世俗派候选人同样取得了自 2003 年以来历次选举中的最好成绩。不过,2009 年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或许是候选人成分的重要转变,即从流亡者转向了萨达姆统治时期以来就一直定居在伊拉克的人。在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联盟的发展打破了种族或宗派的界线。美国国会研究处在其报告中提到了这次选举:

> 诸如前总理伊亚德·阿拉维所领导的世俗政党展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力量,它向我们说明,选民偏爱致力于强大的中央政府、"法律原则"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观念的阵营。①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跨越了宗派的藩篱,人们依然担心事态会复发,导致国家发生全面内战。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裂痕,依然让人感到反复无常。虽然许多逊尼派领导人放弃了抵抗,转而反对像基地组织这样更为极端的团体,但他们仍然抱怨被排除在重要的国家体制之外。在库尔德人的自治程度和基尔库克的地位问题上,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张。最近,库尔德地区政府加大了赌注,它通过了一项宪法草案,声称某些重要且有争议的地区是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这些地区包括石油储藏量丰富的塔米姆省及其种族成分复杂的省会基尔库克,以及摩苏尔周边的大片区域。巴格达与库尔德政府之间就后者可以单方面与外国公司签署石油开采和出口协议,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库尔德的鹰派政治家们正受到驱使,去制定完全独立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伊拉克邻国,尤其是土耳其和伊朗的关注,它们的干涉可能会导致地区的冲突。许多观察家,如阿蒂德·达维沙,就不为近来暴力活动的消退所动,他们

---

① Kenneth Katzman, *Iraq: Politics, Elections and Benchmark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o. RS21968, April 22, 2009, p. 9.

仍然担心事态会变得更加糟糕：

> 应当说，这个国家内部各种群体之间身体和心理上不断加大的距离，使人们很难想象未来的伊拉克会成为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治实体。[①]

175 可是，如今的伊拉克政府所取得的成果依然是重要的。即使2008年末与美国签署备受争议的《美军地位协定》时，伊拉克政府也赢得了美国的重大让步（尽管美国人表示反对）。协定定下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即到2011年12月31日那天，美国所有的战斗力量将离开伊拉克。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在对房屋和住所进行搜查时，同样需要得到伊拉克人的批准，并遵循伊拉克的法律。尽管许多伊拉克人对协定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实际上使美国的继续占领合法化了，但其他一些人则相信，协定已经在实际上对美军的行为作出了重要限制，并为撤军设定了具体的时间表，这两点都提高了伊拉克的独立地位。6月30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重要一步迈出了，当天美国将其部队撤离了伊拉克的所有重要城市，并将150个基地移交伊拉克政府。当政府宣布6月30日为国家主权日，许多人冲上街头去庆祝外国军队的离开时，赢得独立已经是清晰可见了。一位记者描述了这一场景：

> 整个城市已经看不到美国的军队和直升机，身穿军装的伊拉克人的愉悦以及高兴的欢呼声，给这个伤痕累累、饱受困苦的首都带来了一种罕有的类似狂欢节的气氛。伊拉克警察和军队的车辆上装饰着丝带、气球、塑料鲜花和崭新的国旗。一些巴格达人开车行驶在星期一中午炎热的阳光下，不断地揿着车喇叭，而乘客们则把

---

① Adeed Dawisha, "The Unraveling of Iraq: Ethnosectarian Preferences and State Perform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2, Spring 2008, p. 230.

身子悬在窗外,挥舞着国旗,尽情欢呼。[1]

然而,很少有人怀疑,在这个国家真正高兴起来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让伊拉克政府感到尴尬的事实是,伊拉克还要严重依赖美国的空中和后勤支持。就在本书写作时,仍然有134000名美国士兵和13万军事承包商留在伊拉克。虽然美国士兵的人数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不断下降,但军事承包商(其中多数为美国人)的人数却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在不断上升。

---

① Ernesto Londoño, "At Least 26 Killed in Kirkuk as U. S. Withdraws from Iraqi Cities," *Washington Post*, 30 June, 2009.

177

结　语

在过往的 14 个世纪里,伊拉克人民在按照阶级、地区和部落作出划分的同时,也被划分为城市与乡村、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等不同的群体。这些不同群体为和谐共存而作出的斗争历经多个阶段。7 世纪中期,阿拉伯穆斯林武士统治下的伊拉克,建立起某种程度的社会和谐,这有益于尊重每个群体的自治。到 750 年,阿拉伯精英中所出现的部落分裂以及非阿拉伯穆斯林追求平等的需要,削弱了这种稳定性,并使伊拉克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统治下,逊尼派穆斯林的平等成为这个复杂的世界性帝国的基石,在这个帝国之内,巴格达、瓦西特、巴士拉和摩苏尔这样的大城市中心统治着其周边的乡村。尤其是巴格达,它荣升为帝国的中心,将伊拉克不同地区联系起来,巴格达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一起,成为这个国家众多民族政治统一和经济统一的坚实基础。到 950 年,阶级的分裂、中央权力的软弱以及土耳其移民的到来让族群关系更为紧张,同时也加剧了部落主义和加深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裂。1258 年蒙古人的入侵实际上已经导致中央政权的崩溃,部落权力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城市却为此付出代价,伊拉克社会的分裂因而更加恶化。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国家遭受到不断的入侵,经济、人口与文化也严重衰退。虽然巴格达的权势已经大为下降,但它依然是一个地区性中心,故而能够继续保

持政治上的统一感(只是在某些时候无法做到这一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通过限制部落权力和实现有限的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这种颓势。族群关系虽然在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对什叶派波斯人的仇恨,178 却让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打上了一种危险的政治烙印。在主要的城市中心里,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让人们看到了建立在新的公民概念之上的民族团结的初步发展。这样,伊拉克首次以一种更加包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什叶派的宗派主义或部落的地方主义,表达了对奥斯曼人统治的反抗。

1920 年,在伊拉克各族人民早期团结一致对抗英国人新建立的统治的情况下,伊拉克的民族团结出现了深入发展的迹象。整个委任统治和君主制期间,中央化的国家和反对英国人的力量都推动了伊拉克民族融合的稳步发展。对民族融合表现出最大抵制的是库尔德人。其领导人长期孤立地生活在家乡的群山之中,他们同样疏远了给当时多数政治对话带来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融合的另一主要障碍是农村中所存在的高度压迫的半封建关系和部落关系。在反对力量中,社会主义因其主张社会正义、摆脱外国统治而获得独立、强调阶级团结、排斥宗派或种族分裂、承诺动员全民族以图发展等思想而拥有大量追随者。1958 年的革命消灭了过去的地主精英,为政府引入了共和体制,这场革命深受上述思想影响,释放出一种巨大的乐观主义。国家制定了一些进步的法律和法规,旨在推进社会正义、废除部落和宗教法律、鼓励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更大的关爱,民族团结因此显得更加强大。然而,新的共和国很快就成为在新国家的发展方向上所引起的一系列领导权之争的受害者。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族群分裂再一次呈现出集团斗争的本质。除此之外,共和国末期政权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调,引起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对抗性的增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伊拉克民族团结的严峻挑战。

这些困难并没有完全使民族融合的普遍进展偏离其轨道。到 20 世纪 70 年代,依靠不断增加的石油收入和日益增强的压制手段,伊拉克得以将其统治扩展到这个国家的遥远角落。诸如土地改革和鼓励工业发

展等结构性转变，逐步摧毁了各个群体独立的经济基础，而农村的供电、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和小学义务教育的推行，则将国家更为紧密地联系在179 一起。但是，国家的独裁本质并不能让民族融合顺利发展。市民社会的一切特质都被消除了，旧有的社会联系保留了下来，成为控制这个国家的令人窒息的唯一选择。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下，与伊朗和美国进行的极具毁灭性的战争所带来的压力、严酷的国际制裁以及通常是对所有群体所进行的残酷镇压，都使宗派和种族分裂更为激化。在这样一个脆弱的时代，国家却在积极地推动社会分裂，以避免出现一个能够替代萨达姆政权的民族力量。虽然反对派意识到，如果缺少一个基于尊重多样性的民族团结的平台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但他们本身却不能从社会分裂中幸免。

2003 年 3 月，美国领导下的又一场战争所引发的危机，再次考验着这个国家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萨达姆的最后一战被证明是非常软弱的。到 4 月份，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就占领了整个国家，迫使复兴党的领导销声匿迹。尽管许多伊拉克人为独裁统治的结束而感到欢欣鼓舞，但他们也对外国人的占领持警惕态度。就在本书写作之际，后萨达姆时代的一些状况证实了这些担忧。集权主义和独裁统治所留下的伤痕，再加上无能且通常是压迫性的占领政策，似乎都在使这个国家急速失去控制，走向宗派主义、内战和全面混乱。不过，到 2009 年时，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正在慢慢变得更加稳定。选举得以进行，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建立起来，暴力冲突衰退了，占领军也撤离了主要的城市。今天，设想相互争斗的宗派能够就共存所必需的要求逐渐达成谅解，并以此来取代彼此之间的毁灭，这可能已经不再是什么让人感到勉强的事了。

虽然萨达姆的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国家分裂的威胁一定还会存在数十年，但这一想法不应当降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统一作用，以及巴格达在伊拉克各族人民心中的中心位置。在过往的 14 个世纪里，这个国家在许多时候，都眼睁睁地看着各种离心力量似乎要将社会分裂，只有通过一场为争取和谐共存而进行的艰难但却是强硬的斗争，才能使这个国家再次聚合起来。的确，今天最不同寻常的事情

是这么一个事实，即不论近年来战争、制裁、国内镇压和外国占领带来的破坏多么严重，这个国家依然团结在一起，而这些灾难或许已经让那些更为发达的国家四分五裂了。当然，人们无法保证伊拉克社会将继续团结下去。但是，假如这个国家能够得到一点点和平与稳定的话，它也许就能够克服近年来独裁统治和占领所带来的挫败。

部分参考书目

Abdullah, Thabit, *Merchants, Mamluks and Mu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in Eighteenth-Century Basra*, Albany, NY, 2001.

Abdullah, Thabit, *Dictatorship, Imperialism and Chaos: Iraq Since 1989*, London, 2006.

'Ali, 'Ali Shakir, *Ta'rikh al-'Iraq fi al-'Ahd al-'Uthmani, 1638—1750: Dirasa fi Ahwalihi al-Siyasiyya*, Naynawa, Iraq, 1984.

Arnove, Anthony (ed.), *Iraq Under Siege: The Deadly Impact of Sanctions and War*, London, 2000.

Ashtor, E.,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976.

Al-'Azawi, 'Abbas, *Ta'rikh al-'Iraq Bayn Ihtilalayn*, vols 3—4, Qumm, 1939.

Batatu, Hanna,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A Study of Iraq's Old Landed and Commercial Classes and of its Communists, Ba'thists, and Free Officers*, Princeton, 1978.

Chandrasekaran, Rajiv,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s Green Zone*, New York, 2006.

Cockburn, Patrick, "Nowhere to Hid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2 Feb-

ruary, 2007.

Cole, Juan and Momen, Moojan, "Mafia, Mob and Shiism in Iraq: The Rebellion of Ottoman Karbala 1824—1843", in *Past & Present*, no. 112, August 1986, pp. 112—143.

Dann, Uriel, *Iraq Under Qassem: A Political History, 1958—1963*, New York, 1969.

Deyoung, Terri, *Placing the Poet: Badr Shakir al-Sayyab and Postcolonial Iraq*, Albany, NY, 1988.

Farouk-Sluglett, Marion and Sluglett, Pe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nd Tenure and Rural Social Structur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Iraq c. 1870—1958",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15 (1983), pp. 491—505.

Farouk-Sluglett, Marion and Sluglett, Peter, "Iraqi Ba'thism: Nationalism, Social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in CARDRI, *Saddam's Iraq, Revolution or Reaction?*, London, 1986, pp. 89—107.

Farouk-Sluglett, Marion and Sluglett, Peter, *Iraq Since 1958: From Revolution to Dictatorship*, London, 1987.

Fattah, Hala, "Representations of Self and the Other in Two Iraqi Travelogues of the Ottoman Perio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0, no. 1, Feb. 1998, pp. 51—76.

Garfield, Richard, "The Public Health Impact of Sanctions: Contrasting Responses of Iraq and Cuba", i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15, summer 2000, pp. 16—19.

Ghanima, Yusuf Rizq-Allah, *Nuzhat al-Mushtaq fi Ta'rikh Yahud al-'Iraq*,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97.

Graham-Brown, Sarah, "Sanctioning Iraq: A Failed Policy", i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15, summer 2000, pp. 8—35.

Graham-Brown, Sara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Iraq*, London, 2000.

Graham, Patrick, "Beyond Fallujah: A Year with the Iraqi Resistance", *Harper's Magazine*, June, 2004.

Guest, John, *The Euphrates Expedition*, London, 1992.

Hadarat al-'Iraq, vol. 10, Baghdad, 1985.

Haj, Samir, *The Making of Modern Iraq, 1900—1963*, Albany, NY, 1997.

Hashim, Ahmed, "Saddam Husayn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Iraq: The Quest for Legitimacy and Power," i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7, no. 1, winter 2003, pp. 9—41.

Hitti, Philip K., *History of the Arabs*, New York, 1970.

Holt, P. M., *Egypt and the Fertile Crescent, 1516—1922: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1996.

Hourani, Albert,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New York, 1991.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New York, 1993.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Next Iraqi War? Sectarianism and Civil Conflict*, Middle East Report no. 52, February 27, 2006.

al-'Iraq fi al-Ta'rikh, Baghdad, 1983.

Ismael, Tareq, *Iran and Iraq: Roots of Conflict*, Syracuse, 1982.

Issawi, Charles (ed.), *The Fertile Crescent, 1800—1914: A Documentary History*, Oxford, 1988.

Jabbar, Faleh A., "Shaykhs and Ideologues: Detribalization and Retribalization in Iraq, 1968—1998", i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15, summer 2000, pp. 28—48.

Jayyusi, Salma Khadra (ed.), *Modern Arabic Poetry: An Anthology*, New York, 1987.

Jwaideh, Albertine, "Midhat Pasha and the Land System of Lower Iraq", in *St. Anthony's Papers*, no. 16, London, 1963, pp. 106—136.

Jwaideh, Albertine, "Aspects of Land Ten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Lower

Iraq During Later Ottoman Times", in Tarif Khalidi (ed.), *Land Ten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irut, 1984.

Katzman, Kenneth, *Iraq: Politics, Elections and Benchmark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o. RS21968, April 22, 2009.

al-Khafaji, ʿIsam, "The Parasitic Base of the Baʿthist Regime", in CARDRI, *Saddam's Iraq, Revolution or Reaction?*, London, 1986, pp. 73—88.

al-Khafaji, ʿIsam, "State Terror and the Degradation of Politics", in Fran Hazelton, *Iraq Since the Gulf War: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London, 1994, pp. 20—31.

al-Khalil, Samir, *Republic of Fear: The Politics of Modern Iraq*, Berkeley, 1989.

Khoury, Dina, *State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sul, 1540—1834*, Cambridge, 1997.

Lewis, Bernard,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vols 1 and 2, New York, 1974.

Longrigg, Stephen Hemsley, *Four Centuries of Modern Iraq*, Oxford, 1925.

Makiya, Kanan, *The Monument: Art, Vulgar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Iraq*, Berkeley, 1991.

Marr, Phebe,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Boulder, 1985.

McCarthy, Justin, *The Ottoman Peoples and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2001.

Mohsen, Fatima, "Cultural Totalitarianism", in Fran Hazelton, *Iraq Since the Gulf War: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London, 1994, pp. 7—19.

Momen, Moojan, *An Introduction to Shiʿi Islam*, New Haven, 1985.

Nieuwenhuis, Tom,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Iraq: Mamluk Pashas, Tribal Shaykhs and Local Rule Between 1802 and 1831*, The Hague, 1981.

Owen, Roger,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

don, 1981.

Owen, Roger and Pamuk, Sevket, *A History of Middle East Econom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1999.

Ra'uf, 'Imad 'Abdul-Salam, *'Adila Khatun: Safha min Ta'rikh al-'Iraq*, Baghdad, 1997.

Rejwan, Nissim, *The Jews of Iraq: 3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oulder, 1985.

Sanctions on Iraq: Background,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Cambridge, 2000.

Savory, Roger, *Iran Under the Safavids*, Cambridge, 1980.

Sbahi, 'Aziz, *'Uqud min Ta'rikh al-Hizb al-Shuyu'i al-'Iraqi*, vol. 1, Damascus, Syria, 2002.

Shaw, Stanford, and Shaw, Ezel Kur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s 1 and 2, Cambridge, 1977.

Sluglett, Peter, "Imperial Myopia: Some Lessons from Two Invasions of Iraq",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2, no. 4, Autumn 2008.

Spuler, Bertold,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ased on Eastern and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72.

Stripling,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The Ottoman Turks and the Arabs, 1511—1574", in *Illinois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6, no. 4, Urbana, 1942.

Al-Suwaydi, 'Abdul-Rahman bin 'Abdullah, *Ta'rikh Hawadith Baghdad wa al-Basra min 1186 ila 1192 AH/1772—1778 AD*, Baghdad, 1978.

Tarbush, Mohamm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Iraq to 1941*, London, 1982.

Tripp, Charles,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2002.

Yapp, M. 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 London, 1987.

Yapp, M. E., *The Near East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A History to 1995*,

London, 1996.

相关的论文引自: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ition*, Leiden, The Netherlands.

Al-Mada, < http://almadapaper. net/ > Iraqi newspaper, published in Baghdad.

Al-Zaman, <http://www. azzaman. com/ > Iraqi newspaper, published in Baghdad.

Al-Hayat, < http://international. daralhayat. com/ > Arabic newspaper, published in London.

Aswat al-'Iraq, < http://ar. aswataliraq. infol. > Iraqi news agency, published in Baghdad.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shed in New York.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in Washington, DC.

索　　引

（索引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译　后　记

本书的翻译是译者2010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完成的。在弗大期间，除了每周一次与导师会面和参加研讨课外，翻译该书成了一段时间里的必修课，而那段时间正是弗大所在的小城夏洛茨维尔最好的季节。常常会想起我和妻子所居住的那套公寓。它位于一个小山丘之上，南面不远处是一条马路和学校的足球场，北面楼下紧邻一个绿草如茵和橡树成荫的低地。时逢周末，房间的南面就会传来操场喇叭里的音乐声和进球后的阵阵欢呼，而北面的阳台则是我们欣赏风景的观景台。我们曾坐在阳台上观看暴雨的来袭，拍摄枝头跳跃的松鼠，也在夜晚屏气敛息地偷窥月光下觅食的小鹿。每周总有一天，我会和妻子一起坐上校车去超市买回一周的食品。虽然背包每次都因为装满了各种食物而沉重不堪，但临近回家时的心情却是欢快的。还记得校园里怒放的紫薇花、折扣店里各种廉价的名牌衣物、达顿商学院免费的咖啡、法学院花园那把印下我们身影的座椅、Lady Gaga 演唱会上的火爆场面……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也都留在了这部译稿里。

本书的作者塔比特·阿卜杜拉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除本书外，还出版了多部伊拉克历史方面的专著。该书初版于2003年，2011年再版。本书在翻译时，第二版尚未出版，译者是根据作者提供给出版者的电子版译出。回国后又根据第二版，补译了个别作者新添的文字，并翻译了书中图片和插图的文字说明。该书的一个特色是叙述详简

得当，在不大的篇幅里，勾勒出伊拉克从古至今的历史全貌，让读者一目了然。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作者也能够从多个角度入手，尤其注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伊拉克裔的美国人，作者能够看到西方学者所忽略和回避的问题，其结论因而也更为客观。相信读者在看完本书后，会对伊拉克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商务印书馆的张艳丽女士对译稿进行了辛苦而认真的编辑工作，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于沛老师和商务印书馆的王明毅先生，促成了本书的翻译。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在弗吉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谢之恒，他的帮助使我和妻子在弗大的生活更加愉快和难忘，祝愿他顺利完成学业。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丁哲女士，她的陪伴、鼓励和支持，一直是我工作的动力。

这部译作想献给我的父亲，他对世界局势尤其是伊拉克局势的理解，常常让我这个世界史工作者自叹弗如。他的一些观点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印证。

由于本人的专长不是伊拉克史或中东史，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慎之又慎，查阅了多种资料，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译　者

2011 年 10 月 21 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伊拉克史=A SHORT HISTORY OF IRAQ
作者=作者:（美）塔比特·A.J.阿卜杜拉著；张旭鹏译
页数=219
SS号=13336541
出版日期=2013.0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